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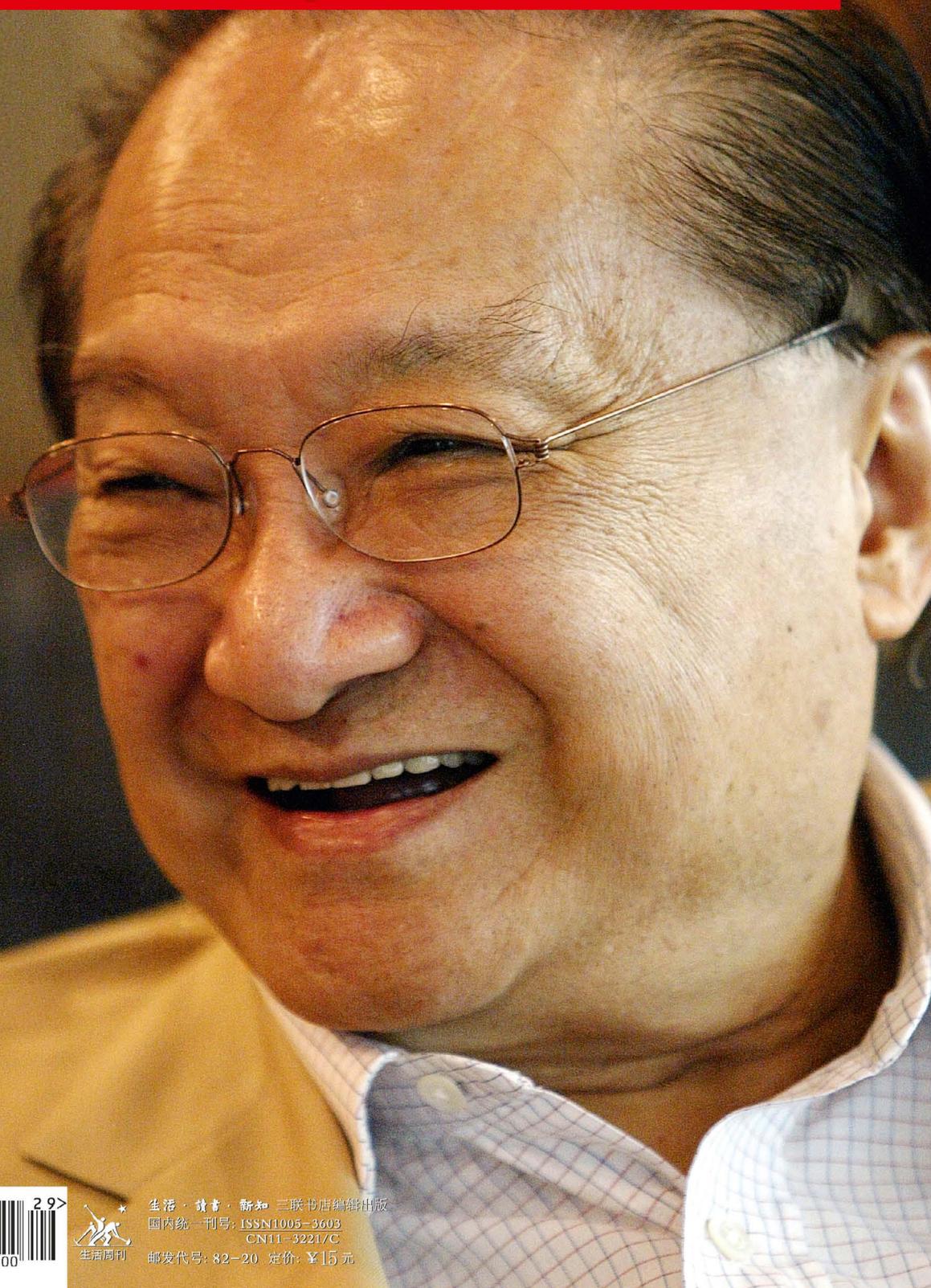
影响世界的人

2017.7.17
2017年第29期
www.lifeweek.com.cn

三联生活周刊

金庸

传奇香港和辽阔江湖



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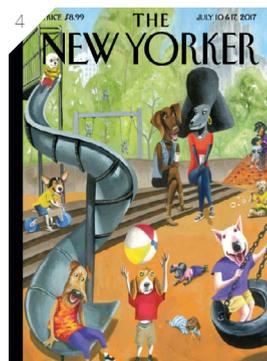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新闻周刊》(美国) 2017.7.7

“伊斯兰国”的儿童训练营

“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为了更好地巩固下一代年轻成员，迅速且有条不紊地强制控制学校课程，并通过礼物和宣传视频将孩子们引导到训练营，进行洗脑式的训练，而后者对儿童的影响和伤害更大。进入训练营的孩子，从改变外观开始被引导，并通过原有的爱好如踢球等运动慢慢接受训练营的渗透，从而认同所谓“真正的伊斯兰教”。



1 / 《外交世界》(法国) 2017.7 伦敦，究竟是谁的城市？

摧毁了格伦费尔塔的“6·14”火灾，导致多人丧生，也让很多英国人清楚地认识到一点：伦敦已经不再是一个基于民众的城市，而是一个资本至上的城市，或者说，它建立在金融交易之上，而不是家庭。火灾发生后，人们开始质疑政治和经济选择迫使安全维护费用的降低，从而成为灾难的原因之一。在接连的恐怖袭击和其他事故之后，伦敦居民的日常安全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3 / 《经济学人》(英国) 2017.7.8 德国问题

本周在汉堡举行的G20峰会成为主张保护主义的美国和支持自由贸易的德国之间的角力场。德国的贸易顺差在去年几乎达到3000亿美元，给全球贸易体系带来巨大负担，而世界上其他国家为抵消这些顺差，必须以同等规模借债并支出。德国因此成为特朗普等保护主义者攻击的目标。但德国尚未意识到过度储蓄的危害，坚持认为自由贸易绝对正确。

2 / 《新科学家》(英国) 2017.7.8 一些很酷的伦理问题

我们应该给动物权利吗？应该通过高科技手段给孩子更好的基因组吗？应该放弃线上隐私权吗？应该让每一个人变得更合乎“标准”吗？应该加强人口控制吗？应该赋予机器人以杀人或自杀的权利吗？应该殖民其他星球吗？本期《新科学家》讨论了若干基因革命、人工智能时代产生的新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有些看似如科幻般天方夜谭，实际上又与人性、人类生存这些现实问题密切相关。

4 / 《纽约客》(美国) 2017.7.10 Uber：CEO出局

今年2月，Uber公司的两位股东回应了女工程师的性骚扰控诉，4个月后，创始人兼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在其他高管纷纷辞职后下台。这家曾经最被看好的公司，除了歧视女性外，还存在内部腐败、知识侵权等严重问题，其烧钱速度之快引起了投资人的担忧，他们认为根本的症结在于卡兰尼克，但卡兰尼克的终点能否成为Uber的新起点，还不得而知。



P30

封面故事

传奇香港和辽阔江湖

金庸

- 34 香港的金庸，金庸的世界
- 48 陈平原：金庸小说何以长盛不衰？
- 54 金庸的“身份”
- 58 金庸访问记
- 64 与金庸同校的日子
- 68 金庸、狄更斯、《圣诞颂歌》与侠之大者
- 76 成为萧峰：金庸笔下的男性进化史
- 80 金庸的三种江湖

P86

香港回归 20 年：问题复杂，机遇犹在



P94

宁乡洪灾，一起冲锋舟救援悲剧

**社会**

- 专访：香港回归 20 年：问题复杂，机遇犹在 86
- 热点：宁乡洪灾，一起冲锋舟救援悲剧 94
- 热点：沙河市场，从美丽新世界到垃圾场 100
- 逝者：张忠培，一代考古人 104
- 调查：海外置业：与中国楼市不一样的投资思维 108
- 新消费：迷你 KTV：移动支付新风口 118

经济

- 市场分析：又见煤价反弹 84
- 商业：“00 后”社交新体验：成为鹿晗之后，我再表达我自己 122
- 商业：一位外观设计师眼中的“天云灰” 126

文化

- 人物：吴秀波：我有困惑，所以做戏 128
- 戏剧：铃木忠志和两出希腊悲剧 134
- 收藏：《埃及艳后》非米开朗琪罗亲笔？ 138
- 设计：为非洲社区而建造 142

- 时尚：给西装来点“不正经” 146
- 书评：国家只是一种无机物 154

专栏

- 邢海洋：生态化“反应”式烧钱 16
- 袁越：同性恋都是天生的吗？ 150
- 张斌：听到球门柱的诉说吗？ 152
- 宋晓军：解决问题需要更多的时间 153
-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57
- 朱伟：余华：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2） 158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1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2
天下	10	好东西	26
理财与消费	18	个人问题	160
好消息·坏消息	20		

2017年第29期，总第945期，2017年7月17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丘谦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丹 Yang Dan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王海燕 Wang Haiyan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张富伟 ZhangFuWei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乔龙宁 Qiao Longning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宇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 lianhuawei@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 沈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883566
-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 太原：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 封二~扉1 · 宾利
- 3 · 霞公府
- 17 · 三联全媒体
- 33 · 生活周刊
- 99 · WWF
- 117 · 松果生活
- 133 · 三联中读
- 151 · 三联书店
- 封三 · 熊猫茶园
- 封底 · 哈苏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
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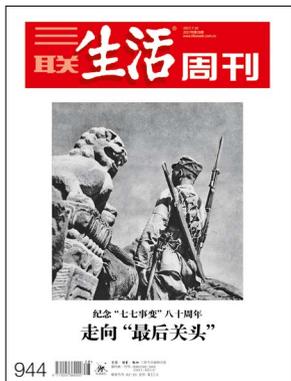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电邮：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走向“最后关头”

2012年读关于“卢沟桥事变”75周年纪念专刊时，第一次发觉原来历史和政治还可以用这样微观的视角来描述，自那以后，成为三联的忠实拥趸。这不知不觉中，三联陪我走过了5个年头啦。5年之后，又看三联解读“七七事变”，这一次把眼光放到了一个更长线的时间中来看待这个历史事件的发生背景和必然性，从1931年引发局部抗战开始的“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卢沟桥枪响，这6年中，中日两国的政策演变、政治人物的活动以及民众的心理变化都成为解读这场战争的关键，而其中很多细小的节点往往被人们忽略。虽然讲述严肃的历史，但内容材料翔实充沛，更有轶事穿插其中，读起来趣味盎然。这样一段重要的历史，值得每隔几年就拿出来细细思考一番。

(@一只特立独行的猫)

不是“对头”

看过太多强拆与“钉子户”的报道，受此影响，对于居民与征拆部门、开发商的关系，我也不由自主地认定那就是一对水火不容的“冤家”。事实上还真不是这样。促使我改变这种印象的，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还有我的一班新同事。

朋友老皮在湖南常德某地承包了几片荒山种植蔬菜，经营些年头了；后来他又看中了一片有水有田的“宝地”准备开发建设生态型农家庄园。去年底，我去看望老皮，他在向我介绍了他的宏伟蓝图后，带我現地踏勘了他规划中农家庄园的边线界址。其间，一位40岁上下的农村妇女看到我们一行，满脸怒气而来，大有兴师问罪之意。原来，该老乡在几年前与村里签订协议承包了一小片鱼塘，还没有到期，老皮承包经营是直接 with 村组联系的，老乡担心自己利益受损。老皮不急不气，和颜悦色地耐心解释，提出一个方案：鱼塘承包事宜须由他们两方和村组干部一起当面核准协商，对方愿意提前转让且价格合适他可接手承包，对方不愿转让他也可以不承包，并表示他承包区域的边界围栏等相关建设一定会充分考虑对方正常的经营需求。一番话下来，我见到那位刚刚一脸怒气的老乡，脸色突然变得灿烂

了，并反复延请我们到她家里小坐，烧水泡茶，请吃水果点心，十分热情。

这令我有些意外，但还仅仅停留在对老皮口才的佩服上，真正让我产生颠覆性印象的是后来的见闻。下午，老皮带我去看他的几个蔬菜种植点。每到种植点，当地老乡见到他，一口一声“皮总”，叫得十分亲切，这不由得让我心生纳闷，也开始细细观察起老皮的言谈举止和处事方式来。我发现，在几个蔬菜种植点转场的过程中，路遇赶集的老乡，他都会主动停下车，捎人一程。每到一地，见到老乡，年纪大一些的，他都能“某大爷”“某大娘”地称呼人家，年轻一些的，甚至能直呼别人的绰号。他抽着上百元一盒的烟，见着人都会递上一支，寒暄几句，偶有老乡递给他三四元一盒的香烟，他也自然而然地接过、点上。总之，他能跟当地百姓打成一片，相处十分融洽。这哪是“水火”关系？分明就是“鱼水”关系嘛！面对我的疑惑，老皮说：我是商人，也是农民的儿子，将心比心，老乡都不容易，我不能与他们斤斤计较，必须保证他们的利益，必要的时候我还可以适当让利。

说完朋友老皮，再说说我的新同事。机缘巧合，我的第二份工作恰巧就是在征收安置部门。说实话，初到这个单位，我是心有

顾虑心怀忐忑的——出于一种习惯思维，我总觉得履行好职责、完成好任务与维护好老百姓利益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我担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被分在安置部门，没有在征收一线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但从工作群动态中，看到过一些诸如堵工之类的矛盾冲突的发生，看到了同事们深入现场耐心解释说明、细致宣讲政策，也看到了矛盾的迅速化解。我所在的办公室，有两个年轻女孩，她们的工作之一就是发放临时安置费、出具小孩入学等相关证明，她们对于前来办事的老乡都是笑脸相迎、热情服务，遇见老者还会主动让座端茶，对于一些材料携带不全的老乡，她们也不像某些部门一句“材料不全”就把人晾在一边，而是表现出了超乎年龄的耐心，一一讲解需要的材料、具体的办理程序等等。面对老乡的致谢，她们的答复是俗套却又比较陌生的“应该的”，甚至会带着歉意说一句“麻烦您多跑了一趟”，着实令人如坐春风、倍感温暖。

由此我想，世上没有那么多“刁民”，只有不懂政策、不明真相的群众，没有不明事理、不讲道理的百姓。只要彼此尊重，

始终以平等的姿态进行友好协商，商人多一点互惠的让利心意，公务人员多一点公仆的服务意识，就一定会少些对立、多些和谐，原本的“水火”关系、“猫鼠”关系也完全可以变成“鱼水”关系。

湖南怀化 光明

“材料”课题研究

近几年，有些地方在职称评审中增加了一项内容，就是对教师参与课题研究情况的考查。于是，在基层学校里，原来“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课题研究，便很快“飞入寻常百姓家”。日前，表弟说起他们学校课题研究的事儿，乍一听来，还真有点不敢相信。学校传达上级的课题申报通知后，很快便有6人各自组团报名申报课题。对于他们那样一个有四五十名教师的学校来说，这个申报数量已经不少了。加上已申报正在进行研究的课题，学校几乎人人都参与课题研究了。在实际工作中，教师积极主动开展课题研究活动，对本人素质和教学工作的益处，是不言而喻的。但课题研究在有的学校实际开展情况如何呢？在局外人看来“高大上”的课题研究，对当事人和知情者来说，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

课题的选择，一般

从提供的目录中查找自己熟悉的内容即可。有课题需要的教师三五人一拍即合——课题组便有了。然后便是上网一阵狂搜，查找课题有关的内容，稍加删减和添加后，填写课题申报表和撰写开题报告，随后将这些材料和评审费一并交上去后，就算课题立项了。课题申报之简单，简直令人出乎意料。之后，按常识说，课题组要按计划自主开展研究活动，但事实却是，申报材料交上去后，课题组成员便“涛声依旧”了，就跟没那回事儿一样。

课题研究有国家、省、市、县等级之别，研究时间也有一、二、三年之分。中间课题组成员基本无事可做，到了临近结题的时候，按照上级部门的通知，大家便要展开一次集中突击行动。根据结题需要的材料清单，大家认真研究一番后，分工合作，协调作战，便投入到材料的准备工作之中。有的搜索、整理阶段研究成果报告（一般分三四个阶段），有的准备、打印最终研究成果报告，有的填写课题结题鉴定书，有的撰写结题报告等等。在成员们的共同努力下，厚厚一大摞结题材

料三五天便能搞定。随后交上去，便基本上万事大吉了，之后静候结题证书下发了事。

课题立项后，虽然课题组基本没有什么活动，但结题上报的材料里却是一应俱全的。如课题研究现实意义、可行性、必要性的论证；课题研究的具体步骤和阶段实施过程；如何走出去学习和把专家请进来指导；课题研究前后学生、班级成绩的明显变化，甚至还有一系列数据的对比；学校领导、教师对课题研究成效的好评等等。

这样的课题研究年年申报，个个结题，不能不令人感到滑稽和无语。课题研究本来是一项严谨、系统、扎实的工作，需要参研人员大胆认真、深入细致地开展工作。可在某些基层单位，课题研究却成了空对空的材料大杂烩。如此只看结果材料，不管实际过程的“研究”对工作毫无促进不说，还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同时还助长了弄虚作假的歪风邪气。此类有研究之形而无研究之实的课题研究，有关部门是不是该认真研究研究了？

河北邢台 刘二奎

本期截稿时间：7月10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英国 | 皇家骑兵卫队

7月7日，英国皇家骑兵卫队在伦敦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彩排。这次凌晨举行的彩排是为了迎接12日到访的西班牙国王及王后。



德国 | 时装周

(右图) 7月5日, 2018年春夏柏林奔驰时装周期间, Danny Reinke 的走秀模特在后台候场。



德国 | “僵尸”示威

(左页上图) 7月5日, G20峰会于德国汉堡举行前, 数百人将自己从头到脚涂成灰色, 扮作“僵尸”在汉堡街头游行, 希望以此引起全世界关注他们反对新旧资本主义的声音。

白俄罗斯 | 阅兵

(左页下图) 7月3日, 白俄罗斯在首都明斯克举行盛大阅兵式, 庆祝独立日。图为参加阅兵的士兵。白俄罗斯为原苏联加盟共和国, 1991年8月25日独立, 1991年12月19日改为“白俄罗斯共和国”。

西班牙 | 奔牛节

(右图) 7月6日, 一年一度的西班牙圣佛明奔牛节在北部小城潘普洛纳举行。图为奔牛节第二天, 民众在疯狂的公牛前奔跑, 躲避公牛的攻击。

葡萄牙 | 悬崖跳水

(下图) 7月7日, 红牛世界悬崖跳水巡回赛葡萄牙亚速尔群岛站, 选手们极致展现自由落体竞技。





生态化“反应”式烧钱

文 / 邢海洋

乐视兵败如山倒，先是贾跃亭卸任，紧跟着贾跃亭夫妇及乐视系 12 亿元资产被司法冻结；接着，贾跃亭及乐视控股持有的公司 5.1913 亿股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冻结，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99.06%；再接下来，媒体爆料贾跃亭已将乐视控股持有的几乎全部乐视影业股权，质押给孙宏斌旗下的融创房地产集团。乐视网距停牌期限仅剩几天，乐视大厦堵门的债主和紧锣密鼓的资产冻结营造出大厦将崩的气氛。

解释乐视的今天，绕不开贾跃亭的生态圈概念。按照贾的介绍，乐视生态包括五大部分：“平台+内容+硬件+软件+应用”，产品线则包括：超级手机、超级电视、超级汽车、智能硬件、娱乐周边、超级自行车等等。消费者所需要的娱乐与生活方式，乐视均提供全方位的闭环体验。而为了把消费者拉进这个生态圈，乐视则需要拿出一定的补贴，还需购买到只此一家的版权。为此，包括乐视网在内的乐视体系近几年融资金额高达 729 亿元，各项已投资额、投资计划或达 1500 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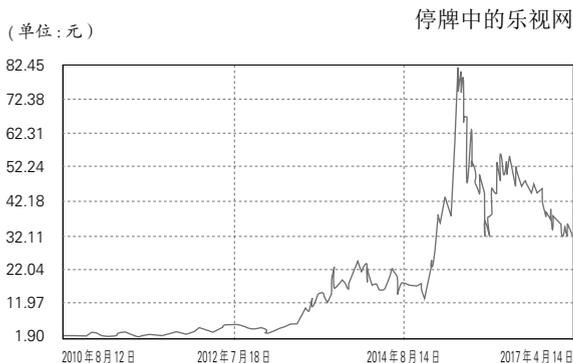
问题是，花钱买来的生态圈可靠吗？想当年，中石油日赚现金 5 亿元人民币，也没逃脱如今行将亏损的状态；中移动即使今天也能日赚 3 亿元，也眼睁睁地看着本被自己的语音和流量服务圈起来的 10 亿用户，悉数流向了微信，自己沦为了最基础的流量提供商。乐视本来是一家二流的视频网站，可上市后贾跃亭成功地扭转了形象，提出了“生态化反”的概念，

俘获了包括互联网和房地产大佬、演艺明星和千万股民的信心。钱投给一个能力超群的理想主义者，生态圈似乎指日可待了。也的确如此，作为技术上和供应链上完全的门外汉，乐视做手机做电视都很快成为行业的领跑者。可这个在外界看来不可企及的成绩背后，也是可圈可点的。A 股缺乏一流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于是给了二流企业畸高的估值，贾利用了这一机会高位抛售，再用现金反哺生态圈，营造出虚假的繁荣。

乐视的“生态化反”最热闹的时候，市场上并没有清醒的声音。被乐视营销“碰瓷”的华为就站出来表示，所谓商业模式创新，并不构成竞争门槛和护城河，是最低层次的创新。而能够构建长远竞争力的真正创新，来自于核心技术投入和基础研究。国内大多都是商业模式创新，技术积累少，更多比拼谁抄欧美抄得更早，谁执行力更强，谁有更多的钱可以烧。对此，兴头上的乐视则以“这是两种新旧模式的交流”把华为送到落伍者的行列。

华为反击乐视，最生动的一句话是：“免费的，可能是最贵的。将用户放在中心，层层圆圈都是快刀哇。”其实乐视和它的拥趸，最渴望的商业模式是苹果式的生态圈，一部苹果手机，只有苹果自己的应用商店，每一份店内消费都需缴纳三成的“苹果税”。可苹果也是靠科技创新获得的“护城河”，当年乔布斯开发苹果手机是非常隐秘的，堪比我们的“两弹一星”，开发者对家属都不能提及。苹果创造了智能手机，如同发现了新大陆，当然有在自己的地盘收税的权利。乐视仅仅靠砸钱“送”手机、电视，再购买一堆天价体育赛事的版权，怎么可能“圈”得住消费者。这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利润本来就不厚，烧钱式的支出和涓涓细流般的利润本来就不匹配，一有风吹草动，乐视的财富大厦轰然崩塌。

一言以蔽之，所谓乐视生态，其实就是一个盲目多元化的激进公司战略，“生态化反”的化学反应，更是忽悠没有商业和自然科学判断力的双料“科盲”的。可从巴铁到乐视生态，当小学毕业生和大专毕业生的“点子”式发明都能做到举国响应，我们难道不应该在国民素质上自找原因？



生产知识

也生产知识产品



栏目插图 | 老牛

“金砖妖币”

7月5日南非执政党非洲国民大会通过了将南非央行国有化的提案，央行国有化传闻一步步坐实，政治风险忧虑与日俱增。3月南非政坛发生巨震，被视为南非金融市场“定盘星”的财政部长戈尔丹被替换，触发兰特大跌，4月，标普与惠誉先后下调南非评级，6月10日穆迪宣布，将南非的长期债务评级由Baa2降至Baa3，距垃圾级仅差一档。不过因为被低估，总体上南非兰特近两年表现强势，被称为“金砖妖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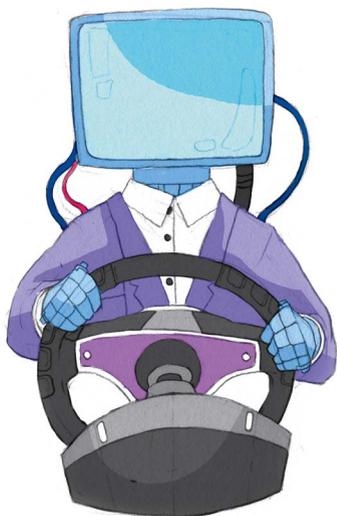
国产片

A股影视娱乐公司处于全线溃败，原因是国产片的票房不佳。2017年过半，电影市场开始回暖，国内票房总收入272亿元，同比增长11%。不过，国产电影票房贡献不及四成，并且，春节档期之后，国产电影票房甚微。5月，除《逆势营救》外，没有一部电影票房过亿元。而春节档的3部10亿元级别的国产片还是受排期对国产片的保护之赐。有媒体报道，8月份美国代表访华，进口片配额或将进一步放开。

7月分红

7月是海外上市的中概股分红最集中的月份，中国外汇“流失”迎来一次季节性加速。去年，继6月外储意外增加134亿美元后，7月外储就下降41.5亿美元。彭博报道称，海外上市的中国境内企业在今年6~8月3个月间，需要筹集约160亿美元的外汇支付股息。5月，中国外储环比增加240亿美元，实现近3年来首次四连升，进入6月则回升势头减速。





百度的无人车

百度 CEO 李彦宏直播了一段无人车驶上公路的镜头，引来了交警的调查，也引来了“实线并道”的质疑，却催动百度股价瞬间上涨了 4%。在去往百度开发者大会的路上，李彦宏一共乘坐了两款自动驾驶车：一款是吉普自由光，另一辆由林肯 MKZ 改装的自动驾驶车。这些车辆没有使用传统无人车的复杂传感器，而仅仅是通过 GPS 和高精度地图来按照地图行进，使人看到了量产的希望。

要约收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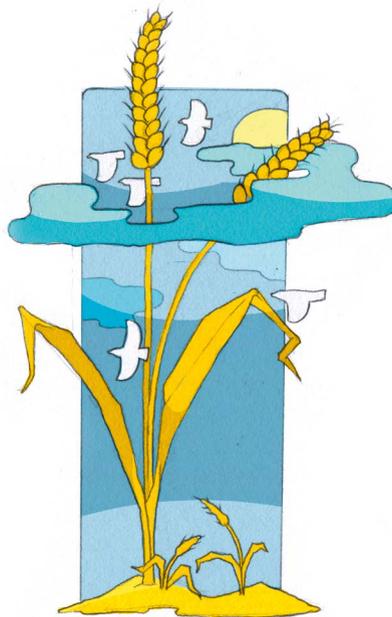
拥有稀缺金融牌照的爱建集团被广州基金盯上，刚刚解决诸多历史问题的 ST 生化则被杭州浙民投要约收购。自 2016 年以来，万通地产、ST 景谷、玉龙股份、四川双马和云南旅游等多家上市公司都曾成为要约收购标的。经济换挡，很多拥有优质资产却管理不力的企业吸引了资产管理公司的注意。与通过二级市场举牌增持相比，要约收购成本可控，不会引起股价异动，在证监会抑制举牌的情况下，争夺控制权要约收购多了起来。

三星超苹果

在韩国三星是神一样的存在，营收占韩国 GDP 的四分之一。今年以来，三星电子股价累计上涨 32%，同期韩国首尔综指上涨 17.8%。在传统淡季的一季度，三星的半导体部门营业利润就达到了历史新高的 54.8 亿美元。野村证券预测，今年二季度，三星还将超过英特尔，首次成为全球芯片行业霸主。源于存储器的供不应求和 4 月发布的 GalaxyS8 的热销，三星或将超过苹果，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公司。

小麦与大米

入夏以来，国际市场小麦进入飙升模式，6 月份，CBOT 现货小麦涨 19%，MGEX 春小麦涨约 34%、创 2010 年 7 月份以来最大单月涨幅。今年是厄尔尼诺后的一年，国际粮食市场已经被极端天气“搅翻”，5 月以来，美国北部大平原遭受了极端干旱天气，本地春小麦主产区的状况可能是 1988 年以来最糟糕的。在亚洲，孟加拉国的洪灾导致大米进口需求激增影响，东南亚市场大米出口价格大幅上扬。





欲洁何曾洁

在过去的10年里，越来越多的家庭清洁产品开始打“杀菌”牌。然而，这些添加了以三氯生为代表的抗菌成分的产品不仅没有显示出比传统清洁产品——肥皂、漂白剂和水——更大的益处，甚至还可能令抗生素耐药的问题加速恶化。以伯明翰大学微生物学与感染研究所为首的研究小组在《抗微生物化疗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对喹诺酮类抗生素耐药的变异病菌也呈现出对三氯生的抵抗性，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就是日常频繁接触含三氯生的清洁产品令大肠杆菌等病菌加快了自身筛选变异的速度。喹诺酮类抗生素以其抗菌谱广、口服吸收好、价格便宜等特点而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病菌的大规模喹诺酮耐药会给人类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

好消息



乐此而不疲

提起健身，你是会把它当成一项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还是繁忙日程中难得的发泄与放松？德国弗莱堡大学的运动科学研究小组日前发现，不同的心理期待会显著影响到个人的健身体验。心情和自信程度——而不是真实身体状况——决定了感觉疲倦的快慢和运动获益的多少。



拼车心理学

决定拼车能否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地理位置的邻近，更重要的是一起搭车的人处不处得来。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研究小组开发出了一款软件，通过分析拼车者的社交网络来预先判断彼此是否“三观”相符。在罗马和旧金山进行的小规模试验中，该方法能让自驾频率下降57%和40%。

坏消息



人穷偏被蚊子咬

美国马里兰大学和罗格斯大学的研究小组对巴尔的摩西部5个街区进行长达3年的跟踪调查后发现，越穷困的地方，夏天的蚊子就越多。发表于《医学昆虫学杂志》上的论文指出，贫民区常常有很多杂草丛生的废弃空地，垃圾也得不到及时处理，这些都为蚊虫繁殖提供了便利条件。



老二的代价

俗话说“老大傻，老二奸，调皮捣蛋数老三”。但根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研究小组的最新发现，论起惹是生非，排行第二的男孩才是最大的捣蛋王。针对佛罗里达州和丹麦的数万名亲兄弟的追踪调查显示，二儿子更容易因行为问题被勒令停学，长大后坐牢的风险也更高。

一生的四分之三时间在筹备幸福中过去；但是也不要以为，最后四分之一时间就可以享福了。这种筹备已经深深地养成习惯，为自己筹备完了之后，又要为别人筹备，因此，享福的最好时机就推到死后了。这就是为什么，人特别需要相信永生。大智者就会领悟，真正的幸福用不着准备，或者至少，只要一种内心的准备。

——纪德

德雷兹纳的论点是，思想领袖的时代取代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公共知识分子是“思想的二道贩子”。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毙掉坏思想并且“揭穿那些伪装成共识的错误思想”。公共知识分子是江湖骗子的天敌。相比之下，思想领袖就像是伯林口中的刺猬。他们懂一样东西，反复兜售，至死方休。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评丹尼尔·德雷兹纳所著《思想产业》

比起凡伯伦时代的炫耀性消费，如今的非炫耀性消费是一种更加“险恶”的身份开支。无论是母乳喂养还是教育投入，非炫耀性消费都是为了提升生活质量，改进下一代的社会流动性，而炫耀性消费本身就是终点——只能徒有其表。

——BBC 报道说，收入最高的 1% 人群现在把最大比例的支出投入非炫耀性消费

+/-
数字

1

小时

科学家正利用无人机研发更快的预报技术。目前，报警系统只能提前 14 分钟预报强烈风暴和龙卷风，无人机能从目标区域上方 2 公里至 3 公里处监视大气层的变化，使风暴警报时间提前 1 小时以上。

185

只

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峰会部署了 1.9 万名警察，11 架警用直升机在空中盘旋，警方部署了 185 只警犬和 70 匹马，禁止示威区的面积为 38 平方公里。

190

万

英国癌症研究会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在酒馆、俱乐部、酒吧和餐馆全面禁烟 10 年之后，英国吸烟者减少了 190 万，16 岁至 24 岁吸烟者比例从 26% 降到了 17%。



(插图 山羊的)



我不知道，我是否找到过让自己满意的回答。但不断地提出问题，问题本身就会得到细化。这就是旧时思想家所说的“政治觉醒”，它既是一系列行为，也是一种存在状态，一种持续的追问、作为仪式的追问、作为探索方式的追问，而不是对确定性的寻求。

——塔那西斯·科茨，《在世界与我之间》

啤酒的爱恨情愁

文 / 老虎油

图 / 谢驭飞



啤酒是比流感更流行的饮品，《牛郎织女》的第一句台词便是男主角的“再来一瓶珠江”，最后则在两个女主演催促上啤酒的声音中结尾。《风柜来的人》是三个少年，他们在高雄的街头跟新认识的朋友喝着离别的啤酒。《小武》在小县城召集小弟开小偷餐桌会议，也不免叫了一瓶啤酒。连生活在《窃听风暴》这般的高压政治环境中的剧作家，亦不时同朋友在一块喝上几瓶柏林啤酒。纵然是《喋血双雄》，同样要来上一杯半杯。在歌厅内端着扎啤的李修贤想从叶倩文那边套出周润发的身份，周则正从住处的冰箱中拿出一罐百威啤酒，隔空抛给了那个右手带着创伤和沧桑的杀手经纪人，随后自己坐下并很快喝掉了一罐。

杀手经纪人没有接住周润发扔来的啤酒，昭示着他已然过气了。江湖子弟江湖老，啤酒更多的是给年轻人准备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的女生们风华正茂，她们高兴时喝，不开心时喝，分别时喝，连离开了世界依然有啤酒送到埋藏了妙龄佳人的墓地。

啤酒是青春，是活力，因此《英雄本色》中断了腿的周润发喝的不再是啤酒，而是承载着几许风雨和若干辛酸的威士忌。《天若有情》中的刘德华则是年少的街头浪子，他提着四罐嘉士伯来到天台，晚风吹动了他的分头，眼前是灯光迷离的夜，伴奏的黄家驹的苍茫歌曲快到了尾声，啤酒已经喝尽，有一个落到地下，他的前程却是

生死未卜。

《天若有情》是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佳酿，一度让北京顽主王朔小小迷醉并感怀了一把。但刘德华不只在其中耍酷扮帅讲义气，他还会到喜欢暧昧的王家卫电影《旺角卡门》中，抓过啤酒瓶，当头往茶餐厅的那个人砸去，给他身边的小弟张学友上了一堂生动的要账课。

王家卫说他的电影很多都是在咖啡厅里想出来的，但并不妨碍啤酒的到来。《重庆森林》中的梁朝伟和空姐女友情动时拿啤酒做游戏，可惜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和空的啤酒罐。王菲突然离开后，他又在那间加州餐厅对着一个行将见底的生力啤酒瓶说话，这和他对着自己家中的香皂、毛巾和衬衣自言自语无异。王家卫就是这样来捕捉和表现都市人隔膜和寂寞的情感的，《堕落天使》也是如此。李嘉欣扮演的那个冷美人，给杀手黎明居所中送去一打一打的喜力啤酒，然后统统收回来，希图从空的啤酒罐中找到她心恋的男子生活的蛛丝马迹。

相比男人，女人不喜欢啤酒的更多些；相比啤酒，阿加莎·克里斯蒂喜欢毒药更多些。电影《啤酒谋杀案》正是改编自阿加莎女士的同名小说，一个小三不法、情海翻波的故事，女人醋意中烧，让毒液滴进了啤酒杯，最后挂掉、跟世界说拜拜的却是男人。虽然如此，男人还是对啤酒情有独钟，因为真相正如啤酒专家狗子说的那样，啤酒可以痛饮，这样能让人显得很豪迈。☑

一个人旅行的好与坏

文 / 中读用户 @ 鸭子

图 / 谢驭飞



A小姐从40岁之后终于开始一个人旅行了，不需要闺蜜躺在酒店说悄悄话，增进彼此的亲密感，也不需要和老公重温什么，更不需要带着个孩子说是为了他。

40岁之前对风景名胜已经看到分不出彼此了，所以40岁之后的A小姐开始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各种：独立书店的讲座、各地livehouse（音乐演出空间）的现场、美术馆、展览诸如此类被她称为江湖的地方。

40岁之后开始一个人旅行的最大便利之处是：劫色劫财的概率大大降低。尤其是不需要和人交流，减少了无效语言的使用，转向内在的语言书写时，文字的含金量还提高了。

有一次单独来北京，A小姐效率极高地在5天时间里去看了中央美术馆的毕业生展出、单向街花家地店的酒会、尤伦斯的展览，再用几个晚上去看了国家大剧院和东四的演出，顺便还拐弯去了麻雀瓦舍，再抽空去三联书店买了几本书。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把路费赚回来。

A小姐已经过了旅游的年龄，她正身体力行地把旅游演变为旅行。

同事B小姐也有类似的经历，以一个特殊的年龄为界定。B是30岁那年开始独自旅行的，为的是给自己的30岁庆生。瞒着父母做好所有功课，在单位吃过年夜饭，然后对父母说，要去朋友家住几天，就消失去了西藏和尼泊尔。但是与A小姐相反，B小姐在旅途中遭遇的种种化险为夷靠的恰恰是她的青春美丽。回来之后，B小姐的感受是，生活中、工作

中的那些鸡毛蒜皮对她来说再也不是个事儿了。

无独有偶的是C先生，他是同事们眼中的才子，因为特立独行所以也显怪诞。每次大部队出去，他一定会有格格不入的事出现。每次团体活动，他一定会有令人惊愕之举。有一年单位外出，他突然决定放弃和大伙一起到达目的地，而选择中途下车，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想起这个城市有蔡元培的故居。或者，临时起意，培训中他会额外溜出去几天，只为了去拜访一个心仪的地方，令他心仪的地方无非是故居、墓地、碑文诸如此类。

D先生的惊世之举，是在得知自己生病之后，决定一个人踏上旅程，去东南亚的某个小国独居。半年的时间，他独居异国，看书，看云，看海。半年的假期用完之后，如期回归，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生活。

一个人旅行，盛名的标签是：年轻、勇敢、背包客、爱自由、个性、独立……成为人们追逐向往的榜样；骂名的标签是：有病、怪癖、荒诞、不合群、不懂事……沦为人们八卦、指点的闲资。

老曹在《红楼梦》借“假语存”，吐露他的真想法。说那天地间除了大圣人、大恶人，还有一些亦正亦邪之人，他们“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每个人都是一个人踏上生的旅程的，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吧。所以，走起！

披着林黛玉外衣的 王尔德

文 / 肖遥
图 / 谢驭飞



在上班族里，“生病”可能是使用频率最多的一个请假理由。据全球最大的劳动力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商克罗诺思公司调查称，七成中国人承认有过“装病翘班”的行为，位居全球之首。在各种装病理由中，感冒是首选，成为45%的白领翘班理由；25%的人选择了肚子疼；5%的装病理由是牙疼和头疼；25%的装病理由为其他，比如眼睛流泪没法看电脑，脚崴了，韧带拉伤，颈椎病，肩膀疼……

在我们公司，把装病技术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当属郝姐。她跟部门主管老袁讲过她甲状腺不好，容易动气，做不了前台工作，和客户吵起来对公司的影响不好。老袁就安排她在后台写写计划总结，也被她婉言拒绝，理由是自己眼睛也不好，长期看电脑眼睛会疲劳，疲劳了就会充血，充血了就会发炎，发炎的话……“我的外公就是因为用眼过度突然失明的”。失明？好吧，部门主管可担不起这个责任，老袁就安排她出外勤，她出去了就没回来，直接住了半个月医院，据说是因为天太热，她心脏不好，晕倒了。尽管并没有目击者，也不知她怎么到医院的。

有时我们也会被郝姐搞蒙。比如逛淘宝的时候，郝姐凑过来给我们指点：“像咱们这个年龄的人吧，服装面料一定要讲究……”在分配工作任务的时候，顿时话风突变，她又会和“咱们这个年龄的人”坚决划清界限，说：“你们年轻人要多表现！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啊，我一个人干你和小方两个人的活儿呢！现在不行了，走多了路腿会疼……”

对郝姐质疑最大的小方，本着求知求真的精神，一针见血地指出：郝姐的这些病虽然严重影响了工作，但是貌似一点也不影响她的生活。据小方说，在他加入的羽毛球微信群里，一直潜水的他发现了郝姐，在群里姐可不是一般的活跃，每周都和球友约打羽毛球。而朋友圈则泄露了郝姐上个月休假去海南参加环岛自行车骑行。她眼睛坏到看电脑多了会失明，却不耽搁她看手机。小方用过一次她的手机，说她的手机上，衣食住行APP一个都不少。另外，她心脏那么破，怎么啪啪啪？有没有过高潮？高潮时会不会心脏病发作晕过去送医院？

小方对郝姐的腹诽，就像中世纪神学家谴责那些在他们的妻子身上找到快乐的丈夫，就像20世纪的消费主义批评家谴责在虚幻商品上寻求快感的中产阶级。“在需要和欲望之间该如何选择？”这个辩题上，他们的价值判断完全不同。比如休闲娱乐对于郝姐来说是必需品，而小方认为是奢侈品，而工作中消耗的体力对郝姐来说则纯属浪费。

其实，包括主管老袁在内的同事们，谁不知道郝姐在撒谎呢？可是，郝姐早就打定主意在公司做一个空心人和无脸人了，她对面子、尊严、价值的认同和大家都不在一个次元，就如同奥斯卡·王尔德早就说过：“人没有身体才能符合中世纪的要求，人没有灵魂才能真正符合现代的要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郝姐内心里是王尔德所说的那种“现代人”，虽然她借来了林妹妹那件“多愁多病身”的外衣披在了外面。☑

掏耳朵上瘾与玩游戏 上瘾的异同

文 / 贝小戎
图 / 谢驭飞



许多人会买了棉签放在浴室里，洗完澡后掏掏耳朵。但棉签的规定用途其实是抹药或者从病人身上获取样本用的。有些厂家会在棉签的包装上注明：“警告：不可伸进耳道内……伸进耳道内会造成损伤。”但大部分人都忽略了，或视而不见。《上瘾》一书作者尼尔·埃亚尔说，许多人会在掏耳朵时弄伤耳朵。甚至有人掏耳朵成瘾，一周不掏一次就难受。有这样一幅漫画，图上的女儿会把棉签藏起来，就像藏棒棒糖一样，以免爸妈发现她在吃。

掏耳朵真的会上瘾吗？埃亚尔说，上瘾是“对某种行为或物质有害的、持续性的、强迫性的依赖”。只是经常做某件事，如查看微信或看电视，并不能算上瘾，除非使用者在受到伤害时也难以停止这种活动。神经科学家马克·刘易斯说，上瘾是一种学习方式，是大脑走最近的路去获得它想要的东西。上瘾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大脑的奖赏机制把注意力导向了某一种单一的刺激。

有些人喜欢掏耳朵，起初是因为感觉耳朵不舒服，比如淋浴时耳朵被弄得太过湿了。这时用可以伸入耳道内的棉签去处理好像是一个很合理的解决方法。问题是耳垢压根儿不是问题。它是有好处的，应该就在那儿，不需要去清理，只要耐心一点就能解决感到潮湿的问题。埃亚尔说：“跟遇到人生许多难题时一样，我们很难做到耐心，人们总是做他们能够做的，而不是他们应该做的。”

上瘾性的产品会向大脑提供一个临时性的解决办法，但这些办法总是带来更多的问題。反复掏耳

朵会导致皮肤干燥，还会擦伤耳膜，引发炎症。发炎的感觉像是耳朵堵住了，让人忍不住去掏耳朵。越掏耳朵越痒，越痒越要去掏。这一循环会持续到要去看医生。埃亚尔称为“棉签效应”：在使用一种产品的过程中，想象中的解决方法成了问题之源。赌博带来经济压力，于是为了忘却烦恼而进入不管不顾的状态。电视看得越多，越感到孤独和无聊，越需要去看电视。

埃亚尔把成瘾性产品分为两种：一种是其生产者不认识它的用户，酒精、香烟、棉签都是这一类。对于这类产品，他们的厂家应该在包装上标明其危害。第二种成瘾性产品的生产者非常了解其用户的行为，如赌场和社交媒体公司、毒贩。有些产业的收入依赖于上瘾者。比如一些在线游戏，他们要尽力去命中所谓的“鲸”——他们只占全部玩家的0.15%，却带来50%的收入。没有这些极端的顾客，他们的生意就无法继续。类似地，赌场也是依靠着少数赌博上瘾的人，其中一些人会为了不中断赌博而穿着成人纸尿裤。许多产业都是从他们最忠实的顾客那里获得大部分收入的。如快餐业，20%的就餐者为他们贡献了60%的收入。埃亚尔认为，对于那些收集用户数据、有能力找出上瘾用户的产业来说，他们应该去联系这些用户，看能否提供帮助。我觉得对于第一类产品，以后也可以智能化，植入芯片，比如你一掏耳朵，棉签就尖叫。■

本栏目投稿邮箱更改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沉浸式虚拟现实

HTC 打造的 Vive 是集成了空间定位 (room-scale) 360° 移动追踪技术的虚拟现实解决方案。整套系统包括内置前摄像头的头戴显示器、两个无线控制手柄以及两个空间定位器，能让使用者在一定空间中自由行走定位，带来沉浸式虚拟现实体验。新增的电话服务使用户可同时在 Vive 头戴设备上接听电话、接收短信并快捷回复。



压力淋浴器

Nemo Helio 是一款方便户外运动时使用的压力淋浴器。装满水后，只需用脚轻踩加压泵，就可以尽情享受一次畅快的户外淋浴。同时 Helio 还可以用于给宠物洗澡或者冲刷泥浆，让户外运动或者野营聚会变得清爽而舒适。

40 年代风格

施华洛世奇 Crystalline Hours Quartz 腕表在直径 28 毫米的表盘内镶嵌了约 2000 颗仿水晶，不同的切面和朝向营造了夜空的璀璨感，用现代手法重释了上世纪 40 年代的设计风格。





4D 投影机

BroomX MK 是一款覆盖了 180 度水平和 120 度垂直视野的投影机。通过手机 APP 可以将房间变身为太空、海洋、丛林等幻境，营造出清晰逼真的 4D 空间。



一次性便携式火炉

CasusGrill 以环保、便捷、轻松式的体验，并依靠其天然 100% 的可降解设计获得了丹麦设计大奖。它全部由可降解材料制作而成，外壳由 FSC 认证的纸板制成，烤架则是天然竹子制成。由于烧烤使用 Quick Oxilite 竹炭提供热量没有明火，所以竹架不会被烧坏。

悬空猫床

这款名为 EZ Mount Window Bed 的猫床为猫星人打造了一款可以享受日光浴的家。这款空中猫床使用吸附装置，让猫可以轻松栖息在半空中的玻璃幕墙上。该款猫床承重大约有 28 公斤，还有不同款式和颜色以适应不同体积和风格的猫咪。





圆柱花瓶

阿尔托·贝克 (Aldo Bakker) 设计的水晶花瓶，透明水晶、大理石和粉色玛瑙三种材质构成一个具有建筑感的切面圆柱体，穿插的水晶捕捉着迷人的光线变化。

微妙的平衡

Artemide 品牌的 La Petite Table 台灯，一个轻质红色塑料灯罩以最小的支撑点，微妙地平衡在倾斜的灯杆上，产生令人愉悦的直接和间接光源。



超现实印花

Altreforme 品牌的 Fiocco 铝合金椅，折叠铝板的造型是受到能够抵御风浪的帆船船首的启发，不拘一格的印花图案灵感则来自于超现实主义艺术。



安娜鸟

芬兰设计大师托伊卡为 Iittala 最新设计的“安娜”玻璃鸟，圆拱形的中空身躯结合沉稳的铜棕色，用玻璃体现了鸟类美丽的色彩与生命力。



粉红绿柱石

巴西首饰品牌 Ara Vartanian 以彩色宝石和几何造型著称，这对“金钩”耳环以一对粉红绿柱石为主体，独创的挂钩设计可以让耳环悬挂在耳朵内侧。



格子呢大象

Loewe 标志性“大象”迷你包推出了红色格子呢的新外观，纳帕皮革内衬的单肩包在西班牙手工制作，也可以拆卸背带用作手包。

宫廷图腾

伯爵 Traditiona 系列椭圆形腕表以 18K 玫瑰金表壳搭配色泽饱满的红玉髓表盘，金质表链表面装饰独特的宫廷式图腾，展现出伯爵精雕细刻的金工技艺。





(VCG 供图)

2009年3月28日，金庸在北京大学出席“世界因你而美丽——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并获终身成就奖

金庸

传奇香港和辽阔江湖

文 / 蒲实

去香港，本抱着一个采访金庸的企图心，却发现已成不可能。他的身体状态已不再方便接受外界的采访或探访。我一天天采访，逐渐陷入一种有些奇怪的境地：我在香港追寻他的踪迹，与和他交往过的人谈论数十年前的往事，但这一切都是以一种旁证的记忆的方式呈现于我，虽然金庸先生就住在香港半山他的家里。

这种奇怪的感觉在某个时刻变得很强烈。他曾经的一位明报董事会秘书在采访结束后，拿出他所收藏的金庸手写聘书和一张与金庸在书墙环绕的办公室里的合影。“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里的查先生（查良镛是金庸的真名）。看，多精神啊，这就是他在我心目中的样子。”这位当年的年轻秘书现在已是一个网络媒体公司的老总，一见面他便开门见山地提醒我，“我只是曾给查先生打工的。香港很多人都给他打过工，他的秘书和自称是他秘书的人不计其数”。他说，前日里他偶然翻到金庸的近照被一位和老先生很亲近的晚辈刊登在某香港报纸上，他顿时有一种不悦感。他认为，这样的暮年照片完全不应该公开发表，这是对记忆中尊长美好形象的一种冒犯。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金庸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已渐成传奇。

金庸非常擅长在武侠小说里将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传奇糅合在一起写，创造出一种半史半奇、亦真亦假、虚实之间的故事境界；而如今，除了他身边最亲近的家人朋友，他真实的现实存在对人们来说已包裹在层层记忆和想象里，人们甚至认定，这比他此刻的现实更真实。一位香港老记者说，今年香港文化博物馆金庸馆开幕那天，金庸的儿子也到了。香港的年轻记者涌过去问他问题，开口竟然都是“请问金先生”，令他惊诧

不已。这也许可被解读为年轻记者的常识错误，但我却想到莎士比亚的名言“玫瑰即使换了名字，也依旧芬芳”。只不过此刻，本质的玫瑰确是那个写武侠小说的笔名“金庸”，这个“玫瑰之名”已在年轻香港人心中成了一个真实鲜活的人，是他在香港结婚生子，取代了那个查良镛。

最初邀请梁羽生和金庸写报纸武侠连载的“新武侠小说”催生婆、时任《大公报》主编罗孚曾说，香港人也是怪，在金庸武侠风靡香港的那个年代，街头巷尾的人“谈到正事，谈到政事，也往往要引用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人和事来教训。仿佛那些武侠小说，都是现代社会的《资治通鉴》，而且他们谈得非常正经”。香港人把金庸这个“造侠者”直接当成“大侠”来膜拜，甚至认为他应当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不过后来，金庸的另一个人格体查良镛也的确通过办《明报》和撰写有洞见和预见性的时政评论，参与到香港政治中，包括参与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筹备。

在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里，有一段虚构的小说文本与真实历史互动的精彩议论。韦小宝帮助俄罗斯的索菲亚公主从囚徒成为“女摄政王”后，骑马疾驰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心想，“这次死里逃生，不但保了小命，还帮罗刹公主立了一场大功，全靠老子平日听得书多，看得戏多”。金庸随即夹叙夹议了一段：

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皇帝权位，造反擒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当年清太宗使反间计，骗得崇祯皇帝自毁长城，杀了大将袁崇焕，就是抄袭《三国演义》中周瑜使计，令曹操斩了自己

的水军都督的故事。实则周瑜骗得曹操杀水军都督，历史上并无其事，乃是出于小说家杜撰。不料小说家言，后来竟而成为事实，关涉中国数百年气运，世事之奇，那更胜于小说了。满人入关后开疆拓土，使中国版图几为明朝之三倍，远胜于汉唐全盛之时，余荫直至今日。小说、戏剧、说书之功，亦殊不可没。

后来阅读到金庸为《碧血剑》在1975年补写的学术性文章《袁崇焕评传》。那时，他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已有3年。《评传》里袁崇焕与崇祯皇帝的性格冲突固然充满张力，但造成英雄命运悲剧的复杂隐秘的力量，又非普遍的人性可以解释，那种集体无意识又人人娴熟运作的权力算计，功夫之深厚，恐怕只能叫几千年的政治文化更合适。这篇历史人物评传与虚构的《鹿鼎记》构成了互读：“痞子”韦小宝回回通吃，次次遇难呈祥，有一个重要的地利人和，那就是在中国的版图内，“因为他面对的是中国人，不管他是汉族、满族、回族、藏族、蒙古族，小节上虽不同文字、不同民族，然而大体上同文同种”。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活的细胞”，他以各种不择手段、鲜廉寡耻和一些义气，映照和解构了与他本质相同，只不过罩上了伪善外衣的御治术。

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金庸虚实相间的“新派武侠小说”，大大拓展了香港人阅读的想象空间，纵深了历史记忆。武侠行踪在江南、中原、塞外、蒙古草原、大理国、帝都之间铺展游移；小说里的人物与思想，在朝与野、涉政与隐退、向心与离心、顺从与背叛、大义与私情之间寻求着平衡，思考着普遍的人性和古代历史的规律。种种时局的因缘际会，在向来被视为“文化沙漠”的香港，开出了一朵绚烂的花，既与香港时兴的以探求身份为主线的本土文学交相辉映，又以香港为枢纽，向全世界华人群体传播，构建了一个辽阔的、文化意义上的“想象共同体”。

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乡愁般地将中国文化重构为一个完整的实体：“江湖”是一个动荡而且充满暴力的领地，构成了争权夺势与政治斗争的场所，并与朝廷发生关联。

这个文化帝国，在时间与空间上被想象成与20世纪中叶的香港遥遥相对的世界：在这个足以和现代科技可相匹敌的文化体系里，“中国武侠构建出一个想象的场所，在那里，其他的外来文明与科技

根本对传统不构成挑战”。

但金庸的小说并未拘泥于这一稳定的结构。相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推陈出新，或有新颖的情节，或诞生令人过目难忘的丰满人物，或在叙事结构上做新的尝试，或呈现对人性 and 历史的新思考：《射雕英雄传》的乱世之苦和侠义，《神雕侠侣》的爱情，《笑傲江湖》“三千年中国政治历史中的人性的悲剧”，《天龙八部》冤冤相报的命运的悲凉底色，《鹿鼎记》对国民性和文化的反思和讽刺……一路读下来，不仅是酣畅淋漓的快感，金庸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思考也层层深入。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在香港的左派与右派媒体间选择了“客观中立”的立场。20世纪50至60年代，金庸与当时香港本土文化所关注的身份问题相呼应。香港人的身份是存在于英国和中国两大传统文化之间的特殊身份，那时大陆共产党与台湾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也势均力敌，香港人在这些强大的多重力量当中，有自己的本土立场，也存在身份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困境。

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都站在汉族人的立场来书写爱国情怀，正邪对立分明，从《倚天屠龙记》开始，作为反派的武当派改邪归正，成为和少林寺并驾齐驱的门派。张无忌也超越了正派和邪派，不仅让明教和六大门派和解，共同对付蒙古侵略，而且通过他与蒙古郡主赵敏之间的爱情，进一步超越了汉族与蒙古族的隔阂。到了《天龙八部》，萧峰这样的人身上也出现了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冲突不匹配。金庸超越了民族和国家边界的概念，这与他深受英国文化影响的中国香港人的本土认同立场的理解，密不可分。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重读金庸依然历久弥新，意味深长。

1972年，金庸封笔不写武侠。1993年，查良镛在卖掉明报集团后辞去《明报》董事长职位，彻底隐退。

在香港，我曾致函金庸离开《明报》时自己所创的公司明河社，希望能够获得关于他和他家人一鳞半爪的新信息。明河社的人告诉我，这么多年对金庸的报道早已饱满，到了现在，“可知的都已知，未知的或许就是不愿说的隐私，那就让它一直不可知下去吧”。恍然间，我发现我在香港所追寻的，是一个已融入这座城市记忆的金庸，这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现在成了被讲述的故事。■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绘画 阿梗



(查良鏞(金鼎)供图)

1981年，查良鏞获颁“英帝国官佐勋章”

香港的金庸，金庸的世界

文 / 蒲实

种种时局，金庸的武侠小说因缘际会地在香港诞生和流行，并以香港为枢纽，扩散到世界华人群体，构建了一个文化想象共同体。查良镛的报业事业也在香港大获成功。“此心安处是吾乡”，那个南来的白手少年，立业香江乐太平。

“造侠者”金庸

7月的香港很炎热。走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窄如峡地的街上，只觉得被装进了上着汽的蒸笼。所有封闭的室内——汽车、办公楼、商厦或地铁里，冷气都开得异常足，以至于一旦踏上开敞的街道或站台，立即就有穿越冰火两重天临界面的空间切割感。1948年，在香港复刊的《大公报》调查良镛来这里上任。初来乍到，他最鲜明的感受也是天气炎热。那年他24岁，行装简单，一句广东话也不懂。从上海起飞后，他才发现自己身上没有一分港币。幸而邻座同行、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借了他10块港币，到香港后他才能搭船过海和乘坐出租车。坐上白牌出租，他用带着海宁乡音的普通话告诉司机“去餐馆”，司机却带他去了“差馆”（警署）。

查良镛描摹1948年的香港，“还比较落后，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那个年代在香港出生和长大的香港人告诉我，今天已高楼林立的沙田一带，那时上学还要经过一条条水田间的田埂；而那时代过童年的人，都记得很多时候在街头玩耍，父母做小贩在菜市场卖东西的情形。这种感觉在今天的国际大都会已全然不复存在，倒是在一些贴满港式茶楼墙壁的黑白旧照片里，还能寻觅到一些过去渔港城的踪影；或是在远离足可引发密集恐惧症的高密度高楼区域的香港郊外，像西贡这样的地方，还有停泊在海港的渔船、夜里吹着湿热海风的露天海鲜大排档，以及张灯结彩迎接香港回归20周年的村庄。连他自己也未想到，他会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一住70余年。

当时的他怀一颗北望神州之心，依旧抱一个外交官之梦，在《大公报》做电讯翻译、编国际新闻版，时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和国际法方面的文章。

1950年，外交部顾问、国际法专家梅汝璈曾邀请查良镛北上，协助梅的外交工作，他毅然决然前往。在北京见过梅汝璈后，查良镛又去外交部找时任周恩来的秘书乔冠华。乔冠华虽表示欢迎查良镛，但也坦然告知，他应去读人民大学的干部培训班。查良镛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不理解，将来也未必可入党”。“香港式”思想行为究竟是什么，查良镛后来有过一些零星的解释。他觉得“一般香港人坦诚直率，重视信用，说话可靠，我很快就喜欢了他们，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他也认为，香港是“完全的新闻自由”，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哪怕是港督，如果想要干预媒体舆论，只要有录音证据，“一旦报告英国政府，明天就可炒他鱿鱼”。

重返香港《大公报》后，查良镛继续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1952年，他转到了刚创办不久的《新晚报》编副刊。在《新晚报》，查良镛开始在副刊以“姚馥兰”（英文“your friend”的谐音）撰写专栏“馥兰影话”和以“林欢”的笔名撰写影评，发表在《新晚报》“下午茶座”的栏目里。20世纪50年代，看电影还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并非人人可以常看得起，卫星电视也还未出现，对大众来说，阅读报纸，特别是报纸副刊，是最为流行的休闲娱乐方式之一。在这个时候，他就已经翻译了大量美国剧作家和电影评论家的电影理论，比如《好莱坞的男主角》（上、中、下）、《论码头风云》（上、中、下）和《美国电影分析》等。除了写和翻译影评，查良镛还写电影剧本，20世纪50年代初给长城电影公司写了《绝代佳人》《兰花花》等剧本。当他不久后开始用笔名“金庸”写武侠小说时，他的叙述和结构很多时候都已有了电影的语言和手法，比如屋外的人如何去看屋内发生的事情，《神雕侠侣》中围炉讨论神雕大侠的场景，《雪山飞狐》中罗生门式的故事方式等。这个时期，他的翻译作品相当多，涉猎的知识领域极广。他以“乐宜”的笔名翻译了美国记者贝尔登的长篇纪实报道《中国震撼着世界》，在《新晚报》上连续刊登。随之，他又以“乐宜”为笔名翻译了美国记者哈罗德·马丁的《朝鲜美军被俘记》和R. 汤姆逊的长篇报道《朝鲜血战内幕》等。



1



2



3

1. 香港武侠小说作家梁羽生夫妇
2. 香港作家、明报出版社和《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潘耀明（左）与金庸
3. 金庸和妻子林乐怡

在《新晚报》，查良镛认识了主编罗孚和梁羽生。梁羽生是广西蒙山人，抗战胜利后，梁羽生到岭南大学读书，1949年到香港定居。他与查良镛情趣很相投，查良镛时常尊他为“梁兄”。与梁羽生是“忘年交”的香港天地书店总经理孙立川告诉我，梁羽生实际与查良镛同年，也是1924年出生的，只比金庸大一个月左右，但当年为了避抓壮丁，曾经改过出生年月。他们两人都是地地道道的棋迷，经常闲来就摆起棋局互争高低，也都在《新晚报》上发表

棋话。两人也都很爱读武侠小说，如白羽的《十二金钱镖》、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读完一部，两人互相交流心得，聊得很开心。但那时，两人都没有想过会写新武侠小说。

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是武馆林立的，现在也依然有一些零星的武馆还留存着。孙立川告诉我，“武馆，或叫功夫馆的传统，在香港根深蒂固”。这些社会团体通常打出强身健体的旗号，但在社会不安定的时候，武功也可作傍身用。这样的民间传统，至今也

可在街头不经意的角落找到一些痕迹：清晨走在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馆外，两人高的李小龙铜像下，全是练习太极、剑法和拳术的长者。那时香港武术会的流派很多，除了太极拳和白鹤派，还有咏春拳派、少林派等很多种。早在梁羽生和金庸写武侠小说之前的民国时期，香港人、广东人就非常熟悉还珠楼主和白羽，也熟悉黄飞鸿、叶问、洪熙官等这些人。但香港报纸那时连载的旧武侠，大多是粤语方言，发表在粤语报纸上；写作主题大多是地方武林恩怨、私家情仇，其主人公也多是广东好汉。当时，香港有两位著名的拳师，一个是太极拳掌门人吴少仪，一个是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1953年，这两位拳师决定比武打擂。香港当时规定不让打擂台，就由他们都比较熟悉的澳门名士何贤先生（澳门前特首何厚铨的父亲）来主办，擂台设在澳门新花园。

香港市民纷纷热议这件事，《新晚报》所出有关比武的《号外》总是瞬间抢购而空。总编辑罗孚决定趁此热闹，搞一个武侠小说连载，促进报纸销路，就找梁羽生来写。梁羽生并不怯场，一口答应，只酝酿了一天时间，《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见报并一路连载下去。《龙虎斗京华》一问世就大受欢迎，人人争读，梁羽生也声名日隆，同时为很多报纸炮制武侠。他由此开创新武侠小说的先河，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孙立川说，对新武侠小说诞生的时间，现在通行说法是1954年1月20日，以梁羽生（本名陈文统）署名的《龙虎斗京华》第一篇为开端。但实际上，在陈文统的散文集里，他早些时候就曾以“梁羽生”的名义写过关于陈家太极拳的文章了。

梁羽生写不过来，罗孚就找到查良镛，让他给《香港商报》写急要的武侠小说连载。他取笔名“金庸”，将童年在海宁老家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看到的滚滚怒潮，以及他听到的关于乾隆的稗史传说，写成了《书剑恩仇录》。从那以后，查良镛开始有了另一重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和身份：金庸。

《书剑恩仇录》涉及的主要历史人物是乾隆皇帝，叙述以虚构的江南世家子弟陈家洛为首的“红花会”群英的反清复明大业，穿插陈家洛与乾隆皇帝私人之间的奇异关系和恩怨。小说开头第一句即是“清乾隆十八年六月，陕西扶风绥德镇总兵衙门内院……”有一种让人难分真假的“可信性”。他在这本小说的后记中写道：“历史学家做过考据，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被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正如内地专门研究金庸武侠小说的研究者陈墨所评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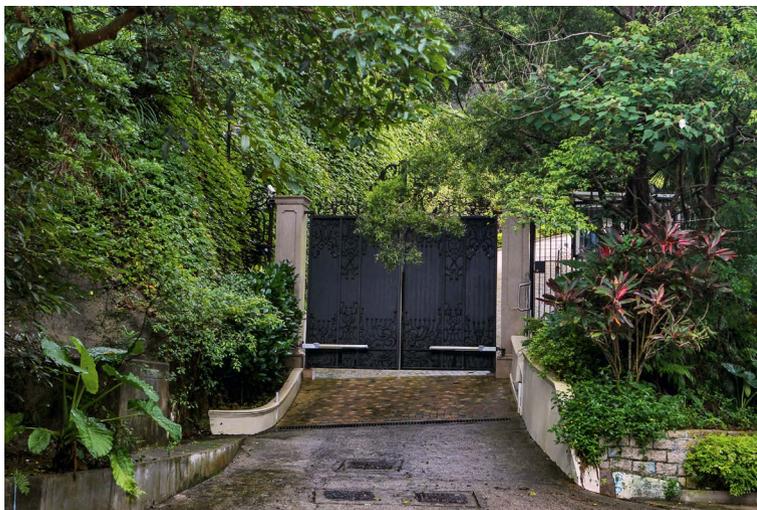
的，这本小说打破了历史与传奇之间的界限，让历史与传奇人物在艺术假定的情境中合二为一，体现出金庸“在实有与虚妄之间”的功夫。

梁羽生和金庸创作武侠小说时，都处在一个副刊小说高度市场竞争的媒体环境里，两人相互间也有很多砥砺。梁羽生的国学基础更加深厚，比较恪守传统；金庸则因为看过很多电影、写过很多影评，写东西比梁羽生好看。梁羽生自己评价，“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的影响较重。梁羽生也有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之处，如《七剑下天山》对《牛虻》的模仿，以及近代心理学的运用等。但大体说来，“洋味儿”大大不及金庸。作为新武侠小说的“催生婆”，罗孚说那段时间，“金梁并称，一时瑜亮。也有人认为金庸后来居上。这一步，大约是两年”。

梁羽生、金庸的新派武侠横空出世的20世纪50年代，香港的文化气候也在剧变中。香港知名作家、明报出版社和《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潘耀明先生告诉我，香港当时流行三种语言——普通话（有些还用文言文）、广东话和英语，主要是广东话和英语，除了南来香港的，很多人不怎么懂普通话。而金庸的文字都是纯粹的汉语，实际上这个纯粹的汉语是从明末清初的笔记文学传统出来的，又吸收了汉语现代文学的词汇和语法，“哪个章节独立起来都像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达到了钱锺书先生所说的‘清通’的境界，没有一点杂质，很通透的”。这对当时的香港来说，突然看到那么规范的文字，“非常新鲜”，又“特别吸引人”。不仅如此，1949年前后的香港，社会和文化都在剧烈变迁中，大批商人、文化人、政治家和他们的财富一起涌入香港，改变了香港的人口结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梁羽生和金庸的小说既吸收了中西文学的艺术经验和叙事技巧，如心理描写、审美抒情，又继承了古典章回小说的形式，间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和典章文物、历史名人、内地风光，大大慰藉了香港移民“北望神州”的文化乡愁。而武侠的传统，在内地和台湾都因政治原因而中断，在各派政治势力都很大的“租界”香港，反而开出了花。孙立川说：“金庸当时与鲁迅的境遇有几分相似，因为在租界里面，不受国共两党的影响，虽然金庸当时是偏左派的。那时的香港大多数报纸日期都写民国多少年，而《大公报》《新晚报》《民报》则是用公元纪年。这种立场，让台湾一开始把他视为亲左的共产党外围，所以金



1



2



3



1. 香港太平山顶，凌霄阁有 360 度观景台

2. 山顶道 1 号，1985 至 1996 年间金庸的住所

3. 中环利源西街。利源东西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字房和机房林立，被称为香港的“舰队街”

4. 香港北角海边。1966 年《明报》迁至北角英皇道 651 号，至今仍有很多左派报人聚居于此



（本组图片：刘育志摄）

4

庸一直不能去台湾，直至后来蒋经国邀请。”

金庸武侠小说里的地理范围，大大开拓了香港人的阅读空间和想象边界。他的武侠小说不仅涉及江湖，也涉及江山。我们跟随《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从回疆戈壁游历至秀丽江南，跨越中原的华山、嵩山、兰封、泰山，抵达北京紫禁城、东北长白山；也跟随《射雕英雄传》的郭靖，从蒙古大漠来到中土江湖；还跟随《天龙八部》的萧峰，壮游辽阔的大理、西夏、宋朝与辽国，或者《鹿鼎记》里的韦

小宝，去往山海关、紫禁城、江南，远赴台湾和莫斯科。这些“万里江山”的宏大空间，不再像香港过去的小说家那样仅限于私仇家怨，囿于一偏僻山村或一都市庭院，而是将整个中国古代史的疆域和风光随人物的足迹如画卷般慢慢展开。这些小说，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它所风靡的香港社会，以及从香港辐射出去的东南亚和世界华人群体中，勾勒出一个磅礴的、史诗般的民族想象。

罗孚评价，“如果没有香港，没有金庸”。那个



(刘有志 摄)

1

年代的香港，街头巷尾的人都在谈论金庸的小说，甚至“谈到正事，谈到政事，也往往要引用金庸武侠小说里的人和事来教训。仿佛那些武侠小说，都是现代社会的《资治通鉴》，而且他们谈得非常正经”。香港人很奇怪，把金庸这个“造侠者”直截了当地当作“大侠”，对他崇敬有加，甚至认为他应当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而如果没有香港，“金庸就只是在上海，度过40年代的末日，进入50年代的日子”。当他写《书剑恩仇录》时，内地正在搞“大鸣大放”；若非在香港，“这第一部书还未写完，就进入大反右了……他甚至没有可能开始写这样的作品”。

其实，在那个资源尚还贫瘠、充满着高速发展的混乱与不公的香港社会里，坏人得恶报、好人得福报的是非分明世界，无疑为市民提供了心灵慰藉。但更深层次的心理也许是，对具有数千年封建传统和非法治文化的中国人来说，一方面，江湖的丛林

法则符合中国人强者为尊的认知，另一方面，每一个怯懦无助、毫无安全感的人，实际上又都在幻想着侠义的救星，扶危济困。这种文化遗传和审美定势，与中国人骨子里卑怯自我的本能幻想相结合，才使武侠小说源远流长。

香港文化博物馆的金庸馆展厅入口处，有一篇金庸为展览所写的前言。他写道：“宋朝苏东坡当年远离故乡到岭南，曾在词里写道‘此心安处即吾乡’。对香港来说，我也是一个移民。”但他住得“很是心安”，“慢慢也就把香港视为我的第二故乡”。那个南来的白手少年，已立业香江乐太平。

阅读金庸

以香港为枢纽，金庸的读者遍布世界各地，构成了一个“想象的文化共同体”。

香港金庸馆里陈列着一套1968年金庸写《笑傲江湖》报刊连载时的手稿，描写的是令狐冲辞别任我行和向问天之后的一段遭遇，这个情节在后来出版的《金庸作品集》《笑傲江湖》的第22回已做了修改。从原稿从左至右竖着书写的手稿中，可见他习惯把每页的开头和最后两行留空，而他在用钢笔书写的过程中，几乎一气呵成，没有太多地方需要改动，可见他文思敏捷和驾驭文字的能力。

馆长林国辉告诉我，获得这份珍贵手稿的历程，非常不易和意外。筹建过程中，“我们知道金庸先生在新加坡办了一个《新民月报》，就到新加坡那边的报业集团联系，看他们的档案，希望可以找到他在当时办报时候的一些报纸内容，另外看是否有一些手稿留存可以展出。很幸运，我们在一些老报人手上发现了竟然在新加坡留下来的手稿”。作家的手稿是最难找到的，“报纸连载的小说，作家一般都不注意保存这些手稿。很多手稿送到报社去，排纸坊的工人就把它一条条剪下来，方便排稿，几个工人，每人拿着一小部分的手稿排，排完再拼到一起，变成报纸印刷用的排版”。经过工人这样的处理，很多时候手稿也就被丢掉了。“在香港的收藏家那儿想找都找不到的手稿，却在新加坡那边的考察中找到了。”在新加坡，林国辉他们还找到一个金庸迷，“60年来一直保存着金庸办的报纸的报道、出版的书，收集研究金庸的主要著作，有一本新加坡刊登的有关金庸先生消息的剪报”。

1967年，金庸以查良镛的本来身份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当地的商人合作创《新明日报》，查良镛占

最多股份。两份《新明日报》起初用的同一个版，内容相同，后来新加坡独立后，两地政府的政策不同，就分了不同内容的“新版”和“马版”，但副刊、小说的稿件港、新、马相同。这两份报纸很快都跻身当地三大销量最多的报纸行列。那时候，金庸总是为他新的报纸特意写一个新的武侠小说，让还没什么知名度的报纸可以先有一个读者群，将经营维持下去。《新明日报》创刊的时候，他就特地去写《笑傲江湖》。当时金庸已经是一个很出名的作家，大家很喜欢看他的作品，所以《笑傲江湖》就成为日报的亮点。

潘耀明告诉我，2015年金庸武侠小说创作60周年的时候，《明报月刊》和《明报》曾参与发起向世界华人征集金庸阅读史的个人故事，集结获奖文章出版。在这本题为“我与金庸”的个人阅读史作品集里，一位印度尼西亚的读者叙述，让我印象深刻。他写道，1966年，印尼的华校被军政权关闭，他小学四年级没有读完就在家无所事事，只能整天困在家里的藏书堆中，阅读连环画与红色小说。那时，印尼时局混乱，虽然禁传华文的条例已经公布，书店都关门大吉，但仍然有些书摊在租借华文书。可他们也不敢乱闯重禁区，就特意回避内地书，而转做港台书的生意。他就从那时起，开始接触“金庸”这个名字，开启了别样的阅读。

他没日没夜地狂读，熬夜时怕家人发现，就用厚皮纸把灯泡盖住，只留一小圈黄光照书页，也导致以后的近视。那时他已转读印尼文学校，华文教育一片空白，但他一直不放弃阅读金庸。就是在那段岁月里，武侠的阅读满足了他对中文世界文化的渴望。通过金庸的书，“我收获了丰富的文化盛宴，从中国地理、历史、民俗读到学教帮派的知识。半新半旧的语言，还有不时插入的古诗词，无形中提升了我的中文程度”。历史的荒谬恰恰就在于，那些“左”倾的华校教育一直让学生与武侠绝缘，恰好是华教的中断，让他的阅读书目里有了“武侠”和“金庸”这个名词。

有意思的是，金庸的武侠不仅在华人世界流动，译本也在印尼文读者中风靡一时。粗糙的小译本不是在书店里销售，而是靠散布在城市角落的借书摊，渗入到家家户户。金庸在报章连载发表时，印尼文译本居然也紧跟在后，那边一发表，这边即时翻译出，一个月后就出一本小本子，译本的出版竟然比原版还快。这些人中，有不谙中文的华人，也有纯印尼原住民；有底层民众，也有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印尼前总统瓦希特和前国防部长。后来当《笑傲江湖》

在《明报》连载时，越南有20多家中文、越文和法文报纸也同时连载；他的小说还被翻译为泰国文。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子平认为，“阅读的自由”一如“写作的自由”，是金庸阅读史中最重要价值争取。政治禁令常常将阅读带入沉重的历史语境，如两岸意识形态的“附带伤害”，或如东南亚国家对华文教育的歧视和限制。然而武侠小说之所以能在这些禁令的缝隙中生长，是因它充满不可抗拒的阅读快感：它“是对现实不满和抵抗的产物。想象一种与现实不同的侠义江湖，想象人间终究有情有义，不公不义可以得到‘诗的正义’的想象解决，这正是阅读体验中根本的‘愉悦’所在”。金庸的全球华人阅读，“集合”起一个被称为“金迷”的“想象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阶级的分野被超越了，从大科学家、院士到小学教师、底层打工仔，莫不是平起平坐的金庸迷；性别的差异和语言的隔阂，也都被打破了。

金庸的武侠小说在20世纪50至60年代除中国内地外的世界华人群体中被广泛阅读，也与香港作为地理枢纽的文化辐射力紧密相关。曾在《明报》

1. 香港金庸馆馆长林国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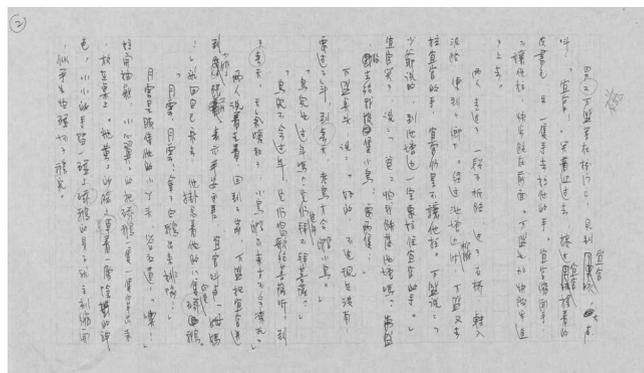
2. 1953年，金庸把《绝代佳人》的剧照、剪报等资料整理成册，足见他对自己首部电影作品的重视

3.《月云》手稿（部分）。《月云》是自传体散文，记述金庸儿时与小丫鬟月云的生活片段



2

(香港金庸馆馆长林国辉供图)



3

(金庸手稿《月云》供图)

金庸、倪匡、黄霑和蔡澜并称“香港四大才子”。四人皆是博闻强识、饱腹诗书之辈，其人生经历和百巧才情，也常被视为香港文化和一个时代的缩影。

倪匡，本名倪聪，1935年出生于上海。初至香港，倪匡曾读夜校，此后一切学问皆靠自修而得。

倪匡自称“自有人类以来，汉字写得最多的人”。他有多笔名，“岳川”写武侠，“衣其”写政论，“卫斯理”写科幻，“沙翁”写杂文，“洪新”写高达和高飞的故事……所写小说，唯求“好看”二字。他的著名作品包括卫斯理系列、原振侠系列、浪子高达系列等，是华人科幻小说界里最具影响力的作家。

倪匡自认写作为其唯一的谋生方式，产量极高，写作速度极快，最高可达一小时4500字，最慢也有2500字，而且从不拖稿或欠稿。最多的时候，倪匡曾同时创作12部武侠小说，“在墙上拉一根绳子，拿小夹子把每个要写的小说夹在绳子上。今天该写这个了，就把这个摘下来，一口气写上12天；明天该写那个，就把那个摘下来写上12天。”

谈及写作，关于倪匡最为著名的趣闻有两个。一个是倪匡曾替好友古龙代笔20多天，没有一个读者发现其中奥妙。另一个则是1967年，金庸暂离香港的数月中，倪匡受命代写正在连载的《天龙八部》。金庸当时唯一的条件是不可以死人，因为个个有用。金庸上午飞走，倪匡下午就写瞎了阿紫的眼睛，笑称之：笔下留人，不留眼。

金庸曾赞倪匡：“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而在2005年，倪匡自称“写作配额用完”，就此封笔，不再创作。

除却写作，养鱼、种花、收集贝壳、木工、烹饪、演戏、古典音乐皆为倪匡嗜好，且都由迷转痴，由痴变狂。倪匡也乐得自嘲：厨艺第一，园艺第二，文艺第三。好友黄霑也对他推崇备至，觉得他是个耐得住寂寞，终日与花草为伴而不感单调的老顽童。

倪匡自己在文章《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中也回忆了和古龙的奇绝往事：至交好友古龙过世，倪匡伤心欲绝，操办后事。吊祭时他泪洒灵堂，还把古龙陪葬的洋酒喝了一大半，喝着喝着，悲从中来，想将酒倒进古龙嘴中，结果古龙“从嘴里喷出两公分的血柱”。倪匡不顾他人警告，将故人之血带回香港，重情率性可见一斑。（整理：吴杨）



和多家香港电视台从事20多年传媒工作的张圭阳博士，在他关于明报集团的研究论文中写道，20世纪50年代，香港开始了经济全面转型。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战争，联合国对中国内地实施贸易禁运，香港政府也相应要做出禁运决定。“在此之前，香港主要是一个转运港，贸易盈余主要依赖货物转口到中国内地。但是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内地实施贸易禁运，香港因而迅速转变角色，由过去纯为中国内地服务的转口港进而发展工业。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香港工厂的数目由1952年的2088家发展到1958年的4906家，工业逐渐成了香港的经济命脉。香港也发展成为世界各国贸易转运的枢纽，在出口方面，美国渐渐成为香港的重要市场，而英国、马来西亚和日本，也逐渐发展成为香港出口的主要市场。”

林国辉说，过去谈到香港和世界的联系，很多时候说香港是一个贸易、金融、交通通信的枢纽，“但我们并未留意到，通过这些枢纽地位，香港也成为文化的枢纽”。过去几十年里，“香港通过我们的流行文化，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全世界不同地方的华人社会、海外华侨和全世界的读者建立了一座无形的桥”。金庸的读者遍及全球，不同阶层的人都读他的小说。有些海外华人不一定看过金庸的小说，可是他总有机会收看香港拍摄的金庸小说改编的电影（20世纪50年代）和电视剧（20世纪70~80年代），或收听金庸小说的广播剧。金庸的武侠，也成为“香港联系起海外华人和世界的文化纽带”。

与港澳台和海外的读者相比，内地的金庸阅读史就是后来才发生的事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内地人全然不知道香港有个金庸。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广州《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金庸武侠小说的流转载才走出了非民间渠道，在内地掀起了一股股热浪。

“报业大亨”查良镛

到熙熙攘攘的中环，沿着利源东街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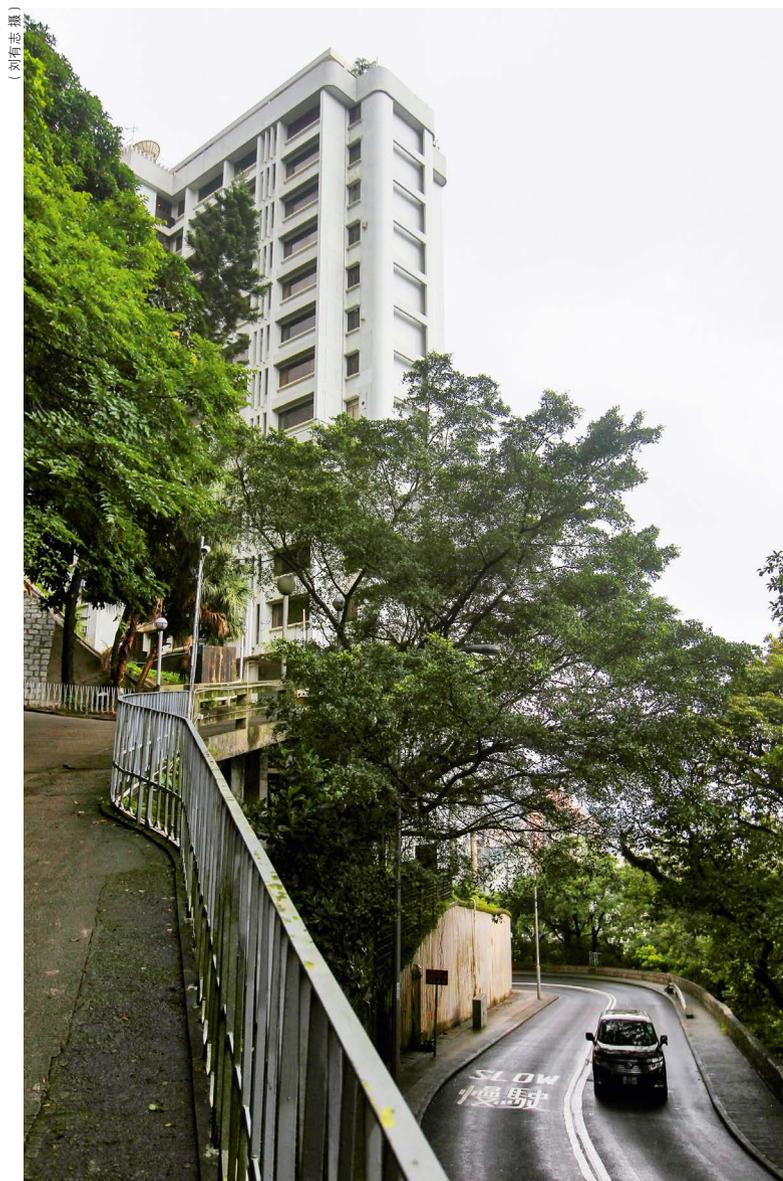
近走几遍，在环球大厦、渣打大厦、置地广场、欧陆贸易中心这些高耸的商业大厦之间，只见一些零星的服装品牌或西伯利亚皮草公司这样的店面。瘦高艳丽的双层有轨电车是流动的广告墙，开往铜锣湾、北角各个方向，环球大厦边一条不引人注意的小道通往天星小轮的港口和上山的缆车。极度闷热中，天暗下来，下了一阵暴雨。人们挤在高楼的屋檐下躲雨，默默无言。

遥想半个世纪前，这里曾是香港报馆林立的“舰队街”，扎堆挤满了一间间字房和机房。那景象已被历史拂去，全然不见，只能凭借想象了。在一个搭着脚手架、正在整修的大楼旁，有一条通往地下室“香港图书中心”的通道，橙色的招牌倒有一种暖意，飘在大都会的浮华间。地下的图书基本都是原版英文书，坐在窄小过道捧着书看的一两个年轻人，就像从过去穿越而来的人。

1959年5月20日，35岁的查良镛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的《明报》在香港登场。世人大多更熟悉他作为小说家“金庸”的身份，但实际上，金庸自己说，办报才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却只是玩玩。作为明报集团创始人、香港报业大亨“查良镛”的身份，才是他一生功业的重点。

办《明报》初期，查良镛除了撰写社评，也继续用“金庸”笔名发表武侠小说的连载，通过武侠连载开拓新生的市场，《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人手少，他就如有分身之数，撰写所有的版面都几乎一人上阵：写“三剑楼随笔”的专栏文章，翻译严肃的学术性文章和著作，在《自由谈》上以“黄爱华”的笔名撰写《祖国的问题》系列文章，以“徐慧之”笔名撰写“明窗小札”的专栏文章。后来，他又创办《明报月刊》（1966）、《明报周刊》（1968）和《明报晚报》（1969），在新加坡创办《东南亚周刊》（1963）和《新明日报》（1967）。查良镛以“一手写小说，一手写评论”，靠一支笔撑起《明报》大业，后无来者。一位资深香港媒体人告诉我，查良镛与《信报》创始人林行止都可谓香港文人一人办报的“最后之人”，从那以后，都只有商人办报；而现如今，香港几乎已没有可靠一支笔养活自己、独立生存的文人了。

1959年，《明报》在港岛中环开张。最初的编辑部可谓微型，沈宝新负责经理和发行，查良镛兼任主笔和总编辑，还有一位诗人和后来《明报晚报》的总编潘粤生，仅仅4人。就在这一年内，香港新创刊的报纸就有10份之多，竞争也非常激烈，获得



上图：马已仙侠岛是金庸搬离山顶道1号后的住地，居住至今

下图：柴湾明报工业中心，《明报》上世纪90年代搬至此

黄霑是香港流行音乐教父级人物。他的一生，见证了香港乐坛的崛起、辉煌与没落。

黄霑原名黄湛森，8岁那年随父母从广州移居香港。1968年，黄霑创作了第一首歌曲《忘记他》，由邓丽君演唱并收录于其粤语专辑中，自此，他作词、作曲、演唱，一生共创作2000多首作品，成为香港流行乐基石的重要组成。

黄霑的影响力早已超出流行音乐，成为香港的一个时代标签。上世纪70年代末，黄霑与作曲人顾嘉辉合作，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辉黄金曲”，既展现了香港的黄金岁月，也是港人人生观的集中体现。《家变》《狂潮》《射雕英雄传》《上海滩》等电视剧主题曲都是这一阶段的名作。从此黄霑成为香港歌坛公认的“词坛教父”，林夕曾称赞他的词作“以文言笔法写词有如行钢线，一不小心便会一面倒。只有学贯五经才能欣赏”。

黄霑的词曲多为武侠奇幻电影所作，曲风古典奔放，饶有趣趣。徐克的早期电影《蝶变》（1979）、《新蜀山剑侠》（1983）、《刀马旦》（1986）、《青蛇》（1994）、《梁祝》（1995），乃至监制的《倩女幽魂》系列，均少不了黄霑的身影。他创作的旋律把徐克的奇诡风骨挥洒得情致飞扬，成就了徐克的“武侠江湖”。

另外，黄霑主持电视台节目，写专栏、写小说、写剧本、演电影，样样手到擒来，文采飞扬，个性洒脱。倪匡曾赠黄霑对联一副：“两日烹调有黄霑，一生煮字无白雪。”

黄霑自嘲“不文”，这雅号源自他1983年出版的《不文集》。

这本黄霑早年发表在杂志专栏上的成人笑话

合集再版60余次，创下香港畅销书重印的最高纪录，至今仍无人打破。

林青霞在《忆黄霑》一文里回忆黄霑想象自己的丧礼：“他说他会播放他事先录好的片段，一开始先‘哈！哈！哈！’地大笑三声，然后叫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的，要高高兴兴地欢送他。”如此至情至性，如果用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比照，黄霑就像“东邪”黄药师，身怀绝世武功而超越世俗，嬉笑怒骂，活得畅快淋漓。等到大家想起他，就想到他的笑声：“哈！哈！哈！”

（整理：吴杨）



（老北摄/视觉中国供图）

市场一席之地很艰难。《明报》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只剩下查良镛和沈宝新苦苦支撑。那时他的家在尖沙咀，与中环的报社一海之隔，常常深夜忙完天星小轮已经停航，只能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才能渡海。

但那的确是一个报业的“黄金时代”。据资深香港记者和《明报》研究者张圭阳博士统计，整个20世纪60年代，香港共有108份报纸，多为同乡合办的“同仁报”。报业蓬勃发展，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办报的成本相当低廉。两三个报业同仁，筹集1万元，向政府缴交报刊登记押金费即可。利润却是可观的：以每份售价1角的报纸计算，报社可向报贩回收六分四，纸价每张不到四五分钱。一份出一张纸的报纸，编辑部只要有三四个人便可以运作（新闻靠抄电台或约外稿），排字、印刷都可移交给专门承印报纸的印刷厂或排字公司去做。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一个20人的字房，一班便可以承包一份报纸的排字工作，报纸每日只需付字房70元至120元，印1万份一张4页的报纸，印费70元，每日向报社结算。当时，一份报纸只要能有1万元以上的销数，就可以只靠卖报纸的收益得以生存，完全不需要依靠广告。

站在中环利源东街上，在有轨电车驶过的陈旧又弥新的叮当声里，那些曾集中于此、承印报纸的字房和机房，似乎还留下机器开动的嘈杂声，穿透时空交织于此刻的喧哗中。遥想这一带，曾经既有报社办公的地方，也有专门为报社提供纸张、油墨的地方，以及排字的字房、版房、铸字房和代报社印刷报纸的印刷厂。张圭阳告诉我，与报纸相关的办公室与厂房一直延伸到邻近的云咸街、荷里活道一带，在湾仔的修顿球场也有很多报社办公室。后来《明报》在1966年搬到很多外省人聚居的北角英皇道651号，又在20世纪90年代搬迁到更西的柴湾明报工业中心，



(查良镛(金庸)供图)

2001年，日本版金庸小说发行，金庸应日本德间书店邀请出席新书签名会

一方面是报纸自身的壮大和地产投资的考虑，但另一方面，中环如今的地段全被购物中心、商厦与金融大楼占据，也是权势和财富角色的星移更替吧。

当我追溯《明报》的旧址前往北角英皇道651号，也只见一栋更名为“科汇中心”的大楼，容纳各种科技和咨询公司。张圭阳说，这一带如今依旧是很多老左派报人的聚居地。在雨水清洗过的街道上，我经过香港廉政公署的大楼，经过很多杂货小卖铺，也经过一位戴着眼镜、衣着略微潦倒的老人摆出的报摊，石块镇住的各类报纸一份不过1港元。一位撑着伞的年轻人走上前翻了一圈，又默不作声地离开了，老人依旧安静坐着，等候，并对此已习以为常。

半个世纪以前的景象是截然不同的。对于查良镛创办《明报》初期是亏蚀还是赚钱，没有确定的说法。但据张圭阳计算，若这份4人合办的“同仁”小报能卖出1万份，扣除每天开销，报社即有167元进账，一个月有5010元，每人每月除了收取300元月薪外，还可以分得1252元的利润。当时一般员工每月只有100余元，而办报可以月收入1500~5000余元，这个数目在当时非常有吸引力。

让小报《明报》壮大为香港大报，有几次关键

的转机。一个是1962年，大量内地特别是广东居民逃往香港。当时内地内忧外患，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所有专家，加之三年灾荒，香港成了一个逃离的目的地。查良镛是偏左派的，他最初态度是不报，低调处理。但随着来港人数越来越多，报社采访部的年轻人对不能报道这件事很义愤，给了查良镛很大的压力。他随即派记者前往报道。报道一出，《明报》立马畅销，发行量迅速由1万份陡升至4万份。张圭阳说：“《明报》记者大多是北方南来，中文很漂亮，文采远胜其他香港本地报纸，对这个话题的报道使其立即脱颖而出。”

那时来到香港定居的内地年轻人，也都爱看《明报》。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距离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国民党退守台湾，已有十几个年头，谁也不能吞并谁。原来因战祸暂时栖身香港的内地人，渐渐不再把香港作为暂栖地，而变为长期居住。香港也有了无数的摩天大厦和许多发展计划，成了繁华的现代大都会。《明报》副刊专辟专栏报道这些人定居香港的日常和内地的情况，让他们一解思乡之愁，这样也积累了很多知识分子读者追看，确立了它一贯的爱国立场。

1966年,《明报月刊》刚刚创立,内地爆发“文革”。几乎是恰逢其时的,《明报月刊》立刻成了海外知识分子论政的舆论阵地,查良镛也适时提出了保护传统文化的宗旨。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正是内地的政治动荡成就了香港查良镛的媒体事业。在内地动荡的10年间,《明报》因为较多准确预见了中国内地政治的发展,一步步建立了“中国问题专家”的国际声望。

他也有拿捏失误的时候,比如1986年对大亚湾核电站的报道。查良镛以为自己拿到了特别可靠的消息,加上内地政治宽松,他预测核电站一定会撤离大亚湾,所以带头反对。但没想到,核电站最后毫不妥协地设在了大亚湾。

曾任明报集团董事长办公室秘书的符浚杰告诉我,查良镛的政治立场根据时局变化,常有摇摆和变化,但他始终不变的立场有两个,一个是“爱国主义”,一个是“知识分子”。他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也常和《明报》员工讲起他骑自行车逃难时一颗炸弹在身后爆炸出一个大坑的情景。那种希望中国人站起来,希望中国强大的愿望从那时起就非常强烈,终生未变。“无论对共产党,对国民党,还是对港英政府,他都是一个一以贯之的纯粹民族主义者”,一位20世纪80年代曾在《民报》工作多年的资深记者告诉我。对于香港左派或右派人士攻击他是“墙头草”,查良镛曾有些机巧地回应:“我的立场,就像一支笔直的筷子。改变的只是桌上摆放食物的圆盘。圆盘转来转去,食物调来调去,人们便以为我的立场变了。其实我没有,变了的是圆盘,是食物。”

符浚杰回忆,他进入《明报》时还只是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小记者。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问香港,中英开始了第一次对香港前途的谈判。谈判后,双方分别发表了声明。当时香港所有报道都按外交辞令评价这场谈判“很有建设性”。前往报道此事的符浚杰回头细想,撒切尔在声明里强调的是“三个条约”,而中方在声明中并未提及,声明重点并不同。他报告了这个想法,第二天《明报》是香港唯一以《中英谈判有分歧》为标题做报道的媒体。“好多人认为查先生对政局判断经常准确,是因为有‘内线’,其实不是。主要是因为他有判断,而且相信合理的、客观中立的判断。”今天香港的媒体业氛围,已与《明报》的鼎盛时期大不相同。“记者只知道在报纸上对政府开骂,个个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却忘记了‘客观中立’的操守。”

查良镛是个很有商业头脑和擅长经营的人。他的商业才华,大概在他15岁编写畅销省内外的中考教辅《给投考初中者》时,就已初露。1991年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查良镛的报业王国达到了辉煌的巅峰,《明报》《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三份刊物的合并出版版权估值为5.8亿港元。在日常经营上,他处处精打细算。一位《明报》老员工告诉我,有一段时间香港报业的印刷纸张只能从北欧进口,纸价波动很大,查良镛总是能做出低价买进的决策,在高价时还有盈余卖给报业同行。据说他在美股市场也获利不少;卖掉过去在山顶道1号的房子搬到半山的马己仙峡岛,以及卖掉明和社原来购置后来有富余的两层办公室,也都是他财富的一部分。

明报总经理兼《明报月刊》总编潘耀明告诉我,1991年他进《明报》,第一天上班就去找金庸问他为什么做《明报月刊》,这种文化杂志在商业上不好销,没有什么经济效益。查良镛当时说:“这是想给明报集团创立一个品牌。”有一次潘耀明和他到广州,查良镛告诉他,一般人对文化的价值不了解,实际上文化是个无形资产。当时《明报月刊》积累的作者都是大师级的海外精英,包括余英时、李欧梵等。“当时查先生给我一个很具体的数字。他说,明报集团没有什么真正的财产,就是一个明报大厦,每股的股值是1毛钱港币,上市以后,马上就是2块9。他说,这个差价就是文化的价值。”很多人以为查良镛是靠写武侠小说赚钱,实际上,他主要是办明报赚的钱。30多年前《明报》销量最高峰的时候,“每年可以存一两亿港币,这还是当时的钱”。

符浚杰在任董事行政秘书期间,时常也帮查良镛处理每天大量的读者来信。他告诉我,曾有读者问过查先生一个问题:“你的武侠小说这么严谨,是事先编排结构好的,还是一边连载一边想下一步该如何写?”他去问查良镛:“他说,他事先构思的是人物的性格,然后再将人物的性格放在后面展开的人物身上于不同场景和情节里去演绎,自然而然就发展出人物的命运了。”这种对人性的洞察力,也被查良镛实践在他对《民报》的人事管理中。“每个人好像都是他小说里的角色一样,他可以快速识别每个人的性格,并且据此把每个人安排在最适合他的职位上。”

潘耀明亦告诉我,“查先生采用的是一种无为的管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明报集团的高层主管很自由,“他聘用之后基本不过问具体事务,所以《明报》每个时期风格都不一样,都是各个主

编的风格”。但是他很细心，“基本《明报》每期都看。只要发现句子不通顺，有异体字，他就写个字条，我们也很紧张，所以《明报》出错很少，他也基本没开除过什么人”。

1993年，查良镛辞去明报企业主席的职务，缓步淡出管理层，并于1994年正式退休，为接近半个世纪的报人生涯画上句号。他那时大概并未像外界广为认为的那样，已决定“隐退”，直到1994年，他在《明报》还保留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他也还是照常上班，希望有一点写作的空间。后来，明报集团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他也最终弃掉了董事长。一些《明报》的老员工看到查良镛搬离办公室前收拾东西，“很是不舍”。

潘耀明说，卖了《明报》之后，查良镛本打算在明河社大干一场，写历史小说。但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事情是，他那时得了心脏病，不久便做了心脏搭桥手术。那时他在北角那边，办公室里有很开阔的海景。“他经常打电话给我，叫我去他办公室喝酒聊天。他喜欢一边喝威士忌一边说话，并不是什么高档的酒，就是普通的轩尼诗”。查良镛平时说话有海宁腔，讲话不是很流畅，但思维敏捷周密，有点大智若愚的感觉，“每喝了点酒，他说话就很多”。他当时其实雄心勃勃，想再做一番事业。他的理想，是建立自己的事业，找到一个接班人，然后隐退，这些都已经实现了。现在，他的下一个理想是去大学里面游学、讲学，并开始写作。当时他想写历史小说，而且计划再做一个不仅只出他的书的出版社，所以请我过去帮忙策划。现在看来，这个理想并未实现。

查良镛是1995年3月20日进的医院。“那天晚上查太太打电话给我，说Louis（查良镛的英文名）动了大手术。还记得那天天下着暴雨，我开车前往医院，心情也非常阴郁。他的心脏搭桥手术做了8个小时，并不是很顺利，他在医院住了大概大半年。虽然他和我签了5年合同，给了我一个两面海景的大办公室，对我的待遇也很好，但我并未开展工作，等到他出院后，他也有些意兴阑珊了。”潘耀明说。☑

蔡澜，1941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他早年留学日本，就读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半工半读，得邵逸夫赏识，被任命担任邵氏公司驻日经理，负责购买日影到香港放映。移居香港后，渐以食评为名，有“食神”之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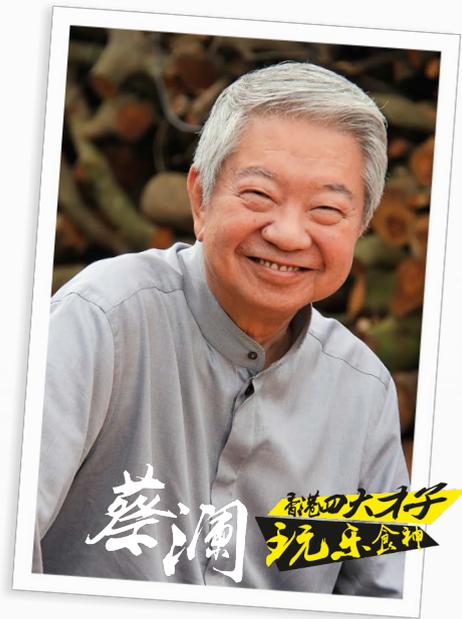
蔡澜最为人所忽视的身份是电影工作者。自小受父亲影响，蔡澜便热爱看电影，自称“香港人当中看电影最多的人之一”，以平均一天一部，一年365天计算，观影已逾2万部。他先后担任邵氏和嘉禾两大电影公司高层，监制过《快餐车》《一个好人》《霹雳火》等多部成龙主演的电影。40年的电影生涯，却没有一部让蔡澜满意的片子；他也发现电影这种集体性的创作并非自己所爱。

蔡澜转而开始撰稿，在《东方日报》《明报》《壹周刊》《苹果日报》皆开专栏。而他开始写食评的原因竟是因为“老父来港，饮茶找不到座位，又遭侍者的无礼，发奋图强，专写有关食物的文章，渐与饮食界搭上关系”。蔡澜的食评不仅写大餐厅，街边小贩同样不放过，这也是他的美食文章亲切耐看的原因。他自称，自己的食评都是在写稿到天亮，肚子特别饿的时候下笔，故而格外惹人垂涎。

作为主持人，在与倪匡、黄霑共同主持清谈节目“今夜不设防”之后，蔡澜又主持了“蔡澜人生真好玩”“蔡澜叹世界”等六档饮食及旅游节目，轻松活泼，妙趣横生，其中“蔡澜叹世界”荣获最受欢迎电视节目大奖。

提及自己的“才子”之称时，蔡澜说：“按潮州老辈人的说法，才子至少要具备这些条件：琴棋书画拳，诗词歌赋文，山医命卜讼，嫖赌酒茶烟。按这个标准，‘才子’二字，与我无缘。”在金庸眼里：“论风流多艺我不如蔡澜，他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他曾将蔡澜比作《天龙八部》中的段誉，往日意今日痴，真正懂得追求和享受人生。而据倪匡观察，蔡澜是熟悉的人之中，唯一一个从未在背后听到有人说他坏话的人，于是他将此种最高境界定名为“蔡澜层次”。黄霑也说：“蔡澜是我最值得信赖的朋友。”

蔡澜不说是自己是“才子”，而说“我只想做一个人”——跟整个宇宙相比，人生只是短短几十年，一刹那的事情。（整理：吴杨）



陈平原：金庸小说何以长盛不衰？

记者 艾江涛

“作为小说家，金庸先生有政治眼光、新闻才华、商业立场，什么都凑在一起，别人做不到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最早进入内地时，陈平原还是中山大学的一名学生。由于处在地理上颇得风气之先的广州，他很早便接触到了单行本的金庸小说，可真正将其作为专业研究对象，却要等到10年之后。

1990年，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金庸热”逐渐形成。学生们对金庸小说的热读，现代文学研究中所感同身受的“自己在大时代中的无足轻重与无能为力”，让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的陈平原对武侠小说的流行感怀颇深：“明知这不过是夏日里的一场春梦，我还是欣赏其斑斓的色彩和光圈。”于是，便有了那本日后在他所有研究著述中版本最多、最为流行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这本颇开风气的著作，将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研究，既考辨了在不同时代、不同文类中游侠文化的变迁，也论述了武侠小说的基本结构模式。同年秋天，陈平原在北大开设了专题课——中国人的游侠想象。

不过，旗帜鲜明地研究金庸、赋予金庸小说以学院品格的是陈平原在北大中文系的前辈严家炎。1994年，在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仪式上，严家炎发表了题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词，在他看来，金庸小说标志着以中国新文学与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取得巨大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殿堂。”两年后，严家炎在北大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随后出版了研究专著《金庸小说论稿》。

陈平原回忆，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与严家炎对金庸的高度肯定，在当时引起争议。除了见诸报端的评论，学界私下的议论更为痛心疾首：以批判鸳鸯蝴蝶派起家的北大，如何背叛新文学传统开始接纳通俗小说？其时，不光是学界，即使金庸本人谈起武侠小说也满是谦抑：“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点点文学的意味，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饶有趣味的是，金庸本人更愿别人称他为小说家，而不是武侠小说家。

当年的争论逐渐远去。随着围绕金庸小说的学术讨论会的召开，金庸及武侠小说在文学研究者的眼里已发生变化，用陈平原的话来说：“学术界不再用轻视眼光看待金庸，承认他是一个重要的作家，而且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非常值得学术界关注。”





（李俊东 摄 / 新华社供图）

1994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为金庸举办名誉教授授予仪式，之后金庸为学生们签名

如果说金庸小说在学界的地位还经历过一个“登堂入室”的曲折过程，那么在万千读者那里早就深入人心。金庸小说何以如此成功，长盛不衰？陈平原将其总结如下：除了极为出色的想象力，金庸丰厚的学养，使其小说超越类型小说格局，成为武侠小说、历史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的集合，故格外耐读；金庸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使其读者的光谱从最娱乐到最政治，前所未有地广阔；金庸作品特别适合于改编为影视剧；此外，金庸不但是文学家与政治人物，还是一个善于经营的成功的企业家。

“有的人没读长篇小说，但看过连续剧；有的人眼睛不好，没法看，但是听过，总能接触到金庸。”让陈平原印象深刻并对金庸的魅力感叹不已的是，在2016年他担任终身评委的“我与金庸”全球华文散文征文比赛上，最终获得一等奖的是一位盲人，他靠听金庸小说获得精神动力，最终战胜许多生活中的困难。

“登堂入室”之路

三联生活周刊：80年代“金庸热”如何成为引人关注的文化现象？你后来和严家炎老师开设金庸研究的课程，据说也是受此影响？

陈平原：武侠尤其是金庸小说进入内地，是80年代的事情。作为热门的校园读物，对于我们那代人来说，读萨特和读金庸是可以混在一起的，所谓西方哲学和通俗文学，不像今天分得那么清楚。我在广州读书时就接触到金庸小说，算是比较早的，但是并没有把它当作专业研究的对象。

1990年，我写了《千古文人侠客梦》，讲了游侠想象在整个中国历史及文化上的贡献。那本书是我所有著作里面接受面最广，版本也是最多的。这本书正式出版是在1992年春天。我在北大讲“中国人的游侠想象”这门专题课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或争议。因为我谈的是“游侠”，而且把它作为一个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现象看待。

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是1994年北京大學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严老师在授予仪式上发表的那篇《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也引起比较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一个针对的是严老师的论述；另外一个针对北大的举措——作为新文化的提倡者，当年以批判鸳鸯蝴蝶派崛起，现在回过头接纳通俗小说，你怎么好意思？

1996年，我撰写《通俗小说在中国》，就从金庸风波说起。在这篇文章里，我谈及人们对包括武侠小

说在内的通俗小说的普遍歧视，其根源是“五四”时期所构建的“新文学神话”。几十年中，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陈述，通俗文学被挤压到几无立锥之地。而这种对通俗文学的故意抹杀，近年来不断受到学界质疑。如何论述以及评价高低是一回事，大学课堂刻意回避通俗小说的局面，终将被打破。

严老师的特点是很有主见，非常坚持，人家批评他，他就更兴奋、更认真了，于是在北京大学开了一门“金庸小说研究”的专题课。据说第一节课去了很多人，但听了一节课后不少人走了，因为他要求修课的学生写报告、参加讨论。可能学生们觉得，本来很好玩的一件事，被弄成了这么严肃，不高兴。严老师将金庸小说作为一个学术课题研究，成果就是1998年北大出版社刊行的《金庸小说论稿》。

金庸小说在80年代就进入内地，有的是内地盗印的，有的是从香港带进来的，有各种各样的单行本在读者中流传。1994年，金庸小说由本人定版且正式授权三联书店印行，书做得很认真，装帧也不错，这套全集对90年代以后金庸在内地的推广普及，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中间还有王一川等编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时，将金庸列为小说家第四，那是一个新闻事件。

2008到2013年，由于各种因素的考虑，金庸对自己的小说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交给广州出版社和花城出版社刊行。对这次修改，学术界基本不关注，读者也不太接受。我以为，从最早的报纸连载转为图书出版，那次认真修订是成功的；2008年以后的修订本不太被认可，原因是，文学作品一旦定型并成为经典，就有其自身命运，一代代读者的接受期待和阅读趣味，使得他们拒绝作者对原作做较大的修改。

三联生活周刊：90年代围绕金庸的争论，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也包括王朔这样的作家对金庸的批评。在你看来，争论的核心是什么？

陈平原：王朔的批评，不能说没有道理。但那过分的苛刻和愤慨是他个人的风格，不必当真。而且，你会发现，金庸对王朔的批评很宽容。我半开玩笑地说，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窃喜。对有经验的作家来说，批评、赞赏都是一种关注和提醒。我再三说，金庸先生是从新闻业走出来的，他有自己的敏感和判断。王朔的批评不会对他造成大的伤害，反而会引起公众对他的关注。所以，查先生的回应非常客气，说了些王朔先生很聪明之类的话，根本不与其讨论武侠小说好坏的问题。讨论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公众的关注是最要紧的。

查先生作为一个伟大的武侠小说家的成就，大家没有争议。争议在于，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有其自身特点，在文学史上地位的高低。查先生不喜欢人家说他是“武侠小说家”，他更愿意说自己是“小说家”。小说家可以写各种题材，可以有不同的风格，一提“武侠小说家”，天地明显就变小了。当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荣誉教授时，有一个明显的错位。北大表扬他对新闻事业的贡献，金庸当时讲的是中国历史的特点，而很多听众却是奔着武侠小说去的。

可以这么说，一直到90年代中期，尽管读者很多，金庸小说还是不太能登大雅之堂。后来，随着不少学者介入，包括在国外召开的几个学术讨论会，如1998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刘再复和葛浩文组织召开“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年在日本横滨神奈川大学召开“金庸小说研讨会”，风气开始转变。经过这些学术活动，学界不再用轻视的眼光看待金庸，承认他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也承认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值得关注。这是一个“登堂入室”的漫长过程，大家视野逐渐开阔，趣味也趋于多元，看问题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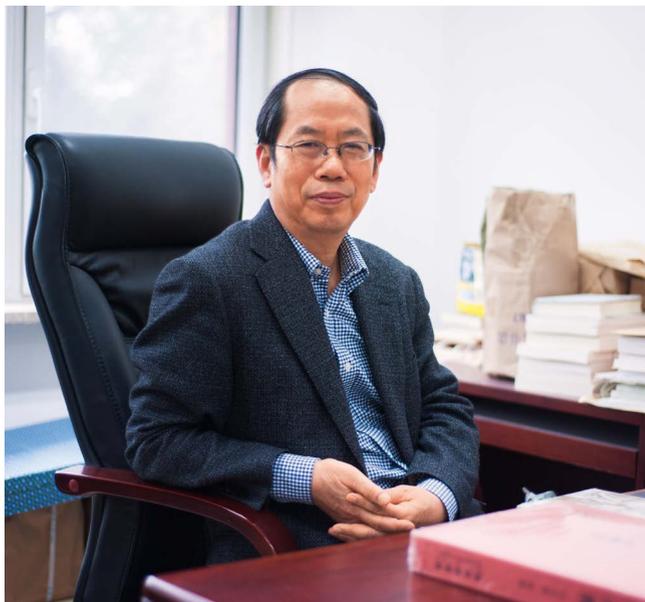
长盛不衰的背后

三联生活周刊：在论著中，你从“共同回应晚清以降西方小书的刺激与启迪，以及整个社会转型中思想意识的变化”的角度，倾向于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旧派武侠小说与五六十年代的新派武侠小说合起来看。在新派武侠小说家中，为何金庸的小说更有生命力？

陈平原：是这样的。作家的独创性和类型的延续性，必须两边都谈到。否认作家的独创性是不对的，金庸确实了不起，改变了武侠小说的格局；但是武侠小说这一类型小说如何一步步变过来，作为历史学家，你必须明白它演进的步伐。

我当年写《千古文人侠客梦》时，新派武侠就谈这三个人：金庸、古龙、梁羽生。今天看来，这三个人中，为什么金庸小说的生命力最长？有几个原因。

第一，金庸本人的学养在三人中是最好的。某种意义上，很多人尤其是海外华人，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入手，去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点古龙做不到，古龙小说更多的是驰骋天外的想象力与诗意，犹如寸铁杀人，这与金庸小说的博大精深是不一样的。金庸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所下的功夫在三人中最深，使得他的作品能超越纯粹的类型小说。金庸某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

种意义上是把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等混合在一起写，所以时代变化了，读者趣味也变了，但他的小说还能长期存在下去。

第二，必须考虑到，金庸有超越小说家的能力、视野和襟怀。某种意义上，只看武侠小说，不见得能洞察金庸的好处，必须把《明报》的视野带进来。在几个新派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是有独立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的一个人。他是有《明报》事业垫底的武侠小说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明报》是个很重要的舆论场所。中央政府关注他，也是这个缘故，通过金庸的“社论”，可以了解香港舆论导向。而且，你仔细阅读金庸小说，尤其是《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其中蕴含某种政治寓意，跟他写作时中国内地的政治生态有关系。所以我说金庸是一个有政治关怀的小说家，也正因为这样，他能得到比一般小说家更多的关注。比如大家会谈到邓小平读他的小说，其实一开始也可能是关注香港舆论，不仅是把他当作一个小说家看。

我曾在若干场合见到政治人物如省长省委书记等，与金庸亲切交谈，都说是他的热心读者。这其实不简单。古龙、梁羽生的小说不见得会进入政治人物的视野；人家即使私下阅读，也不会公开场合表达“倾慕”。而金庸小说的读者，可以从最娱乐的拉到最政治的，光谱极大。

第三，金庸小说之所以长盛不衰，还因为它们

特别适合于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除了作为根基的长篇小说，影视剧、漫画、动漫、游戏等，共同构成了金庸武侠小说庞大的“江湖世界”。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小说文本问题，可以有更多衍生产品，而金庸也很善于在这方面拓展。

三联生活周刊：插一句，金庸小说适于改编成电影，应该与他 50 年代在长城电影公司的那段经历包括写法也有关系？

陈平原：金庸早年的电影剧本写作，对他的武侠小说创作有没有影响，我未做研究。直觉不太像。如果谈电影手法（蒙太奇技巧）对小说的影响，古龙应该在他之上。古龙的小说一看就是从电影和日本漫画过来的。但是在长篇电视剧改编这方面，金庸的小说更有潜力，也比较容易操作。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金庸是一个文学家，一个政治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报人和商人。说到这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比别人经营更为得法。记得一件事，当年他以 1 元人民币将《笑傲江湖》的电视剧改编版权卖给了央视，这是非常精明的手法。他的作品进入日本市场时，也采用过类似手法。这不是一般书生可以做到的。我说这些，并无褒贬之意，而是说他在原创核心完成后，在转移成电影电视游戏等衍生品的过程中，非常有经验，所以会被我们不断关注和提及。

请你记得，金庸作品进入内地 40 年来，几乎每过几年就会有一个相关的新闻事件出来，包括人物评价、版权纠纷、作品修订等。所以说，作为小说家，金庸先生有政治眼光、新闻才华、商业立场，什么都凑在一起，别人做不到。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千古文人侠客梦》的前言写道：“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现有的武侠小说是一种娱乐色彩很浓的通俗小说。”其中也暗含了你对武侠小说的立场。站在一个专业研究者的立场，你如何看待金庸小说的艺术性？

陈平原：首先，雅文学、俗文学的边界今天日渐在拆除，我们不会像过去那么截然两分。金庸小说在类型小说中达到非常高的成就。但是类型小说（武侠、言情、侦探、推理）有一个基本机制，第一本你会看得很兴奋，看多了便会懂得它是如何经营的。没有套路，就不是类型小说了，我在《千古文人侠客梦》里谈为什么是“仗剑行侠”，为什么是“快意恩仇”，为什么是“笑傲江湖”，为什么是“浪迹天涯”，这些基本的“叙事语法”，构成了武侠小说的作者与读者共同认可的“套路”。这些基本套路有其写作的便利，

也就是可复制性，人物变一变，故事变一变，可以不断写下去。这一点，与我们所说的求新求变的探索型小说不一样。

金庸在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才有意颠覆这一小说类型的叙事语法，这是他一个很大的变化。但即便在此前，金庸小说的好处在于，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侠小说。比如他特别喜欢写亦正亦邪的人物，早年的类型小说一般不会这么写，这属于剑走偏锋，做得好会有突破，做得不好，读者可能不接受。刚才说了，金庸小说其实有很多变革，他把政治视野、历史小说、言情小说都带进来，这都是对武侠小说的拓展。

尽管有如此拓展，但类型小说就是类型小说。类型小说适合做综合研究，不能只看一本两本，得看一大批，才能描述它们的总体特征，故适合于从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进入做综合论述。这与鲁迅小说适合于一篇一篇细谈，那是不一样的。这里谈论探索（文人）小说与类型小说的差异，不是纯粹的价值判断，只是描述其写作机制与生产方式。

要说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其实探索（文人）小说难改，反而类型小说好改，因其操作空间及自由度更大。另外，如果你想通过小说了解历史文化知识，好的类型小说更合适。因为，探索（文人）小说往往刻画性格，探究人性，触及灵魂，对外在的历史文化背景反而不是特别关注。

“用中国语言写中国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换一个问法，金庸小说对五四新文学的吸收借鉴包括成功转换，体现在哪些地方？

陈平原：这么说吧，早年大家都把金庸小说当通俗小说看，所以它有抗拒五四新文学那一面。金庸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说“我用中国语言写中国故事”。换句话说，你们很多新文化人是用外国语言来写中国故事。这一点，他很自觉。

某种意义上，他确实跟我们所说晚清侠义小说还有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旧派武侠小说有所不同。但其实武侠小说从旧派武侠开始，已经与新文学在不断对话。李安拍的《卧虎藏龙》，由王度庐小说改编而来，而王度庐早年是搞新文学创作的，写得不成功，转而写作武侠小说，但其政治立场、人物塑造以及若干写作技巧，明显受新文学影响。

金庸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的小说带有历史小说的味道。谈金庸，必须把他对历史的关注带进来。我曾经说过“金庸对历史上民族问题的认识很精彩”，

金庸很得意且引用过。金庸在小说中特别关注易代之际或乱世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且不是纯粹站在汉族立场，这一点使他超越了很多同时代的作家。金庸以一个小说家的直觉，也有他接受西洋文化的影响，加上香港的特殊位置，导致他不是以汉族王朝为中心来思考问题，这一点很了不起。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五四新文学放弃游侠文化传统，以致这一领域被武侠小说独占感到遗憾。从这一角度看，五四新文学所确立的文学尺度，今天来看有何值得反思的地方？

陈平原：其实，对“五四”立场的反省是一方面，对“五四”立场的坚守也是一方面。我们必须回到历史。这也是我在谈晚清和“五四”时再三论述的那个问题，在我看来，晚清和“五四”其实是一代人，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文学变革，尽管后来有分歧。其实，我们专业里不同学者立场也不同，比如王富仁坚决主张打压通俗文学，范伯群特别强调通俗文学的意义，我的立场是，“五四”新文化人崛起过程中的立场及偏见值得尊重，否则他们不可能往前走。只是时过境迁，历史学家得纵览全局，看到他们各自所走的方向与得失利弊。

从新文化人的立场来说，他们这么做是对的，如果不这么做，他们站不起来。因为几十年的历史论述，导致我们会觉得“五四”那代人很霸道，声音很大。但请你记得，在20年代，他们是少数人、是弱势群体。当 they 要站起来发声表达，必定要有偏激的一面。所谓“登高一呼应者影从”，那是后来历史论述造成的误会。

我们会经常讲一个故事，鲁迅给他妈妈买的是张恨水的作品，鲁迅的妈妈不会读《呐喊》《彷徨》的。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我们应该明白，五四新文化人开启的“新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有活力、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但这不是全部。通俗小说、旧体诗词，以及学者们的各种感怀与写作，也是我们谈论20世纪中国文学时必须关注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中详细考辨过“侠”的形象的历史变迁，在你看来，金庸小说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是如何形成的？

陈平原：这涉及不同时代不同文类的问题。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武侠小说，比较能对照起来看的是唐传奇、元杂剧以及明清小说中“侠”的形象。其实，还有游侠诗文必须关注。诗与长篇小说不同，比如龚自珍“一箫一剑平生志”，就与约略同时代的小说《三侠五义》不一样。如果说诗只是表达文人的情怀与意

气，没必要那么复杂；可小说要吸引那么多普通读者，必须有很多变化与波澜。

还有就是政治立场。比如《三侠五义》等清代侠义小说，强调“为王前驱”，侠客容易演变为官家豢养的鹰犬。民国建立以及皇权解体，导致以后的小说家，确实不再像以前那样强调“为王前驱”了。到了金庸、古龙等，特别强调侠作为个人的价值、立场和追求。

三联生活周刊：尽管我们知道你习惯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还是想请你谈谈与金庸先生交往中，对他有何印象？

陈平原：我与金庸先生有若干接触，但没有深交。我不愿与研究对象有太密切的关系，保持一个距离，评判时不太受个人感情、利益的影响。所以，我与金庸的关系，仅限于见面打打招呼。只有一次例外，险些亲密起来。

2001年，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招收历史专业博士生，引起很多争议，比如资格问题等。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说起此事，我说查先生的长处，在于他有历史学家的眼光，但没有历史学家的技术和能力。他是一个很好的有历史眼光的文学家，若招博士生，应该在中文系设一个“文学与历史”方向。浙江大学一听，这主意最好。大概是怕校内竞争激烈，挂的导师是金庸和我。当然是以他为主，我是帮助打边鼓的。

我对金庸非常尊敬，原本也是想帮忙，可惜没帮得上。查先生是很要强的人，正因为他要强，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记得有一次在香港，听他津津有味地讲在英国念博士的经历。本来人家准备授予他名誉博士的，他不，非要自己读。查先生骨子里有一种非常刚硬的东西，认准了，百折不回，你说不行，我非要做。这是很令人敬佩的。包括在浙大招博士生的事，原本也许不在意，有人说他不行，那他就非要争这口气不可。

教书本来没什么了不起，但需要用心，且花时间。而他其实没时间跟学生多谈话，一到浙江，马上就被热心人包围。有人在报纸上说，幸好有陈平原帮忙，学生可以到北大待一阵子，接受良好的训练。传话人添油加醋，据说大侠很不高兴，我赶紧撤退。

依我观察，金庸不太善于演讲，但回答问题时应对很好。我在好多场合，见到他演讲完了，应邀给听众签书。早年为了卖书，与公众热情互动，这可以理解。等我见到他时，他已名满天下，用不着这一招了。可让我很感动的是，他会问对方叫什么名字，不只是题签，还随手写上一两句鼓励的话。他这么大的名气，如此体察人情，实在不容易。■

金庸的“身份”

——专访金庸资深研究学者陈墨

记者 傅婷婷



1983年，邓小平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查良镛（金庸）先生及其家属

（吕相友摄/中新社供图）

“身份的内在冲突问题，是金庸小说超过其他武侠小说而具有更加先进的思想主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查良镛的《明报》社评、60年代开设的专栏“明窗小札”和武侠小说连载，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连接？

陈墨：查良镛是一个新闻人，同时是一个文学家，知道传播中“耳语”的重要性。在我看来，他的社评是比较亲切平实的，并非慷慨激昂。但比较而言，社评相当于大声朗读，人们听到会注意，看起来更醒目。

“明窗小札”相当于耳语，用更亲切更平实的

视点和读者交流，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一种轻灵解暑的文风。读者每天读一点，不见得立竿见影，但效果会慢慢显示。

“明窗小札”和社评跟金庸武侠小说的关系，可以说一个在小说的上方，一个在小说的下方，三者形成一个三角的关系，是循环的、互相的影响。社评在上方，用直接明白的言语方式谈论社会焦点问题，而“明窗小札”是讲情多于理。社评对人的影响大，对小说的视野影响也比较大，而小说对人性的关注又会影响到他的立场和言论的声调。

懂得人性的作者和不懂得人性只懂得事件的作者是不同的。社会的分工、现代学业的分科，往往把社会现象、国际政治这些事件性的研究和对人性的洞察和了解，分隔成汤恩比所说的“密封舱”，这个舱不了解那个舱，但是实际上人类的行为和活动

是一个整体。人类的政治行为和社会事件都是人的思维和行为，是人性造成的，这是一个复杂现象。

金庸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既有新闻眼又有艺术眼，新闻眼能有更大的视野，关注更大的范围当中发生的国际和社会事件。艺术眼是他能看到这些事件背后人性的动机和根源。他又懂得读者习惯什么样的腔调、言论方式和话题。所以在话题、声调、言语和形式的选择上，他比别人确实更有长处。作为小说家的艺术眼更方便于他的新闻眼的传播效果。金庸的视野非常开阔，有时候在这里栽一朵花，那里摘一片叶，再到别处看一棵树。

三联生活周刊：金庸在60年代连载的武侠小说，如《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等，与他当时社评的思想有什么联系？

陈墨：金庸立场的改变有两个重要时间点。一个是1959年，离开《大公报》和长城公司，创办《明报》，选择了一个更艰难但是更符合他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的立场，一个独立和中立的立场。左派也骂他，右派也骂他。这对一个报人和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次选择。另一个是1962年，内地大规模的剧烈的社会变革，大量的居民奔赴香港。一系列的事件对香港人产生了影响和震荡。金庸开始思考内地激进的社会变革为何会导致那样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明报》在这一时期开始受到更多读者关注。这些事情让金庸开始思索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金庸是香港居民当中较早明确这种意识的一批人。当时香港人身份是存在于英国和中国两大传统国家之间的一个特殊的身份，香港人在两种强大力量的当中，有自己的本土立场。1962年，金庸先生其实开始思索这些问题。因为政治的国家边界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自古以来就如此，但是实际上，现代社会有很多的事务，包括跨国公司、科学组织、非政府组织，都是在打破国家边界，形成一个后现代或者说现代后的体制。所以金庸思考这些问题是他本人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报人、新闻人的迫切需求，他必须对这些现象做出他自己的洞察和解释，才有话可说，有社评可写。

这个立场在他的小说当中是有互动的，我曾经开玩笑说，乔峰、萧峰身份认同的变化，是从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转向了国际主义、和平主义。这个立场的转变，在小说写作和《明报》社评的时间上是同步的、互相影响的。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具体说说在《天龙八部》中，

“乔峰还是萧峰”的身份认同问题？

陈墨：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此前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都毫无疑问地站在汉族人的立场来书写爱国情怀，所有的中国读者都充分认同。到了《天龙八部》，写萧峰这样的人，他的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不匹配，要哪个身份？产生冲突的时候，就迫使他来思考和取舍。

在开始讨论《天龙八部》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思索原因。近些年，完成了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证的后半部分。看到了金庸社评、“明窗小札”，我才找到了源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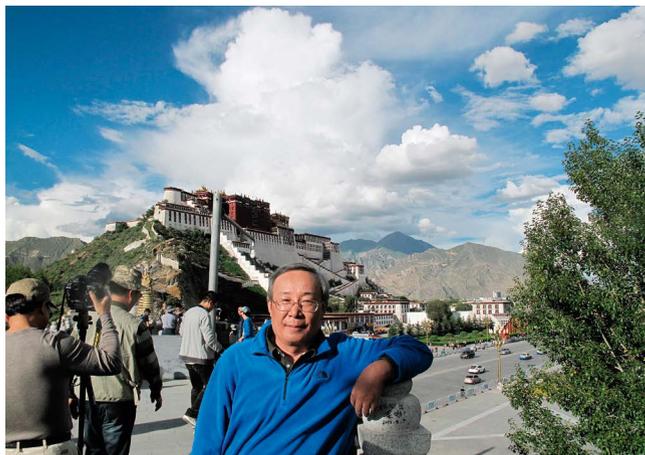
乔峰的生物身份是契丹人，但是文化身份是汉人。因为他完全在汉文化的哺育下成长起来，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完全是汉化了。他对汉人的太祖长拳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很多汉人本身，而且他甚至是利用太祖长拳来应对少林拳，少林拳是达摩祖师从异域传来的，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式的身份冲突的场景，一个象征性的场景。

而乔峰的身份认同问题，源于金庸先生对于香港人的这种本地身份，即第三种身份的认同，在本身作为中国公民同时在英国文化影响的两种势力中，逐渐取了第三种选择，就是香港本土认同的立场和概念，是超越国家边界的一种概念。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样是非常先进的理念，一直影响到今天，还会影响到未来。并不是说否定了国家和政治的维度，而是多了一个本地身份认同的维度。这样就非常重要了，提高了认知复杂度，使香港人的生存达到了一个心理上、文化上和政治上自我认同的效果。当然，他的底盘是从来没变过的，文化知识影响价值观和行为习惯的一个方面，不可能影响他的整体。

三联生活周刊：《天龙八部》中其他人物角色的身份危机如何存在？

陈墨：三大主人公都有认同危机，但是维度不一样。虚竹是少林和尚和灵鹫宫宫主，自己的信仰和江湖领袖身份实际上始终处于自我冲突当中。段誉有点像释迦牟尼出家前的经历，他作为一个王子的政治人物的身份和自身性格也有冲突，所以不断地离家出走平衡自己身份的内在冲突。虚竹不断想回少林寺而回不去，段誉则总是想出来。段誉回到皇宫当中，和虚竹不回少林寺，其实是一样的，坚持内心的慈悲，立足于江湖，立足于皇宫，其实都可以，是《天龙八部》找到的一个方案。

在因果报、怨念这样一个代际传承的网络当



金庸资深研究者陈墨

中，唯独萧峰、段誉和虚竹这三个人，能够以自己的慈悲心，对天下苍生，超越民族，超越种族，超越国界，超越政治，以普世的慈悲心理，超脱出人与人之间的怨念之网，这是《天龙八部》最伟大的主题，这个主题是小说所独有的，根源是身份的危机。身份的内在冲突问题，是金庸小说超过其他武侠小说而具有更加先进的思想主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少林寺方丈玄慈大师和叶二娘是一对情人，最后玄慈承认了，又惩罚自己，又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这个角色大大提升了人性的复杂性。这在别人的小说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作者认知的复杂度大大提升以后，《天龙八部》就变成了复杂精微的人性和社会的两层建构。这个建构在《倚天屠龙记》当中也有实现。

三联生活周刊：在《倚天屠龙记》当中，张无忌的身份有几种层次？

陈墨：张无忌的父亲是正派阵营的佼佼者，母亲是邪派阵营的佼佼者。同样也是萧峰式的身份认同问题，回归父系系统武当派，还是回归母系系统明教的天阴教呢？这个跟《天龙八部》的冲突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换了一种，从道德立场的内在冲突来写张无忌的故事。张无忌的选择是超脱自由的立场，按照具体的行为和事实来评判是非对错，而不是按照派别和象征物的立场。这个在武侠小说史上也是一个重大的飞跃。因为武侠小说史讲究好坏分明，是成人的童话，童话一定是好坏善恶分明的，而在《倚天屠龙记》中，明教当中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人物，而武当派中的宋远桥的儿子宋青书，就是因为个人的欲望，导致心理的扭曲、行为的不轨，

变成了一个可悲的人物。

张无忌超越了正派和邪派，他的第一重超脱，是让明教和六大门派化干戈为玉帛，共同对付蒙古异族的入侵，这种民族的立场比江湖的正邪立场层次更高。金庸先生了不起的一点，就是让张无忌完成了第二次超脱。是什么呢？张无忌跟蒙古郡主赵敏之间的恋情，赵敏为了爱他可以不惜跟家庭决裂，跟她爹和哥哥闹翻，不惜抛弃她所有的这样一个珍贵的身份和物质利益享受，愿意跟他去流浪，是一个可爱的形象，所以并非所有的蒙古人都是坏人。而汉族姑娘周芷若一心一意做的那些事情让张无忌无法认同。汉族姑娘和蒙古族姑娘之间，他认同蒙古族姑娘。这是另一种超脱，蒙古侵略者和汉族人的矛盾是一回事，而蒙古人的个体和汉人个体的爱情、友情、互相了解、关心是另外一回事，从群体的立场又超脱到个体的立场，那就是真正的文学的立场，也是一个新的文化思想的立场。

彼时香港处于多重势力之间，中国的文化渊源和英国的政治统治之间，大陆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台湾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间，这样一个冲突，形成多重的身份焦虑和自我认同的困境。张无忌就是这样困境的一种化身。

三联生活周刊：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社评的互读，在文学性上有什么体现？

陈墨：还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知识的丰富和渊博。另外一方面，关怀的焦点的变化，层次的提升，使他的情怀不断在拓展。因为他从民族主义到和平主义，从爱国主义到国际主义，然后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到最后从一个武侠世界的建构者变成了武侠世界的解构者，像《鹿鼎记》就是一种解构，其中的游戏态度把武侠小说的边界扩展了几十公里，同时忧患和思虑的边界，也延伸了几十公里，其忧患意识有点像鲁迅的《阿Q正传》，但它比《阿Q正传》更丰富，是一部伟大的书。

金庸对人性的目标的不断追寻，不仅有利于他的小说创作，而且使他的小说从一个类型化的普通水准提升到真正文学化的较高的水准。他对个性和个人的不断思索和探讨，不同身份的设置，而后体现出来的行为价值和背后的文化价值，使他的思考超脱了武侠小说的类型而伸到了文学之中。■

（陈墨：金庸武侠小说研究著名学者，著有《陈墨评金庸系列》等。现为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从事中国电影史、口述历史研究，出版相关学术著作近20本）

“明窗小札”和“徐慧之”

1962年12月，查良镛在报上开设“明窗小札”专栏，评析当时国际重大新闻和形势，作者名为“徐慧之”，作为一个窗口，观察欧洲、美国、苏联等等国外的世界。“徐慧之”是一个报馆编辑的角色，他的文中也偶有提到“金庸兄”。

事实上，除了报馆的少数人之外，大部分读者当时并不知道，“徐慧之”就是查良镛本人。专栏结束后，“徐慧之”这个名字也渐渐被人遗忘。近年，“明窗小札”结集成书重新面世（目前出版至1965年）。原来是金庸嘱托其文学助手李以建收集资料后，陆续编辑出版。

李以建告诉本刊，“明窗小札”的文章，“主要来源于翻译国外的报纸和杂志内容。当时通信还很不发达，《明报》也还是小报，没有钱订阅那么多的传真和电报，因为电讯非常贵，香港再大的报纸都没钱订阅那么多的电讯。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打开一个窗口。金庸先生的英文非常好，‘明窗小札’引述一些新闻，但也并非纯粹新闻报道，会写一些小小的评论，一部分评论是翻译引进的别人的观点”。

对于大部分金庸的武侠小说迷来说，这些散文式的随笔文章是他们鲜少看到的查良镛的另一面。

“明窗小札”专栏一直持续到1968年10月，除了1967年中断数月，其余时间几乎是每天写一篇。为什么取笔名为“徐慧之”呢？金庸研究学者陈墨认为，初期《明报》尚处于小报时期，投稿量不大，入查良镛法眼的也不多，所以需要不同的笔名，让读者感到是不同的作者。至于“徐慧之”三个字的意思，陈墨说到他的推测：“从字面上看，可理解为‘慢慢地了解和懂得’，‘慧’可以是智慧，也可以是‘知会’。另一方面，‘徐’是金庸先生母亲的姓氏，她是徐志摩的姑姑，我猜跟对母亲的纪念也有关系，母子有非常深的感情。当然，这些都是一种推测，我没有研究过，也没有求证过查先生本人。”

李以建1994年才到查良镛身边工作，其时金庸已经从《明报》退休，但他从其他同事和友人处了解到金庸当年办报和写作的状态：“他白天管理报社，处理各种事情，应酬见客。晚上七八点以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来，保持一个人的安静，开始写作。写到大概半夜两三点。当时铅字印刷的排版工人在门口等，拿到后即去排版。金庸先生往往要看完大样，等到报纸出街，即报纸派发运送给各个报摊点，早上五点多才下班回家，休息到中午。他长期习惯如此。”

“明窗小札”以精炼简洁的编译为主，综合评析国际时事政局；而《明报》社评则直接晓畅地发表观点。有研究者认为，金庸武侠小说的连载是《明报》

成功的重要原因。但在李以建看来，这只是说对了一半，他认为，真正令《明报》从小报跨入大报行列，成为香港媒体中佼佼者的，还有其独特鲜明的时政评论。李以建评价道：“金庸撰写社评的时间丝毫不比其创作和修订小说的时间短，其篇幅之众、字数之多，在数量上甚至超过小说。其蕴含的深刻内涵和宣扬的鲜明主张，以及体现出的对世界的洞察、对历史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把握，堪与小说媲美。”

据张圭阳的《金庸与报业》记载，从1959年《明报》创刊到1992年控股权转移，其间的33年，查良镛自己执笔撰写的社评至少有7000多篇。他认为，在香港报业史上，查良镛的社评继1874年著名报人王韬在《循环日报》上的社评后，再次产生了重要影响力。而王韬在1874~1884的笔政10年，发表的社评也才901篇。《明报》社评的内容涉及大陆、香港、台湾、华侨、苏联及共产主义，乃至国际热点。

关于查良镛写社评的状态，张圭阳还在书中记载了一个既有趣又无奈的当时工作场景：“查良镛写社评，写得极慢，文稿很少修改，显示在落笔前已有充分酝酿的腹稿。许多时候，到了凌晨一时许二时，过了截稿时间，查良镛还没有把社评交出来，唯一敢敲打查社长大门追稿的，就是字房副领班翁荣芝。翁公敲门，大喊‘你的肠粉写好未？’原来稿件去到字房，先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发给工友执铅字，活像剪肠粉一样，翁公追稿，直喊稿件为肠粉。说也奇怪，查良镛一听翁公喊起肠粉敲起门，文思马上便敏锐起来。”

香港学者蔡元丰曾跟金庸有过几面之缘。在20世纪末的第一届国际金庸研讨会期间，蔡元丰开车陪金庸夫妇到落基山游玩。在用餐的时候，蔡元丰拿出了一本明报社评选《香港的前途》，请金庸先生签名。他跟本刊记者回忆当时金庸的反应：“当时他很惊讶，说从来没有人让他签这本书。于是他在书上写了‘查良镛’三个字。查先生有点高兴，大概是因为我不仅注意到他的武侠小说，还注意到了他的社评，并且跟他谈了武侠小说跟社评的关系。”蔡元丰还记得，当时他聊到了许鞍华对金庸《书剑恩仇录》的改编，金庸摇摇头笑说，这不算什么，王家卫《东邪西毒》才是扯得最远的。

在李以建看来：“如果说金庸的小说是浮现在海岸上冰山的雄伟壮丽一角，那么，金庸的社评等创作则是深藏在水底下的那巨大的坚实厚重的部分，二者是无法分割的一体，共同构成了金庸独特的话语世界。”（文/傅婷婷）



【林津露 摄】

金庸访问记

文 / 李怀宇

金庸晚年不太喜欢聊办报纸与写小说，而念念不忘的是做学问。我们的话题焦点始终不是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和江湖一样好玩。

“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

我早在读书时代就熟读金庸小说。后来机缘巧合，我在母校的石景宜赠书室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浏览1966到1996年的《明报月刊》，这是由金庸创办的学术文化杂志，主编胡菊人、董桥、潘耀明都是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这些年，闲来无聊时，金庸小说是

我消磨时光的最佳读物，一读再读，总觉妙趣横生。算起来，我是一个“金迷”，可是，金庸晚年的一些作为，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心生当面求教的念想。

2008年12月4日，我应约来到位于香港北角的明河社，但见门口挂着金庸手书的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金庸的办公室是一个宽敞的书房，落地窗外，维多利亚港的无敌海景尽收眼底。我见过无数读书人的书房，以金庸的书房最为豪华。我忍不住随处看看书架上的藏书，其中一面书架是各种版本的金庸作品集，华文世界的繁简体版外，还有多种译文。当天下午的采访过程中有几个细节印象深刻：金庸的书桌很特别，写字板是斜放的，金庸给我题字时，便在上面挥毫；采访中问，秘书送来热腾腾



的叉烧包作为点心；公用洗手间在明河社之外，上洗手间时需带上公司专用的锁匙。

采访意外地顺利。当天晚上，我刚回到旅馆，就接到金庸的太太用粤语打来电话：“查生想跟你通电话。”随后我听到金庸先生的第一句话竟是：“李先生，吃过晚饭没有？”原来金庸觉得相谈甚欢，想跟我再谈一次。

2008年12月9日，我再赴明河社，金庸随手从衣袋中取出一张浙江同乡会成立的邀请函让我看，表示当天晚上要赴宴，没有办法请我吃饭。又说他现在常常一起吃饭的朋友是有同乡之缘的倪匡和陶杰，至于美食家蔡澜推荐的东西，他没有兴趣。

我们在采访中用普通话，闲谈则多用粤语。我发现金庸乡音未改，多次提起家乡：“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我叫徐志摩、蒋复璁做表哥。陈从周是我的亲戚，我比他高一辈，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是钱学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当年我到杭州听

她唱歌。”

我提起围棋，金庸谈兴甚浓。“围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训，得心悟，得天寿。”他颇为欣赏。“以前我兴趣最好的时候，请陈祖德、罗建文两位先生到家里来住。在文化界，我们朋友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让我三子，让余英时先生两子，我跟余先生还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们两个差一点，他的棋瘾很大，我请他星期天来下棋，他一定来的。余先生喜欢下围棋，他棋艺比我好一点。”金庸先生笑眯眯地说，“余先生的岳父陈雪屏围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儿，先下一盘棋看看。”我听了这种“小说家言”，不禁笑道：“我听余先生讲，他和太太陈淑平谈恋爱的时候，还不认识陈雪屏先生，是等到1971年结婚7年了才正式见到陈雪屏先生。”

金庸提起老朋友黄苗子、郁风、黄永玉的旧事，感慨郁风过世了。对书画，他时有出人意表的品评，偶尔在家也提笔挥毫，又提起启功先生：“启功来香港见我，我写几个字请启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

左图：2008年12月，接受作者采访时的金庸

右图：2010年8月26日，上海世博会澳门馆里的“金庸书房”。书房里展出了金庸当年在《明报》工作时用过的屏风，上面雕刻着《射雕英雄传》中的人物



(查良镛(金庸)供图)



左图：1963年，香港艺人张瑛（左）与金庸签约购买《倚天屠龙记》电影版权

右图：1960年，金庸与电影《神雕侠侣》主角合影。（左起）谢贤、金庸、南红和梁素琴

就是：‘你绝不可以临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风格，一学碑帖，自己的风格完全没有了。不学碑，不学帖，你的字将来有希望。’我说：‘启功先生，你这句话是鼓励我。’他说：‘不是鼓励，你的字是有自己的风格。任何碑帖不可碰。’我说：‘我碑帖没有学，但书法极糟。’”

金庸好奇心极重，不时主动问起我采访过的学者近况。一些学林趣事，他听得兴味盎然。畅谈两个下午，我恍觉曾经听说“金庸口才不好”不过是一种误会，原来只要是感兴趣的话题，讲起来也像武侠小说一样引人入胜。我们的话题焦点始终不是武侠人物，而是学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远渡重洋的杨联陞、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一一道来，如同江湖一样好玩。

“我不赞成有‘金学’”

江湖上传说“香江四大才子”是金庸、倪匡、蔡澜、黄霑。这四位，我都见过。记忆里，第一个见的是黄霑，并不是谈他的歌词，而是谈他参演一部舞台剧。难忘黄霑带着朗朗笑声和不遮拦的粗口，想约他另找时间做长篇专访，没想到不久他就去世了。其他三位我倒都是都长谈过。

当我跟金庸提起“香江四大才子”之说，金庸即刻说：“这个讲法靠不住，不对的。倪匡本来在美国的。倪匡最滑稽了，讲笑话。从前写书的时候，我常常和蔡澜在一起，我跟蔡澜讲：你讲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吃。他是新加坡人，喜欢的东西我全部不喜欢，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没有关系，你推荐的东西我就不吃。倪匡和陶杰跟我比较投机，陶杰的妈妈是我们杭州人，他父亲做过《大公报》副总编辑。”

在“香江四大才子”之后，陶杰有“香港第一才子”之称。我和陶杰第一次见面是在晚上12点以后，我问他：“香港谁的文章写得最好？”他说：“金庸。”我又问：“金庸之后谁的文章写得好？”他说：“董桥。”金庸听了我的转述，微微一笑：“陶杰妈妈跟我同乡，他爸爸跟我同事，倪匡跟我同乡，吃的东西差不多。董桥年纪大了，兴趣在古董字画上面了。”

我们聊起当年胡菊人和董桥主编《明报月刊》，各有各的精彩。金庸说：“我和胡菊人先生去访问过钱穆先生一次，钱先生的眼睛瞎了，报纸、书都是他太太念给他听。他讲话无锡口音，跟我是一样的口音。”

我便说：“钱锺书也是无锡人。”金庸说：“无锡出了很多名人。章太炎先生在无锡也教过书，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也是有名的。钱锺书先生送了一套书给我，写一句‘良镛先生指教’。我说，《管锥编》



(查良镛(金庸)供图)

当中有些我还看不懂，他送给我书，我就写了一封信多谢他。钱先生写信很客气，但是口头讲话就不留情面，很锋利。”

一谈起做学问，金庸十分醉心，尤其对《红楼梦》有独到见解：“一般人不是研究《红楼梦》，是研究曹雪芹。我认为《红楼梦》不见得是曹雪芹写的，完全没有证据证明是曹雪芹写的，现在有人研究曹雪芹的生平，一写几十万字，我觉得这个路线可能是错的。如果最后证明这个小说完全不是曹雪芹写的，那研究完全是空的。冯其庸先生跟我也是好朋友，但是我没有跟他谈这个问题。需要肯定作者是谁，如果连作者都不知道，去研究曹雪芹完全没有用的。”

我说：“现在除了‘红学’，人家还提出‘金学’。倪匡先生说，‘金学’是他开创的。”金庸朗声道：“我不赞成有‘金学’！”

“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金庸一生功业，以办《明报》为重，有人还写了专著来研究。我说：“听说您对《资治通鉴》读得非常熟。”金庸说：“因为那时候《资治通鉴》比较好，容易看，我小时候在家里没有事，看《资治通鉴》像看故事一样，我觉得文笔好。”我接话：“您也把《资

治通鉴》运用到《明报》的领导上来？”没想到金庸说：“香港是完全的新闻自由。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个电话给我：‘查先生，这个问题你明天怎么写怎么写。’我就把这个电话录音下来了。我明天去报告英国政府，明天就炒他鱿鱼了，所以港督是不敢这样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员想要干预舆论，你录音下来确定证据，告诉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马上把港督召回。”

我问：“您做新闻的信条是什么？”金庸说：“英国报人史各特(C.P.Scott)讲，‘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 but the facts are sacred)。事实很重要，不能够歪曲，港督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这个事实不能歪曲，但是评论可以自由。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同，但是根据的同样一个事实是不能歪曲的。这一点是我们办《明报》必要的信条。”

我说：“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时，中国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当年您和朋友姜敬宽通信时，就认为《明报月刊》的风格想办成‘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金庸说：“那是很公正，凭良心讲话。到《明报月刊》40年时，我还是讲：我当时是拼着性命来办的，准备给打死的，结果没有打死，还好。他们觉得我很勇敢，我说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广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这个环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我问：“您投入到办报的精力比写小说的精力更多？”金庸答：“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在聊起报界前辈的近况后，我问：“您跟新闻界的晚辈交流多吗？”金庸说：“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其中有一个系是传播系，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些同学就问我：你在香港办《明报》很出名，办得很成功，而且人家要杀掉你，你也不怕，我们现在学传播媒介，应该取什么态度？我跟学生讲：你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这是唯一的标准。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样写文章，我在香港是拼了命来做的，我是准备把性命牺牲，把报馆也准备让他们铲掉了。你们现在不能牺牲性命，牺牲报纸事业，你的报纸事业还没有牺牲，人已经先被炒了鱿鱼。如果做坏人的话，不做报纸也可以做坏人，男人可以做强盗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宁愿做坏人的话，不一定做新闻工作，什么坏人都可以做。假设浙江一个高官老是贪污，老是欺压老百姓，你写一篇文章美化他，违背良心，这是不可以。这些同学就接受这个观点。香港的新闻自由在以前英国人



1



2



3



4

李志清根据金庸
小说绘制的画作：

1. 《书剑恩仇录》
2. 《笑傲江湖》
3. 《射雕英雄传》
4. 《白马》

(本组图片：香港文化博物馆提供)

统治的时候，跟英国是完全一样的。”

我问：“您在香港办报纸和写小说，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金庸说：“最核心的精神是讲老实话。中国好的，我就讲好的，有人讲大话，我就揭穿他的大话。写武侠小说是为了写正义的人，好人就讲他好的，坏人就讲他坏的。社会上有这种人，我就要把他表现出来。”

“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

作为“金迷”，我对金庸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

不以为然，便说：“沈从文先生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张兆和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没有以前那么好。”金庸说：“小说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总是觉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觉得不好，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鲁迅也讲，一篇文章写好了放在那里，不要发表，过十几二十天拿出来看看，觉得不好，再修改一下，又觉得好一点，还是放在那里，再一年半载拿出来看看，再改一下会好一点。”

我说：“您的小说在48岁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就写完了，后来做了第一次修订，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金庸笑了笑，说：“我

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这样子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写好以后要交给印刷厂去付印了，印刷工人觉得这个字勾来勾去看不懂，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里。托尔斯泰看这完全是根据自己修改的来抄，当然好得多，但是他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涂。印刷工人还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帮他抄一遍，托尔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写的文章，一定可以改的。”

我随即说：“问题是人家觉得你的小说已经可以不朽了，还要那么改？”金庸说：“不敢当！我这个明河社是专门出我的小说的，我修改之后要重新排过，每修改一次要花很多钱的。普通作家写了以后，叫他修改一个字，他也不肯修改的，改一个字花钱太多了。这个明河社本来是可以赚钱的，赚的钱都花在修改上面。普通作家没有这个条件，给了印刷厂，印刷厂就不肯给你改的，要拿回来修改一个字也很麻烦的。当时看看改过已经不错了，但是再过十天八天看看，觉得如果这样写会好一点。我写武侠小说还是比较认真，比较用心的。”

我对金庸的小说改编成影视常感失望，便问：“您的小说大概是在中国最多被改编成为电影、电视的吧？”金庸说：“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香港人看了也不满意，他们说：如果你有金庸这个本事，自己写一个好了。他们不会照我原来的小说这样拍的。”

我又问：“张纪中拍的电视剧改编得怎么样？”金庸说：“我跟他他说：你改了，我不承认。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有些拍不好，我就不看，我跟他他说：你有些拍得不好。”我笑道：“我觉得《天龙八部》拍得比较好。”金庸也笑道：“《天龙八部》没有什么改动的。以前我说：你不要改了，要改不如让编剧自己去写好了。编剧写不出来就没有本事吃饭了。”

我说：“其实您在创办《明报》之前曾经做过电影编剧，您的很多小说一章一节就是电影、电视的写法。您原来看过许多西方电影，然后把电影手法融入小说里？”金庸一听，不禁微笑：“对，西方电影、电视我都看。当时在香港写影评，就每天看一部电影，香港放电影很多，每天看一部都看不完的。现在没有这么多电影看了……”

“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

金庸晚年不太喜欢聊办报纸与写小说，而念念

不忘的是做学问。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金庸以80岁高龄远赴剑桥大学求学之事。金庸说：“剑桥大学给了我一个荣誉博士，排名在一般教授、院士之上，所以我再申请念博士，他们说：不用念了，你这个荣誉博士已经比他们都高了。我说：我的目的是来跟这些教授请教。后来校长就同意了。在剑桥念博士有一个条件，就是博士论文一定要有创见，如果是人家写过的文章，就不要写了。”

金庸想了几个问题，考虑到中国考古学家从西安发掘出来的东西。以前说唐朝玄武门之变，兵是从东宫从北向南走，再打皇宫。金庸认为这条路线不通，为什么要这样大兜圈子呢？直接过去就可以。金庸说：“我心想唐朝写历史的人，是在李世民控制之下的，他吩咐这样写就这样写了。我发现是皇太子和弟弟过来，李世民在这里埋伏，从半路杀出来，把他们打死了。历史上这条路线根本就是假的，因为李世民作为弟弟杀掉哥哥不大名誉。我认为唐朝的历史学家全部受皇帝指挥，不但是唐朝，从唐朝、宋朝，一直到近代，所谓真的历史是假的，喜欢怎么写就怎么写。”金庸的硕士论文就以玄武门之变为主要内容：《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得了很高的分数。

接着，金庸的博士论文研究安禄山造反，唐玄宗派了他的儿子荣王去抵抗，后来荣王死掉了，历史上也没有讲为什么会死，他手下的两个大将也给杀掉了。金庸说：“这中间一定大有问题，是太子派人把弟弟害死了，把两个大将杀掉了。我找了很多证据，证明这个事件是历史上造假，其实是太子在发动政变，把弟弟杀掉了，而且他占有军队，连父亲也不敢动他。我的基本论点是中国古代的皇位从来不讲传统或宪法，实际上是哪个有兵权，哪个会打仗，就传给哪个。中国是不讲宪法，讲兵权，外国也讲兵权，但是外国做得表面上漂亮一点。”

金庸的老师麦大维(David McMullen)早已到了退休年龄，为了等金庸把博士论文写好，特意延迟两年才退休。而剑桥大学校长对金庸说：“剑桥大学现在你是年纪最大的学生，我们最喜欢。”

我问：“您在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拿了荣誉博士学位和教授称号，还是那么感兴趣到大学读书？”金庸说：“我到剑桥，目的不是拿学位。我喜欢跟有学问的教授讨论问题。”

在我访问金庸两年后，他终于在2010年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时年86岁。☑

与金庸同校的日子

文 / 苗千

这样的搭讪老人大约一天总要遇到几十次，他承认并邀请我坐下，我就这样猝不及防地遇到了金庸。

一晃十多年了，现在回想还是会奇怪 2005 年剑桥的夏天怎么那么热。我住在一栋维多利亚时期建的老房子里，房间里只有一盏灯，被一个纸糊的灯罩罩着。到了半夜吹进热风，我便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从打开的窗户随热风一起进来的还有一种体态极大的蚊子，这让我想起家乡野外草原上那种专叮牛羊的蚊虫，心里充满恐惧。“这种蚊子在草丛里生活，不会咬人的。”来自台湾的林小姐告诉我。

林小姐是台大历史系的高才生，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继续深造，刚完成了一年的硕士课程，正打算继续读博士学位。她恰好住在我的楼下，我们房间的构造一模一样，温度也基本相同，到了夜里都热得睡不着，她邀请我去她的房间喝茶夜谈。

林小姐房间的书架上摆了满满三层佛教经典，大概是分了多少次从台湾背来的。我不明白一个以唐代佛教史为专业的学生何以从台湾跑到英国来深造，于是林小姐给我介绍她的导师——据说这位学者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最了不起的汉学家，他研究中国历史几十年，直到现在每年都还往中国跑。“他真的很厉害，你给他一个汉字，他都可以告诉你这个字最早是什么形态，最早出现在中国哪本书里。”林小姐的台湾腔听起来很是夸张，我将信将疑，不过没有继续追问，毕竟当时我有自己的烦恼。

一天我和林小姐约好一起吃晚饭，下午时我却发现房间门下有一张她塞进来的便条，上面写她读博士的计划突生变故，心里实在太过烦乱，吃不下晚饭。此后我便很少再见到她，到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她似乎就离开了剑桥，据说去了伦敦。

开学后，剑桥小城的华人圈一下子热闹起来，因为据说金庸在拿到名誉博士之后，又来这亲自攻读历史学的博士学位，我在报上看到他的博士生导师的名字，正是此前我听林小姐说过的西方最了不起的汉学家。

此后我便常从身边的同学朋友那里听到有关金

庸的消息。与金庸同学院的同学常绘声绘色地向我形容他们将这位作家团团围住要签名和合影，把学院的中国学生聚会生生变成了一场读者见面会的盛况。有时我也从报纸或是国内的网络上看到他的消息，说他在剑桥的郊区买了一栋房子，每天从家到系里上下学的路上走一个来回，这期间他不会为“粉丝”签名合影，因为此时是学生身份，其他时间则愿意和读者交流。听说他爱去城里一家广东风味的中餐厅吃饭。他的那位汉学家导师，有时会亲自去金庸的家里辅导。

虽然和这位大作家在同一所大学同年入学，除了这些偶尔传来的消息之外，我与金庸最大的交集却只是在我卧室的书架上，有一套我从国内带来的《倚天屠龙记》。这个故事我已经不知道读过多少遍，早熟到随手拿起五册书中的任何一册，翻开都能毫无障碍兴致勃勃读下去的地步。虽然对于前情后事早已熟稔于心，但每当无聊或是心绪不平或是自己的情感生活有任何波澜时，我仍会一再翻开书，读起张无忌先生的恋爱故事。

我执意背一套五本的《倚天屠龙记》到英国，大约是因为在当时觉得自己与书中的男主角张无忌性格最为接近，因此读起来也最有同感：在事业上随波逐流，在感情上优柔寡断，是我给当时的自己贴的标签之一。陷于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选择之间，人生最大的痛苦与最重要的目标莫过于选择一位合适的异性，这大概是有 20 多岁生活无忧的青年男子的梦想。至于事业——或者说之于小说人物的武功——那倒是不用多操心，就算是往悬崖下一跳，或是在山谷里随便找找，总会找到一本《九阳真经》之类的典籍来练，无须太过挂怀。

倚天屠龙之类的大词，在张无忌心中比不过赵敏和周芷若在耳边的软言细语。从小耍弄着屠龙刀长大，这个无数武林人士眼中的至宝，在张无忌眼里也只是个玩具而已。这个在远离人烟的伊甸园中长大的懵懂青年被抛上权力斗争的巅峰，其下场自是可想而知。但是一个 20 出头的年轻人不管这些，认为这样的小说情节就是生活的全部，并以为书中所刻画的人物颇似自己。正如金庸写的，张无忌不是好领袖，但可以做我们的好朋友。



(新华社供图)

2005年6月22日，金庸（右）身披“荣誉博士”长袍准备参加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学位颁发仪式。当天，金庸获得剑桥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对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中国男性来说，熟读金庸是一门从中学延续到大学的必修课。小说之外，每部长篇改编的电视剧大约也都看过了两三个版本，每个人的心里自然也都有认定的经典。在海外肯花时间静下心来重读小说可以说是一种略微奢侈的休闲，想到作者此刻正和自己同校，感觉更是其妙，于是我干脆借着回国的机会把金庸的另外几部长篇小说也都背了过来。

手边的金庸小说多了，读法也就丰富了。我试着把“射雕三部曲”纵向连起来读，也试着横向比较着阅读，或是把不同的故事情节都通过一个“带通滤波器”，只关注情节的某一个侧面，以此来寻找某种此前可能被忽略的阅读乐趣。比如不去关注书中人物的武功，只体会其中的爱情，再对比这些小说的创作时间，我惊叹于作者在创作这些武侠经典的过程中，对于爱情的描写和设置竟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化。

《射雕英雄传》是“射雕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让金庸一举成名的长篇作品。创作郭靖这个人物时金庸33岁，或许是出于对第一个“侠之大者”

主角的偏爱，或许是因为作者当时对爱情仍然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美好幻想，如今阅读郭靖的爱情经历，我难免会觉得过于美好圆满而显得太不现实。

在最美好的年纪、最恰当的时机遇见最合适的人，这在郭靖的爱情生活中只是开了个好头而已。让郭靖、黄蓉的爱情成为金庸小说中的情感线索的典范，还离不开此后降临到郭靖身上的一连串的好运气。郭靖几乎可以对自己的爱情完全自主，离不开远在蒙古的亲娘与几位师父敢于放手，这才使华筝公主和穆念慈都无法成为黄蓉的对手。极为重视家庭和礼教的少年郭靖肯定想不到，自己感情之路上最大的阻碍居然来自一向以特立独行自居的老丈人。

这位五绝之一，蔑视礼法，上通天文下晓地理的黄药师，在选婿的过程中斤斤计较到了几乎算是猥琐的地步。桃花岛主在选婿过程中犯下的另一个错误，就是为郭靖找了一位看上去极具威胁，但实际上又没有任何竞争力的情敌欧阳克，相比之下，郭靖为了爱情毫不犹豫地勇闯桃花岛，自然是大放异彩，让黄蓉对他死心塌地。

作为金庸成名之作的男主角，郭靖的主角光环耀眼，太受作者的偏爱，乃至在爱情问题上无人可与之争锋。也正因为如此让郭靖之恋显得尤其不现实，让21世纪的世俗男女读者们只能感叹一句，这不过是小说罢了。

爱情毕竟还不是《射雕英雄传》的核心情节。到了《神雕侠侣》中，杨过的爱情之路就远没有郭靖走得顺畅了。塑造出杨过这样一位情圣式的人物，使《神雕侠侣》的地位在金庸读者心目中容易两极分化，喜欢这部小说以及主角的读者与不喜欢这部小说以及主角的读者针锋相对，这大概是因为相比之下，读者更愿意在杨过或是小龙女的性格和经历之中将自己投射进去，进而联想到自己的爱情故事。

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与郭靖、黄蓉的爱情截然不同。与其说杨过之间的爱情是源于相互吸引直至水到渠成，不如说这两人都是彼此在世上唯一的选择，与其说这是两个人的爱情，不如说是两个人的命运——爱情在两人生命中的比重都太高，以至于成为他们命运的底色。

多年卓绝的等待，让杨过之恋同样显得不够真实。男女之间的爱情开始从生活中得以升华，开始变得“伟大”，这样的手法更像是作者把爱情这一理念放在极端情况下进行的某种思想实验。若是从创作时间上来看，金庸在1959年不仅开始创作这部在“射雕三部曲”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小说，还创作了另一部人物形象同样鲜明的《雪山飞狐》。若是在时间上做一个横向的比较，会发现相比于杨过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雪山飞狐》里胡一刀与他夫人的爱情就显得轻松明快多了。

《雪山飞狐》中与胡一刀故事做对比的，恰恰是胡一刀在书中最重要的朋友和对手苗人凤。苗人凤与一位落难官家小姐的偶然相遇造就了这位“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大侠一生感情的悲剧。命运强行的捏合，夫妇二人始终无法沟通，让苗人凤遭遇了爱情的背叛和等待，直到夫人临死前的痛苦醒悟。

相比于苗人凤在爱情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幸，胡

一刀与夫人这一对神仙眷侣在旁人眼中的不搭配就丝毫都不重要了。俗人以市井眼光打量这对夫妻，觉得“这位少年夫人千娇百媚，如花似玉，却嫁了胡一刀这么个又粗鲁又丑陋的汉子，这本已奇了，居然还死心塌地地敬他爱他，那更是叫人说什么也想不到——“想不通”这三个字，大概是大多数人心中对于爱情的真实感受吧！”

爱情毕竟还是需要被投入到现实中进行考量。相比于“射雕三部曲”的前两部，或许是因为在处理手法上更加纯熟，或许是作者对于爱情的观点已经发生了改变，或许是因为爱情情节在其中的分量最轻，《倚天屠龙记》中描写的张无忌的爱情故事最接近于普通人的恋爱经验，其中的现实因素也更多。于是相比于其他几位男主角，张无忌的性格更接近于当代普通人，让读者更易产生知遇之感。

《倚天屠龙记》中着重展现的是父亲和兄弟之间的深情厚谊，在爱情方面，张无忌接近于没有性格，也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专注的目标。他除了具有作为一部武侠小说的主角所必备的高超武功和侠义精神之外，实际上在多数的情节中都是被亲人长辈、下属或是女性所照顾，不需要对自己的命运做出真正的抉择，于是他就把追求爱情的舞台让给了4位特色各不相同的女性角色。

金庸宣布这场贯穿全书的由女性主导的爱情争斗正式开始时，安排得颇为正式。他让张无忌与4位选手同处一条船上，如此还不放心，还让张无忌的义父谢逊陪在他身边进行开场动员演讲——“当年你父母一男一女，郎才女貌，正是天作之合，你却带了4个女孩子，那是怎么回事啊？哈哈，哈哈！”周芷若满脸通红，低下了头。小昭却神色自若，说道：“谢老爷子，我是服侍公子爷的小丫头，不算在内。”赵敏受伤虽然不轻，却一直醒着，突然说道：“谢老爷子，你再胡说八道，等我伤势好了，瞧我不老大耳刮子打你。”

与郭靖和杨过比较，张无忌是对爱情付出最少的一位。郭靖与黄蓉虽然是一见钟情，但是当遇到了黄药师的阻挠，他毫不犹豫地冒死前往桃花岛提亲，勇于挑战在当时武功强于自己的欧阳克；因为一个善意的谎言，杨过苦苦追寻和守候了16年，这16年间杨过把爱情演变为信仰，乃至且痴且狂，让自己的人生变成一场对爱情的赌局。

相比之下，作为明教教主，一直被命运推着走的张无忌在爱情中更像是身兼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角色——这样的犹豫不决，让他的爱情故事有了更

《倚天屠龙记》中描写的张无忌的爱情故事最接近于普通人的恋爱经验，其中的现实因素也更多。于是相比于其他几位男主角，张无忌的性格更接近于当代普通人，让读者更易产生知遇之感。

多的人情味，也更有了一些现代人趣味。无论是被周芷若手中的倚天剑穿胸而过，还是在绿柳山庄中和赵敏的初次交手，或是在和殷离、小昭的交往中，张无忌的表现都具有很强的表演性，因此能够把自己和几名女性的关系控制在“暧昧”阶段——这样便更像是现代都市男女所热衷的感情游戏，以至于逐渐让自己也分不清楚更喜欢哪一个了——或许这才是让一个身处21世纪的留学生觉得在张无忌身上产生了共鸣的真正原因。

不在实验室时，大多数时间我都窝在自己的睡房里，不用起床就能伸手够到书架上的金庸小说。有时读上几页就开始神游天外，从书中人物的爱恨情仇中联想到自己的生活，或激动或惆怅，只为给自己平淡的生活增添些惊心动魄的感觉。时至又一个夏天的下午，我走在街上，不经意瞥见在街边咖啡店中坐着一位华人老者。老人头发尚黑，戴金丝眼镜，手边放着一杯咖啡，脸上的神情却是疏离，又像是在神游天外。老人的相貌我是熟悉的，没来得及过多思考，我马上走过去搭话：“请问您是金庸先生吗？”——这样的搭讪老人大约一天总要遇到几十次，他承认并邀请我坐下，我就这样猝不及防地遇到了金庸。

之前我也想过，何必只是因为吃了几口美味的鸡蛋就非要附庸风雅地去见那位下蛋的母鸡，也幻想过和金庸面对面探讨他的作品——我追问他到底觉得张无忌心里最喜欢哪一个？殷离为爱痴狂，是否代表着作者心中的某处隐痛？小昭温柔似水善解人意貌美如花，却最终远走波斯担任圣女，是否说明作者其实在内心里认为理想爱情之不可得，理想女性压根儿就不存在？或许我还会为作者指出书中的一些不合情理之处，或是替作者构思出一个更好的结尾。当我真的与金庸面对面而坐，最终只是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金庸先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读者，我很喜欢你的小说。”

这样的表白金庸大概每天也要听到几十次。他向我微笑点头，礼节性地询问我来自哪里，现在学习什么。我规规矩矩地回答了问题，赶忙掏出手机，请旁人为我和金庸先生拍一张合影，然后要逃跑似的起身告辞，等到走得远了，又后悔忘记了要签名。我这才明白原来追星是这么回事，其实不如隔着作品与金庸先生在书中相遇相谈了。

与金庸的相遇激起了我再一次通读金庸小说的热情。待我读到《天龙八部》和《鹿鼎记》，发觉作者驾驭情节和人物的手法愈发熟练，而爱情的作用

和地位之于武侠，也又一次地发生了变化。在这两部人物众多、情节繁复的名著中所展现的爱情视角更趋男性化，段誉和韦小宝，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崇拜女性也好，物化女性也罢，对女性孜孜不倦的追求才是他们一生真正的动力。爱情似乎又一次退却了，作者真正感兴趣的是江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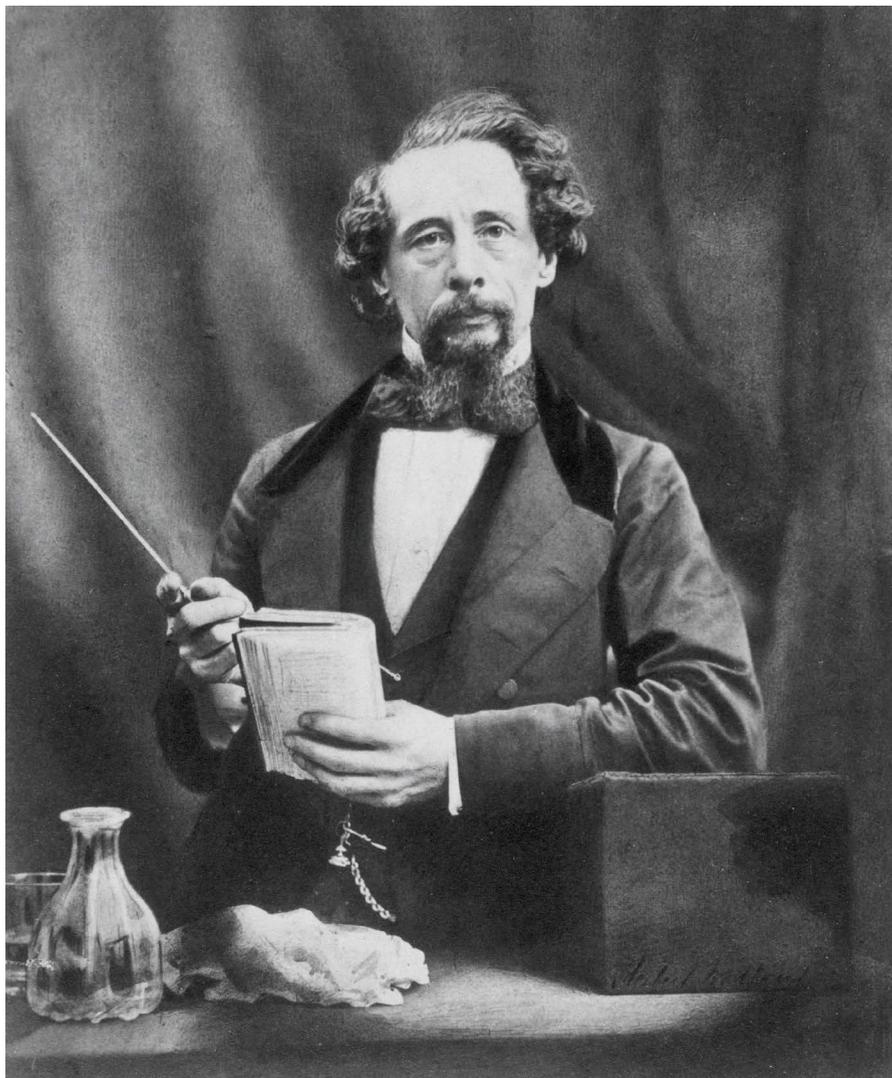
在这两部巅峰之作中，作者似乎更加隐藏在人物之后，对于人物的真实看法也更让读者难以猜测。段誉对王语嫣有如对待神仙般地崇拜，韦小宝对待自己看中的女性，当成事业般不屈不挠追求，这两人各得其所——然而在后来的修改中，金庸对这两人结局所做的变更也最大，他让段誉遁入佛法，又让韦小宝人财两空，这其中真正的原因恐怕只有作者自己才了解了。

如果仍然追索时间线索，在创作段誉和韦小宝之间，出现的人物是令狐冲。有时我觉得令狐冲是一个真正的侠客，以至于不需要爱情，因为在正邪之间以一个理想主义者出现的令狐冲真正需要的是孤独，或许是作者认为，与其让人物在爱情中成长，倒不如让他在江湖中成长。令狐冲在少年时期对青梅竹马的小师妹的爱情可以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萌发，但是小师妹转眼间的移情别恋并未让他成长，乃至最后小师妹的死亡也未能让令狐冲抛弃自己对于爱情完全不现实的憧憬——这种憧憬，他的作者在创作“射雕三部曲”的时候就已经抛弃了。

任盈盈的出现对于令狐冲来说是命运的馈赠，也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在令狐冲身上有一种酒神精神和太阳神精神的奇特混合，这可以让他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混迹于武林直至笑傲江湖，却从不曾让他在爱情上有所思考或成长。武侠世界中的同生共死，时常出现的自杀殉情，可以看作情节发展的必须，对于读者却没有任何借鉴意义。读者在少年或青年时代痴迷金庸，阅读的收获之一或许就是能在金庸的引导之下逐渐走出金庸早年所设定的爱情世界。

2010年，金庸毕业了。他史无前例地在剑桥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之后，又以80多岁的高龄获得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博士学位。他仍是华人世界最受读者尊敬和崇拜的作家之一，却少有人对他在剑桥大学求学的几年间所做的扎扎实实的历史学研究感兴趣。金庸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唐代历史，总共242页。

我也毕业了。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与金庸同年入学，又几乎同时毕业，但几年间我一共也只遇见了金庸那么一次，浅浅地交谈了那么几句，当年的合影也随着那部旧手机不知去向了。■



1



2

1.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
2. 查尔斯·狄更斯小说《圣诞颂歌》插图
3. 上世纪70年代，王司马绘制的《书剑恩仇录》插图

金庸、狄更斯、《圣诞颂歌》与侠之大者

文 / 鲁伊

时间，是1956年的圣诞夜。摇曳的烛光下，听着从政府山方向远远传来的教堂钟声和风琴声，32岁的《新晚报》文艺副刊编辑查良镛，正在赶写第二天要以“金庸”的笔名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专栏文章。

一反素来以聊围棋、电影、音乐和历史掌故为主的常态，在这篇《圣诞节杂感》里，他絮絮而又温情地提起了家人，提起了一本小书。

“我不是基督徒，但对这个节日从小就有好感，有糖果蛋糕吃，又能得到礼物，那总是一件美事。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一本狄更斯的《圣



3

诞述异》(A Christmas Carol)(注:大陆译名为《圣诞颂歌》)给我。这是一本极平常的小书,在任何书店中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去翻来读几段。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厚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但其实,或有意或无意的,金庸在这里说了个小谎:

无论是对于1956年生活在香港的他自己,还是对于1843年生活在伦敦的狄更斯,以及对于这期间和以后的文学史,“这本薄薄的小书”,都是一本极不平常的小书。

1956·香港·金庸

这时候,距离金庸从上海《大公报》总部南下香港分社,已经是8年多的时光过去了。开始时待半年就回的计划,却被一个又一个的变化打乱。

赴港初期对他有提携教导之恩、被他视作榜样

的老报人胡霖(字政之),没过多久就因病辞世。作为中国第一个采访巴黎和会的记者,先后主持《大公报》27年,最终的结果却是缠绵病榻,身后萧瑟。

关心外交时势的他一度辞职北上,希望进入新中国的外交部,但却因为出身地主家庭和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读过书的“历史污点”而被婉转谢绝。接着,1951年4月,父亲查枢卿在海宁老家被以“不法地主罪”判处枪决。听到消息,他哭了三天,伤心了半年,除了失怙之痛,会不会也因为父亲的死由,几乎从根本上断绝了他或许曾经有过的游子回乡、报效桑梓的可能?

几乎与此同时,与众多民营新闻机构一样,《大公报》开始进行结构和内容调整。内地版按照中央政策,改为财经类报纸,不再发表国际新闻和评论,信息源只能采用新华社通稿。香港版虽然情况特殊,但也上行下效。当初作为国际电讯翻译和编辑被派驻香港的查良鏞,自然面临去留问题。幸好来自上面的指示足够宽厚,上司和同事也善加回护,于是,作为折中的解决方案,他在1952年被转入《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每日关心的话题从国际风云、天下大事,变成琴棋书画、音乐电影。

在《新晚报》,为了报社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的任务,为了创收,或许也是真的闲不住,他在本职工作之余,和境遇相仿的同事陈文统(梁羽生)和陈凡(百剑堂主)一起,连载起了武侠小说。新辟的这条蹊径看起来颇有前景,老东家《大公报》遂转过头,向三人约稿,于是就有了《大公园》副刊上始于1956年10月的《三剑楼随笔》。但这个专栏,似乎并没有预料中的那么火爆,在这个圣诞夜过后不过一个月,就无疾而终。看几个当事人事后欲说还休语焉不详的回忆,陈凡在《书剑恩仇录》收书后连载的《风虎云龙传》未能获得预期反响,而金庸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情节越写越崩溃,被评论者视为江郎才尽、乏善可陈的劣品,最后于1956年底草草收尾,应该都是关键因素。

在这8年间,他还经历了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他两情相悦的杭州小姐杜冶芬,追随他到了香港,但终于经不起人在异乡为异客的寂寞和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消磨,离婚回了大陆。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一年5月,他和美丽能干、比自己年轻11岁的报社同事朱玫在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但新的问题随之而生:在这个圣诞夜,金庸可能已经或即将成为一个父亲。

长子查传侠1976年10月在美国自缢身亡,是



左图：1946年，在南京出席国民大会的新闻界代表《大公报》社长胡霖

右图：电影《远大前程》剧照（1947）

金庸心中最伤痛的一道疤。网上资料，均将他的出生时间写为1959年，《明报》初创之际，可做一下减法，就会发现，这与查传侠自杀时“年仅19岁”的说法对不上。但最具有说服力的旁证，还是金庸自己接受采访时透露的信息。1991年，他把《明报》卖给了并非出价最高、年纪轻轻、此前名不见经传的于品海，坊间流传，一个原因是于品海长得像查传侠。被记者追问时，金庸回答说：“他（于品海）跟我大儿子同年，都属猴，相貌也的确有点像，潜意识上不知不觉有亲近的感觉。”

一个子女众多、工作繁忙的父亲，或许记不清每个孩子的生日，但头生子的属相，应该是很难搞错的。

1956年2月5日至1957年2月4日，是为农历丙申猴年。

直到一年后辞职离开《大公报》时，他拿的依然是“四等十三级（或四等十四级）”的薪水，不是什么高级职员。两部武侠小说虽然让金庸有了些名气，但比起当时因《七剑下天山》而名声大噪、重获《大公报》重用的梁羽生，气势上却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盗版横行，他也没拿到多少钱。业余时间给长城电影公司写剧本看着倒像一条可能名利兼收的路，但也不是稳定的收入来源。要是剧本通不过无法开拍，所有心血都会成为竹篮打水一场空。

而他寄居其中的这个弹丸之地，又是否是一个宜于安家落户、繁衍生息的安乐乡？导致约60人丧生、300余人受伤、持续近半个月的九龙及荃湾暴动，就发生在不到2个月前。此前几年大量涌入的数百万外来人口，固然是日后香港工业、贸易和金融业的腾飞积累了人力资源，但迅速成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也伴随着火灾频发、治安混乱、资源匮乏、环境恶化。英国议会甚至开始严肃地讨论，要不要就此放弃这个自维多利亚时代就引发众多争议的烂苹果。

虽然亚热带的香港冬季仍温暖如北方的初春，在这个初为人父的年轻人心中，这时候，是否曾经涌现过出自先祖查慎行之手、后来被他当成《鹿鼎记》第一回回目的那句诗：如此冰霜如此路？

未来的世界有太多的变化，生活的担子他能不扛？如何把孩子抚养长大？

而已过而立之年、好像还没立起来却已经失去可以依仗之人之物的他自己，又何去何从？

他翻开了一本书。不是别人的书，是狄更斯——“托尔斯泰说，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读狄更斯，心情又会好起来，和世界妥协。”这是许多年后木心的形容。而金庸自己的文字，是这样的：

“狄更斯每一段短短的描写，都强烈地令人激动，使你不自禁地会眼眶中充满了眼泪……”

欲把金庸比狄更斯

事实上，我一直纳闷的一件事，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金庸与其他作家，其实已经颇有一段不短的历史，但把狄更斯和金庸这两个拥有众多明里暗里相合之处的通俗文学大家进行比较的文章，除了香港学者黄维梁一篇寥寥几百字、仅提出假设而未考据说明的网文，以及百度金庸吧里2007年一条陈年旧帖“《神雕侠侣》抄袭了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竟然再未见其余——当然，也许只是我搜索功夫做得不到家。

欲把金庸比狄更斯，最直观的也最常见的比较法，当然是两人生平经历中的那些巧合之处：都当过记者，都是会讲故事又高产的大师，都靠精明的商业头脑白手起家，都创办过自己的报纸杂志，都凭一支笔名利兼收，以及都曾在中年因为爱上比自己小很多的女性而与其生儿育女的糟糠之妻离异。

但是，这种相似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在事后

诸葛亮的追光照射之下，成功的写作者都是相似的，某些事件的重要性会被放大，相关性会被解释成因果性。仅举几例，即可说明其荒谬：狄更斯是出了名的演讲高手，热衷于举办巡回作品朗诵会，后期收入的主要一部分便来自于朗诵会的门票，金庸却“一向木讷，不喜多言，心里面的话，几乎完全宣泄在他的小说里”（沈西城：《金庸这个人！》）；狄更斯虽然“严格地讲并不英俊”，但讲究吃穿，追求时尚，常常对镜自赏，操演举手投足之间的仪态，金庸却颇不修边幅，“不要说跟风流潇洒、飘逸俊雅搭不上边儿，就连文质彬彬也似乎谈不上”。倘若生在同一时代同一城市，他们甚至未必能够成为朋友。

略深一层也更靠谱的比较，在于两人的文字与叙事风格：总体上中正平实的文字，不卖弄华丽文辞和高深概念，流畅易读，朗朗成诵，时时杂有怪趣诙谐之笔；人物鲜明，故事情节紧凑，不出几页就有一个小转折小高潮，可也合情合理，不诉诸怪力乱神。至于典型人物、故事情节乃至景色描述，在金庸早期至中期的几部小说里，借鉴狄更斯的痕迹，细查之下其实也十分明显。比如被严家炎赞为“看似平淡，其实很经得住咀嚼品尝”、充分体现了“新文学语言的魅力”的《射雕英雄传》的开头，假如导演系的学生拍习作而预算紧张，简直可以直接从《远大前程》的经典老片那里剪辑素材。百度网贴中说《神雕侠侣》中杨过是皮普，小龙女是艾斯特拉，郭靖是皮普的姐夫，黄蓉是皮普的姐姐，也并不能完全说是牵强的捕风捉影。

在用英文直接读狄更斯的小说时，这种借鉴会变得格外清晰。事实上，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看1957年1月1日开始在《香港商报》上连载的《射雕英雄传》，以及其后的《神雕侠侣》《鸳鸯刀》和《雪山飞狐》，有时候甚至要比看一些糟糕的狄更斯小说中文译本更有读狄更斯的感觉。这就像张无忌使的太极剑，招数全忘记了，却恰得其剑意。

考虑到金庸相当出色的英文能力——一个有趣的佐证，是他修习佛教经典时，先从中文佛经入手，却“愈看愈糊涂”，于是从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英文译本，这才感觉“比较容易懂”——以及香港文化与英国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应该并不令人惊奇。

看中国近现代文学，一个悖论，是原创作品最没有翻译腔并塑造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汉语风格的许多作家，比如几乎每个中文系学生都要顶礼膜拜的“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

老舍、曹禺），反倒是外文能力极高、不仅大量翻译外国作品而且可以以娱乐为目的直接阅读原文著作的一批人。倘若从维特根斯坦语言分析的角度看这一现象，跳过译者加诸译本的自身生活形式和语言偏见，尽量减少公共语言对个体语言的层层污染，或许是他们可以自成一家的关键。而对于以狄更斯为代表的面向大众、不仅靠人物和情节推动，还依赖活泼生动韵律感十足的文字不断强化阅读愉悦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作家来说，欲得其精髓，就像要领悟全真教的内功心法，直接跟“玉女心经”和“重阳遗篇”学的杨过，反而要比全真门下下一代传一代、却一代不如一代的牛鼻子道人们来得靠谱。

然而，在这一层次的比较，也有其问题。正如



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在《千面英雄》一书中指出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所有英雄故事，本质上都遵循着一个核心模式，英雄的旅程在基本结构上没有什么差别。而金庸 2007 年在北大演讲时为张纪中也为自己辩护时说“外国早有评论家指出，人的悲欢离合不过 36 种，只不过是看怎么搭配。”显而易见在其创作过程中，受到过 1946 年去世的法国作家乔治·普罗迪（Georges Polti）的经典著作《三十六种戏剧模式》的影响。根据这本书的观点，灾祸、反抗、厄运、疏忽等 36 种情节模式，已经足以涵盖古往今来所有故事的腾挪变化，便如在学会了独孤九剑却识字不多的令狐冲眼中，秃笔翁写出花儿来，也都不过是兵刃路子而已。剑招有尽也有破绽，但会不会被人轻易破掉，能否恃之行走江湖，却取决于各人的天分和修行。如果非要说金庸效法借鉴狄更斯，那么狄更斯又何尝没有有效法借鉴他的前辈和同辈作家？从两人的回忆文字中看，至少希腊戏剧、莎士比亚、司各特和《一千零一夜》，都曾是他们共同的灵感源泉。

金庸和狄更斯最重要也是本质上的相似之处，在我看来，是在于作为英雄创造者的他们，也像自己笔下的英雄那样，在某个方生方死的关键时刻，踏进了两个人内心共同深为恐惧的洞穴——作为一个对自己的天分有充分了解和信心的人，生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浮华时代和喧嚣城市，但却永远感觉是个无依无靠、四顾不应得孤儿——并最终找到了自己所寻找的宝藏。

这个命运交叉的节点，很可能便在 1956 年的这个圣诞节，由《圣诞颂歌》这本小书，完成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接。

1843·伦敦·狄更斯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伦敦的守财奴史克鲁奇，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感，对所用的雇员异常刻薄。一年圣诞节晚上，一个已死合伙人的鬼魂来拜访他，说将有三个圣诞节的精灵来带他出去游历……”

1843 年的圣诞节，《圣诞颂歌》首次出版之时，查尔斯·狄更斯 31 岁，比 113 年后重读这本书的金庸还小 1 岁。

但作为作家的他，可是要成功多了。

如果说北宋时，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永词，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那么在 1843 年，“日不落”帝国的经济、政治和军



事势力所及之处，凡有说英语的人聚居之处，每当夜晚到来，烛光之下，壁炉之旁，一家人围坐，便可能会有人轮流诵读起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尼古拉斯·尼克贝》《雾都孤儿》，或是《老古玩店》——这些忠实的读者里，就包括了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她在信中长篇大论地与亲朋好友分享读后感，还曾经和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聊狄更斯小说就聊到半夜。

一部又一部畅销作品给狄更斯带来了颇为丰厚且相对稳定的收入，他和妻儿住在伦敦中产阶级街区舒适的宅子里，衣食考究，文化娱乐丰富多彩。此前不久，他还刚刚在出版商的赞助下完成了首次美国之行，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在亲戚朋友圈里，他是逆袭的经典教材：看看，就是这个在鞋油厂做过童工、父亲曾因负债被投进监狱、统共没上过几天学的小伙子，从小我就看好他，有天分，有前途，现在果然名利兼收了吧，而且还是那么棒，惜老怜贫，总去慈善机构演讲，有个周转不灵跟他开口，没有不帮忙的！

然而，他的境况，其实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风光。

正在连载的《马丁·朱述尔维特》（*Martin Chuzzlewit*），虽然被狄更斯自认为优于此前一切作品，销量却一直不佳。他为了吸引读者把主角之



左图：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电影《雾都孤儿》剧照

右图：迪士尼根据狄更斯小说改编的电影《圣诞颂歌》剧照

一送到了美国去，也没有太大帮助。之前的《游美札记》（*American Notes*），狄更斯对美国的奴隶制进行批评，嘲笑美国人不讲卫生随地吐痰等坏习惯，结果给自己树了不少敌人。再之前的历史题材小说《巴纳比·鲁吉》（*Barnaby Rudge*），也是没激起什么反响。他的出版商很不满意，威胁要大幅削减每个月付给狄更斯的固定津贴，并开始催收他预支预借的大笔款项。

在版权保护尚未完善的那个时代，即便在英国本土，狄更斯小说的盗印本和简写本也是满天飞。而在美国，身为外国人的他著作权根本得不到美国版权法的保护。盗版书卖得再好，和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能拿到手的钱当然不算少，可开销也是源源不断。妻子凯瑟琳又怀孕了，这会是狄更斯第五个孩子——餐桌上又要多一张开口要粥的嘴巴，家里又要多一双噼噼啪啪穿着新鞋跑来跑去的小脚。

对于他的出版商和几个最亲密的朋友而言，狄更斯缺钱、欠债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虽然直到这时为止，靠着 he 的一支笔积累下的信用和好人脉，拆东墙补西墙、表面光鲜的日子还能维持下去。但这种境况不能不让他联想起 1832 年在贫困交加中病逝的前辈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写出过那么多部影响深远的畅销历史小说，但在 1825 年的那场席卷全英国的金融危机中，司各特投资的印刷

厂倒闭，一下子成了欠下十几万英镑巨额债务的穷光蛋，连自己一家人住的房子，也被抵押了出去。

甚至狄更斯都无需看司各特的例子——自己的父亲约翰·狄更斯，不就是眼睁睁的前车之鉴。那个在他少年时不过因为还不上 40 英镑的欠账就被关进监狱、一家人求告无门，直到狄更斯的祖母去世、继承遗产后才脱缰继的男人，这时候，或有意或无意地，频频向狄更斯和与他有往来的人开口要钱。会不会，他是感觉到了“来日大难，口燥唇干”，所以要“今日相乐，皆当喜欢”？据一位狄更斯密友的回忆，他曾抱怨，有这样的父母，宁可自己是奥列佛·退斯特那样的孤儿。

时代的孤儿与侠客

“这本薄薄的小说中充满了多少矛盾和戏剧、多少欢笑和泪水呀！兄妹之爱、男女之爱、父子之爱、朋友之爱，在这个佳节中特别深厚地表现出来。”

看狄更斯和金庸的小说，一个最大的共同点，主人公大多为独生子女，大多父母双亡，或者至少有一方在成长的过程中缺位。于是，他们一路渴望，一路找寻。

《诗经·蓼莪》里的句子，“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怙和恃，都是依靠、凭仗的意思。

如果说13岁丧母、27岁丧父的金庸如此安排笔下英雄的人物设定，是“找爸爸”情结在作怪的话，那么一直到中年之后仍父母健在的狄更斯，为什么从奥列佛·退斯特到尼古拉斯·尼克贝，从耐儿到大卫·科波菲尔，也全都是孤儿呢？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两个作家的笔下，亲生父亲的形象即或出现，也通常不那么体面：董贝先生之于儿子保尔（《董贝父子》）、威廉·杜丽之于小杜丽（《小杜丽》）、岳不群之于岳灵珊、段正淳之于干私生女儿。而被主人公当成父亲的角色来仰慕依靠的那些人，最后也往往走向偶像的黄昏。

此外，无论是狄更斯还是金庸，现实中都兄弟姐妹众多，但为什么温暖的手足之情对于他们笔下的人物来说，却更多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向往与想象？

这个谜团，在查找资料时不经意看到的一段古文里，似乎得到解释。它出自白居易的《祭乌江十五兄文》：

惟兄之生，生而不辰，孩失其怙，幼丧所亲，旁无兄弟，藐然一身，自强自立，以致成人。

狄更斯和金庸的小说之所以能够打动那么多人，或许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主人公身上诚实地投射了自己深重的孤儿感，而这种诚实是最能引起生活在财富一边井喷般产生高塔般积累，一边又可能如泡沫般消失的盛世危城——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和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种种情形极其相似的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香港——里面的人的共鸣的。谁不曾为每一秒钟都在冒出来的机会感到兴奋？谁又不对难以预测、散发着死亡腐败气息的未来心怀恐惧？但谁又有必胜的信心，自强自立之后，就一定能够“成人”——成为自己所向往的人？

在1843年圣诞节将至的时候，狄更斯太清楚，如果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这种肆意放纵的兴奋和恐惧对社会中的成年人和小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极端的功利主义，以理性为名义的冷漠无情，向前，向上，不要让自己掉下来，不要停步，更不要回顾。

事实上，《圣诞颂歌》这本小册子的诞生，便源自一个朋友提供给狄更斯的英国童工在工厂和煤矿里被残酷剥削的调查材料。一直致力于减少工厂劳动时间、救济贫苦儿童、提供免费基础教育的这个朋友希望狄更斯可以借助自己的名气在报纸上发表时评，呼吁有能力的富人和中产阶级出钱出力，扩大整个社会的同情心，减少没有必要的残酷与苦痛。

但这不是他自己早已知道且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吗？

一个为许多人所忽略的事实是，狄更斯的家庭，其实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并不能算穷，而是住高尚社区、有体面工作和收入的中产阶级。父亲负债累累不是为了满足生活基本需求，而是花在金表、钢琴、好衣服、大房子和孩子的私立学校这些被认为有助于实现其“阶级向上流动”梦想的投资性消费上。一个简直可能让现代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拍手叫好的家庭决定，是在收入骤减周转不灵的情况下，继续让看起来更有天分的大女儿范妮学钢琴，上伦敦皇家音乐学院，而让12岁的大儿子查尔斯·狄更斯停学，当掉他喜爱的书本，安排他去鞋油厂，做一份每天10小时、每周6天、周薪仅有7先令的童工。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公平、耻辱、恐怖、丑陋，那么你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摆脱这样的境遇——这是狄更斯父母的逻辑，也是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众多进步主义者奉行的逻辑。

但在1843年的那个冬天，本可以成为这个逻辑最佳代言人的狄更斯，却决定向它发起挑战。不是用朋友提议的时评——这是他和金庸的另一个不同之处，狄更斯更擅长讲故事，但似乎没什么写评论的天分——而是用一个鬼故事。

这本鬼故事，他想好了，要有最精美的彩色插画，红色布面精装烫金，小小的可以放在口袋里，当成一份适合送给孩子们的圣诞节礼物。

他的出版商觉得狄更斯疯了，简直是加速自取灭亡的节奏，拒绝承担出版费用，一切都由已经登台高筑的狄更斯自掏腰包。

于是，在这一年的圣诞节，几乎全英国的家庭，都在诵读着这个开头：

首先要说的是，马莱死掉了……死得像钉死的门钉一样。

我们生活在这个十分重视金钱和物质的社会里，友情和善意常常被利害关系及钞票的数字所破坏……发财当然不坏，金钱和物质也决不能轻视，但总得有一个日子，让每个人多想到一些亲谊和友情，少算一些利害和金钱吧！

1956年的圣诞节，写下这段文字的金庸，应该知道1843年的狄更斯所不知道的许多事：

《圣诞颂歌》成为狄更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一本书，虽然刚出版时没能立时解决他的债务危机，但却令狄更斯的名气登上一个新高峰，并让他在未来数十年的时间里拥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度。

这本小册子被评价为“重新发明了圣诞节的一本书”，直至今日，仍在不断地再版，作为长辈送

给孩子们圣诞礼物，而英语国家庆祝圣诞节的仪式，许多也始于这本书；

从那时起，从英国开始，体力劳动者、女性和儿童的境遇有了极其显著的改善，许多人开始像老史克鲁奇一样，意识到进步并不是一切，每个人都有能力给别人带来快乐或不幸，而这些幸福可能存在于十分细小和微不足道的事情之中。

写完这段文字后不久，金庸开始连载《射雕英雄传》。与前两部小说的主角、被附加了一大堆光环但还是单薄无力甚至于略显猥琐的陈洛和袁承志不同，郭靖不是什么名门之后，没有什么天赋异禀，授业启蒙的更是简直可以形容为“低手”“暗师”的江南七怪。但傻人自有傻人的坚定。在未来的十几年里，这个傻人的身后，站了起来一个又一个性格各异但选择不二而且越来越打着独特金庸风格印记的侠之大者：面对蒙古大军的铁骑，他们没有选择日行千里的小红马，也没有选择岁月静好的桃花岛，而是在那个最关键的时刻，和需要他们守护的襄阳站在一起。

然后，是1959年，在一片香港向何处去的疑问中，金庸做了一件和1843年的狄更斯十分相似的“傻事”。他首次出资3万港币，几个月后又注资5万，与沈宝新共同创办了《明报》。在此之前，金庸在

长城电影公司当编剧，月薪是280港币，写一个剧本有3000港币稿费。就算此时《射雕英雄传》的轰动给他带来了不错的收入，这笔钱，也可以算得上是他的全部家当。许多同事旧友都不看好他的疯狂举动，认为小查这次非倾家荡产不可。

或是幸运，或是巧合，这个当时的未来没有变成如今的现实。

几十年后，如果你有耐心一一追着去看上百篇因《明报》旗下出版物而获得一个可以自由发声的文字江湖的写作者回忆金庸的文章，你或许会觉得，直接把《圣诞颂歌》的结尾搬过来，说的也是一样的意思：

他变成了一个好朋友，好东家，好男子汉，好到这好而老的城市从未有过，或者这好而老的世界里，任何别的好而老的城市、乡镇或自治城市都从未有过。有些人看见他的转变觉得好笑，但是他让他们去笑，睬也不睬他们；因为他是够聪明的，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是这样，没有一样东西在开始出现的时候，不被一些人笑得死去活来；他也知道这些人总归是盲目的，因此他想，他们龇牙咧嘴地笑得眯起眼睛，跟他们得了更不好看的怪病比起来，不过是半斤八两。他自己在心里笑着：对他来说，这就够了。■

最想念的 年货

年货、年味就是乡愁，就是亲情，而亲情永远不过时。

在新的一年里，新的一个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一个充满乡情、亲情，充满年味的文化产品

——《最想念的年货》





生活 1005-3403

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出品

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



成为萧峰：金庸笔下的男性进化史

主笔 / 陈赛

死亡乃是人生最大的恐惧，但在武侠世界中，贪生怕死却是最令人不齿的行径。

《笑傲江湖》中，刘正风满门被灭，慷慨赴死之前，与魔教知己曲洋合奏一曲《笑傲江湖》，但箫中之意，犹有遗恨，是因为最心爱的儿子在临危之际，贪生怕死，辱没了令名。

男性气概，或者说英雄气概，首先是一种勇气，是对恐惧的控制。所以，金庸笔下的英雄主角大都不怕死。

若论结局，这些英雄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归隐江湖，却只有萧峰一人选择了自杀。另一位自杀的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张翠山。但张翠山不算主角，而且他的死与其说是杀身成仁，不如说是一种逃避。妻

子害得师兄全身瘫痪，既无颜面对师兄，也没有勇气再面对妻子，从他的道德标准出发，情义两难全，只能选择自杀。

张翠山的自杀是早有准备的。他先拜托师傅张三丰救回自己的儿子，然后再向到来的众人表示，自己会担当一切。如何担当呢？就是横剑自杀。

但萧峰的死不同。辽帝已经在军前立下重誓，宋辽 30 年的和平可保。他与中原武林的仇怨已解，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而跑到辽国来营救他。是，他不得不离开辽国，但天地之大，并非没有去处。灵鹫宫、大理国，或者去女真部中安身，长白山边，打猎喝酒，也算逍遥快活。事实上，就在自杀身死之前的一段时间，他还是这样想的。

那么，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萌生了死志？为什么在一个并不需要他死的时候，他却非死不可？是在雁门关睹物思人，为阿朱殉情？是忠义两难全，以身殉道？是因为经过几番人生剧变，对他而言，活着本



左图：2003年版《天龙八部》剧照，胡军饰演萧峰
右图：1997年版《天龙八部》剧照，黄日华饰演萧峰

来就无味得很？还是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只能用英雄的血才能洗刷？

萧峰自己的解释是：“身为契丹人，却胁迫辽国皇帝，成了契丹的大罪人，再无面目立于天地之间！”

如果他这样一个大英雄无面目立足于天地之间，人立于天地之间的根本到底是什么？

男人中的男人，英雄中的英雄

曾经与朋友聊天，说起中国男人的理想形象，古往今来似乎要推萧峰为第一人。

但中国文化的土壤里，似乎又不大可能长出萧峰这样的男性。

在《男性气概》一书中，哈佛政治学教授哈维·曼斯菲尔德将“男性气概”首先定义为“危机之前的自信”。

按照这种定义，再也没有比萧峰更男人的男人了。

杏子林里，马夫人污蔑他偷偷潜入马家偷信，他回道：“以乔某的伸手，若要到你府上取什么物事，谅来不至空手而回，更不会失落什么随身物事。别说府上只不过几个女流之辈，便是皇宫内院，相府帅帐，千军万马之中，也未必不能办到。”

聚贤庄面对群雄的围攻，他说：“我乔峰要走，

你们谁能拦我！”

少林少室山一战，面对当世三大高手，他朗声道：“慕容公子、庄帮主、丁老怪，你们三人齐上，萧某何惧？”

书中唯一一次描绘他的惧意，是他一掌打伤阿紫，抱着她深入长白山寻找续命人参。一日陷于暴风雪中，天色阴沉，大风雪马上就要来，雪地里人踪俱灭，连野兽的足迹都没有。他数次跃上大树瞭望，只见四下里尽是白雪覆盖的森林，又哪里分得清东南西北？

“他虽然向来天不怕地不怕，但这时茫茫宇宙之间，似乎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人，也不禁颇有惧意。倘若真的只是他一人，那也罢了，雪海虽大，终究困他不住，可是他怀中还抱着个昏昏沉沉的小阿紫。”

写的虽是惧意，读来却是一派天地苍茫、我自独行的自信与豪迈。

很多人都指出，萧峰身上有古希腊英雄的影子。人物的设定像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宙斯之子，天生神力，却饱尝人生百苦，一出生就被母亲弃于荒野（惧怕赫拉的报复），但又被赫拉的乳汁救活。他凭借武艺绝伦，智谋高超，完成惨绝人寰的“十二试炼”，但在此之前，他被赫拉迷惑，在疯狂中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

他的命运之展开，则像俄狄浦斯王，竭力逃避神谕所示的“弑父娶母”的命运，但追寻身份真相的每一步，与命运对抗的每一步，都是将自己一步步推入万劫不复的命运深渊。

他的结局则让人想到阿喀琉斯。阿喀琉斯是人神之子，诞生之初，他的母亲曾预言他有两个迥然相异的命运：一是过和平的生活，尽管一生碌碌无为却可获得长寿；一是投身战争建功立业，但短命而无法享其天年。阿喀琉斯毅然选择了后者，萧峰也选择了后者。

古希腊人相信，一个男人的灵魂由三个部分组成：理性、欲望与血气（thumos）。前二者好理解，thumos一词却失落已久，英文中都没有可以直接与之对应的词。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形容 logos（逻各斯）是一个车夫，驾驶着 eros（爱欲）和 thumos（血气）两匹马。

“血气”是一种英勇的品质，一种强大而复杂的能量，为人类和动物所共有。希腊人经常将它与愤怒，尤其是当一个人的荣誉、爱人或社群遭到威胁时油然而生的一种正义的愤怒感联系在一起。这种能量驱动一个人的行动、野心和战斗的欲望，促使他们为挽救自己的生命而甘冒生命危险。

在战场上，古希腊英雄，比如阿喀琉斯以竖琴

鼓荡英雄血气，萧峰则以酒激发英雄肝胆。

阿紫认为萧峰平生最勇敢的一战是聚贤庄之役。他的聚贤庄之行，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侠义之心，要救一个“道上相逢、谈不上什么交情”的小丫头，但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却是“自踏入江湖以来，只有为友所敬，为敌所惧，哪有像这几日中如此受人轻贱鄙视”，一时气愤难当，傲心登起，被激发了英雄气概。他曾经几度试图全身而退，都因为对方的辱骂，怒气渐渐勃发，终于不可抑制，以致大开杀戒。

“乔峰杀人之后，更是出手如狂，单刀飞舞，右手忽拳忽掌，左手钢刀横砍直劈，威势直不可当，但见白墙上点点滴滴地溅满了鲜血，大厅中倒下了不少尸骸，有的身首异处，有的膛破肢断。这时他已顾不得对丐帮旧人留情，更无余暇分辨对手面目，红了眼睛，逢人便杀。奚长老竟也死于他的刀下。”

这让人想起《伊利亚特》中，好友被杀，阿喀琉斯呐喊着冲入特洛伊阵营，顿时敌人尸横遍野，大败而逃的特洛伊人纷纷跳入克珊托斯河。阿喀琉斯追入河中，又让许多敌人倒在自己的剑下，“水面上人血泛涌，殷红一片”。河神劝阿喀琉斯离开，因为河里堆满了尸体，河水已无法流入大海，却遭阿喀琉斯的断然拒绝。他一边杀敌，一边怒吼：“统统死去吧，特洛伊人！”

强烈的悲愤，只能在暴虐的厮杀之中才能得到宣泄，无论他的母亲在战前如何警告他，这场复仇会导致他自己的覆灭。

尽管史诗在道德上谴责阿喀琉斯虐杀赫克托尔的暴虐，但阿喀琉斯并不因此而有所贬损，他始终是伟大的、豪迈的，他的悲伤导致他的暴行，只能使人痛心，并不使人憎恨。这么多年来，也没有人苛责萧峰，反而津津乐道于聚贤庄一战是多么的惊天地泣鬼神，一个顶天立地、快意恩仇的英雄形象就是这么任性地跃然纸上。

聚贤庄一战，金庸起的标题是“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句话出自《孟子》，原文是：“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什么意思呢？反躬自省，如果正义不在我这一边，即便对方是一个卑贱的布衣平民，我能感到不害怕吗？反躬自省，如果觉得正义的确在我这一边，对方纵然有千军万马，我也会勇往直前。

这句话出自《孟子》，是儒家对“勇气”的看法——真正的勇气建立在正义之上。经过理性的思考，确认真理和正义在自己这一边，人才会有真正的“大勇”。

但是，还是乔峰的他当时刚刚被逐出丐帮，身

份成谜，前路难测，正处于人生的大迷惘之中，他真的确认真理和正义在他这一边吗？

成为萧峰

在《童话中的男性进化史》一书中，美国心理学家艾伦·知念试图从古老的童话中寻找一种超越英雄主义的男性原型。“在中年的某个时刻，男人青年时的梦想、愿望和理想，顷刻间土崩瓦解，令他们徘徊在地狱边缘。年少的英雄范式在这个中年启蒙礼的第一阶段便被摧毁殆尽。随后，男人开始了流浪，漫无目的、毫无方向。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形象通过梦境、幻想、友谊或者心理治疗开始了。”

金庸的武侠小说大都是关于成长的故事，是一个少年，如何经历各种挫折与磨难，最终成长为一代英雄。英雄观的一大特色便是将世界分为善恶两大阵营，然后把自己标榜为前者，而对手妖魔化为后者。而成熟男子面临的挑战在于接纳自身的善恶和承认内心的黑暗。由此而言，在金庸的小说里，萧峰的故事可以说是一则罕见的中年童话。

从一出场，当萧峰还是乔峰的时候，他已经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的帮主，一个威名赫赫的英雄。杏子林事变，他被剥夺了世界，丧失了作为人的条件，以前的价值尺度统统被打碎。他要追寻自己的身世真相，其实是要重新获得人的条件，是要重返世界，重新获得立于天地之间的根本。

在杏子林里，他为慕容复辩护，曾讲过两个故事，把自己对“英雄好汉”的定义说得很清楚。

一是他与公孙乾对掌，三掌之下，公孙乾自认“江南第二，天下第屁”，英雄在“坦荡”二字。

二是风波恶与乡下人桥头对峙，受辱之余，不恃强凌弱，不伤及无辜，英雄在“是非分明”。

他与段誉结拜，是因为段誉的直爽生平未见，对于自己被鸠摩智所擒，来到江南的各种倒霉丑事，毫无文饰遮掩。后来与虚竹结拜，则是因为虚竹在凶险情势之中挺身而出，重义轻生。他鄙视慕容复，一把掷出，是因为“人家饶你性命，你反下毒手，算什么英雄好汉？”

成为萧峰之后，他不再是汉人，但仍然是一个儒家文化打造出来的英雄，即使在巨大的迷惘中，仍然自觉地践行着他对英雄的标准，但很可惜，这些英雄的准则不足以帮他应付一次次因契丹的身份而带来的两难境地，反而让他一次次越陷越深。

他是契丹人，却受南朝抚养，杀了不少契丹人，

破败了不少契丹的图谋，岂不是大大的不忠？

他的父母在雁门关外为汉人害死，他反拜杀害父母的仇人为师，三十年来认别人为父为母，又是大大的不孝？

他执意复仇，却失手打死了最爱的女子，亲手毁掉了自己唯一幸福的可能。而他一心要找的杀他养父母和恩父、陷他于种种不义的“大恶人”，到头来竟然是他的亲生父亲。

大辽皇帝要他攻宋，他抗拒君命是不忠，不顾金兰之情是不义，但若南下攻战，残杀百姓为不仁，违父之志为不孝。忠孝难全，仁义无法兼顾，却连一走了之也不可。

最后，中原群豪为救他而来，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一个个死于辽兵之手，但若相救，便公然与辽国为敌，成了叛国助敌的辽奸，不但对不起自己祖宗，那也是千秋万世永为本国同胞所唾骂。

金庸一次次用这些两难境地制造的矛盾冲突来推进萧峰的悲剧。但如果没有这些悲剧的不断发生，萧峰也就不再是萧峰了。

如果他的契丹身份未被揭穿，他一直做着他的丐帮帮主，他仍然会是一代大侠，为国为民，但他会始终秉持着民族的偏见，以为所有的契丹人都暴虐卑鄙、不守信义、残杀汉人、无恶不作的无耻之徒。

如果阿朱不死，塞外牛羊之约未曾落空，那么世上也不过是多了一对平凡的夫妻而已。而且，后来金庸借阿紫之口，指出这一理想的无趣之处——“他们说来说去，尽是打猎、骑马、宰牛、杀羊，这样的话听多了，又有什么味道？”

如果他不曾自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与褊狭就不会令我们如此悚然心惊。萧峰人生的最后一战，内心经历的煎熬与痛苦无人能够理解。但他的死，在故事内外，在每个人的心里都留下了一个疑问：

“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那他为什么反而来帮助大宋？看来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杰。”

“两国罢兵，他成了排难解纷的大功臣，却用不着自寻短见啊？”

……

耶律洪基见萧峰自尽，心下一片茫然：他到底于我大辽是有功还是有过？他苦苦劝我不可伐宋，到底是为了宋人还是为了契丹？他和我结义为兄弟，始终对我忠心耿耿，今日自尽于雁门关前，自然绝不是贪图南朝的功名富贵，那……那却又为了什么？

萧峰一生的悲剧，始于误会，终于误会。这些误会由何而起？

除了阴谋家的诡计和命运的捉弄之外，真正的罪魁祸首恰恰是狭隘与偏见。萧峰和阿朱为马夫人所骗，这个谎言破绽百出，他们居然照单全收，简直匪夷所思，但复仇之令人目盲、智力停摆，本就如此。

看过整本《天龙八部》，最让人困惑的就是里面几乎没有一个聪明人。所有的人都是那么的偏激、狭隘，小到门户之见、派别之争，大到民族仇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少林寺大难在前，玄慈方丈令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全体僧人以身殉寺，也不愿假手于虚竹——一个一心向佛，却身负他派武功的高手。他们的偏激、狭隘在今天看起来毫无道理。契丹如何？汉人如何？少林如何？逍遥派又如何？但其实，也许对象不同，但我们今天的偏激与狭隘何尝少了？

40多年前，著名的英国社会学家亨利·泰弗尔设计了一个实验，让人们根据对克利和康定斯基的画作的喜好而分成两组。实验显示，他们对自己的组员很友好，却对另一组的人相当苛刻。此后，为数众多的实验都向我们揭示，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文化身份的标记都能够让人产生对“他者”/“圈外人”的敌意——甚至连随机分配的衬衫颜色都能做到这一点。

与此同时，这种对“他者”/“圈外人”的敌意，似乎又与我们天性中高贵的另一面紧密结合，即大规模合作能力与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例如为自己所属的群体而战，甚至牺牲生命。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指出，对自己群体的爱与对异类的敌意很可能相辅相成，从而形成了一种善良与暴力混杂的奇特局面——“就像一半是慈悲的特蕾莎修女，一半是战斗的兰博”。

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都源自这种古老的“我们vs他者”的思维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偏见、预设与刻板印象。是的，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是的，我们信任与我们相似的人。但这意味着我们必然要仇恨和鄙视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吗？

年轻的俄狄浦斯凭借逻各斯的力量赢得了王位，却对自己弑父娶母的事实一无所知。当知道真相之后，他发现自己一生是多么盲目，对逻各斯的信仰轰然倒塌。最后他刺瞎双眼，逃离了忒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逻各斯的崩溃也意味着他的人生崩溃。

萧峰则是个仇恨的影子，他所到之处，到处是腥风血雨。复仇，毁灭了他，也成就了他。他的寻找身世之旅，是自我毁灭的过程，也是破除褊狭的过程。最后，他以生命为献祭，洗刷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也最终实现了英雄的终极价值。■

金庸的三种江湖

文 / 蓝江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出：人天然就是政治的动物。而在中国的武侠小说里，也可以有一个对应的表达：人天然就是江湖中的动物。

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在政治思想史上曾经有过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其中有一种解释很适用于金庸先生的江湖世界。同样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谈道：“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就是在于人对善恶和是否合乎规矩等其他观念的认识，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就是在这类规矩上的结合。”简言之，家之所以为家，城邦之所以为城邦，政治之所以为政治，都有着其适宜的规矩。当然，江湖也有规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整个江湖世界都是依照某种规矩建立起来的，而所有的门派、侠客义士，甚至武将官僚、贩夫走卒，如果要在江湖上混，都得按照江湖规矩来行事。不过，不能将武侠小说中的江湖规矩混同于朝廷的王法，实际上，在很多小说中，都倾向于将江湖规矩同朝廷王法区分开来，这就是所谓的“江湖事，江湖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古龙的小说中读到西门吹雪和叶孤城的紫禁之巅的王者之战。简言之，武侠小说中的江湖规矩，往往在道义上高于王法，即便朝廷命官，在江湖上，也得以江湖方式行事，否则就是朝廷的鹰犬走狗，江湖上人人敬而远之。

如果要读中国的武侠小说，理解这种特殊的架构是必要的。武侠小说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描述了许多惊世绝伦的武功，展现了诸多侠肝义胆的侠士，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以江湖规矩来铺设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

既然武侠小说的架构需要依照一定的江湖规矩来展开，金庸亦不能免俗。从最开始的《书剑恩仇录》到封笔之作《鹿鼎记》，实际上也都贯穿着金庸对武侠小说中这个最基本结构的反思。虽然武侠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清楚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江湖规矩，在武侠世界里隐隐地起作用，但是，究竟什么是江湖、什么是江湖规矩？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说，

金庸先生尝试给出不同的回答。实际上，金庸的回答不止一个，而是三个，我们可以依次来看看他笔下的三种不同的江湖哲学。

门阀和武功

第一种江湖是门阀的江湖。《书剑恩仇录》是金庸首次对武侠小说的尝试，在这个时期，金庸先生与流行的反清复明的武侠小说主题（尤其是梁羽生）保持了一定的衔接关系。《书剑恩仇录》的主角设定是带有反清复明性质的帮会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同时他更重要的身份，也是小说中埋下的最重要的伏笔，他与乾隆皇帝为同胞兄弟。在随后的《碧血剑》中，金庸更直接用真实人物的血缘关系来塑造主角形象，《碧血剑》的主角是袁承志，他直接被设定为晚明名将袁崇焕之子。这样带有英雄血脉关系的设定，在武侠小说的早期十分受欢迎，人们更愿意相信一个英雄侠士有着非凡的家族背景。实际上，直到《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金庸先生从英雄血脉来塑造主角的套路都没有发生改变。尽管《射雕英雄传》两位主角都出生在余杭的牛家村，但郭靖之父郭啸天在出场时就自称为梁山好汉“赛仁贵”郭盛之后，而其义弟杨铁心也被设定为抗金名将杨再兴之后。这是一种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史诗逻辑，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是以家族血脉来设定英雄人物的路子，一位英雄之所以是英雄，是因为他继承了英雄的血脉，他的父辈、祖辈的血液里都流淌着不凡的气质。在《荷马史诗》中，一位英雄的出场，总伴随着他那不凡身世的介绍：当阿喀琉斯出场时，女神们为之歌唱，“佩琉斯之子，捷足的战士阿喀琉斯”。而斯巴达国王阿伽门农出场时，则唱道“阿特柔斯之子，权力广泛的阿伽门农”。为什么史诗会采用如此啰唆的叙述方式，每一个关键的英雄人物出场，都必须强调他们的父亲或者祖父？这正是因为在古希腊世界，人们相信伟大的英雄人物绝非凡夫俗子，而是具有神的血脉，他们之所以非凡，也正是由于承袭了这个伟大的血脉。在中国门阀政治最兴盛的魏晋，世家门楣也是判断才能高



1



2

1. 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剧照 (2017)

2. 电视剧《神雕侠侣》剧照 (2014)

3. 电视剧《笑傲江湖》剧照 (2013)

4. 电视剧《鹿鼎记》剧照 (1998)



3



4

低一个重要标准。在那个时代里，最关键不在于你是否练就了何种能力，出生于颖川陈氏，还是出生于琅琊王氏，才是入阶高第的敲门砖。

可见，早期的金庸小说秉承了这种史诗英雄史观，也将一种重视血脉门阀的价值观带入到江湖中来。郭芙再不济，她毕竟是大侠郭靖的女儿，即便砍掉了杨过的一只胳膊，也只当大小姐的任性作罢，仍然有耶律齐这样的俊儿郎心悦诚服地娶她为妻，这自然是更懂得江湖规矩的耶律齐有意而为之。《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幸运地承袭了武当派和明教两大血脉，有武当张五侠这样翩翩侠士般的父亲，也有白眉鹰王殷天正这样的外公，让张无忌可以迅速地得到正道和明教的认可。《雪山飞狐》的胡斐父亲是胡一刀，而他们的前身是李闯王手下的四大护卫。《神雕侠侣》的主角杨过尽管一开始遭遇了江湖人士

的白眼，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为《射雕英雄传》中认贼作父的杨康的儿子，同时也正因为他是杨康的儿子，郭靖才觉得杨过只要施教得当，日后定成大器。

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期的几本著作中，金庸先生越来越觉得这种以血脉门第来裁定英雄地位的江湖论调存在太多问题。在《连城诀》《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几部小说的主角设定中，人物越来越倾向于平民化，越来越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作为支撑。狄云在《连城诀》中是湘西的农家子弟。《侠客行》中的石破天是梅芳姑口中的“狗杂种”，他天天学做的事情就是砍柴、做饭，大字不识一个，也不谙人情世故。《笑傲江湖》里，即便令狐冲拥有华山派“君子剑”岳不群座下大弟子的名号，但小说也提到他不过是岳不群夫妇收养的父母双亡的孤儿。《鹿鼎记》的韦小宝则是低贱到极点的角色设定，

是一个父亲都不知道何许人也的丽春院妓女韦春花之子，简直是那个时代最下九流的身份。小说主角的变化，充分体现了金庸对江湖的哲学反思，他想要回答，是否一个真正的英雄必须拥有不凡的血脉，一个出身平常之人是否能担当匡扶正义的大任。从狄云、石破天、令狐冲、韦小宝几个人物的选择上看，金庸已经逐渐抛弃了早年他以血脉门阀来论江湖的基调，将这种视野转向了更为平常的大众。

第二种江湖是武功的江湖。江湖中有英雄的学派，也有着不同的门派。拥有英雄学派的人物不好找，在江湖上常常露脸的就是各大门派的弟子，这些或名门正派，或邪道魔教的弟子，虽然绝大多数时候无法登上大雅之堂，更多时候是在下面比画比画，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家族血脉的背景，那么各自的武功就说得上话了。实际上，江湖上的交往也很简单，你一招“有凤来仪”，我一招“刀光剑影”，瞬间被我打趴下，就得听我的。最忠实执行这种以武论道的是那个“万里独行”田伯光，他的逻辑很简单，他能揍过令狐冲，令狐冲就得听他的，就得把仪琳小师傅叫出来，或者跟他喝喝酒；相反，风清扬教了令狐冲几招，令狐冲终于把这个之前死也打不过的大色鬼打败了，田伯光于是二话不说，悻悻地下了山。田伯光很懂规矩。他所懂的规矩是在论家族门阀之外的江湖规矩。所谓江湖，就是以武论道吧，《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都有一个华山论剑的“武林论坛”，大家一番切磋之后，定下了“五绝”的排位，也就是“中神通、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的排名。在五岳剑派的盟主大会上，决定五岳合并为一派的，也是武功，在这个时候，无论左冷禅多么霸气，或者嵩山坐拥主场之利，一旦左冷禅在武力上败给了岳不群，“君子剑”自然就成为名正言顺的五岳派的掌门。

以武功来论道的江湖规矩，不再是门阀政治的翻版，而更近乎霍布斯《利维坦》中间谈到的共同体状态，实际上这是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丛林状态的必然结果。武力是整个江湖丛林中唯一可以被

以武功来论道的江湖规矩，不再是门阀政治的翻版，而更近乎霍布斯《利维坦》中间谈到的共同体状态，实际上这是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丛林状态的必然结果。

共同承认的硬法则。这个法则不论出身、不论门第，也不论从书本上掌握了多少绝学，一招制胜，则天下臣服。如果有人十几秒里可以击败某个掌门，他自然可以得到江湖的敬仰，而不必担心有什么组织在背后搞什么构陷。

如果没有门派，如何在江湖上谋得一席之地？很简单，就是靠武功。在侠客岛悟出太玄经秘密的石破天，就不再是那个乡下的“狗杂种”，而成为一代江湖的传奇。从血刀老祖那里学会了血刀经的狄云，在度过冰封的苦难之后，也成为可以与万震山和花铁干等江湖名宿匹敌的人物。最典型的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曾阿牛”，一套九阳神功和乾坤大挪移，不仅让他得到了明教教主的地位，也得到了正派人士的敬仰。这样，武功似乎是血缘和门派之外直接让人在江湖上获得显赫地位的途径。

江湖和政治

如果仅仅到第二种江湖，《笑傲江湖》足以成为金庸武侠小说的巅峰之作。但是在《笑傲江湖》之后，金庸又写了《鹿鼎记》。为什么要写《鹿鼎记》这样一部似是而非的武侠小说？或许，在金庸心里还有一个疑问，即如果一个角色，既没有显赫的身世和传承，也没有惊世骇俗的武功，他是否可以在江湖上立足？可以说，《鹿鼎记》就是为了解答这样一个答案而创作的小说。

在《笑傲江湖》中，金庸其实已经开始这样的思考。在小说的一开始，谈到了一个武功并不怎么厉害的总镖头林震南，他开办的福威镖局，已经成为“大江以南首屈一指的大镖局”。林总镖头教训儿子林平之的一段话颇有启发：“江湖上提到‘福威镖局’四字，谁都要跷起大拇指，说一声：‘好福气！好威风！’江湖上的事，名头占了两成，功夫占了两成，余下的六成，却要靠黑白两道的朋友们赏脸了。”林震南提到的镖局成功之道和江湖地位，实际上既不是依靠家族门阀，也不依靠武功盖世，而是另一种门道，善于交朋友。虽然林震南夫妇最后也因为不慎交了川西的余观主这样不善的朋友，但不能否认的是，林震南创下长江以南第一大镖局，正是在于他强大的交际能力。《笑傲江湖》中另一个反武侠类型的典型人物是在东方不败政变之后实际控制日月神教的总管杨莲亭。在小说的描述中，他“身形魁梧，满脸虬髯，形貌极为雄健威武”，但在任盈

盈看来，这位杨大总管“只二十来岁年纪，武功既低，又无办事才干”。但平心而论，杨莲亭管理下的神教并不差，任盈盈对杨莲亭的评价多有怨气，但从小说反映的实际效果来看，这个时期的日月神教的地位是高于任我行担任教主时期的。杨莲亭对神教实施的政治治理，让东方不败可以安居幕后，各个武功高强的长老堂主都臣服在杨莲亭脚下。如果没有任我行在令狐冲、向问天等人帮助下回归夺权，杨莲亭治下的日月神教并没有真正的内乱。一方面他可以哄好东方不败，让这位教主大人安居幕后，完全信任他独揽大权；另一方面，他利用东方不败的权威来管辖诸长老堂主，缔造了神教的“切口”（让教众不断欢呼“东方教主，文成武德，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和各种仪式，按照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阿甘本的话来说，这种“切口”和仪式是古典政治中治理最有效的工具之一，而杨莲亭深谙此道，在神教的地位上，他不亚于汉高祖时期叔孙通对儒家礼仪的重新制定，从而奠定了汉家四百年江山。杨莲亭的确是金庸小说中被低估的角色之一，之所以被低估，也正是因为杨莲亭不会武功，常常被视为东方不败的男宠，而恰恰是这样一个男宠，对神教实施了最有效的改革，创造了一种稳固化的政治机制。在阿甘本的政治理论中，杨莲亭的这类政治学叫“荣耀政治学”（对于荣耀政治学的分析，可以参看我的另一篇文章《金庸小说中的阿甘本》）。

显然，金庸并不满足于《笑傲江湖》中杨莲亭的角色塑造，他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正面塑造一个比杨莲亭更为杨莲亭的角色，这就是韦小宝。我们前文已经说过，韦小宝没有什么血脉上的地位，倒是后来韦小宝当了钦差大臣巡游扬州，一位拍马屁的布政使硬把这位自己都不清楚来历的韦大人贴上唐代平泾原之变的忠武王韦皋的传承。韦小宝的角色是对传统武侠小说的一次彻底的反叛，他既没有资历，也没有武功，但可以将朝廷和江湖同时玩于股掌之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韦小宝是一个增强版的杨莲亭。杨莲亭仅仅只需要哄好东方不败一人，但韦小宝可以在多个势力之间同时做到游刃有余：在鞑子皇帝康熙面前一遍遍的“鸟舜鱼汤”，弄得康熙开怀大笑；在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面前，他真心诚意地侍奉着自己的师傅；在尼姑九难面前，他很懂得这位前明公主的喜好，便投其所好获得其信任；在神龙教主洪安通面前，假装会蝌蚪文的韦小宝硬是把无字天书上的东西读成了“洪

教主寿与天齐”，混得了神龙教的白龙使。但韦小宝绝不是一个谄臣，他自己虽不善军事和治理，但他很能知人善用，在平吴三桂之前，他向康熙举荐了对自己出言不逊的赵良栋和被平西王排挤的王进宝，事实证明，赵王等人正是日后平息三藩之乱的功臣。在收复台湾的事情上，也正是这位韦爵爷看重了不得志的施琅，让这位后来的水师提督一举攻破郑家的海上防线。在江湖上，韦小宝同时担任天地会青木堂堂主、神龙教的白龙使、少林寺仅次于方丈地位的慧明禅师，他调配一流高手为其所用，击败了桑结喇嘛和噶尔丹刺杀顺治老皇帝的阴谋。由此可见，韦小宝尽管没有任何背景，但是可以在江湖上翻山倒海，不会一丝武功，但足以诛杀像冯锡范、洪安通这样的顶尖高手。或许，金庸在《鹿鼎记》中，想通过韦小宝这样的角色告诉我们，在门阀和武功之外，还有另一个江湖，即第三个江湖——政治的江湖。

实际上，韦小宝的存在，也正是金庸为我们道破了江湖政治的最后的秘密。真正玩懂江湖规则的不是那些或义薄云天或奸险狡诈的武林高手，而是像韦小宝这样能够在不同势力间，甚至是势不两立的势力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人。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江湖就是政治，同时能将台上和台下的规则都摸得一清二楚的人，才是整个江湖世界的王者。尽管韦小宝最后的命运亦是带着六个老婆归隐，但是他的归隐并不代表江湖哲学的失败，恰恰是这个神奇的小人物揭开了江湖世界最神秘的面纱，将江湖的权力关系在最赤裸的层面上敞露出来。

这样，当武侠小说走到杨莲亭和韦小宝这里，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便终结了。“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李白《侠客行》中的那种纯粹的侠士的江湖，已经在血色浪漫的厮杀中凋谢。《鹿鼎记》之后的侠客，我们再难以领会乔峰在酒馆偶遇段誉时的那种快意恩仇，也没有了段誉、虚竹、乔峰三人在少室山脚下决意会战中原群雄的气壮山河式的豪迈。这或许也正是金庸在完成了《鹿鼎记》之后不再写武侠小说的缘故吧，江湖侠士的以武论道的规则，逐步被更善于在暗地里政治权衡的权力关系所取代。正如古希腊世界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与提洛联盟在战斗中两败俱伤之后，英雄的时代就此沦落，同样，当岳不群将计就计从左冷禅手中攫取五岳剑派大权，任我行从东方不败手中夺回日月神教之后，江湖的英雄时代也拉下帷幕，令狐冲和任盈盈只能在一曲笑傲江湖中唱出江湖世界的挽歌。■

又见煤价反弹

主笔 谢九

以煤炭为代表的上游原材料价格屡现强势上涨，凸显了去产能之路的困境与挑战。

6月份以来，国内煤炭价格再次出现强势上涨，秦皇岛的动力煤现货价格达到了598元/吨，逼近发改委年初制定的红色警戒线。

在经济下行周期，市场对于煤炭的消费量大幅萎缩，加之煤炭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煤炭价格的强势反弹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从短期因素来看，这一轮煤炭涨价的刺激因素除了夏季用电高峰到来之外，国内对于进口煤炭的限制也是引发煤炭价格上涨的导火索。我国今年进口煤炭量大幅上涨，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进口煤炭及褐煤1.12亿吨，同比增长29.6%，进口额662.6亿元，同比大增147.2%。5月份以来，国内有关部门开始着手限制进口煤炭，近期有消息显示，我国自7月1日起禁止省级政府批准的二类口岸经营煤炭进口业务，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打压煤炭进口量。在夏季用电高峰和限制进口煤炭这两大因素的刺激下，加之煤炭行业的去产能仍在大力推进，因此，煤炭价格强势反弹并且触及红色警戒线也就并不令人意外。

事实上，这并非煤炭价格在近期出现的第一次反弹，去年下半年以来，煤炭价格就曾经出现过一轮强劲反弹，给下游的钢铁、电力等行业带来巨大压力，管理部门通过引导主要煤炭企业释放先进产能来缓解市场压力，煤炭价格的反弹势头一度得到抑制。

今年初，国家发改委牵头，联合煤炭、电力和钢铁三个行业协会，制定了《关于平抑煤炭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的备忘录》，2016到2020年期间，原则上以年度为周期，建立电煤、钢煤中长期合作基准价格确定机制，以重点煤电、煤钢企业中长期基准合同价为基础，建立价格异常波动预警机制。《备忘录》将动力煤价格划分为绿色、蓝色、红色三种情况：当动力煤价格位于绿色区域（价格上下波动幅度在6%以内），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不采取调控措施；当价格位于蓝色区域（价格上下波动幅度在6%至12%之间），重点加强市场监测，密切关注生产和价格变

化情况，适时采取必要的引导措施；当价格位于红色区域（价格上下波动幅度在12%以上），启动平抑煤炭价格异常波动的响应机制。以2017年为例，红色区域意味着煤价跌至470元/吨以下或者上涨至600元/吨以上，目前秦皇岛动力煤价格上涨至598元/吨，距离红色警戒线只有一步之遥，意味着新一轮干预煤炭价格的调控措施可能会随时出台。

长期来看，我国煤炭依然是一个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在经济下行周期，下游市场对煤炭的消费量减少，2014到2016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已经连续3年下跌。与此同时，污染压力之下，清洁能源对煤炭的替代效应也会随之提升，按照煤炭“十三五”规划的预计，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15%左右，天然气消费比重达10%左右，而煤炭消费比重下降到58%左右。和“十二五”末期相比，大约下降5个百分点。

在产能过剩和需求下降的大背景之下，煤炭价格长期来看应该处于下降通道之内。但事实上，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煤炭价格就开始强势反弹，直到近期触碰红色警戒线，说明短期之内煤炭市场的供求关系和长期趋势并不一致。从短期来看，煤炭市场的下游市场需求并没有出现意外的变化，主要的变量在于供求紧缩所致。在供给侧改革之下，我国对于煤炭市场每年的去产能都制定了详尽的指标，比如整个“十三五”期间的目标是：“化解淘汰过剩落后产能8亿吨/年左右，通过减量置换和优化布局增加先进产能5亿吨/年左右。”从长期来看，可以很有效地实现去产能目标，但从短期来看，如果去产能的节奏把握不当，则有可能引发市场的短期剧烈波动。比如去年煤炭的去产能目标为2.5亿吨，但是去年上半年的去产能步伐一度比较迟缓，上半年仅完成目标的三成。7月份，发改委要求：“各地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决策部署，倒排任务量、倒排时间表，确保11月底基本完成任务；中央企业和地方大型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力争11月上旬完成任务。”在硬性指标面前，去年下半年以来煤炭去产能加速推进，在上半年去产能进度大幅落后的背景之下，最终全年还是完成了2.5亿吨的目标，但是下半年去产能速度过快，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短期之内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为煤炭价格报复性反弹埋下伏笔。

尽管煤炭价格短期之内快速反弹，但是市场对于长期趋势并不看好，最新的年度长协煤价反而创出了新低，这种反常的现象充分体现出煤炭市场短期和长期之间的供求矛盾。这种现象如果长期存在，将会向市场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扭曲市场的供求关系，最终使得去产能之路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去年下半年煤价大幅反弹，有关部门通过释放煤炭先进产能的办法来缓解短期供给关系，一度使得煤炭价格得到了抑制，但是考虑到煤炭行业的主旋律仍是去产能，所以这种短期之内释放产能的做法不得不十分谨慎，近期煤价再度强势反弹，并且触及红色警戒线，可见这种一边去产能，一边释放产能的做法在实际操作上仍然存在巨大的难度。

去年下半年以来，不仅是煤炭价格，很多上游原材料价格都出现了明显反弹，钢材、水泥、有色、废纸等价格都出现较大涨幅。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来看，我国的PPI指数曾经连续54个月负增长，工业领域的通缩持续了长达4年多的时间，但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PPI指数开始由负转正，到今年5月份，PPI指数已经连续9个月上涨。

工业领域长达4年多的通缩就此逆转，显然和供给侧改革下的“去产能”密不可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我国上游很多行业的盈利开始回暖。

2016年，全国煤炭企业补贴后的利润总额为320.8亿元，同比增长363.7%，2015年同期净亏42.9亿元；钢铁行业在2016年实现了300亿元的盈利，而在2015年则是500多亿元的亏损；2016年我国水泥行业实现利润51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55%。

上游企业自然乐见盈利回暖，但对于更多的下游企业而言，则意味着更大的成本压力。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企业盈利能力普遍放缓，如果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很多处于盈亏边缘的企业很可能会因此陷入亏损之中。在供给测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中，去产能始终处于最重要的位置，是因为过剩产业中长期大量存在僵而不死的僵尸企业，如果不能实行有效的市场出清，中国经济很难实现真正的转型升级。按照权威人士去年的说法，处置僵尸企业，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如果因为去产能带来过剩行业的价格上涨，甚至给下游企业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这显然不是去产能改革的初衷所在。

而从更长时间来看，过剩产业的价格报复性反弹，也很难具有持续性。由于价格反弹并非由于需求上升所致，价格上涨带来产能短时间内复产后，供给过剩的矛盾终将再度显露，届时过剩产能可能会面临新一轮价格雪崩。☑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7年第七期要目

封面话题

美岛莉与维也纳爱乐成员的舒伯特

- 热点·观察** 深度巴赫
斑狐说乐 莱比锡，有一个声音在呼喊！
专访 意大利女钢琴家莫瑟尔谈托克豪森
话题 “纯白”的《马太受难曲》：从巴洛克到后现代
再听博列特后期录音中的肖邦
爱乐笔记 拉斯玛尼诺夫访谈
肖斯塔科维奇《第六交响曲》之迷
布鲁诺·瓦尔特自传《主题与变奏》39
乐史空间 珀塞尔家族中的音乐家（一）
早期音乐 “玩”出来的音乐——互动音乐之“游戏”展示会
20/21世纪音乐 浮生碎乐
聆听音乐 巴赫的康塔塔 BWV147 与 140
作曲家与作品 巴赫的《复活节清唱剧》与《升天节清唱剧》
波兰作曲家格莱茨基访谈（上）
人物 舒伯特与施莱格兄弟：浪漫主义的黎明（六）
资料库 巴赫音乐的延伸收集与认识
听购收 一个世纪的传奇——底特律交响乐团访问记
专题 爱乐使我重生（下）
爱乐往事 爱乐使我重生（下）

《爱乐》2017年订阅须知

2017年《爱乐》月刊，每期16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7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
www.amazon.cn

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0200012709201646336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视觉中国 供图)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应邀来华访问。这是历史上英国女王第一次访问中国



1997年7月1日，穿着苏格兰裙的英军士兵捧着香港总督府前降下的英国旗帜走向驻地

香港回归 20 年： 问题复杂，机遇犹在

文 / 李菁

1938年出生的姜恩柱，是典型的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外交官。从驻英使馆的一名青年外交官到驻英大使，由分管欧洲和港澳事务的外交部副部长，到调往香港、担任香港回归后中央驻港机构第一任主要负责人，他经历了香港问题艰难的谈判过程，过渡以及回归的全部历史历程。姜恩柱熟稔香港事务，在接受采访时，无论涉及人名、年代还是具体数字，他都信手拈来，表述准确而严谨，让我们对香港回归20年的历史性跨越有了一个更为客观全面的认识。

艰巨的谈判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从启动谈判到最后回归，然后直到2002年从中联办主任的岗位离职香港，你经历了一个很完整的过程。能否大概回顾一下这个历程？

姜恩柱：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英国考虑到为期99年的新界租约到1997年6月30日到期，有些投资涉及土地契约今后怎么办的问題，所以这个问题提上日程。最初是港英当局派了当时的港督麦理浩访华、探路子，到1979年7月，英国驻华大使

柯利达正式约见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宋之光——我当时在外交部西欧司工作，陪宋之光会见柯利达。会见时，柯利达奉命正式提出，新界租约于1997年6月30日到期，英方希望中方同意土地契约的期限可以跨越到6月30日以后。

两个月后，宋之光正式答复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希望英方不要这样做，因为这样不符合我们的政策。1979年11月初，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访问英国，我作为工作人员陪同前往。会谈时英方再次提出这个要求，华国锋答复英国说，不应该这样做，这是中央经过认真研究做出的决定。与此同

左图：内地自由行促进了香港各行各业的经济复苏，从广东道名店到公屋商场的超市，都成为自由游客的抢购战场（摄于2012年）

右图：2012年6月20日，当选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的梁振英（中）在中西区与市民见面



（视觉中国供图）

时有关部门研究怎么解决相关问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最后邓小平提出，要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决定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收回香港不仅是收回新界，而且包括按不平等条约中永久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就是香港全部地区都收回。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国政府就宣布：对于历史上旧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一概不予承认，将来通过谈判加以解决。这个也适用于香港，1972年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奉命正式向联合国提出，要求联合国把香港和澳门从“非殖民化”的名单上删除。因为如果根据非殖民化委员会的规定，列于这个名单的将来是可以宣布独立的。我们要把香港和澳门从名单中删除，是因为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从来是属于我们中国的。我们不承认清朝政府同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回归中国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1984年，你出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这一年正好是撒切尔夫人访华，签订《中英联合声明》，用钱其琛先生在《外交十记》中的话，这时候中英关系处于“蜜月期”？

姜恩柱：中英在解决香港问题时经过激烈的斗争，在周南的回忆录中讲得很细，因为他当时是谈判代表。最终英国不得不同意把香港交还给中国。1984年12月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宣布1997年7月1日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英国政府表示将于1997年7月1日把香港归还给中国。《联合声明》的签署，使中英之间一个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了解决，从此中英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随即英国女王在1986年访华，这是历史上英国女王第一次访问中国，中英关系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关系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方面开始讨论制定香港回归以后要实行的基本法，花了4年零8个月。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如何从“蜜月期”变成“冷战”，甚至一度关系破裂？

姜恩柱：英国一方面在各个领域同中国发展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它开始做撤退之前的准备。早在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发表的一个月前，港英当局就提出在香港推行代议政治体制改革的白



(视觉中国·供图)

皮书，要对香港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香港长期实行的是总督领导下的行政主导体制。它是由英国从伦敦派人来香港当总督，总督把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集中在一个人手里。香港的立法局是总督的咨询机构，由几部分组成，都是由港督委任。这个运作体制，有利于港督掌控香港，而港督听命于伦敦，所以这个体制有利于英国政府控制香港。

但是英国在同意把香港交还中国的同时，要进行改革，逐步减少和取消委任，而引进由间接或直接选举产生立法局议员，以此改变立法局的性质，使它从一个咨询机构变成立法机构，使香港由行政主导逐步改变为立法主导，并企图将此强加给中方，这样在香港交还中国之后，中国任命的行政长官要控制立法局就没那么容易，中央政府要通过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来控制香港的难度就增加了。香港归还给中国，但英方的真实目的不是还政于“中国”，而是还政于“香港”。“白皮书”明确提出，其主要目标是要在香港“逐步建立一个能更直接向港人负责而又稳固地立根于香港的代议政治体制”。这样的改

革中方当然不同意，一开始的时候，双方就存在分歧，但是总体上来说，中英关系还处于黄金时期。外界不知道，实际上分歧已经开始，而且这个分歧越来越明显，一直到后来发展成为对抗。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过程中最艰难的是哪一段？

姜恩柱：到了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当时，英国保守党的部分高层人士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以为中国政府在国内维持不到1997年，英方当初同意交还香港吃亏了，所以他们想翻案。英方抬高要价，提出要求增加立法局直选议员的比例。中英双方讨价还价，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也做了一定的让步，最后完全达成协议，这是以钱其琛外长和英国外交大臣赫德通过七封来往信件最后确认的。

但是之后不久，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英国对形势做出更加错误的判断，态度更加恶劣，又出尔反尔，提出还要进一步增加立法局议员直选比例。当时我做副部长，应邀访问英国，我的对手

英国国务大臣顾立德跟我提出他面临的压力。我说，你这个没有道理，我们基本法已经做了规定，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你再要更改不可能，把他顶了回去。

然而英国方面还是坚持，就在我访问英国结束的那一天，英国任命的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来到香港，两个月后，即1992年10月，他抛出一个更激进的政改方案。随后，彭定康访问北京，为他的政改方案辩解。我同他会谈时指出，他的政改方案是“三违反”，即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同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违反两国过去已达成的协议。我们谈得很不愉快。他甚至说，他对我指出“三违反”的说法“感到厌烦”——这是很不客气的话。我也毫不客气地回敬说，我们对英方一再节外生枝的做法也“感到厌烦”。我们不欢而散。后来钱其琛外长会见他，也一再明确表示中方态度，并警告他，港英政府如果坚持这样做，中方只好另起炉灶，按照基本法的规定来组建香港特区第一届立法会。彭定康听不进去，他以为中国不敢推倒重来，因为中国困难。但是彭定康对中国很不了解，他的方案虽然得到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赫德的支持，但是在英国国内和香港都遭到不少人的强烈反对。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的“推倒重来”和“另起炉灶”，在当时是中方的底线吗？这个底线是邓小平亲自定的调子吗？

姜恩柱：对，是我们的底线。这是由中央制定的，小平同志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是：香港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根本利益，我们在香港问题上，决不能让步，这就给香港问题定调子了。

英国在内外压力下，1993年4月开始谈判，我担任中方代表，进行了17次谈判。我们的想法是，尽可能把英国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但是同时也做另一种准备，就是如果他坚持不改，那我们就分道扬镳，回归的时候我们就另起炉灶。

实际上，1993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由钱其琛副总理担任主任，霍英东、鲁平、周南和我担任副主任，这个预备工作委员会就是为另起炉灶做准备。

10月份，我们提前发表《邓小平文选》里面三篇关于香港的谈话——这三篇文章本来是过一段时间才公开的，我们提前发表也是释放一种信号——这三篇文章全面阐述了我们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其中特别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在过渡时期香港发

生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将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做另一番考虑。”这句话份量很重。英国收到信号，柯利达就赶快出来讲这是一个重要信号。到了11月，谈判由于英方的蓄意破坏而破裂。之后，我们加紧预备委员会的工作，加紧研究制定各种方案，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

几番较量之后，英国贸工大臣赫塞尔廷在1995年5月访问中国，他跟我们领导人讲了一段话，他说他奉命转达梅杰首相给中国领导人的重要信息，其中一条是结论性的，“英国政府认为同中国发展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是英国唯一正确的选择”。这几条实际上是对从1989年以来英国与中国进行对抗的完全否定，承认自己错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与英国政府的两大主要矛盾一个是政改方案，另一个是启德机场。启德机场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好解决的问题吗？

姜恩柱：启德机场相对来说是一个次要问题，后来新建了赤鱘角机场。因为启德机场饱和了，不利于航运。最重要的是政改方案，过渡期之前中英斗争最核心的就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斗争不是和英国了，是跟香港的反对派。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里还提到去见女王的时候，她也主动提到香港问题，主要经过是怎样的？这在当时是怎样的信号？

姜恩柱：众所周知，英国女王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没有实权，她一般不参与政治，但是在英国民众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英国外交部事先跟我打招呼，不要谈具体的政治问题，所以我在见她之前没有准备提香港问题。

在白金汉宫见女王时，我向她递交国书后，也提了1986年她访华时我参与接待过她。女王听了面露喜色。她问我她去过的那几个地方——北京、西安、上海、昆明、广州现在都怎么样了，我跟她简单讲了现在变化很大。女王又问我香港情况如何。我说中英双方正在香港问题上进行合作。

女王给我的印象还是很稳重的，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就说话比较随意。上世纪70年代他和女王接见我们驻英使节时，当时中国还在“文革”，外交官都没有带亲属。女王很礼貌、周到地同大家握手、寒暄，跟在她后面的菲利普亲王因为我们没有带夫人，就说我们是和尚。到了第二年，他又说，怎么今年你们还都是和尚？我们一时半会儿也解释不清，而且他也不等你回答就走开了，所以只能一笑了之。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了你在《大国较量》里写了一些小细节也比较有意思，包括当时赫德参观圆明园的小插曲，那不是我们故意安排的吧？

姜恩柱：1991年4月，外交大臣赫德访华。当时赫德要求参观颐和园，我们礼宾司就做了安排。结果安排从后门苏州街进去的，没想到那儿有块石碑，上面写明此处为英法联军所烧毁。赫德和他的助手都略通中文，一位助手看了说，原来我们是bad guy（坏蛋）！赫德板着脸，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地进去没多久就匆匆离开。

赫德这个人本来是个中国通，上世纪50年代在英国驻华使馆当低级外交官，后来回去他就离开外交部当希思的秘书。希思要访华，都是通过他联系的。赫德从政以后当内政部长，后来当外交大臣，但是此人对华态度不好，我们申办奥运会他在澳大利亚发表讲话反对，香港问题上与我们对抗，他也是其中一个主角。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后来跟彭定康、赫德这些人还打交道吗？

姜恩柱：同彭定康没有交往，同赫德有来往。赫德1995年辞去外交大臣职务，到国民西敏寺投资银行（NatWest Markets）担任副总裁。我到任不久，他请我吃饭。因为他要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所以他把英国十几家最大的公司包括英航、英国石油、联合利华、罗尔斯-罗伊斯等集团总裁都请来作陪。席上他说我和姜大使相识20多年，虽然双方有时争论激烈，但仍然是朋友。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有一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

姜恩柱：……他在商言商，要跟我们拉关系。那次宴会上，有一个大公司的头头跟我说：我们希望同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希望香港平稳过渡，只要那些政治家不要插手就好——这个董事长朝我挤挤眼，这句话明显就是针对赫德说的。赫德当时表情有点难看，但是他很快转过来说：“姜大使，我希望访问中国，我们也希望在上海设办事处，同中国开展往来。”我说，我们欢迎。

资本的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在香港回归的过渡期间，中方也做了一些在香港的英资财团的工作，包括怡和集团、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等。那时候他们的稳定



香港回归后中央驻港机构第一任主要负责人姜恩柱

《大国较量》

对香港的和平过渡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姜恩柱：回归之前，小平同志就提出来，要防止出现几种情况，其中之一就是撤资。在英国这些大财团里，怡和洋行态度不好。它在《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就迁册，把原来的注册地从香港迁到百慕大，还大批出售它在香港的地产。其他几家公司，比如说汇丰，也做了撤退的准备，但是它比较聪明，它同米特兰银行合并，把总部设在伦敦，但是继续在香港经营。太古也比较聪明，因为它主要是搞航空的，它同中国民航和港龙合作，让出部分股权，继续在香港发展。渣打银行表示对中国有信心。这些财团其实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做撤走的准备，另一方面做继续经营的准备。因为他们看到，香港是最容易赚钱的地方，他们大部分利润都来自香港。

但是怡和洋行后来后悔他们做的决定。董事长有一次请我吃饭时向我表示，以后他们不干预政治。他说这句话是因为从香港迁册之后，他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失败，他把香港的地产卖了，吃了大亏。而几家继续同我们保持合作的财团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像汇丰，跟我们的中国银行一起发行港币。除此之外，还在内地增加投资，太古在厦门搞飞机修理厂。这些公司都从香港回归当中赚取大量利润，所以态度非常好。英国这些大财团，同中国的合作不是削弱了，而是在加强。怡和洋行的态度也变了。他们这些年都在增加对我国内地的投资，比在英国赚钱容易。

三联生活周刊：香港有几大家族，包括李嘉诚、

霍英东等人。他们是不是在香港回归 20 年中最大的受益群体之一呢？

姜恩柱：香港的资本由几部分组成，最大的原来是英资财团，后来是美国财团，但是后来像李嘉诚、霍英东，包括郭家、郑家这些华人家族慢慢发展起来，他们的投资逐步超过英国和美国的资本。这些华人财团应该说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中得到巨大的好处，也为中国改革开放做了贡献。这些公司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大，他们希望香港回归，希望平稳过渡，不希望香港搞乱，不赞成香港反对派现在整天搞政治斗争。

三联生活周刊：那可以说我们跟他们的沟通一直很畅通，关键时期他们也会发言，他们的表态对香港的稳定还是很有作用的。

姜恩柱：对，我在香港的时候跟他们往来很多，沟通也很顺畅。总的来说，这几家都是爱国的。至于这些财团投资的方向，网上有各种议论，这个就不要多议论了。

三联生活周刊：在香港回归的 20 年中，大陆的中资机构也有很大的发展。它们对香港经济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姜恩柱：香港是我们内地中资企业在境外最大的投资目的地。我们一些大的企业，在香港都有很大的投资，中国银行、华润、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远洋、中国五矿等等。香港所有的鲜货、猪肉和禽类，这些都是由五丰行来供应。在香港的中资机构，除了中央的以外，各个省市都有很多大公司在那里。北京有北京控股，上海有上海实业，广东有粤海……其他各个省都有。中联办有一项工作内容，就是负责联系和协助内地有关投资主体管理在香港的中资企业。中国内地在香港的这些投资，是香港整个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香港回归的时候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有一些中资企业就考虑回到内地发展。我们向中央反映这个情况：香港当时很困难，如果中资企业再把资金转到内地，对香港不利。中央很重视，就引导这些中资企业继续在香港经营，所以现在内地在香港有银行、保险、交通、物流、航运、房地产、建筑等等投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问题与出路

三联生活周刊：以往，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加

上历史原因，香港成为内地唯一的对外通道。但是这些年的一个事实是，香港的地位在逐渐下降。这也引起香港人强烈的不适应感，你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姜恩柱：新中国成立之后，西方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我国当时主要的外汇来源、外贸的转口，都要靠香港。在香港回归 20 年以来，香港一方面经济继续得到发展，本地国民生产总值从 1997 年的 1.34 万亿港元，增加到去年底的 2.49 万亿港元，增长 80% 多，在发达经济体里名列前茅。股市的市值从 1997 年的 3 万亿港元发展到去年底的 24 万亿港元，增加了 8 倍，所以总的经济发展情况是好的。

但另一方面，香港的发展同祖国内地相比，显得比较缓慢。回归的时候香港在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里面经济总量是第一位，但是经过这 20 年，广东现在是香港的 3 倍多，上海是香港的 1 倍多，广州和深圳都已经快赶上香港了。香港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在下降：回归的时候比重是 16.7%，到去年已经下降到 2.78%。

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复杂。简单地说，首先是受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发展的影响，这些国家都出现经济衰退和危机。第二，经济结构单一，金融、房地产、外贸这三大块占香港经济的 85%。香港正面临经济转型期——我举一个例子，过去内地所有的对外进出口要通过香港，现在沿海城市都发展起来，不需要全都通过香港了；过去台湾与大陆的贸易也都要经过香港，现在台湾跟大陆实行“三通”，也不需要经过香港，所以我国内地通过香港的转口贸易大大下降。香港原来的优势在弱化，而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没有形成。第三，香港一些人受港英时期一些理念的负面影响，认为政府不应干预经济，他们不了解在经济转型时期需要政府制定战略，起引领作用。董建华当行政长官的时候，曾经提出要发展科技，鼓励创新，但是遇到很大的阻力。直到梁振英当行政长官的时候，才提出“适度有为”的理念，政府要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已经晚了，已经错过了十几年的宝贵时间。最后，香港反对派不断闹事，导致特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分散精力，不能全心全意致力于发展经济。由于这些原因，香港跟内地城市相比显得发展迟缓。

三联生活周刊：在以往的历史过程中，在香港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央政府毫不惜力帮助香港，现在这个态度是否没有改变？

姜恩柱：对，没有改变，还是会继续支持他们。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帮助香港克服经济困难，鼓励香港发展，并且采取特殊措施，内地跟香港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另外，建立内地同香港的特殊经贸安排，对原产地是香港的产品实行零关税。前几年开始，又允许香港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使香港成为境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还鼓励内地有条件的企业到香港上市，取消过去对香港旅游限制，鼓励自由行，全国各地的市民都可以去香港旅游。香港的旅游人数占第一位的就是内地，这对缓解香港旅游业、餐饮业和零售业的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又实现股市沪港通、深港通，这一系列政策，都是要帮助香港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你之前接受采访时，也提到香港的经济总量增长了80%多，但是实际上这部分利益并没有惠及中下层，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如何解决？

姜恩柱：香港的人员结构非常特殊，香港3/4的工作岗位都是低收入岗位。一方面，香港有很多有钱人，富翁很多；但是另一方面，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收入很低，房价非常之高。香港回归之前房价贵得不得了，当时我到香港去看房价简直惊呆了。山上的房价达到12万港元/平方米——1997年内地的房价很低，北京4000元就算是高价了——现在香港的房价比回归之前最疯狂的时期，还要高出70%到80%。

现在香港90%住户的居住面积不超过70平方米，其中一半不超过50平方米。香港这些年低收入阶层的薪金增长缓慢，有的停止甚至在下降。这就造成两极分化，一方面香港需要包括金融业在内的高端人才，但是这些人才很少，而大量低收入的人才，技能有限，向上流动的机会很少。所以现在很多香港人到内地找工作。当然香港总的工资水平还是要比内地高一些的，但是它的房价很贵，物价也贵。

我在香港工作是住在跑马地，附近有一家专门代客人存放衣服、被子的店。我就感到奇怪，怎么还有这样的店？后来一了解，因为一般香港人家里居住面积小，实在太拥挤，所以夏天就把冬天的衣服存到店里去。这在北京没有，上海没有，我在伦敦工作时也没看到，只有香港有。所以香港这个社会很复杂，贫富差距很大。这些年来，中央不断向特区政府指出，你们要重点发展经济，要改善民生。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你刚才提到了香港年轻人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利用自己这个特殊的地位，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帮助外国企业走到中国内地来，发展机遇很多。现在就看香港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

面临的实际生活问题，他们对自己、对香港的前途有一些悲观的情绪，你觉得这是香港最大的隐忧吗？

姜恩柱：这是隐忧之一，实际上香港年轻人出路还是很多的。首先要解决身份认同问题——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要了解中国的近代史，因为过去英国搞殖民教育，许多香港人不知道中国的近代史。特区政府成立之后，董建华先生曾经想在学校里推广国情教育，上历史课，把初中历史课作为必修课，但是遭到很多人抵制，搞不下去。现在香港回归20周年，回归的时候刚出生的小孩，现在20岁了，他们对中国的近代史一概不了解，不知道中华民族的苦难史，不知道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历史，对国家没有正确的了解，这是很大的缺陷。其次，其实机会是很多的，很多香港人到内地来找工作，内地也很欢迎香港来的学生就业。

三联生活周刊：目前香港的政治结构也发生很大变化，面临的矛盾也比较突出，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姜恩柱：要解决香港面临的问题，首先要逐步让香港民众看到国家的强大，看到香港的出路离不开国家。中央政府对香港采取很多特殊政策，只要在中央的规划下好好干，好好配合，前途是无量的。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与国际联系比较多，同内地也有联系，利用自己这个特殊的地位，帮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帮助外国企业走到中国内地来，发展机遇很多。现在就看香港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刚上任的时候就一再表示，香港问题很复杂；20年后看香港，你会给出什么判断？

姜恩柱：依然很复杂。因为这些问题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复杂的现实因素，要解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需要有一个过程。只要全面准确地按照一国两制方针，按照基本法办事，我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

（感谢实习记者曹祯的帮助）



(吴建波摄/视觉中国供图)

宁乡洪灾，一起冲锋舟救援悲剧

记者 / 王海燕

6月22日至7月3日，湖南遭遇暴雨，暴雨带来的大洪水，导致湖南全省14个市州逾千万人受灾。根据新华社7月7日消息，此次灾害累计核实因灾死亡、意外落水溺亡、失联人员共44人。在受灾最严重的湖南省宁乡市，对当地人来说，这场灾难远比1998年的洪水更凶猛，能与之相比的只有近半个世纪前1969年的特大洪水。

当地政府还通报，7月1日，宁乡市大成桥村发生救援冲锋舟侧翻，致13人落水，3死亡，1人失联。出事时，冲锋舟上共载重21人，除了驾驶员和村里的妇女主任，所有村民均没有救生衣。

救援冲锋舟超载

直到7月1日早上，70岁的欧碧良夫妇对大雨的形势估计依然是乐观的，他们对接下来一天要经历的祸事毫无知觉，事实上，也无法知觉。当天早上，夫妇俩吃完早饭，丈夫李仁群出门去玩牌，欧碧良有点担心地嘀咕：“你今天不要出门了，怕是要发水。”李仁群乐观地说“不会的不会的”，就出门了。

后来，根据官方通报，6月30日至7月1日，24小时内，湖南省宁乡全市平均降雨量高达218.9毫米，已经接近特大暴雨的标准“24小时250毫米”。但欧碧良夫妇对本刊说，当天他们并未接到任何防



(朱贵添摄/视觉中国供图)

2



(连国庆摄/视觉中国供图)

3

1. 7月2日，武警湖南总队直属支队官兵在转移受洪水围困的益阳市群众
2. 7月1日，湖南宁乡黄材镇已经接近丘陵地带，但在暴雨中依然严重积水
3. 7月1日，黄材水库泄洪。黄材水库位于宁乡欧家湾毗邻的洑水上游

范通知。李仁群是当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才被玩牌的人略带戏谑地催促，“你还不回家，你家里都发大水了”。他记得自己当时回家的时候，雨势已经变小，他还能跟平时一样，从田边的乡间小路轻松地走回房子。但等到回到家里没多久，老两口就傻眼了，家里的房子是一个小院子，离洑水江堤只有200米远，洪水很快涌进来，欧碧良记得，当时院子门口两扇大铁门中只关了一扇，“水来得特别快，像浪一样打过来”。

到下午的时候，欧碧良在二楼接到了自己平时在长沙市区做生意的儿子的电话，催促他们赶紧离开房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当时老两口对房子里的东西不放心，还不太愿意。直到傍晚，欧碧良家的

院子里，水已经涨至腰深。住在欧碧良对面、隔着几块稻田的侄子欧伟文带着一艘本地人驾驶的小渔船过来接老两口，带他们转移。当时，欧碧良还来得及在家里收拾了一点钱、首饰和衣服带在身上。

欧碧良夫妇居住的地方在湖南省宁乡市大成桥镇大成村4组，当地人称欧家湾，离宁乡市区20多公里，离湖南省会长沙约70公里。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良田相接，毗邻市区，是当地较为富庶的村子，欧碧良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居住，但这个地方最大的缺点就是“爱发大水”，当地人已经有些习惯了。

因为欧家湾正处在一条叫洑水的大河及其支流相接的三角冲刷地带，洑水是湘江的一级支流，上游还有几座水库，包括与全国三大土坝水利工程之一的黄材水库泄洪道相接，导致这里发暴雨时极易发涝灾。

当时，小渔船载着欧碧良夫妇和欧伟文从已经变成一片汪洋泽海的稻田和乡间小道上曲折通过，到达平时走路大约需要20分钟以外的一个路口。那是一个道路与溪流交叉的路口，道路被夹在一座煤粉厂的两间厂房中间，溪流很深，超过一人高，通往一条当地人叫“小河”的洑水支流，路边还有一条修建了水泥堤的灌溉沟渠。欧碧良夫妇在那里下了小船，和更多的村人一起站在煤粉厂的一个小平台上，等着政府的救援冲锋舟。

直到那时，虽然形势紧急，但没有任何人想到死亡，地势更高的安全地带，也即救援指挥部就在100米以外，平时走路，三两分钟就到了。当时冲锋舟上已经有三个人，包括两位坐在一头一尾的民兵驾驶员和大成桥镇河潭村妇女主任李元秀。欧碧良记得自己当时有点害怕，除了去年同样是因为洪水坐过一次救援冲锋舟外，她一辈子没坐过船，她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开船的驾驶员用很大的声音安慰有些惊慌的村民，“上了，上了。不怕！不怕！全部都上！”于是所有人都很快上了冲锋舟，在舟上以两排相对的方式挤挤挨挨地蹲下。当时到底有多少人等着上冲锋舟，欧碧良已经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好多人好多人”。其中不少是老人、小孩和妇女。根据大成桥镇政府后来的通报，当时船上共有包括民兵在内21人。

原先就在舟上的三人均身穿救生衣，但他们并没有给等着上船的村民提供救生衣。一名大成桥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后来对媒体说，没有提供救生衣的



【视觉中国供图】

1998年，武汉遭遇特大洪水，城郊多地被淹，市民在自救

原因是，多趟转运后，有些村民忘记归还，导致出发的时候只剩下7件，且全部湿了，村民不愿意穿。一些当时上船的村民则对本刊说，当时冲锋舟和驾驶员都没有询问他们，他们也在舟上看到救生衣。

有没有救生衣，对一些人来说，很快就变成生死差别。因为这辆超载的冲锋舟在刚刚开出后，就立刻发生了侧翻，导致13人落水，3人死亡，1人失联，其中死亡的是欧碧良的弟媳谢招连、侄儿媳谢霞和同样住在欧家村的村民陈保兰，失联的则是欧碧良4个月大的侄孙女欧心阳。河潭村妇女主任李元秀同样落水了，但因为穿着救生衣浮在水面，又抓着冲锋舟，很快就被船上的人拉了上去。

侧翻时刻

根据大成桥镇政府的通报，冲锋舟侧翻是因撞

到不明物体熄火，引发船上人员恐慌发生侧翻，致使部分人员落水。欧家湾的村民余香是当时最近的目击者，也是死者陈保兰的弟媳，她当时就带着自己两个7岁的孩子，站在村民上船的煤粉厂厂房的平台上，她本来也是去等着上船的，只是迟了一步，她到达的时候，冲锋舟已经开走了。她当时甚至还有一瞬间的失望，因为她听说，那已经是冲锋舟最后一趟过来接人了，这意味着她和两个孩子被抛下了。

但这种失望只持续了也许几秒钟，因为她立马就看到，冲锋舟刚刚开出去，本来是要沿着原本的道路路线直往前去，却在小路和沟渠的交叉口被一股急流冲得转了向，沿着沟渠径直往下，朝大约50米外的泔水支流冲过去，很多人从船上掉了下来，周围立马响起一片尖叫和呼喊“救命”的声音。

那个路口之所以有急流，是因为煤粉厂厂房夹

着道路形成了一个出口，交叉右侧通向泐水支流的地面又有一个比周围地带倾斜度大得多的缓坡。那条路本是欧家湾散居的村民通往县道的必经之路，正是因为这个路口积水较深，从早上开始，阻止了很多村民自行转移至安全地带。

这也是一个致命的出事地点，因为当时各处农田和道路虽然已经是一片浑浊的汪洋，但至少是平静的，但冲锋舟侧翻的地点一股急流正冲向不足30米外的泐水支流，而那时，这条支流的河水已经超过河岸，泥浆色的波浪湍急凶猛，狰狞可怖。余香立即爬到煤粉厂更高的地方去看，阴暗的天色里，已经只能看到冲锋舟的黑影一起一伏，再也看不到任何人影，一个她看不清楚是谁的成年人则抱着一个小孩，踩在沟渠边的一棵树根上，声嘶力竭地呼喊着“救命”，她的两个孩子吓得抓着她的衣服又哭又跳又叫。

而对船上的人来说，当时的情景更加恐怖。陈保兰对本刊说，当时“船一偏，就把船上那一边的人全部丢进水里了”。湍急的浑水随即涌进舟里，瞬间就齐没到他们蹲着的腰身，她的丈夫李仁群赶快挽着她的胳膊慢慢坐平，朝对面滑过去，竭力保持冲锋舟的平衡。陈保兰和孙子李彦凯同时掉进了水里，50多岁的陈仁贵立即跳下船去将李彦凯捞上冲锋舟。但是等他再转头寻找，他已经在湍急的水里看不到妹妹的身影了。

欧碧良的弟弟家当时有7口人在冲锋舟上，包括欧碧良的弟弟欧子建、弟媳谢招连、两个侄儿欧大伟和欧伟文、欧伟文的妻子谢霞、欧伟文2岁的女儿欧雨阳、欧伟文的女儿欧心阳，奶奶谢招连和谢霞手里各抱着一个孩子。根据欧大伟对媒体的回忆，在看到船要翻了之后，瘦高的他主动跳了下去，而根据船上另一外村民袁尚文的说法，当时跳下船的还有站在船头的一位民兵。但已经无济于事了，严重超载的冲锋舟不受控制地发生了侧翻，坐在同一侧的13人（包括在船上的欧子建所有家人）全部掉进了水里。

一片混乱当中，欧伟文和欧大伟只救起了2岁的欧雨阳。而另外一边，余香看到，正准备继续转移村民的渔船上也有人扑过来救人，在绕过煤粉厂的稻田地带，救起了几个被河水冲了一大截的村民。但当时天色已晚，找人本就困难，而且“冲到河道中间的话，那么大的水，再会游泳的人也救不了啊！”余香对本刊说。政府重新派出的救援船则是半个小

时后才达到出事地点，那个抱着小孩拼命呼救的人，也是直到那时才被救起。

事实上，政府的救援指挥地点就在离出事地点140米左右距离的县道上。如果复原当天村民们的转移路线，可以发现，欧碧良夫妇及欧子建一家是由村民驾驶的小渔船转移到煤粉厂。而陈保兰祖孙则是自行走了一段水路，换乘小渔船，最后才坐上冲锋舟的。

余香和陈保兰的家一墙之隔，是陈保兰的妯娌，她对本刊说，虽然当天早上她的丈夫李谷明就给村里打过电话，询问救援计划，但直到下午她才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人说，救援的冲锋舟已经到了。但因为没有政府的救援人员前来接引，直到傍晚，因为陈保兰的兄弟陈仁贵过来接他们，两个女人才有机会带着三个孩子离开，陈仁贵告诉他们，冲锋舟已经是最后一趟前来转移村民了。

当时，余香、陈仁贵、陈保兰三个大人带着三个7岁的孩子，从高处的田坎绕了一大截路后，到达小渔船接人的地方，陈仁贵和陈保兰先带着李彦凯乘坐小渔船离开，余香则带着自己的孩子等小渔船回来接引第二趟。但等余香带着两个孩子也到达煤粉厂的时候，冲锋舟已经开出去了。

一家三口和相依为命的奶奶

根据欧大伟的说法，在长沙工作的他是在7月1日早上接到弟弟欧伟文的微信，知道家里情况不妙的。欧伟文本来准备一早就开车带着家人去长沙，但到煤粉厂处时被阻断，被迫回到家里，眼看着水在接近12点的时候涨到齐墙1.2米的高度，直到那时，欧家依然未接到政府的转移通知。

欧大伟和表哥李志强于下午2点从长沙赶回大成桥镇，到达离煤粉厂100多米的救援指挥处时，他看到路上共有三台冲锋舟，其中一台在地上，两台在车上，舟上写着“宁乡民兵”四个字。欧大伟

冲锋舟侧翻的地点一股急流正冲向不足30米外的泐水支流。严重超载的冲锋舟不受控制地发生了侧翻，坐在同一侧的13人全部掉进了水里。

去询问，救援处的人最开始告诉他冲锋舟没油，后来有油了，却没找到油管，油管到后，又没钥匙。下午5点17分，在路边等待的欧大卫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内容是“我家乡发大水了，我家进大水了，欢迎捐款资助”，配的表情是撇嘴、哭泣和尴尬，显示他当时的心情虽然焦灼，但还不绝望。

下午5点半，终于有一辆冲锋舟下水救援。但半个小时后，救援处的人告诉欧大伟，需要村民转移到煤粉厂处统一上冲锋舟，欧大伟立即联系了一艘村里的私人小渔船，将村民们接到煤粉厂处等待政府救援。欧大伟记得，包括他一家人在内的最后一批人在煤粉厂上冲锋舟的时候，时间已经是下午7点，他和欧伟文当时希望先把妇女和小孩送过去，但冲锋舟上的民兵一再表示当天只运这一趟了，让大家全部上船。

而根据大成桥镇政府通报，7月1日上午10时左右，宁乡市大成桥镇玉新村和大成桥村部分群众被洪水围困，接到该镇求救电话后，宁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就派遣三艘冲锋舟前往救援。而大成桥镇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则称，救援的冲锋舟是从邻近的玉新村调过来的，属于市武装部，由宁乡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派遣，因为平时动力和船体不在一起，导致三艘冲锋舟当中只有一艘有发动机。这名工作人员还说不知道冲锋舟的准载人数，但肯定超载了。而救援指挥处的一位居民欧金凤则告诉本刊，她总共看到冲锋舟三次出去转运村民（包括出事一次），前两次回来船上大概都是七八个人，最后一趟，她还没看到冲锋舟回来，却先听见了远远的呼救声。

7月7日，事发6天后，洪水已经退去，洑水及其支流依然浑浊，但水位已经下降到河谷很低的位置，看起来平静无害。农田里除了早稻满带泥浆且干瘪的稻穗显示今年收成堪忧外，已经不大看得出洪水肆虐的痕迹。从卫星地图上看，欧家湾地势平坦，良田中间屋舍错落，一片绿意盎然。

但相邻两家的声传四野的哀乐透露了悲剧。在欧子建家漂亮的小洋楼里，堂屋正中是一座灵堂，堂屋左右的偏房里，一边停放着欧伟文母亲谢招连的遗体，另一边停放着欧伟文妻子谢霞的遗体。谢招连的遗体是7月2日下午2点多钟找到的，面容安详，还僵硬地维持着怀抱孙女的姿势。谢霞的遗体则是7月4日下午才找到，已经面目全非。而那

个4个月大的婴儿，则至今没有找到。

在出事后的很多天里，同时失去三位至亲的欧伟文眼睛都没合上一下，在找到妻子谢霞的遗体之前，他甚至害怕找到。和妻子在一起7年的时间，分开的时候，他至少每天要给谢霞打一个电话。在他和妻子居住的房间，他现在连窗子都不敢开，甚至开门也是小心翼翼的，害怕房间里妻子和女儿的味道被风吹淡。他在朋友圈里说：“我不会变动我们房间里的所有布置，哪怕是一条毛巾、体温计、面膜、小水壶，我只想在您平安回家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我们依然不变的生活味道。如果可以，我的一切换您平安回家。”

欧碧良则在出事当天晚上，无法吃下一口饭，她对1998那场全国闻名的大洪水没什么印象，和当地更多人一样，她记忆里印象更深刻的洪水是1969年8月，宁乡暴雨成灾，那一年，她的奶奶被洪水冲走，一个堂弟、一个堂侄被垮塌的房屋压死。根据官方通报，那场大雨造成宁乡县563人死亡。她原本以为她有生之年不会再经历这种事情了。

而在陈保兰家，悲伤和残酷同样重。采访的时候，一说到当时落水的情景，陈保兰的哥哥陈仁贵的声音立即就变了，变得哑而虚弱，“我也是老人啊，我哪里救得过来”。陈保兰是他唯一的妹妹，5年前，陈保兰唯一的儿子患癌症去世，给陈保兰留下唯一的孙子李彦凯，李彦凯的妈妈则在去年改嫁，平时，陈保兰的丈夫远在珠海打工，只剩下陈保兰和7岁的陈彦凯住在欧家湾，相依为命。

出事那天，陈保兰本来邀请陈仁贵去家里吃中午饭，但因为雨太大了，陈仁贵要安顿家人，就没去，直到安顿好家人，已经是下午，他赶紧去接陈保兰和李彦凯到安全地带，当时他抱着李彦凯，陈保兰和余香则分别背着余香的两个孩子，绕了一大圈，走过的路要么已经深及大腿，要么是仅容一只脚踏地的砖墙，才艰难地乘上渔船，赶上了那趟救援冲锋舟，等着被带到安全的地方。

而被舅舅爷救上冲锋舟的李彦凯，还懵懵懂懂，他妈妈说，他最近几天晚上都会突然从梦中惊醒。他已经很懂事，知道陈仁贵把他救上船后很快就心脏病发作，是因为“没有救上我奶奶，很急”。直到现在，这一家人依然没有得到政府的如何处理事故的说法。7岁的李彦凯或许要很久才能彻底明白，这场变故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生生不息，因你行动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一。WWF在全世界拥有500万名志愿者以及一个在100多个国家活跃着的网络。WWF的使命是遏止地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创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为此我们致力于：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确保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动降低污染和减少浪费性消费的行动。

在中国，WWF的工作始于1980年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是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37年间我们在中国的项目领域由最初的大熊猫保护扩大到物种保护、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可持续发展教育、气候变化与能源、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科学发展与国际政策等领域。



实际上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现在加入WWF



（杨华峰 摄/视觉中国供图）

7月1日，暴雨致湖南长沙城区多处内涝，裕园小区的居民涉水买菜

沙河市场，从美丽新世界到垃圾场

实习记者 / 刘畅 记者 / 王海燕

6月22日至7月3日，湖南宁乡乡下暴雨。在宁乡市区，受灾最严重，最早引起外界关注的是沙河市场及其周边。这里没有人员伤亡，但每户商家的损失从数万到上百万元不等，总损失估计达10亿元。这里的很多人都是从小生意做起，终于渐渐站稳脚跟，却在一夜之间生死悬一线，眼睁睁看着财富付诸东流。直到7月7日，洪水已经过去数天，这个原本到处都是崭新商品的巨大市场，依然一片恶臭，如同垃圾场。

突如其来的洪水

像往年一样，从6月开始，宁乡进入汛期。今年雨势尤大，自6月28日以来连降暴雨，7月1日上午仍没有减弱的迹象。但大雨不影响做生意，这里是宁乡最大、历史也最悠久的综合批发市场，1500多间门面、300余个摊位被划成建材、百货、食品等几个区域，高峰时，每天有2万城乡各地的交易客商来这里进货。与所有的批发市场一样，这里堪称宁乡最大的美丽新世界。

7月1日下午，大雨已经渐渐止住，傍晚时分，天空甚至有一丝放晴的迹象。但就在这时，洪水却如猛兽般突然扑来。一家母婴店的老板黄青是最早



【纪实摄影/视觉中国·钱翔】

7月3日，湖南永州洪水退去后，市民忙着清洗家具，组织灾后生产自救

看到洪水的人之一。她的店面紧邻市场西门，靠近沙河桥，洪水从那里翻过桥，直冲入市场。这完全出乎黄青的预料，因为直到下午，黄青还看到沙河市场的领导在往河堤上垒沙袋，也没有任何人通知商户们要注意洪水，大家还站在沟水边上看水势。

到了下午约3点半左右，市场领导突然让看水的商户们赶快回去搬货，说洪水马上就来。黄青吓了一跳，赶紧回店里转移货物，刚走进店门，就听见广播里通知黄材水库已经泄洪，大约6点到8点的时候到达县城，水要涨1.5米到2米，市场也很快就会断电。

黄青录下了广播，发到家里的微信群里招呼家人，家人们还不太相信，都说沙河从没受过灾，水位不可能涨到那么高。但黄青还是搬了些轻便的衣服到二楼，只搬了半个小时，店外的台阶上已经能够看到水，4点50分左右，水进店没过小腿。黄青抬头一看才知道，洪水已经翻过沙河桥，正沿着西

门的路疯狂灌进市场。她和大嫂赶紧手牵手，往东门逃走了。

黄青看到洪水从前面冲过来，处在市场另一个角落的李澜，有一间和黄青朝向一致的厨卫批发店，她经历的却是洪水从背后袭来。因为沙河市场是被洪水的一个急拐弯包住了两边，洪水来临时，两边都开始进水，其中黄青所在的西边是因为洪水翻过桥面，李澜所在的东南角却是因为河堤有一个巨大的缺口。李澜记得，在她的店面所处的位置，她根本听不到市场的广播通知，她是在下午4点才从房东那里接到转移的通知。

知道这个消息后，李澜赶紧带着孩子先回了小区，她丈夫贺雨文则留下来转移货物，但因为市场管理方催促，贺雨文其实也只带了几个抽油烟机，就从前门开车离开了。李澜后来从丈夫那里得知，当时洪水涌来的速度非常快，就在他们接到通知后15分钟，大水就涌过来，不到6点，她的店就全被

淹没了，洪水甚至很快攀爬到二楼，到晚上10点50分左右，洪水达到峰值，最深处有5米。

但当天洪水最大时，被淹没的不止低洼的沙河市场，还包括沙河市场边上地势较高的地方，贺湘的店铺就在那里。下午5点，沙河市场已经淹了，贺湘的店还安然无恙，看起来也不可能出事，她在朋友圈发了条视频，称自己“很安全，有水，有电”，配了3个勾手指的俏皮表情。

结果下午6点半，贺湘一家正在吃饭，发现水居然涨到了街边。直到这时，他们依然没有警惕，因为当时雨势不大，又没有收到泄洪的通知，一家人还在讨论洪水最高能不能到店外的台阶。晚上7点多，一家人准备提前回家，就在他们离开前，洪水涌进了店里。她和哥哥一开始把整箱的啤酒和饮料堵在门口，排成一线，堆了三层后就去收拾贵重物品。结果大约5分钟后，整箱啤酒和饮料筑成的防线被攻破。

两人又往门口继续垒货，垒到大约第五层，“轰”一下，又被洪水冲垮了。一家人这才慌神了，想从后门离开店铺，在后门处，她和哥哥遇上先行回家却因水势大不得不折返的父亲。3个人原想从楼外的楼梯爬上楼，但店铺西边对着洪水，过来的水流非常急，已经无法走了。平时一步之遥的路变得无法跨越。

无路可走的3个人当时只能紧紧挨在一起，站在后门外大约半米高的台阶上，但洪水很快淹没台阶，又涨到大腿处。这时他们已经彻底慌了，赶忙又爬上贺湘爸爸停在后门边的面包车顶，但是按照当时的水位涨势，面包车顶能坚持多久，谁心里都没有底。平时交通便捷的城市此时被分割成了一个又一个无法相互跨越的孤岛。

洪水中的自救

贺湘和哥哥、爸爸在车顶一直待到晚上11点，依然没有任何办法离开。而水势还在不断上涨，甚至已经没过了脚踝。3个人站在车顶，眼睁睁地看着四台笨重的冰箱、两个收银台，还有许多零碎小商品被洪水一件一件冲出大门。

贺湘的妈妈挨家挨户敲门，快到晚上11点，终于在一个做二手车生意的邻居家找到一条很粗的安全绳，三楼的邻居用绳子把站在车顶的几个人拉上了楼。最后，一家人在社区的安排下，在二楼的一个家具店过了一夜。贺湘从没想过，身在城市，自己有一天还需要这样逃生。

就在贺湘一家拼命想要爬回楼上的时候，也有身处楼上的人在担心。在沙河市场东边，是一个叫沙河佳园的小区，地势比沙河市场略高，但处于同一片洼地。陈昱是沙河佳园业委会的委员，7月1日下午不到2点，他被另一个业主委员会委员叶潇叫上，去堤坝上察看洪水水情。他们从小在这里生活，对洪水的水势有一定把握。叶潇把一根筷子插到堤上，结果才打个电话的工夫，水就涨到筷子那里，而筷子离堤坝顶端的距离是2米。

他们觉得形势不对，跑到传达室拿扩音器，叫上保安，叫了三辆车，通知业主挪车、转移。下午3点多，一名派出所民警也过来提醒居民，这时小区的车已经撤得差不多了。就在民警通知后半小时，水翻过洪水堤坝，陈昱发现车库里住着一位老人，赶紧把这位老人转移到二楼，之后陈昱才想起奔回自己在小区附近的店面。

但当时水已漫过大腿，他的母亲劝他保命要紧，赶快回家。下午6点左右，他又蹚着水准备走回小区，结果刚走到门口，就听见“嘣”的一声巨响，小区的围墙被冲垮了。急水冲过来，瞬间齐腰，陈昱也被冲出四五米远。小区楼房的一层也很快被淹，当时陈昱的妈妈和老婆、孩子还全部在三楼的家里，他本来准备把家人转移到外面安全地带，但现在，他只能先摸着残余的围墙，慢慢爬回楼里再说。

一家人全部被困在家里时，陈昱和妻子只能通过窗口观察洪水的情形，眼看着小区的围墙被彻底淹没。晚上7点多，家中的水、电、煤气都停了，陈昱8个月大的小女儿在发烧，他试图打电话求救，结果信号不好，打了五六遍“110”才打通，对方让他们不要急躁，耐心等待救援，却好久没有回信。

陈昱的手机很快没电了，只好分别用母亲和妻子的手机接着打求救电话，除此之外，在孤立的家中，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后来，“110”给陈昱提供了一个救援电话，但信号断断续续，电话通了又断，最后终于向救援人员说明了地址和被困人数，但依然没有救援人员前来。这时陈昱和妻子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趴在窗口看河堤的水，到晚上11点多，又是“嘣”的一声巨响，江边的工地围墙也被冲垮了，水势再次加大朝小区冲来。而小区内的道路上，已经形成湍急的河流，漂浮着家电、液化气瓶等物品。陈昱已经对救援不抱希望，他安抚母亲，鼓励妻子，并告诉自己，“房子不会被冲垮”。

2日凌晨3点，小区的水位终于缓慢回落，陈昱夫妻俩终于稍微松了口气。然而第二天救援仍没有

来，他的女儿还在发烧，陈昱只好向住在小区地势更高的邻居求救，邻居搞来了一辆皮划艇，陈昱终于把家人送出孤岛般的家。但当时宁乡市大部分地区已经断电，妻子不得不开车将孩子送到乡下的医院，陈昱则划着皮划艇营救小区里的其他老人、小孩。

身家付诸洪水

在家里的那一晚上，陈昱经过了担惊受怕，但最后总算平安无事，但他的店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的店铺在市场边工贸街上，代理保洁产品。工贸街来水时，先往地势低的沙河市场里灌，灌得太满了，水开始往回流，最后退水则是从沙河桥所在的市场西边退出的。这样反复几次，水横着从陈昱的店里灌进来灌出去好几次，所有的货都被卷走了。

因为一直困在家里，陈昱一开始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直到7月2日中午，他刚借楼下邻居的充电宝充了一点电，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一个洗车店老板打来的。那个老板告诉他，他的货物全部从店里跑出去了，跑到大街上，好多人在欢天喜地地捡。但当时陈昱还在用皮艇转移小区的老人和小孩，等到他忙完转移的事情，去店里一看，仓库已经空如也。

他急得话都说不出，跑去派出所报案，但派出所的人告诉他，店门是开的，冲到外面的货被人捡了这事儿，派出所也无能为力，派出所最多能帮他进“捡”货的人那里挽回一点损失。但警察办案是需要证据的，派出所的天网已经停电失灵，指望不上，陈昱又找邻居问是否有当时拍下的照片或视频，结果邻居告诉他，当天自己的智能手机没电了，连电话都是用老人机打的。陈昱挽回损失的最后一丝希望就这样必然地破灭了。而这批货，是他在6月底借了几十万元，和朋友合伙囤下来的，却这样打了水漂。

与陈昱一样，在沙河市场做生意的大多都是本地人，从小生意做起，一点一点做大，到拥有多个仓库和门面。因为是做批发生意，很多商家都会赊账或借钱囤货，一些贵重品类如电器、冻货，店里囤着几十万上百万元的货稀疏平常，在平时，这是极其正常的商业流转手段，但当灾难来临时，却会使商家承受甚至超过全部身家的损失。市场内的多位商家都告诉本刊，根据市场负责人和他们自己的估计，整个市场的损失，保守估计最少有十几个亿。

7月1日，被邻居用绳子营救上楼后的那一晚，

整个店面已经被洗得空空如也的贺湘则一直在琢磨，到底怎么回事，她记得去年宁乡下大雨，持续了很长时间，沱水下游的市中心都出现了内涝，但他们的店铺并没有受影响，甚至1998年大洪水时，店铺所处的位置同样是安全地带。

商家们把事故的一大原因指向黄材水库泄洪，因为在接到通知与洪水涌入之间，只相隔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任何人都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转移货物；另一个原因则指向市场边沱水堤坝的那个缺口，这个缺口比市场西门的沙河桥处涌水量更大，正是因为这个缺口，使得整个沙河市场所处的低洼地带被两股洪水夹击，水位快速上涨。

在现场可以看到，沙河市场地处低洼，比沱水的堤坝低了接近3米，而那段缺口则与市场齐平，成为一个完美的涌水口。陈昱告诉本刊记者，这个缺口是在2015年出现的。而根据公开资料和当地媒体报道，这段缺口是宁乡为了打造滨江公园项目，挖除原有的防洪堤后形成的。施工方曾在公开资料里称，会在洪灾季节设置日常防汛岗位，监控水情，积极应对洪水。但根据市场及周边多位商户向本刊提供的信息，这个项目在挖除原有防洪堤、种植景观树以后，已经长时间停工，并处于无人照看的状态，更没有人在此处进行防洪监测。

但所有事后的复盘都挽回不了商家们的损失了。因为地势原因，洪水在沙河市场停留的时间很长。做厨卫生意的李澜7月2日下午从家里赶到市场时，水仍有两三米，她无法靠近自己的店面，只能站在沱水边的堤上。在那里，她看到有做木材的店主蹚进污水里，想要捞起一些板子，堤坝上的另一些人则在哭泣。李澜后来统计自己店铺里冲走和冲烂的货物，起码值30多万元。因为互联网的冲击，同时因为沙河市场西北角又建起了一个新的建材市场，李澜自家店铺的位置也不算好，30多万对她说来，夫妻俩要不吃不喝挣3年。

到7月7日，天气已经晴朗了好几天，沱水的水位线下降到非常低，但市场里依然到处飘荡着刺鼻的馊味。所有的商户老板都自备了抽水机，抽出地下水，愁眉苦脸地试图翻捡出来一点东西，冲刷干净，摆回空荡荡的货架。但更多的东西都挽救不回来了，整个市场里，华丽的水晶灯，崭新的电器，整箱整箱的酒、零食，整袋整袋的冻货，全都变成了糊满泥浆的残破垃圾，胡乱堆得到处都是。■

（文中贺湘、黄青、李澜、贺雨文、陈昱、叶潇均为化名）



(子杰文彬摄/中新社供图)

张忠培，一代考古人

记者 / 张星云

7月5日，张忠培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从考古大家苏秉琦的弟子，到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创始人，再到故宫博物院院长，他的一生曾有过几种身份，最终都不离做学问的风骨。

2014年，张忠培度过自己80岁生日那天，没有铺张的生日宴会，而是过得非常“学术”。他与曾经的学生们一起开了一个简单朴素的座谈会，讨论他的考古学术思想。学生们给他带来了两本刚出版的书，一本是他晚年带学生们进行的长期研究成果《中国陶鬲谱系研究》，一本是学生们为他编辑的《庆祝张忠培先生八十岁论文集》。

张忠培的家是北京小石桥胡同里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自他1987年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举

家搬到北京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再没有换过地方。如今看来，那是一套拥挤、简陋的房子。张忠培待客和工作的书房非常小，七八平方米的地方除了书柜，还有一张书桌。张忠培自己坐在椅子上，其他来家里见他的人就只能坐在塑料板凳上，再无其他空间。书柜上，地上都堆满了书。书桌不够长，他在桌子尽头又接了一张80年代学生用的小课桌。每次弟子们来看他，心里多少会有些惭愧，因为所有后来在北京工作的弟子们，早都买了第二套房，只有老师一直住在国家分配给他的这套房子里。

弟子高蒙河在最近10年与张忠培联系得愈加频繁。高蒙河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因为对中国考古学史感兴趣，他从2010年起开始经常去张忠培家里，帮老师整理尚未发表的文章，与老师聊一生的经历。他每次从上海去北京，在张忠培家胡



(王岩/摄/新华社供图)

左图：考古学家张忠培（摄于2011年）

右图：1993年6月，由画家袁熙坤（左二）和香港龙马艺廊董事经理金享石先生（右一）共同收集的92件中国古代陶器、瓷器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接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忠培（右二）等文物专家的鉴定

同口的快捷酒店住几天，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与老师整理文件、聊生平，除了吃饭和午休，一般一直聊到晚上八九点。高蒙河为老师整理出了近10万字的生平，编辑了三本新书，以《中国考古学》为主题，分别用《走出自己的路》《说出自己的话》和《尽到我的心》为名，通述中国考古学近百年历史。高蒙河记得，虽然张忠培的书房很小，很多材料因时间的久远都泛黄了，但张忠培可以清楚地告诉高蒙河，在书架第几排第几本书、翻到第多少页，能够看到他曾经重点做的笔记。此外，每次高蒙河到他家之前，他已经泡好茶，并为高蒙河倒好半杯茶，等高来到书房坐下后，他再添成一整杯茶，这样茶水不烫，茶也泡开了。虽然张忠培一辈子不善直接表达自己对弟子的感情，却全都通过其他方式表现出来。

授业解惑

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教授赵宾福与高蒙河一样，都是张忠培在吉大教授考古学时期的学生。赵宾福记得80年代初他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张忠培作为吉大考古学科的创始人，亲自为他们这

些本科学生讲授《新时代考古》和《考古学通论》两门课。在赵宾福的印象里，先生满嘴湖南口音，常被同学们拿来开玩笑。那时没有多少考古教材，但先生讲课特别生动，可以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包括边疆地区的史前史拓展成一个品系。“感觉他视野特别开阔。”赵宾福对本刊回忆道，“尽管他的主攻方向是新石器时代，但他的研究也涉及先秦时代、夏商周三代，甚至关系到秦汉帝国之后的国家形态。”

1985年赵宾福考取了张忠培的研究生。一开学张忠培就给赵宾福规定了毕业论文方向：半坡文化研究。接到这一庞大的题目，赵宾福立马傻眼了，畏惧之下，他去了张忠培家里，告诉导师自己的担心：自己刚20岁，本科期间注重田野考古训练，没有多少理论研究，而半坡文化在当时是一个明星级的题目，不光是新石器时代的研究者，只要是考古学研究者，都知道仰韶时代的半坡文化。当时他人已经发表了很多著作式的考古报告，材料多到惊人。此外，石兴邦、张忠培本人，乃至老师的老师苏秉琦等诸多考古学大家，都写过关于半坡的研究著作，甚至系列论文。“作为一个研究生，我怎么能搞这个题目呢？我怎么能搞出自己的看法呢？”赵宾福向

老师提出。张忠培回答他：“那我问你个问题，你以后到底想不想从事考古工作？”“想。”“那你想不想当一流学者？”“肯定想。”“那行，你想要当一流学者，那你就必须跟一流学者较量，如果你不去研究一流学者研究的问题，不在他们的观点、论文基础上再提出疑问，你怎么能够成为一流学者呢？”

这种对话场面，其实张忠培自己也经历过。1956年，张忠培从北京大学创办考古专业本科毕业，作为副博士研究生，师从民族学、人类学大师林耀华和一手创办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并带领本科生在陕西华县、渭南做区域系统考古发掘。在华县元君庙遗址，张忠培发现一处仰韶文化墓地，并在1959年写出了《元君庙仰韶墓地》论文的初稿。他套用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头一次从考古学上揭示了中国古代确实存在母权制时代。张忠培得意地拿着论文去给自己的导师苏秉琦看，老师看后却没有任何表情，而是要求张忠培对墓地做进一步分期研究。

三四年过去了，到了1964年，张忠培试过了各种办法，还是没有完成研究，于是他去找导师陈述困难，希望说服他，分期不可能。苏秉琦沉下了脸，依然坚持让张忠培继续分期研究。“望着老师高大的背影在我眼前消失。当时我想，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天两头受批判，他连党员都不是，竟然批判他是修正主义者。但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他还这么重视这批材料。这个老先生多么执着啊，对考古事业这么忠诚。接着我就想，科学世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要是万一分出期呢？我没分出来，我这辈子就失掉了一个追求真理的机会，而这个真理本应该我来发现。”张忠培后来回忆道。

那一次，张忠培两天三夜没有睡觉，终于成功完成墓地分期。他一改以往考古以一座房屋或一座墓地为研究单位的做法，而是将每排墓葬解释为一个氏族墓地，由此确定了墓地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性质，《元君庙仰韶墓地》也因此成为研究中国史前氏族组织的典范。

张忠培从此继承苏秉琦的衣钵，开始考古学遗存的社会学式解析。此外他还领悟到，当时流行套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分析的苏联考古学体系的“以论带史”存在问题，应该以实地考古资料建立理论，即“论从史出”。由此张忠培建立起自己的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他曾说，我们见到的历史，是史料表

述的历史，因此只能通过对已有史料和不断发现的新史料的研究，与材料俱进，让材料牵着鼻子走，才能摒弃先验论，是接近历史的唯一途径。为了研究者不带自我立场说话，真实地代研究对象说话，就需要在考古遗存、人、时间、空间这四维关系的前提下，对它们进行客观的观察，并通过比较，搞清楚它们之间自身实际存在的或是文化上的，或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差异、矛盾和关系。张忠培将考古学的真谛和目标定为“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把死人说话”。

可以说，老师苏秉琦的严格要求，最终让张忠培超越了那个时代，研究出独特见地的学术理论，并成长为成就颇丰的考古学家。也正因此，在分配到吉林大学任教，并于1972年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之后，张忠培同样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们，培养出了众多考古学专业人才。

张忠培经常教导学生，应该坚持“三不写论文原则”：不为会议写文章，不为职称写文章，不为稿费写文章。

在张忠培的影响下，“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的基础”成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重心。他曾说：“文章是在书房里写出来的，但问题只能在田野里发现。”无论在北大还是吉大，张忠培都喜欢带着学生去田野实习。他告诉学生们，一个优秀的考古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田野考古工作者，否则，不长时间蹲考古工地，不亲自依靠技工搞考古发掘，就难以熟悉田野考古理论，进而难以读透考古报告，更无法从报告中找到问题，甚或不能使用报告材料进行学术研究。

学术求真

1987年，张忠培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变化——从长春举家搬到北京，离开工作了25年的吉林大学，就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这就相当于转行了，在行业内，考古学与博物馆学是两码事。”高蒙河对本刊说，晚年张忠培曾向他回忆过当时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前的犹豫心情。彼时张忠培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15年，被考古界视为一位纯粹的学者，而如果去了故宫，他将不能再搞教育、做学术，而是转行为行政管理。但张忠培还是接到了任命书。1986年6月，他带家

人搬到北京，分配的住房还没到位，他就躲进宾馆，北京的熟人一个都不敢见，生怕别人说他放弃学术来北京当官。

张忠培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第四任院长。他提出学术才是故宫的根基，将建筑考古、古建学术研究与文物保护结合，故宫研究院和考古研究所相继成立。主持故宫博物院的经历，让张忠培特别关注文物保护。后来，他先后被任为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长江三峡工程验收委员会委员、南水北调工程考古专家组组长，负责全国各地重大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他主张“国保”考古单位一律不予挖掘，“省保”单位基本不挖掘，他认为现在的考古学手段不能采集主要信息，应该留给后人慢慢研究。他建议全国各地的考古发掘应该严格按照考古学规程进行，切忌公园化遗址。

1991年，张忠培不再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熟悉他的朋友和学生们都期待，结束了行政管理工作的张忠培可以焕发学术上的第二春。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现在总结他的学术生涯，在吉林大学的二十几年，他将很大精力放在考古学科的人才建设上，科研学术成果并不是很多，《中国北方考古文集》上的二十几篇文章，几乎是他那时的所有作品。”赵宾福对本刊说道，“而在他人生最后的二十几年里，写的东西是吉林大学时的多少倍啊，并且正是在最后这段时期，他由考古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攀升到思想研究和文化研究。”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秉琦提出考古学中区系类型论的实质是文化谱系论，而后张忠培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认为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是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1994年，他写成《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开始从以往通过对墓地的解析探讨社会基层组织，转为文明研究。2011年，77岁高龄的张忠培再次发表《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一文，全新阐释了古今社会文化的演进规律，在谱系论基础上，形成了“文化论”。他指出，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到秦汉帝国的先秦历史过程，经历的是一条“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发展道路。“文化多元一体”说的是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多元一体，“国家一统多元”讲的是统一国家内的多元考古学文化。这种文化谱系结构的考古学文化，是文化杂交的产物，遵循“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进规律向前发展。因

在张忠培人生最后的二十几年里，他由考古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攀升到思想研究和文化研究。

此他得出结论，文化演进规律是实现文化更新、建设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一年后，在《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一文中，张忠培提出把良渚文化的居民划分为四大等级，其中握有军权和神权的神王处于最高等级。良渚文化社会政权性质是神王国家，即政教合一国家，神权最高，军权居次，军权是社会统治权力的基础。他进而对中国国家形态的演变过程做了至为详细的考察，形成“国家论”学说。

在他的理论中，青铜时代前是神权与军权并重的神王之国形态；进入青铜时代后发展出军权凌驾于神权之上的王国政权；商晚期到周，步入多民族国家管理与统治形态；东周至秦确立为皇朝帝国政治体制；辛亥革命后走上了党治国家道路、党国政治体制。

自此，“三论”成为张忠培一生最核心的考古学理论，也同样可以视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史的发展轨迹。“谱系论”是关于如何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的理论，“文化论”是关于如何对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进行研究的理论，“国家论”是关于如何对国家起源、形成及其发展阶段和各阶段所表现出的特质进行研究和探索的理论。

“对中国来说，考古学是输入的舶来品，人们将考古学输来中国，用它的一般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中国考古遗存，就有一个用这考古学的一般理论、方法、技术同中国考古遗存及研究中国考古学遗存的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结合得不好，则考古学是考古学，中国考古遗存还是中国考古遗存，依然是两张皮，没有成为中国考古学，只有结合好了，才能长成为中国考古学。”张忠培生前曾在新书自序中写道。

高蒙河说，老师张忠培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通过实践和方法，形成“中国考古学之道理论”。■

（感谢奚牧凉对本文的帮助）



海外置业：与中国楼市不一样的投资思维

记者 / 吴丽玮

当中国房地产投资者将目光转向海外时，那些来自国内楼市的经验和判断力都需要刷新后重新累积。海内海外，天壤之别。

去香港买保险为何火？

“这两年内地人在香港买保险实在太火了。”香港康宏金融集团联席董事陈思告诉本刊，“去年上半年香港保监会的数据，内地赴香港投保的保费高达

301亿港元。香港保险每年新增的客户大多来自内地，内地人之所以选择来香港买，除了逐渐看到香港保险的优势以外，主要是因为人们希望合理配置全球资产的意识大大增强了，尤其是银联通道的关闭，更是把一些潜在需求大大刺激了起来。”

2016年10月28日下午，香港保险圈内部开始流传：银联将在次日零时关闭香港保险业务消费通道。当晚香港几家保险公司随即延长了营业时间，大多从深圳赶来的内地投保人在保险公司门前排起了长队。

与内地保险相比，香港在计算保费的时候预定



左图：美国华盛顿州麦地那市一家房产中介公司的销售人员带着北京客户韦宏斌观看一处待售的房产

右图：中国买家吴珊珊（右）和美国伊利诺伊州当地房地产经纪人 Lisa 一起查看房地产清单

利率比内地高，保费低、保额大、涵盖的疾病种类多，除此之外，香港保险分红更多，这是内地同类保险没有的优势。尽管买香港保险需要本人亲自去香港购买，内地保险在保障范围上正在逐渐缩小同香港的差距，而且从理赔的便利性上说，香港并不占优势，但去香港买保险仍然成为很多内地人的选择。“香港保险还有一个优势，就是采用美元保单，单纯从外汇投资的角度来说，买香港保险也是个很好的选择。”陈思说。

陈思的工作主要是为客户进行全球资产配置，香港保险是这座金字塔中最基础的一部分。“在我们看来，手中除了留有应急用的6~24个月的生活费用外，其他的资产首先应该放在安全保障类项目上，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购买保险，以前内地人买保险的意识不强，但补偿性的重大疾病保险其实是一个杠杆极高的理财项目，孩子3岁以前投保，每年2000多美元的保费，缴25年，保额是30万美元，保额是保费的5倍之多，非常划算。”陈思告诉本刊，保障类投资应该占到家庭总投资的20%~60%。“只有在保险上把保额做足够，才应该继续去考虑稳健性和进取型的投资项目。但最近几年国际流行的全

球基金定投波动性较大，所以目前最主流的进取型投资方式在以投资为目的的海外金融房地产领域。”

陈思今年32岁，从去年开始，她不断涉足海外房地产市场，连续在伦敦和多伦多买了公寓进行投资。“我自己做这个，当然有很多机会可以去投资，但是前几年我一直在把家庭资产配置的基础打牢。”陈思是山西人，除了自己在香港和内地两头跑之外，家人全都在内地生活。前几年，她在山西和离香港不远的珠海分别投资了房产，又为还没读幼儿园的孩子请了一个国际互惠生，每年费用约10万元，这个互惠生除了在日常生活中给孩子提供浸泡式英语的环境，也承担了保姆的部分职责，另外她还要为自己的父母每年安排一次出国旅行，每年冬天，全家人还要赴港生活3个月，这也是每年一笔不小的固定支出。孩子出生后，她毫无例外地在香港投保，“我认为给孩子保重大疾病险足够了，另一个是保险型的教育储蓄”。从一开始的100万美元的保额，追加到现在的300万美元，她每年给孩子买保险的保费是2万美元左右，另外教育储蓄1万美元。经过几年的资金积累和安排，她觉得现在是有余力进行更高阶投资的时候了。



【图文】

左图：提供海外置业专家服务的互联网产品“及优”事业部总裁黄秋子

右图：提供移民服务的“出国邦”CEO 杨平

“普遍认为，加拿大和英国的金融房地产市场是全球最稳健的市场。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地方海外投资者比例不是很高，澳大利亚的海外买家占到了60%，这意味着当地的房地产泡沫会很多，投资风险很大。”陈思在伦敦“距离金融城走路10分钟”的市中心买了一套标价60万英镑的期房公寓，首付40%，还贷采用还息不还本的方式。由于当地的租售比能够达到3.5%~4%，租金可以完全覆盖每月的还贷金额。“现在英镑兑人民币的汇率差不多是9比1，相当于以历史上6折的价格在买房子。这套房子我的主要目的是炒楼花，2019年交房前卖出，至少从目前看，房价已经比我买的时候涨了10%左右。”她投资多伦多的公寓则以长期持有为主，“因为我喜欢多伦多，以后有让孩子去那里读书的打算”。多伦多的这套公寓40多平方米，总价在220多万元人民币，首付35%，贷款利率非常低，只有2.7%，租售比相当高，可以达到5%~6%。等她买完不到半个月，多伦多突然颁布了海外限购令——海外购房者需要加收15%的海外购置税，这让她觉得特别幸运。

此外，她还大胆地在华盛顿以5万美元的价格

投资了一块生地。生地指的是美国还没开发的一级农业用地，大型土地集团对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除了预留出5%~10%的土地自己使用外，其他的土地分割成不同的单元向投资者出售。几年后，这块生地将转为二级工业用地，即熟地，土地价格上涨区间一般在7%~20%，投资生地者从中赚取差额利润。“土地投资最大的风险是土地的退出时间，但我认为这块地很保险，因为它距离白宫只有30公里。”陈思说。

“除了房地产，前几年内地基金的回报率都能高达10%，因此始终对海外投资的关注度很低。”陈思说，但是随着内地投资出现的一些风险和房地产市场的规则限制，包括她在内的投资者对海外的关注度则越来越高。3年前，陈思买过国内某大型教育集团的一种固收类产品，没想到最后100万元打了水漂。“正是因为觉得这种背景的大集团实力雄厚，而且所有的文件都是合法的，没想到原本要投入生物医药领域的钱，最后被挪用去上海做了房地产，全赔了进去，但因为这个集团的背景太深，至今在内地都很难立案侦破，这让我对内地的金融管制完

全失去了信心，即使后来追查到对方提供了虚假信息，但是仍然遇到监管的严重困难，像那一年还出现了一些银行虚假理财产品的案件，谁也想不到银行的理财产品都会有假，整体上人们的投资信心就降低了，没有了那些虚假的高回报理财产品，投资海外的安全性优势就显著起来了。”

在前年和去年，投资房产获得欧洲身份的业务非常火爆，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以及马耳他、塞浦路斯等欧洲小国，纷纷打开了移民窗口，花几十万欧元在当地买一栋房子，就可以获得该国的护照或永久居留权，享受自由出行欧洲和子女在欧洲读书的待遇。尽管人们对于这种“抄底”投资的价值有不同看法，但欧洲投资移民确实能满足一些人的需求。提供移民服务的“出国邦”CEO 杨平就在塞浦路斯买了一栋别墅，拿到了该国的永居身份，他告诉本刊记者，通过买房获得欧洲自由出入的权利，是中国富人的向往自由迁徙的“消费升级”，按照他自己目前的情况来说，欧洲移民的门槛最低。“移民我已经考虑了很多年，但因为我在国内处于创业阶段，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离开中国去国外蹲移民监的。现在欧洲打开了移民通道，我比较了一下，塞浦路斯买房政策最为宽松，房价也有上升趋势，而且不需其他要求就可以拿到身份，所以符合我的移民要求。”

留学、移民与买房

与其他投资产品不同，房产除了可以投资增值，更重要的是它有不可或缺的使用价值，在海外置业时，这种需求同样概莫能外。

提供移民服务的亨瑞集团高级副总裁王茜告诉本刊记者，在该公司所服务的客户中，超过90%的移民愿望都与子女教育有密切关系。“有客户来做留学咨询，我们会帮他们算一笔账，留学生的学费和投资移民的费用相比相差不大，而且美国在不断紧缩H-1B签证，即便找到了工作，想拿到H-1B工作签证也要全凭运气，未中签的往届生不断累积在抽签大军里，以后留学生留美形势会越来越严峻。我们会跟家长说，如果你希望子女留在美国，那不如以家长作为主申请人办全家移民，拿美国身份。”通过全家移民实现子女海外读书的愿望，这就涉及各国规定不一的移民监问题。几大主要移民国家，都对申请永久居留权和申请入籍的人有每年时间不等的登陆居住要求，从留学初衷到全家移民，最终就

会衍生出买房居住的问题。

提供海外置业专家服务的互联网产品“及优”事业部总裁黄秋子曾经在曼哈顿有丰富的金融咨询和地产行业经验，她告诉本刊，曾经给纽约的大学本科一年级中国留学生算过一笔账，入学时如果买一个一居室房子，4年之后卖掉，最后比4年租房能节省几十万美元。“当然，也要看这个城市是不是具有投资价值。纽约的房价受各种因素影响的概率比较小，在次贷危机时，美国整体的房价下跌了10%，而纽约的房价只下跌了2%~3%，而且是美国房价最早往上涨的城市。纽约的房子经过这样的压力测试，证明是很保值的。”黄秋子说，自“二战”以来，全美房价的复合增长率只有2%~3%，与GDP增长一致，因此只能抗通胀，但没有增值的可能，但纽约的复合增长率是7%~8%，甚至可以达到10%。

2008年黄秋子来到纽约读经济系硕士，全系30个人，8个是中国人，第二年中国学生就变成了15人，之后人数越来越多，“2014年，我参加了纽



(张雷摄)

约大学在北京、上海、广州的三场留学生宣讲会，到场的一共有 1000 多人，其中至少有六七百人是当年录取的本科学生”。这些让她意识到中国留学生是纽约房地产行业一个潜在的巨大群体。

福特汉姆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 一年级学生尚宇晨刚刚在曼哈顿敲定了一所公寓。他在时代广场附近租了一年的房子，觉得很划算。“30 多平方米，每个月租金 2400 美元，相比美国其他州要贵很多。而且在美国租房和买房的程序一样烦琐，不是看中了给钱就行，要给物业委员会写申请信，填 50 页的资料，还要有 5 个老师或当地亲友的推荐信，准备好以后至少要等一个星期才能被批准。”读大学前，尚宇晨已经在长岛读了 3 年高中，2014 年，他的爸爸获得了 EB-1 杰出人才移民签证，一家三口拿到美国绿卡，考虑到以后会长期在纽约学习和工作，以及父母赴美时的居住需求，家人一直有给尚宇晨买房子的打算，直到他读哪所大学最终确定，买房终于提上正式日程。

“4 年前纽约的楼市还处在低迷阶段，这几年只涨不跌，现在房价已经比最开始涨了近一倍。”纽约的房地产市场需求很旺，尤其是每年暑假期间的 5~8 月，是房地产最热的时期，为此，尚宇晨和妈妈提前在 4 月份开始看房，在一个月里集中看了曼哈顿的 20 多所房子，但看中的几套房子竞争仍然十分激烈。第一套公寓是母子俩最满意的，尚宇晨告诉本刊：“美国人对房子的要求和中国人很不一样，美国人不看重平米数，但看重公共设施，比如楼顶能不能晒太阳，公共办公区环境怎么样，楼下有没有游泳池、健身房等等。美国人的另一个需求是景观，他们要求窗外的风景很好，比如能不能看到哈德逊河和中央公园，这些都是纽约公寓最大的卖点。”这套 80 平方米的房子在配套和景观方面都很出色，标价 90 万美元。美国与中国二手房市场的交易规则完全不同，抢手的房子不但没有还价的空间，客户们还要通过自己的房产经纪人加价才能参加竞拍。通过卖方经纪人透露，这套房子一共有 10 个竞争者，第一轮，尚宇晨出价 91 万美元，“卖方中介说，价格还可以，说明我们的价位不高不低”。因为太喜欢这套房子了，他们决定追加到 95 万美元，“一般加价都是 1%~2%，按说我们已经加了 5 万美元，应该百分百拿到，没想到有一个犹太人不断在加价，最后没能抢到”。

第二套房子性价比比第一套还高，位置更靠城中心，但离地铁稍远，也是 80 多平方米，标价

88.9 万美元。尚宇晨加到 89.5 万美元，这个价格让他有些后悔，“后来我和妈妈商量，如果能以 91 万的价格抢到，还是非常划算的”。两人一犹豫，错过了 offer 截止期，最后这所房子以 90 万的价格被别人买下。“如何加价是门学问，因为不知道别人会涨多少，很难拿捏。每一次竞价过程都挺熬人的，尤其是我妈，有了两次失败之后，挺受打击的，这和国内买房的感受太不一样了。”尚宇晨说。

他们最终买到了一套在市场上已经挂牌一段时间的房子，显然不太抢手。房子在洛克菲勒大厦附近，更加靠近商业区，面积也有 100 多平方米，但是这些并不是美国人所青睐的要素，这座公寓楼没有健身房，窗外没有好的景致，但妈妈回国时间临近了，已经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最终他们以 80 多万美元的价格买了这套房子。

在美国买房子过程严谨，比在国内手续要烦琐很多。以前中国人在海外买房，怕麻烦，往往是拍出现金全款购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使用贷款，并且熟悉了贷款的流程，尤其是准备在美国长期居住的人，贷款可以积累自己的信用分，这在美国生活非常重要。如果选择贷款，在竞价买房以前就要与银行确定贷款意向。尚宇晨告诉本刊，虽然美国人可以使用信用贷款，但妈妈在美国几年的信用卡刷卡记录和美国从小就开始累积的信用记录不可同日而语，银行评估后只能贷款 16%，并不划算。

初到美国的中国人通常要以国内资产作为贷款抵押，这也是最近几年美国才逐渐开放的政策。像花旗和摩根大通银行这样的美国本土银行，基本不支持客户的境外资产，但像华美银行、国泰银行这样的非本土银行却有灵活的抵押与还款方式。尚宇晨通过一家外资银行获得了房款 60% 的房贷，分 30 年还清，因为房价高企的曼哈顿鼓励海外买家前来投资，境外资产抵押，在前 5 年的利率比抵押本地资产还要低一些，为 4.5%~5%，之后就按照市场浮动利率来还，跟当地人一样。

尚宇晨拿着银行同意放款的预批信才能去竞拍房子，而要获得这份同意放贷的银行许可，对中国人来说也有些麻烦。“有些银行要求你将 40% 的首付房款打进该银行账户里，有些银行只要求存房款的 10% 就够了。现在中国有外汇管制的问题，我和妈妈各开了三个银行账户，找了好几个亲戚，每人每次 5 万美元这样分别往几个账户上转，一个账户上最多 10 万，转多了转得太密集都容易被盯上，显然，只要 10% 房款的银行更适合我们，它们只要你出示

国内的存款、房产或者股票等资产证明就可以了。”

除了与银行和房产经纪人打交道，买房子还要聘请律师，由律师来负责审核大楼和卖家的合法性，以及房屋质量是否存在问题、物业是不是能维持管理等等，最终给客户出一份评估报告，这跟国内相比，安全性要强很多。尚宇晨和律师从他们移民开始就一直在合作，房产交易中的律师费是1000多美元。另外，和租房一样，也要跟物业管理委员会打交道，填写50页的表格，你需要联系自己的会计师，出具两年的报税记录，还要出具资产证明，告知买房目的、居住人数、是否有宠物，有宠物的话，要有齐全的宠物检疫证明，以及屋内和公共设施的保险单等等，也是相当麻烦的一件事。“但物业委员会一旦通过了你的申请，就会全权保护你作为房东的利益，即使你破产交不了每月1800美元的房屋管理费和税费，任何人都无权将你赶走。”尚宇晨说。

在经历了激烈竞价，并提交了各种不厌其烦的表格之后，两个星期内卖方律师会发来购买合同，双方签约，40%的首付款先打进双方律师的公共账户里，等银行贷款审批下来，物业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之后，8月份，房屋终于可以正式交割了。

如果是给读大学的孩子买房，考虑的条件要相对单纯一些。如果让孩子在海外读中小学，作为中国的家长一定是要考虑学区因素的。传统的被中国人推高学区房房价的代表当然是在加州，而最新的一个市场则是西雅图。

不只是学区房，西雅图的整个楼市都是美国在近几年异军突起的一个新兴市场。原本的三线海边小城凭借近些年在互联网领域的产业布局，吸引了包括微软、谷歌、亚马逊等高科技巨头进驻，无论是经济活力还是人口规模都有了巨大的增长。“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西雅图，中美签署了高科技合作协议，这给很多中国人创造了在西雅图工作的机会。”黄秋子向本刊分析道，“西雅图没有州税，当地人的收入已经和纽约这样的一线城市差不多了。这里距离温哥华开车只要两个小时，房价却只有温哥华的1/3。而且这里是距离中国最近的美国城市，甚至包括《北京遇上西雅图》那部电影，也在中国打响了西雅图的知名度。这些因素都导致其成为华人置业的热点，这里绝对是近几年全美房地产涨幅最大的一座城市，有的人买房一年多时间，房子就升值了30%~40%，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想象的。”

4年前，李璐在西雅图买到了自己心仪的学区

房。她买房的过程其实也是修正自己对美国学区房认识的过程。她有亲戚在西雅图定居，帮她介绍了一个华人经纪，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买最好的学区。“经纪人说，公认的最好学区是贝尔维尤(Bellevue)，学区里的几个高中排名都在全美前20名。但经纪人并不建议我买这个学区，这些学校最开始是因为有很多韩国人、日本人和犹太人，所以成绩很好，现在又来了中国的内地人、台湾人和印度人，成绩越发好起来了。他告诉我说，好成绩是靠亚洲人擅长的恶补得来的，学生的课业负担特别重，十一二岁的孩子半夜1点钟才能写完作业，早上6点钟又要起床上学，可是当地人的孩子每天都在参加大量的课外活动，有着很幸福的童年生活。我记得经纪人有句话让我印象极为深刻：‘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这么辛苦地读书，为什么不留在北京上学呢？’”

李璐告诉本刊，在跟经纪人交流的过程中，自己的想法慢慢就变了。“说实话，贝尔维尤的中国人太多了，但我更愿意居住在白人社区里。而且这一区的房价非常高，开车二三十分钟以外的地方，同样的价钱就能买到两套房子。”最终她选择了在西雅图的卫星城柯克兰买房，那里的学区不是最顶尖，但她选择的社区里邻居的受教育程度很高，“很多都是波音的工程师，或者是医生”。这所房子刚刚挂牌两三天，但一下子就接到了七八个申请表，“这里面至少五六个都是华人”。李璐当时还在国内工作，眼看着回国的日期快到了，她叮嘱经纪人，无论如何都要帮自己拿下这套房子。“经纪人给我想了很多办法。这套房子标价52万美元，我的意向是加到54万美元，但我要贷款，跟全款比没有优势，经纪人建议我在放贷之前，给卖家支付房租，于是我又追加了一个月的房租，并且在申请表上诚恳地介绍了我家的情况，包括我们夫妻的工作背景、孩子的教育情况，希望以此能博得卖家的好感。”幸运的是，李璐真的拿到了这套房子。她后来选择去加拿大生活，西雅图的房子一直在出租。“现在房价已经涨到了80万美元，卖完第二个月我就租出去了，租金是2500美元，现在涨到了3000美元。”

无法照搬的楼市经验

今年初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7中国高净值客户海外置业展望》称，截至2016年5月，中国内地总资产千万元以上的高净值人群数量约134万，总资产亿万以上的超高净值人群人数约8.9万，有接



中国买家在悉尼郊区一处待售房产外排队看房

近一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将海外房地产投资作为最主要标的，他们平均拥有 2.3 套海外房产，且拥有 4 套及以上海外房产的人群占比为 15.6%。“分散风险”是中国高净值人群购置全球房产的最主要原因。但在海外投资买房究竟能赚多少钱？

“很多人在国内房地产市场上 10 倍、20 倍地赚到了大钱，想当然地以为哪里都涨。到洛杉矶一看，这么好的房子，居然这么便宜，毫不犹豫地就要买，但是美国的税费要比国内高很多，一年涨幅不到 10% 的话很难赚到钱，但涨幅在 10% ~ 20% 的房子在美国是很少的。”在洛杉矶地产行业有丰富投资经验的孔先生对本刊记者分析道，“另一个不能忽视的是维护成本。有些人贪便宜，买带巨大草坪的别墅，但美国人是要每星期打理草坪的，如果你不打理，会被邻居举报。那些房子长期空置的中国富人，需要请人专门来修整草坪，别忘了，在美国人工成本是最高的，即便是请最便宜的墨西哥人，光上门费就是 100 美元左右，花园比较大的话一个月要花好几百美元。另外还有你的水电、屋顶维修、州税、保险等等，都是需要考虑进去的成本因素，一座 100 万美元的房子每个月的税和保险大约在 3 万美

元左右。我的一个朋友，在国内资产非常雄厚，几年前在洛杉矶海边买了一套几千万的顶级豪宅，但他们一年来住不了几天，房子长期空置，每年的维护费用也要数万美元，时间长了就变成了一块烫手山芋，想转手出去非常困难，很难找到租客，能买得起豪宅的人又很少，而且卖房还要付 6% 的佣金。”

中国人在国内市场上汲取的经验在美国很难奏效，孔先生同样犯过类似的错误。十几年前，他在北京西四环投资了一套高档住宅，2009 年，房价翻了 3 倍。“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肯定到头了，于是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在自己当时住的圣地亚哥投资了几个房子。总之我犯的错误就是拿北京和美国来相比，圣地亚哥的房价这几年根本就没有涨，虽然租售比高，但是很难租得出去，最后只好赔钱卖了。可是再看北京，我当初投资的那套房子早已是天价。”后来他搬到了加州生活，尽管这里涌入了大量的中国移民和投资者，但他依然不觉得美国房地产市场是可以和中国相类比的。“在美国的中国人从总体数量上来说还是少数，洛杉矶价格上涨比较快的都是华人聚居的几个小城市，中国人为了生活便利聚集在一起，美国人慢慢搬走，这里变成

了很嘈杂的地方，未来接盘那些房子的也不可能是美国人，只会是新移民。”

另一个与国内差异巨大的是房产经纪人的地位。在美国买卖房屋几乎无法绕开经纪人，尤其是对于海外买家，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对经纪人的依赖程度更高，几乎每个采访对象都会提到，买房过程中，经纪人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几年前，张美因夫妻俩办了美国的投资移民，正式登陆前就开始着手买房。来美国看房前，她在网上联系了一些华人经纪，但总体情况让她并不满意。“我跟经纪人说了自己的需求，我没有孩子，不需要学区房。我也不太喜欢华人聚居区，在美国，华人集中的地方多是在火车站或者市中心，都不是特别好的地方，我希望选择一个比较安静的海边白人社区。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已经表达得很明白了，但是华人经纪仍然带我看的是华人区的学区房，他们会跟我说，除此之外，他们可以带我去看比弗利山和好莱坞的房子，可是那些地方都是豪宅啊，根本不是我们消费能力范围内的，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房子去哪里了，他们为什么不给我介绍呢？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每个少数民族在美国多多少少都是有局限性的，这些华人经纪所掌握的资源主要集中在华人聚居区，所以来看去看都跳不出这个范围。后来我换了白人经纪，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奶奶，她手里掌握的资源就完全不一样，提供的房子确实是我们所需要的，通过她很顺利就买到了心仪的房子。”

在中国，房产经纪人除了掌握比较丰富的房源外，在保护买卖双方的利益方面几乎无所作为，能够提供的专业意见几乎没有，因此饱受诟病。于是很多人到了美国依然带着负面情绪去与经纪人接触。西雅图房产经纪人罗平在美国已经生活了30多年，1984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92年在南加州大学计算机专业获得博士学位，他原本在硅谷做软件工程师，后来又陆续做过咨询和培训的工作，在3年前，决定做一名房产经纪人，因为觉得这个职业能够实现自己“想做一些事儿，但不想给别人打工，又不想开公司那么麻烦”的愿望。

他告诉本刊，一个职业的房产经纪人并不是只把房子卖出去就够，而是要为买家挑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房子。“有的中国客户非常强势，因为在中国中介的地位非常低，因此也很提防我们，生怕透露了自己有多少财产。这在中国行得通，因为经纪人无论如何都会劝你说，咬咬牙把房买了吧，但我觉得这非常危险。亚洲人买房喜欢感情用事，有时候

出特别高的价钱，过后又要后悔。尽管他们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经济能力，但有时你能看出他们想出的价钱是他们承受不起的，有一次我急了，一定要让客户把自己的所有资产拿出来给我看，国内的国外的，恨不能把钢镚儿都数出来给我，我说这怎么行啊，太危险了，你绝对不能花这么多钱买房子。在美国，首付之外手里要留有一年的生活费，以及6~12个月月供的钱。”

一个职业的经纪人会有自己明确的界限。张美因非常感谢帮她买房的那位白人老奶奶。“有一次我看中了一栋房子，我的经纪人不明说，但会不断提醒我，你要考虑一下楼梯的问题。那所房子楼梯特别多，一共有四层，我的经纪人说，‘去厨房要下半层，去厕所要下半层’。我们一想，是啊，每天要去那么多次，上下楼梯会很麻烦，最终选择了放弃。其实这所房子非常不错，但挂牌一段时间都没卖出去，想必很多人考虑到了楼梯的问题，经纪人很冷静，能够客观地看待房子的问题，对你做出善意的提醒。”在海外买房时，买卖双方都是可以退到幕后的，尤其是卖方，往往不与客户见面，由经纪人来接受买家提交的offer，但他的权责非常有限，一个有职业操守的卖方经纪只有接受offer的权利，不能给卖家做任何决定，客户试图通过讨好卖方经纪人来实现买房目的应该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海外置业的顺序

在黄秋子看来，尚宇晨买房的经历是一个很标准的国人海外置业路线图。对于第一次在海外买房的人来说，买公寓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公寓管理完善，业主的麻烦很少，“地基、屋顶、锅炉都有专人打理”。尚宇晨未来也打算在长岛买一幢别墅，“像美国人一样，工作日住在城里的公寓里，周末回别墅度假”。有了置业经验之后，面对风险的能力增强，买别墅也同时拥有了土地，但业主自己需要处理的问题也大大增加了。“更资深的投资人会选择买旧房，自己翻修。”黄秋子说，“这需要很丰富的经验，既能够判断房子是否有翻修增值的空间，同时又要具备翻修的能力。”最高阶的投资是买地。因为熟地很难抢到，中国买家有些会尝试去做生地。“做生地的人对区域政策要有很深入的研究，比如一块生地原本的用途是建设公共设施，但有些人能通过周边房子有改造升级的空间，来赌这块地未来会改为商业用途。这是很高级的玩法，往往也会伴着一一些内幕

消息在里头，是绝大多数人都碰不得的投资方式。”黄秋子说。

在加拿大生活近30年的资深投资客房崇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海外投资人，买旧房翻新就已经是一件需要有广泛经验和丰富阅历才能够企及的房产投资门类。出国前，房崇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1994年，在加拿大有了一点积蓄后买了第一套刚需房，从此开始了自己倒房子的传奇经历。

当时他们全家在汉密尔顿生活，在2月雪最大的时候，看上了后来买的房子。房崇告诉本刊，当时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非常萧条，这栋房子在圣诞节前上市，但整个冬天都没卖出去，当时自己的经验简直太不足了。“当地人是极少会在冬天买房的，因为雪盖在屋顶上看不到底下的状况，等雪化之后才发现，屋瓦已经到了该换的年限，窗户木框油漆剥落，需要整体换新。”加拿大很多房子都房龄很长，这所房子建于1960年，买了房，必然面临着维修的方方面面。为了省钱，房崇开始自己学着维修，后来又逐渐有了设计的能力，在修房子这件事上乐此不疲，从一个文人彻底变成了一个建筑工、手艺人。

第一次换水龙头时，没有技术基础，很快下面管道爆裂，水流喷涌从厨房一直淋到地下室；为了美化房间，贴上一些过时的墙纸和花边；因为不会拆带水池的下柜，只敢把上半截换成新的，致使橱柜看着不伦不类……房崇在第一所房子里的实验导致5年后卖房时房价受到牵连，不升反降。几年之后，他们家的经济状况不断好转，也曾投资过其他的房子，有小型公寓，也有群租房，因为房租便宜，所以打交道的都是当地的底层白人，有拖欠房租的无赖，还有贩毒的瘾君子。“安大略省的法律是充分保护房客的，房东要负责打扫房间、倒垃圾、铲雪割草。为了省钱，我们一家三口齐上阵，遇上拖欠房租的房客，房东也占不到多大便宜，从宣判到执行拖得时间很久，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甚至还有恶劣的房客不顾一切跟我们作对的，我耗不起，只好选择把房子卖掉。”房崇说，靠租房赚钱并不那么容易，他最感兴趣的还是挑选社区里的“洼地”，改装后出售赚差价。

房崇在20多年的时间里经手了不下20栋房子。他的经验除一部分来自各种痛苦的教训外，绝大多数是在雇人装修时，自己作为监工时刻盯着，从而偷师了手艺。为了省钱，他请了一个性价比高的华人包工头，但这些人都不會英语，他通过帮他们翻译说明书，并与政府检查员打交道，获得了不少装

修知识。华人包工头包工不包料，材料需要房崇亲自去市场上采购，他因此熟悉了各种材料，在各大建材商店里可以在百万零件中迅速找到需要的那一个。最初装修时，房崇完全要靠雇人来装修，加起来花费大概有十几万美元，后来逐渐加大了自己动手的比例，到近几年变成了完全由自己设计施工，土木水电全都信手拈来。

房崇原本是开店做生意的，装修房子只是副业，后来生意不景气了，索性关店专心倒腾房子。这些房子里有两栋赔了钱，其他都赚了几万加元不等，算下来家庭的总收入相当于当地中产阶级的中上水平，虽然跟国内通过炒房暴富无法相提并论。

房崇告诉本刊，每一次买房，他都会让经纪人查清这所房子过去的交易历史，以及同一条街上过去几年房子的成交记录。有了这样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就很容易确定房子现在的价值。“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所房子在1990年房地产高峰时以23万美元的价格售出，结果1999年我买房时一下子跌到了14万美元，国内很难想象加拿大房价负增长到这种程度，我拿着经纪人给我的表格，在街上逐一核对每座房，看什么样的房子在什么时间卖什么价，这下心里有谱了，我确定眼前确实是一个捡漏的机会，最后以13.5万美元成交。”

房崇是北美华人圈里的装修“网红”，他在博客里记录了自己的装修进展，很多人因此找到他，帮他们买房子或修房子出谋划策。今年2月，国内新移民来的朋友来多伦多买房，请他当参谋。在两次抢房失利后，第三次卖方要价150万美元，朋友在几番竞价之后最后以181万的价格成交。“我只对朋友肯定了房子好，值得买，但是对这个价格我没有说话。朋友获胜之后感慨，看来房价还得涨，这是根据他国内的经验 and 中式思维，但是我在海外待时间长了，见过北美市场的冷热轮回，没那么乐观。如果这种购买力主要来自海外，本地的大多数人出局，那涨势能是常态化的吗？尤其是现在外汇管制越来越严，由中国买家主导的疯涨局面不能持久。”在4月20日，安大略省政府突然颁布对外国人买房额外征税15%的海外限购令，5月份房价即迅速下跌了6%。关于未来的走势，他认为楼市起伏不会太大，“这是一次小的调整，市场会恢复到一个平稳的发展。毕竟加拿大社会安定，移民在增长，刚需仍然在，利率还很低，这些都是有利的因素”。■

（感谢那倩茜为本文提供的帮助。文中部分人物使用化名）

读绘本，解决100个育儿问题

- 十二年亲子阅读、多家重点小学、幼儿园讲读绘本的实战派专家亲自讲授
- 从六大主题出发，为您立体解析最让父母头疼的104个育儿问题，针对每个问题推荐精品绘本
- 每期音频8分钟，一周2次，碎片化时间学习，让您轻松做最会和孩子沟通的父母
- 价格199元/年

认知
学习

艺术
创造

父母
成长

社会
交际

六大主题

行为
习惯

情绪
管理



生活家：李一慢

十二年亲子阅读、绘本课堂讲课经验
曾举办线下亲子讲座超过600场

“书香中国·北京悦读季”首届金牌阅读推广人
为各大幼儿园、小学、绘本馆教师授课近百次，培养“领读者”上千人



【松果音频课堂】



[方铭晖 摄]

北京雷石天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杰



迷你 KTV：移动支付新风口

文 / 杨璐

迷你 KTV 使唱歌开始“独乐乐”。

迷你 KTV 好玩的地方在于，它有序常理。谁都知道 KTV 是一个群体娱乐，可现在移动互联网到了尾声，碎片化使它进入到“独乐乐”的领域。不但不用攒人去唱歌，如果你在逛街和看电影的空隙突然想歌咏吟唱，也能被即时满足。这种技术难度不高的小亭子，得益于移动支付的成熟。只是人们“独乐乐”需要多大密度的机器来匹配“情不知所起”的唱歌需求呢？

既娱乐又投资

创业之风刮了这么多轮，现在有做生意之心的人都知道要在风口到来时，扬起风帆，能走一程是一程。1992 年出生的卢讯也是其中之一。他过去没怎么做过生意，现在却已经投资了十几万块钱，在

广东的佛山、肇庆和湖北的十堰各安放了两台迷你 KTV。下一站计划是武汉，他前一段刚刚去跑了一趟，寻找合适的投放地点。

卢讯亲身感受到迷你 KTV 是如何迅速风靡的，他告诉我说，最早关注到这种机器是去年在广州休假的时候，看到商场里有人排队进到亭子里唱歌，他因为好奇也跟着排队，体验了一次，觉得很好玩。回到深圳之后，偶尔周末逛街也会想起这种小亭子，可是商场里并没有这样的设施，他就隐约觉得这是一个商业机会。那时候，卢讯并没有立刻投入到这项生意的钻研中，他刚刚工作几年的时间，手里的积蓄不多，刚把钱投到一种新型的虚拟货币中去。

今年 4 月份，卢讯的手里又有了几万块钱的积蓄，当他再想经营这个生意的时候，发现偌大的深圳已经没有安放两台迷你 KTV 的合适位置了。“光为了租铺位，我就跑了一个多月，去了七八十家商场、电影院、步行街，人流量好的地方都已经被摆上了。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去下面的地级市再找位置。”卢讯说。他从深圳辞职之后就长住广州，所以选在距



迷你 KTV 加盟商卢讯

离广州一小时车程的佛山铺设第一组机器。“那组机器放在了佛山一个商场的侧门口，人们进出时候都能看到它。我每隔三四天去搞一次卫生。平时机器维护看后台就行，如果大半天没有钱进来，那就可能是机器出问题了。”卢讯说。佛山的开张营业之后，卢讯又买了两台机器放在了肇庆，肇庆没有进到商场里，而是在步行街上租了一个商铺，商铺的面积刚好可以并列放下两台机器。

同许多风口只在一线城市和沿海城市的游戏不一样，迷你 KTV 之风从一线、二线城市迅速下沉到三、四线城市，也从沿海地区刮向了内地。卢讯想在老家十堰的地标万达广场里安放这个新鲜的玩具，可就在他跟万达招商的职员因为打不通电话失联的几天里，已经有两台机器进驻到了万达广场的电玩城。都还不用制造和运营机器的公司出手，加盟者们的自我驱动就已经在城市里的商场、电影院和超市里打起了小规模争夺战。卢讯买的两台机器，最后放在了十堰一条商业街的超市里。

迷你 KTV 其实早在七八年前就出现了。北京雷石天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马杰告诉我，他们很早在日本和中国台湾都见到了这种点播机器，但当时觉得中国发展这个行业的条件不是很成熟。中国硬币的最大面值是 1 块钱，无论是直接用 1 块钱投币还是用纸币换游戏币，付费都太烦琐了，很难做大。

真正把迷你 KTV 这种形式引入中国的是对日本市场的街机游戏十分熟悉的游戏行业。这种机器落地到中国，技术和体验上都进行了提升，广州艾美网络科技公司是这其中的成功者。这家从前主要生产游戏厅的跳舞机的公司，经过两年的研发，申请多项专利，终于打造出了“咪哒唱吧”这个产品，并且在 2015 年下半年开始投放市场。随之跟进的是一年后成立的友唱 M-Bar，这家在厦门做视频点播系统的公司获得了从事智能售货机行业的友宝在线天使轮和 A 轮的投资。实力雄厚的创业者陆续在进入，雷石公司推出了 WOW 哇屋，他们是视频点歌系统的老牌企业，大约占中国市场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还曾经作为“小行业成功者”被收入了美国马里兰大学 MBA 的案例。创始人王川也是小米的联合创始人，现在负责小米盒子和小米电视的业务。有数据统计，现在从事迷你 KTV 创业的公司已经超过了 20 家。

这种从前并不显眼的街机游戏经过移动互联网的改造，成了今年炙手可热的创业项目。WOW 屋的天使轮投资人赖晓凌告诉我说，迷你 KTV 的出现是利用了一些移动互联网的杠杆，把之前的 KTV 娱乐降低了很大的门槛，不用再去找大块的时间，不用组团，也不用担心自己五音不全影响听众。赖晓凌同时也是小米和易到用车的投资人。如果根据第三方数据研究机构艾媒咨询发布的《2017 年中国线下迷你 KTV 专题研究报告》，迷你 KTV 的火热才开了一个头，与 2016 年相比，今年中国线下迷你 KTV 市场规模翻番，预计将达到 31.8 亿元，较 2016 年增长 92.7%，预计 2018 年线下迷你 KTV 市场规模将继续增长至 70.1 亿元。

卢讯看不到资本市场上的运筹帷幄，他从自己投资的角度想问题，告诉我说，虚拟货币的收益也许很大，但是风险也高。迷你 KTV 是一个实体，每天都在挣钱。不过，他对于多久回本心里没数。佛山的机器是跟艾美科技联营的咪哒唱吧，所以成本价从 2.88 万元降到 1.88 万元，可是公司要抽成 15%，现在的月收入只能与房租相抵。有了佛山的经验，他觉得被公司抽成就赚不到钱了，机器价格也不高，他转而买了友唱，原价 2.36 万元，做活动时只要 1.76 万元，铺在肇庆、十堰和正在选址的武汉，这些地方都是刚刚开业，并不怎么赚钱。6 台机器现在一个月能给他带来 1 万多元的收入。他觉得如果能够在一年的回本，这个生意他就很满意。

迷你 KTV 是一门好生意吗？

卢讯没办法用精细的数字来告诉我，这是否算一项好生意。他是个新手，虽然弟弟和朋友在他的带动下也买了迷你 KTV 设备，但更多是凭直觉对未来的认可。严秋朴则老练多了，他是做录音棚和录音设备出身，2009 年以后进入到 KTV 行业。他告诉我说，KTV 从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行业。它的门槛非常低，不像做餐饮要管厨师、采买、成本，也不像酒吧夜店要管顾客、管酒水。KTV 行业的生产工具点歌系统、音响系统都是非常成熟的标准品，只要选的位置好，装修不错，员工受到比较好的管理和培训，甚至都不需要是连锁加盟和打出品牌，生意都不错，两年多三年就能收回成本。

严秋朴入行的时候，赶上的是 KTV 辉煌的尾巴。他的第一家店没有租到很大的面积，只能设计成 25 间房，每间最多容纳 30 人。如果在量贩式 KTV 的鼎盛时期，这样的店面显得小气了，可实际运行下来却发现，小店的营收效率高过了量贩式的前辈们。因为当时 KTV 的客流已经下滑，量贩店空置率高，利润越来越薄，直到亏损。2015 年初，北京朝阳门钱柜关门成了 KTV 衰落的标志性事件。它是北京第一家量贩式 KTV，一度甚至是明星们聚会的地方。严秋朴说，KTV 行业经常开会商量对策，经常被说到的一个原因是不能吸引“90 后”来唱歌了。围绕着这个问题，KTV 行业的转型就装修风格变得萌或者二次元，还尝试跟互联网合作，从线上 K 歌软件给线下店铺引流。

这些策略效果很有限。严秋朴说，量贩式 KTV 进入中国 20 多年，模式根本没有变化，无论包房变大还是变小，装修风格从奢华变成动漫风，还是有人对着屏幕唱，其他人坐着听。可这 20 多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年轻人来讲，狼人杀、密室逃脱等太多好玩的东西了。甚至一起玩儿的人都在发生变化，从前只能找周围亲近的朋友去唱歌，现在通过互联网去把有相同爱好的陌生人聚集在一起太容易了，骑行、登山、跑团各种垂直的兴趣小组也分流了很多人。从线上 K 歌软件向线下包房导流的效果也微乎其微。“线上用 K 歌软件号称有几亿人在用，但它形成的理由不是 KTV，而线下实体店对应的是 KTV。线上的需求和线下的产品根本就不契合。对应的看美团、大众点评组织的试吃活动，线下店就爆满。因为它线上形成的群体就是一个吃喝玩乐的群体，线下店是提供吃喝玩乐的实现，这

个对应就是有价值的。”严秋朴说。

回到 KTV 的开头，它能够风靡东亚的原因是同时满足了人们唱歌和聚会的需求。严秋朴觉得，拯救 KTV 的核心问题不是换装修，而是唱歌和聚会两种功能分道扬镳，并且每一项功能都做到极致。行业里发展势头不错的 KTV，都在聚会上花了很多心思，完全向派对的方向去转变，唱歌只是娱乐节目之一。所以，KTV 除了提供唱歌的设备和包房，还为客户定制派对，根据主题提供道具，营造现场氛围。这种 KTV 的包房和酒水价格也能卖到普通店的数倍。

严秋朴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他清空了在上一个 KTV 项目中所有的股份，创办新公司，全力以赴迷迷你 KTV 的项目。严秋朴从学生时代就是音乐发烧友，毕业后没有从事本专业，而是进入到录音领域。他的兴趣、工作经验始终在唱歌上，索性做这款只为了满足唱歌的产品。“唱歌软件唱吧战略投资了咪哒，全民 K 歌与友唱合作，说明他们也认识到迷你 KTV 是比 KTV 更与唱歌相契合的项目。”严秋朴说。

从投入和产出的角度，他觉得迷你 KTV 是比从前 KTV 更好的生意。他告诉我说，他上一个 KTV 项目算是行业里投资回报比较可观的品牌，最快 20 个月收回成本，如果能在 24 个月收回成本算是成绩优秀的店面。但他为了研究迷你 KTV 市场，也买了各种不同的设备测验，最快的是在 2 个月零 10 天回本，慢的也在 4 个半月回本。“我上一个 KTV 项目，每个月的工资要开出去 350 万元，这些工资平均到每家店是将近 9 万块钱，等于说，它先要每个月把这 9 万块钱赚回来，才能养活得了自己。以现在的市场行情是很吃力的。”严秋朴说。

从管理角度，他也觉得迷你 KTV 这种无人设施，减少了不可控的因素。所有连锁行业都要面临员工培训管理和对加盟商的规范。严秋朴说，他做 KTV 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精力是在跟加盟商协调，让他们按照为了树立品牌形象的规范来经营。这种交道不好打，加盟商认为自己是投资者，天然具有话语权。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他们卖成本更低的酒水或者规定最低消费时，与其纠缠谈判的精力耗费很大。“我的迷你 KTV 项目，选择什么样的加盟商、品牌对他的控制度是怎么样的。我已经想好了。”严秋朴说。

壁垒：点位还是演唱效果

卢讯在肇庆商业街上的铺位，每台机器的租金

是一个月1200元，他把唱一首歌的价格定在了4元钱，如果按照他期望一年回本的进度，平均每天要卖出去25首歌。是否盈利完全取决于目标人群的消费意愿，就是所谓的争点位。雷石WOW哇屋的A轮投资人，清华银杏创投董事总经理程鹏告诉我，这个行业整体上还在铺设机器阶段。大家都还集中在商业场所，但细分下来每个场所的逻辑不一样，比如影院是文化消费，商场人流大，都是各家重点使力的领域。这个铺设的过程里，一轮轮的洗牌会非常快。铺设这一关过了，才谈得上运营，就是你的机器被激活的频率是怎样的。

2015年就投入市场的咪哒自称已经覆盖了500多个城市，去年跟进的友唱也在接受采访时宣布投入了超过5000台机器。抢点位几乎是第一轮的生死关头，从WOW屋的策略也可以看出竞争的激烈程度。它虽然背后是KTV点歌系统的龙头企业雷石，可今年才推出市场，比对手晚了一大步。总经理马杰的想法是，签约连锁电影院，最好是独家的，迅速把点位先拿到手里，从数量上赶上和反超。到7月初，万达、星美、横店影视、恒大影城、银座、CGV、金逸影城、博纳国际影城等都签了协议，其中金逸影城、博纳国际影城、华谊兄弟等5个品牌院线是独家进驻。设备也在以每天100台的速度出场。马杰说，公司专门有一组人每天给签约院线的电影院打电话，问他们场地是否腾出来了，可不可以让机器入场。

除了点位作为壁垒，像马杰、严秋朴这样从事KTV相关行业的创业者觉得，迷你KTV的唱歌效果也是一个区分高下的因素。跟动辄号称有上亿用户的线上K歌软件相比，同样是利用碎片化时间的唱歌娱乐，付费使用的迷你KTV理论上得有线上替代不了的经验。WOW屋的做法是把专业歌手常用的修音手段加入到机器中来。唱歌在耳机里感受和最后录制输出的效果，不但音准经过修饰，音色也能让人听起来像是有把好嗓子。马杰说，可以把WOW屋的系统理解成声音版的美图秀秀。为了增加趣味性，WOW屋的迭代产品甚至在研发唱歌的扩展功能，选择变声的模式，让人们能够提前听到自己老年时的声音，或者把自己的嗓音变成某个歌星的音色。严秋朴的产品要8月份才能推上市场，他告诉我说，做回他的老本行，让普通人有专业录音棚的感受。

技术力量还可以借助迭代，让大家迅速回到同一竞争平台上，曲库的厚度在KTV行业的创业者看

来是核心的竞争力。要做大生意，第一得解决版权问题，第二要给用户足够多的选择。开过KTV的严秋朴从决定创业迷你KTV时起，就立刻找了一家做点播系统做到前三位的公司作为合作伙伴。而WOW屋作为刚刚加入几个月的新面孔被这个行业关注，是因为它背后的雷石公司是这个领域里的龙头企业。马杰告诉我，曲库制作的部门几乎是公司一周7天、每天24小时不停歇的生产部门。一首新歌拿来，他们要把人声去掉，把伴奏留下来。这个过程中如果有损耗，曲库部门的乐队就要在录音棚里自己演奏出来，再加回去。而字幕组要根据旋律打出字幕变化的点来。为了能适应大众的唱歌水平，一些高音要进行降调，有难度的旋律还要加入导唱手段。

曲库部门像个手工作坊，是这个行业的核心生产部门。它要强调时效性，要留意把爆红的歌曲制作出来，还得紧跟每周的歌唱类综艺节目。马杰说，在这种综艺节目的播出季里，这个部门每周末都要安排人加班，在节目结束两个小时内，把歌曲的卡拉OK版做出来。甚至雷石公司厕所的墙上贴着曲库数字的信息牌，有人定期更新曲库部门生产的进度。在这个月的月初，雷石公司的曲库里已经有超过40万首卡拉OK伴奏，因为点歌系统也销往海外，所以，曲库里也覆盖了很多语种的歌曲。这是雷石公司十几年的积累，也是马杰感情最深的地方。他在朋友圈里袒露心迹：“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不冒险，但这一次不冒险我这辈子白活了，我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让他下这么大决心上马迷你KTV的项目，就是因为这是目前最好的曲库出口。不用再经过买点唱系统的KTV客户筛选，而是全部推向用户。“机器在本地会储存常被点到的歌曲，冷僻的放在云盘里，一旦有用户点到，能很快下载到本地来。如果这首歌被点了很多次，它就会自动地保存在本地了。”马杰说。

所有的商业逻辑都说得通顺，可用户的需求是创业能否成立的起点。卢讯是唱K的重度用户，他演唱的歌曲还曾在迷你KTV的用户榜单上名列前茅。他的加盟除了理财，还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马杰觉得，歌咏吟唱是中国人持续了数千年的爱好，短时间内不太可能消失。可对于在公共场所隔着透明亭子独自唱歌的乐趣有多普遍，又能持续多久呢？谁也不能说是“刚需”，但它是这个市场到底多大的前提，创业者得有所打算。■

（实习生沈启雯对本文亦有贡献）

“00 后” 社交新体验：成为鹿晗之后，我再表达我自己

文 / 王梓辉

15 岁的山东女生小顾刚刚结束了自己初中二年级的生活，迎来了自己盼望已久的暑假。一周多之前，在网上搜寻“社交软件”时，她发现了一款叫“闪聊”的 APP，觉得还有点意思，就下载下来试试。自那之后，每当她进入这个 APP 的界面，她就不再是那个来自山东的小女生小顾了，而变成了电视剧《择天记》中的人物——白落衡。

刚刚打开闪聊，你首先要做的是在那些热门的影视剧、游戏、动漫等作品中挑选自己喜欢的角色，这要非常慎重，因为这个角色就是你之后在这个 APP 中的身份了。目前，手机游戏《王者荣耀》是里面最火的角色来源。如果你现在去注册的话，热门角色中的前八名都是《王者荣耀》里的英雄，第一名是“小乔”。

选择好自己要扮演的角色之后，你可以通过“扩列”来寻找志同道合的圈子与朋友，“扩列”是他们的行话，意思就是“扩充好友列表”。加入圈子需要“圈主”同意，而找朋友则需要通过“戳”对方获得对方的反馈，一旦对方回应你的“戳”，你们就算是搭上话，可以聊天了。

因为选择了《择天记》中的角色“唐三十六”，因此“戳”我最多的就是“白落衡”，最多的时候，我同时在和四五个白落衡聊天。这里的聊天分两种情况，“角色说”和“本人说”，你当然能明白它们的意思：扮成你的那个角色聊天，以及恢复本人身份聊天。显然，“角色说”才是这套游戏的核心以及它吸引人的点。

“三十六，你又和‘莫雨’吵架了？”

白落衡（离夕旧梦）一上来就直接进入剧情，没有前面的试探与铺垫，开始了一场“尬聊”。

“本公子才没闲工夫和她吵架呢！”

我接上了话头，于是一场《择天记》外传就此上演。

为了区别于其他的相同角色，每个人都会在角色名称后面加一个自己的个人 ID，比如上面的“离夕旧梦”；也可以是一串数字，比如陈长生(1567893)。于是在这个网络的虚拟社会中，我们都成了白落衡、

陈长生、唐三十六，但又各不相同。

变种“语 C”：披上一层外衣，开始“尬聊”社交

闪聊当然不是第一个做这件事的公司，事实上，这种玩法早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以及一系列的专有名词，如果你不是此中人士，一开始你肯定摸不清其中的门道。

这种通过文字描写以第一视角的剧情还原出一个人物的玩法被称为“语 C”，它的意思是“语言 cosplay”。不同于一般通过外表装扮来模仿动漫游戏中的人物，语 C 是通过语言上的模仿来描述一个虚拟的精神世界。在“知乎”上有人这样写道：“cosplay 用外表还原了一个角色，语 C 用文字演活了一个灵魂。”

要做出高水准的语 C 作品其实并不容易，以《三体》为例，如果你没有学霸级别的数学或物理学知识，强行以罗辑或叶文洁的身份“开戏”，恐怕只能徒留笑柄。

名人朋友圈（后简称“名朋”）也许是国内最早以语 C 的形式起家的社交产品，当然，在很多语 C 圈的“老人”看来，因为名朋更改了很多语 C 圈的规则（从某种程度上它几乎将普通人的入门门槛降为零），他们并不太喜欢这个产品。已经玩了 5 年语 C 的知乎用户 shalnark 就对我说：“‘老人’很厌烦这样的 APP，因为它抹去了语 C 里最基础的东西。”

但这并不妨碍这款产品已经聚集起了很多并不熟悉语 C、却喜欢通过这种角色扮演的方式来社交的年轻人。在这里，你可以是王思聪，也可以是鹿晗。目前他们拥有超过 200 万的用户，平均年龄在 16 岁，基本都是初高中生。

在名朋 C00 张宏宇看来，“基于兴趣的社交很容易争取到年轻用户”。现在的“00 后”们一方面面临着很大的学业压力，另一方面处于青春期的他们也有拓展社交圈的需求。压力大，渴望释放，渴望成熟，渴望表达，年轻的“00 后”们需要一个真实的、志同道合的社区供他们交流，而语 C 的形式既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喜好，也降低了社交破冰的难度，不会出现两个人“尬聊”的场面，反正双方可



游戏高手在杭州一家小龙虾餐厅内为顾客代练网络游戏《王者荣耀》

以用虚拟身份开始一场漫无目的的对话。

来自福建的皮皮在名册中的角色是演员林更新，他今年上高一。皮皮接触这个产品的时间也不长，还不到一个月，不过只要你找他聊天，他基本都在线，这证明了他已经是这个产品的活跃用户。

一开始，皮皮愿意玩这个APP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可以和别人搭戏”。你再问他为什么和别人搭戏能吸引他，他就回答你两个字：“有趣。”

闲聊自己也在思考“有趣”背后的东西，他们觉得小朋友们在社交上更看重的是有没有同好、聊天尴不尴尬。因此，通过在角色筛选时做出的选择，小朋友们实际上也就是在筛选自己的同好，这种玩法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他们的喜好，自然就会觉得“有趣”。

“00后”们自己很少去挖掘自己为什么喜欢这样的玩法，但他们的感官直觉自然能把他们留在这里。

来自山东的初二女生落画告诉我：“这里可以认师父认徒弟，很有意思的。”虚拟身份与虚拟环境带来的虚实交错之感吸引着众多像落画这样的小女生。“像我这么大的姑娘都想要一个陈长生一样的师

父（陈长生是电视剧《择天记》的男主人公，女性角色白落衡的师父）。”

至于认了师父究竟能做什么，落画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他的温柔，也许是因为仅仅是照片和陈长生一样帅，也许是他很不喜欢听歌却会很认真地听我唱歌。”到最后，落画自己总结了一下：“我想，应该就是在需要的时候那个人正好出现吧。”于是，一个她已经忘记了来自哪里的18岁男生成为落画在虚拟世界中的“师父”，尽管双方才刚刚认识几天。

你看，这种角色扮演的游戏既能让“00后”们在虚拟世界中得到精神上的快乐，也能满足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很难实现的愿望，他们自然会喜欢了。

不仅是社交应用，他们的声音已经遍布网络

当然，就像你很难用同样的概念、喜好、特征来归纳过去的任何一个大的世代族群一样，“00后”作为一个跨越十年的概念，里面的构成也纷繁复杂。除了在闲聊或是名册这样近似游戏的社交环境中聊天之外，快看漫画、最右、小肚皮……这些针对年轻人

垂直喜好开发的APP都是“00后”的乐土。它们有的以男生用户为主，内容多为搞笑吐槽；有的以女生用户为主，通过少女养成式的产品设计带“00后”一起成长；有的则“男女通吃”，通过动漫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内容形成一个极具向心力的社群。

如果你不是快看漫画的用户，恐怕你很难想象这个APP的活跃度能有如此之高：一个热门漫画家的“粉丝”基本都在10万以上，其每条动态的留言数动辄好几千，而且几乎没有水分；连快看漫画的一个虚拟人物在上面都有十几万“粉丝”，每条动态的互动数也都在1000左右。而这一切的基础是他们的9000万用户量，这其中，“95后”“00后”是基本盘。

在快看漫画公关总监肖成看来，“强烈的表达欲”是这些年轻人区别于“80后”“90后”最明显的地方。作为一个提供漫画内容服务的APP，社区却成为这个产品不可或缺的一个功能，现在，快看漫画的社区是现在漫画圈里最活跃的网络空间，而“00后”在其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我们现在微信中看到一篇喜欢的文章，最多去点个赞，但这些年轻人不一样，他们有很强的参与感，就是想表达，哪怕我的声音很难被别人听见。”打开快看漫画完结榜第一名《整容游戏》，它的评论数已经超过了186万条。

而专注于“00后”女生社交养成的产品“小肚皮”在这方面也有类似的想法。见到的更多、更愿意表达、更有自己的观点，小肚皮CEO袁琛雯这样总结“00后”们在社交方面的特点。

显然，哪怕是在这些并不是纯粹的社交应用中，“00后”们追求表达、追求与他人互动的欲望都满溢了出来。作为一个拥有游戏、手工课堂、兴趣培养乃至商品服务的多功能应用，袁琛雯就表示他们的APP中有不少的功能都是“00后”们在社区讨论中提出来的，同时，她也认为他们设计产品的思路就是鼓励小朋友们更多和同龄人交流、沟通，这些对于他们的成长都是积极和良性的。

除此之外，在教育领域的作业帮、搞笑社区最右，乃至从去年底爆火的狼人杀系列等APP中，“00后”们的活跃度都会让你咋舌不已。甚至在那些已经非常主流的应用，比如微博和知乎中，“00后”们的活跃程度都在逐步上升。根据百度指数的数据，就以知乎为例，其19岁以下用户的比例连续几年都呈上升趋势。

所有的一切都显示，再用过去的老眼光来看“00后”就太过狭隘了。事实上，“00后”们已经逐渐

成为社会舆论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发声群体，至少在网络环境中是这样。来自知乎的shalnark就说：“‘00后’早就不是当初在网上被喷的小学生了，‘00后’的我今年都17岁了。”

当然，“00后”这个概念也包括现在的小学生，但他们想要强调的是，一个“小学生”的概念早已不能指代“00后”了。

不变的是QQ以及年轻人的自我意识

不过，不管是闪聊、名人朋友圈、小肚皮，甚至是知乎和微博，他们都是“00后”们社交生活中的“配角”，真正的主角与核心没有悬念，就是QQ，也还是QQ。

自从1999年推出之后，腾讯公司的即时通信产品QQ已经伴随着“80后”“90后”们成长了起来。现在，随着很多“老用户”转战微信，更年轻的“00后”们又接了上来。因为他们的加入，直到去年底，微信的月活跃用户数才刚刚超过QQ。在其超过8.6亿的月活跃用户中，“00后”的比重已经超过了两成。这也意味着QQ的“00后”活跃用户已经超过了1.7亿人次。

即使是在上面我们提到的所有APP中和“00后”们聊天，一旦你询问他们平时最常使用哪个APP，90%的答案都是QQ，剩下10%是《王者荣耀》。而双方如果要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一定是互相加QQ而非微信。

“现在的人都觉得QQ好用。”皮皮说道，而且他也不认为他们“00后”在长大了之后会从QQ转移到微信上，“时代在变化，人也在变化”，皮皮用这样一句充满哲学思维的话来解释他的结论。

腾讯公司社交网络事业群即通产品部总经理冼业成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QQ一直在基于对不同年代年轻用户的需求对产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优化。其次，QQ满足年轻人自我认知的部分需求。我们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多地寻求关注和认可，这种自我意识比以往‘80后’用户更强烈。第三，目前年轻人社交有非常强的娱乐化趋势，‘90后’‘00后’都在构建自己网络社交的语言体系。他们会更喜欢原创，更喜欢构建虚拟世界观，更喜欢把个人的创作跟热点资讯结合。”

更注重自我表达、更看重兴趣社交、社交娱乐化，冼业成这样总结“00后”们的社交特点。在快看漫画一份涵盖了12万用户的调查中，将近一半的

人都认为“自我个性”这个词最能代表自己。

但如果你回看历史，会发现几年、十几年之前，“90后”“80后”们也是这样评价自己的。“自我”这个词似乎逃不开所有时代的年轻人，每一代的年轻人好像都曾被更年长的长辈们评价为“太自我”，但这其实也是年轻人的共性。

“QQ空间”是表达自我，“兴趣部落”是表达自我，“厘米秀”也是表达自我……打开QQ，除了登录界面一样，似乎每个人的QQ又都长得不一样，这样你也许就理解了为什么“00后”们这么喜欢使用QQ而非微信。

“我似乎是一个假的‘00后’。”在众多有关“00后”调查的评论中，你总能看到“00后”们这样的回复。其实，又哪一个“真的00后”的定义呢？时代在演进，年轻人的自我意识很难改变，只不过他们展现自我、追求独特性的方式却在不断变化。

出生于1986年的肖成就觉得自己那代人当年的表达权是被压抑的，当时的社会在主观及客观条件上都没有为小朋友们提供足够平等的表达的权利，但现在不一样了。社会文化的进步、从小受到移动互联网的浸淫，以及父母和社会在教育思路上的转变……这些各色因素都让“00后”们不仅拥有了平等获取信息的能力，也让他们获得了之前的世代也许比较匮乏的充分表达自我的能力。因为拥有了这样的能力，表达的欲望自然喷薄而出，这是人性的流露。

而科技的进步又为他们提供了足够多样化的选择。名朋的张宏宇就认为，腾讯的产品将会承载年轻人的生活和工作，而他们真正想做的是，“为年轻人提供精神世界的寄托”。角色只是虚拟的身份，而本质还是自我表达，但通过各式各样你了解的、不了解的产品形态，“00后”们已经能借助工具的外衣，在表达自我意识的路上越走越自由了。☑



橡胶科技, 创变轮胎

4D 创新纳米级设计

向前路, 不停步
Run towards challenge

DUNLOP
邓禄普轮胎

一位外观设计师眼中的“天云灰”

主笔 / 李三



雅各布·赫泽尔

雅各布·赫泽尔是全新奥迪 A5 外观设计师，他最喜欢的车身颜色是“天云灰”，理由是：“稳重的感觉，非常直观地体现出车的外形，呈现出雕塑感和高科技特质。”每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偏好，而天云灰，也像是另一个意义上他梦想的颜色。

当雅各布·赫泽尔（Jakob Hirzel）6 岁的时候，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汽车设计师，在他加入奥迪设计团队后，他的梦想变得越来越具体了，“我希望能够从事新一代奥迪 A5 的设计”。然而，实现这一梦想并不简单，因为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第一代奥迪 A5 实在太成功了。“第二代车型一定要像第一代那样出色，甚至做到更好。”他深知自己没有第二个选择，只能更好，否则就是失败。

超越经典，绝非易事，与其说雅各布·赫泽尔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挑战，不如说面对的是一座又一座无形的山峰。“第一代奥迪 A5 标志性的波浪腰线，绝对是最具标志性的设计之一，尽管我们在设计过程中试图采用与之完全不同的设计，但当我们创建了无数不同形状的线条之后，最终还是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种设计能够取代这条经典的腰线。我们必须沿用这个设计，因为它是奥迪 A5 车型的设计精髓。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与上代相比，全新奥迪 A5 的腰线会显得更挺括、更动感，亦更具有现代感。”

几年前，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参观他的设计工作室，闲聊中，上海客人向雅各布·赫泽尔讲述了一些有关中国龙的文化，“中国龙有一副动感凌厉又富有威严的表情，这令我印象深刻”。后来，他将“龙的表情”与现代设计以及奥迪的灯光科技结合在一起，于是有了现在动感的全新奥迪 A5 矩阵式大灯。“我认为这种车灯的设计并不显得过于激进，反而是一种非常能增进运动感与设计感的设计。”

三联生活周刊：之前你是否参加过奥迪其他车型的设计？

雅各布·赫泽尔：在奥迪设计师团队工作，会

接触到不同的车型设计，在全新奥迪 A5 之前，我也参与了一些其他车型的设计，包括奥迪 R8 车型和 Q7 车型的一些局部设计等。通常，一款车型的设计工作要提前 4 年，所以我们的 A5 设计团队在 4 年之前就开始一起工作了。在全新 A5 投入量产的两年前，总体设计工作就会基本结束，我们的设计工作不会持续到最后一刻，所以我现在也参与了很多其他车型的设计工作。

奥迪有非常强大的设计团队，每一个具体部件的设计都会有很多专家来负责，比如轮毂和线条，这些能够体现奥迪车型的特征和设计水准的部分，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很高兴能够加入奥迪设计师团队的大家庭，与这个强大的团队一起把我们的设计理念转化成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全新奥迪 A5 最满意的设计是哪个部分？

雅各布·赫泽尔：设计之初，我们会做很多提案，探索新车型的各种可能性。起初团队考虑沿用第一代腰线设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重新解读和更加现代化的表达。此后，便开始了主要设计单元的设计，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月。我还参与了奥迪 A5 家族其他车型的设计，亲历了这些车型从提案到定稿的全过程。之后我们用了两年时间进行密集的设计工作，与工程师、空气动力学专家以及所有的设计创作团队一起，高强度地工作。在设计过程中，会有很多不同观点的碰撞和激烈的讨论，我与几个设计师一起，就外观设计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当然，最终决策还是由设计总监来敲定。

个人而言，我最满意的部分是经过两年的努力工作，终于看到自己的设计理念从梦想变为现实，

从一个虚拟的模型到实车投入量产。看到全新奥迪 A5 能够在这样棒的场所进行上市发布，能在马路上纵情飞驰，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工作中经历的一切困难、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回报，都是值得的。

三联生活周刊：相较第一代，全新奥迪 A5 也反映了时代变化和现在的消费者的审美变化。在你看来中国消费者有哪些特点？是否会影响到你的设计思路？

雅各布·赫泽尔：中国的消费者确实比国外消费者更加年轻。在审美方面，我们不会针对某些特定的消费群体去取悦他们的需求。在设计中，我们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普适的审美，从自然中获得启迪，汲取灵感。我们希望不同年龄层、不同性别的消费者都能够理解并欣赏全新奥迪 A5 的设计理念，并被其吸引，我们需要考虑全球的用户需求。全新奥迪 A5 在设计中更加注重增强其表现力，凸显出原来的优势，让过去车型中优秀的特征更加强烈，更加可视化地表达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全新奥迪 A5 的车身颜色据说多达 15 种，请问你最喜欢的颜色是哪种？它有着怎样的寓意？

雅各布·赫泽尔：因为我是外观设计师，我们的设计师团队主要负责设计车的外形和轮廓。出于比较的目的，我们会一直使用银色，便于帮助我们比较新旧设计的区别，银色也能帮助我们更直观地看到车的外形和轮廓，突出亮点。所以在设计过程中，永远都只有银色这一种颜色，只有在投入量产之后，才会看到其他的颜色。

我个人非常喜欢天云灰，灰色给人稳重的感觉，非常直观地体现出车的外形，呈现出雕塑感和高科技的特质。还有很多其他色系都非常好，比如说哥特蓝绿、斗牛士红，这几种颜色非常完美地体现在全新奥迪 A5 上，与这款车非常相配。

三联生活周刊：整个实际过程是否顺利？为满足量产的需求，有没有一些被取消或修改的设计？

雅各布·赫泽尔：在设计过程中每一个步骤都有很多困难。我们的工程师非常重视高质量，汽车的设计必须符合奥迪一贯的高质量要求，所以在一开始有些设计是很难推进的。我举几个例子，首先是镀铬饰条，它不仅视觉上拉伸了前脸，表达出进取与渴望的特质，又不显得咄咄逼人，从侧面看也有拉长线条的效果。四环的徽标两端的线条向上延伸，构成穹形轮廓。S-line 镀铬设计使奥迪 A5 的比例更加协调，看上去更具力量感，同时也延续了隐藏在边缘的引擎盖

线条，这是我们可以达成的最干净简洁的解决方案。

我们做了大量的设计和调整，保证所有车型在量产中达到完全相同的效果。另外，车门关闭线也做了隐形处理，从技术角度这很复杂，不论测量还是切割都要非常精准，才能实现设计效果。引擎盖的穹形棱线构造空间更大。普通的引擎盖铰链是上下移动的，我们设计的引擎盖铰链可以先向前移动，再向上移动，这样可以避免碰撞，更便于打开。这样的铰链非常复杂，体积也更庞大，要求我们尽量把它做到最小。同时，为了行人安全考虑，也需要留出更多的空间。在做行人安全测试的时候，需要测量整个引擎盖的柔软度，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把铰链放到很低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我们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当然，为了保证整体车型非常流畅动感，我们也做了一些技术上的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行人碰撞标准越来越苛刻，很多厂家用压低车头的方式降低对行人的创伤。这样的要求会不会给设计带来困难和限制？

雅各布·赫泽尔：汽车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部门和相关组织都非常关注汽车驾驶安全，寻求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率。汽车安全不仅关系到驾驶员和乘客的安全，也包括行人的安全。在全新奥迪 A5 的设计中，我们对安全问题极度重视，并致力于将其体现在全新 A5 的产品设计中。

我们的工程师据此给出了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在实现汽车安全功能的同时也兼具了设计美观。比如增大引擎盖的体积，使发动机部件和发动机引擎盖之间留出更多的空间，有利于发动机散热，有效减少因发动机过热导致的一系列安全隐患。在设计过程中，有时候新的解决方案未必容易实现，因为我们必须说服团队。在这方面，设计师团队做得非常好，在美观方面没有做出任何妥协和让步，同时又实现了功能性。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虚拟设计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朝一日它会替代设计师吗？

雅各布·赫泽尔：现在虚拟设计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原型设计阶段，但我认为，虚拟设计只是设计过程中的一个工具。现在有一些公司完全抛弃了物理模型，认为全部运用虚拟模型就可以体现所有的细节，像实物一样栩栩如生。但在奥迪，我们还是保留了物理模型，我们认为虚拟模型没有办法提供真实可见的效果。不能触摸、感受，就不能让我们调动所有的感官去感受其所有的特征。所以我们会结合虚拟模型与实体模型，与数据相结合，根据数据建模。如果模型做出调整，也会修改相应的数据。☑



1

吴秀波：我有困惑，所以做戏

记者 / 宋诗婷

吴秀波在最容易做演员的时代做了制片人，做了《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他在为自己争取表演和表达的自由。

七年一戏

不久前，吴秀波的一个好朋友突然约他见面，“一个非常厉害的制作人，50多岁”。两人约在昆仑饭店，大哥花了两个半小时，把自己从17岁到眼前的所有经历按着年份讲了一遍。他还讲到了自己几年前去世的太太，讲到“本来已经过去好几年，走



2



3

1~3. 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剧照

出来了，前几天听到一首歌，又回到了那个状态”。

两个相识很久的中年男人第一次彼此袒露心扉，其间各哭了两场。临走前，两人第一次彼此拥抱，大哥语重心长地说：“咱们都老了，不知道能活多久，不能让接下来的时间像从前一样不知所踪。”这番长谈，让吴秀波有种恍惚感，沉重又不知所措。

“一个比你年长的男人，约你吃饭，就为和你讲讲话。有时候我很庆幸自己现在做的事，我至少可以通过戏和角色，说出那些我说不出口的话。”

有困惑，有未解的人生命题，所以做戏，所以

有了当下热播的《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从司马懿来拍“三国”的想法始于7年前。“对于中国的男孩子来说，三国故事就跟乒乓球一样，你学不学都能打两下，你看没看《三国演义》和《三国志》，都能唠叨两句。”吴秀波说，他每隔几年就会重读三国，每次读完都有新发现。“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从董卓之乱开始，讲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为什么不讲？我对最终平定天下的司马家特别感兴趣，一个人能隐藏自己的心思，这不难，但如果历史也把他隐藏起来了，我就分外

好奇。”

有了从司马懿视角拍三国的想法，吴秀波却突然忙起来了。2010年前后，《黎明之前》《追捕》等电视剧让他被观众所熟悉。2013年，《北京遇上西雅图》上映，他花胡子配西装的雅痞大叔形象深入人心，一时间成了城中潮男的典范。

找他拍戏的人越来越多，不靠谱的也很多。经纪公司喜天影视的老板周宴西就给他扔来了一个不靠谱的剧本。“《马向阳下乡记》，一个农村戏，这我哪演得了？当时我可是个潮大叔。”吴秀波象征性地翻了翻剧本，“没法看，前三集就睡着了好几次。”

当时，找周宴西帮忙递剧本的就是《军师联盟》的导演张永新。“这事儿我后来才知道，秀波没看上这剧本，过来和我吃顿饭是给宴西面子，打算委婉拒绝我。”

饭局上，张永新不甘心，当着吴秀波的面把剧本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又是两个半小时，我鼻子酸了好几次。”两个半小时之后，吴秀波被张永新打动了。

几乎连剧本都没有，吴秀波就进了《马向阳下乡记》的剧组。他还记得，那年夏天特别热，剧组在山里，合作的演员都不是明星，简单、干净，拍戏的那段日子，他的心难得地踏实。闲来无事，他也会和导演聊聊戏剧，聊聊历史和三国。在那几个月里，吴秀波和张永新建立了一种革命友谊式的信任和默契。

《马向阳下乡记》快杀青时，有场戏在水库边拍摄。快收工了，张永新转身往外走，吴秀波突然把他叫住。“你了解司马懿吗？”张永新愣了一下。“鹰狼狼顾的那个司马懿吗？知道点，挺感兴趣的。”

话头就此打住，《马向阳下乡记》收工了，杀青了，导演和演员都各忙各的。有天，张永新突然接到吴秀波的电话：“司马懿那个项目启动了，有没有兴趣去做？”张永新当然立刻答应，只是他当时也没想到，这部戏会前前后后花了4年时间。

新视角看三国

虽然一口答应了下来，但吴秀波的那通电话让张永新很忐忑。“那之前，我没拍过古装剧，但也懂行，三国魏蜀吴的故事，按他说的模式，拍多少场景，什么样的规模，大致一算就知道，得是几个亿的投资。很兴奋，但也诚惶诚恐。”

吴秀波和张永新看了大多数他们能找到的关于司马懿的文献和资料，绞尽脑汁为这个人物寻找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立足点。“《三国演义》里，司马懿不是主角，数出去六七号人物，也数不到他，资料少。”吴秀波分析。

张永新考虑得更务实。“在中国老百姓眼里，司马懿是个奸白脸，深谙厚黑学。影视剧里对他都是有意无意地贬低。把这么一个丑角端到影视剧的中心，把他当男一号，该怎么做，这是第一关要解决的问题。作为导演，如果你没有这个预估和判断的话，那就是不负责任的。”

材料看了一圈，再加上历史专家的解析，张永新和吴秀波渐渐有了底气。“民间主流认知中的司马懿其实是有偏差的。”张永新说，“功过两奇伟，这是更公正地对司马懿的评价。”

接下来就都是技术活了。吴秀波说，在筹备《军师联盟》阶段，至少有30个人和他说过，这个戏不好做，不能做，三国故事在今天玩不转了。“老《三国演义》是一座大山摆在那儿，《新三国》的收视和口碑也争议很大，我们怎么做？最保险的就是人家怎么拍你怎么拍，至少不会犯错。但这么做，我和秀波都不甘心。”

考虑再三，他们决定做小不做大。三国纷争，群雄并起，争权力，争天下，归根到底，争的都是人心。《军师联盟》要避重就轻，以世道来讲人心。“《三国演义》里有太多吸引人的情节，我们改编时往往关注情节，但没有解决人物的内心矛盾。戏剧写的无非是两个字——人性。用什么样的历史和故事讲人性，讲人物的内心矛盾，这是我们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吴秀波说。

这样的设定奠定了《军师联盟》在情节、影像、表演等方方面面的基调。一部投资4亿元的剧，大场面用得很克制，镜头大多是中景、近景和特写，着重刻画细节。每个主要演员都有些小动作，这些小动作又是性格和心理的外化。三国故事的典故很多，除了不能不拍的被吴秀波称为“老百姓的文化历史”的典故，能略过的尽量不表，以免剧情再沦为老套路。

吴秀波不算是个精明的商人，但他也知道，做一部电视剧，孤芳自赏没有任何意义，打通与观众的沟通渠道，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最先讨好的是作为电视剧收视主力军的女性观众。“剧本第一稿基本符合史实，但毫无趣味。第

二稿完成了男性对于三国的认知。我把剧本拿给家人看，看完说，这什么玩意？好，又换了个女编剧写，把家庭生活写了进去。家里人终于觉得，这戏能看了。”

“女性才不管谁得了天下，只会问这家归谁管，存折在谁那里。”吴秀波对于女性观众的分析大概要惹一些女权主义者不痛快，但这个方法确实奏效了，《军师联盟》女性观众的比例要远高于很多历史题材电视剧。

第二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一个1700多年前的人物与当下观众的内心产生共鸣。“一个战乱纷争的故事，一段遥远的历史，这和一个孤零零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有什么关系？”吴秀波总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司马懿的困惑，杨修的困惑，甚至是曹操的困惑，也都是他自己的困惑。“做戏是因为有困惑，看戏又何尝不是呢？只有把历史变成一个人的疑惑，这才是所有人的疑惑。司马懿从生到死面对的是什么？生存。先是要活下来，接着是对家庭尽责，然后变成情感的压抑，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也因此产生了欲望，以及与欲望抗衡的压力。这是每个人的生命历程。”

剧中以个人生命历程来与观众共情的例子比比皆是。杨修的死，荀彧的死，曹操的死……每个生命的终结都是唏嘘一场。《军师联盟》似乎有个影像上的固定套路，无论以再宏大的场面开场，最后的落脚点一定是个人，是细节。拍摄一场战争，特写的细节是白胡子老人被杀，士兵举着滴血的刀追一个孩子。“老人、小兵，战场上最不合时宜的人，他们是战争最好的注脚。”张永新说。

除了剧情和影像，《军师联盟》也试图在服装、道具和造型上现代起来。“既古典又现代。”这是张永新和吴秀波对这部剧的要求。古典是在大方向上符合史实，服装的设计、建筑的风格整体上都是汉代的，但在细节之处要让现代人看着似曾相识。

“造型上参考了西装的样式，你会发现，我们很少用大红大紫的颜色，很少用纯色，都是复合色，这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看起来很时尚。建筑风格也参考了北欧的木质极简风，室内的设施也尽量简单化，这会让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舒服。”张永新解释。

电视剧播出时，吴秀波和张永新都会追着看几眼，他们看的不是早已烂熟于心的剧，而是网友的弹幕。“我对现在的‘80后’‘90后’抱着尊重的态度，

他们的视野和品位比我们这代人刁钻。毕竟，他们看过美剧、英剧，看过太多好东西，要骗他们不容易。”采访前两天，张永新刚从弹幕上看到网友对于剧中穿帮镜头的吐槽。“看得我脸上火辣辣的。”张永新说。

新手制片人

做演员，吴秀波驾轻就熟，做制片人，运作一个价值4亿元的大项目，他是第一次。采访那天，吴秀波不间断地喝了两杯浓缩咖啡，一大杯啤酒。他吃素4年，很难在吃喝上兴奋起来，咖啡能让他下午萎靡的神经稍微活跃起来。“喝酒是拍戏期间才喜欢上的。”作为制片人，他常常要和不同的人喝酒，谈生意、安抚工作人员情绪、和演员聊角色，酒都是重要的社交工具。

一进组，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要兼任制片、剧本监制和男一号，在几个角色里跳进跳出。“迄今为止，我从未像拍戏的那333天一样，从未经历过那样的体力、精力，以及态度修行上的透支。”

在片场，几乎每个麻烦最终都会落在吴秀波头上。演员听说剧组里出了什么事，那都是八卦。但做制片人，剧组里出了事，每一件都是事故，都生死攸关。

采访时，他举起手当电话，现场还原那段让人崩溃的日子。“秀波，再不来人就罢工了，那5000万元还没到。秀波，那边防火的已经来了，要怎么着？秀波，那12个发电机不给咱使了，棚也租不下来。秀波，演员从马上摔下来，骨折了。哥，我这戏可不能这样写，你得给我改改。秀波快来，这戏还没拍呢，演员谈不拢了……忙活完这一团事，我还得搞艺术啊，往镜头前一站，边上人说，秀波，你不能再吃了，都胖了。”

第二次和吴秀波合作，张永新也觉得自己的地位有所提升。“拍《马向阳下乡记》时，秀波老师是

“我对现在的‘80后’‘90后’抱着尊重的态度，他们的视野和品位比我们这代人刁钻。毕竟，他们看过美剧、英剧，看过太多好东西，要骗他们不容易。”

腕儿，现在他角色变了。可以随便招呼他垫场，找他当救火队员，哪里需要就让他补哪里，谁让他得为大家负责呢。”

糟心事多了，吴秀波悟出个道理，剧组的事，演员的事，都是过去或者将来的事，他能尽力解决，但都无法掌控，唯一能掌控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自己的情绪。“所以，这333天，我遵循的唯一一个原则就是——不生气。我真的做到了。”吴秀波说。

在国内，有些制片人是找钱的，有些善于卖钱，也有一部分关心艺术。吴秀波想作为整个项目服务的制片人，这和当下很多互联网公司的CEO思路一致。“我要为所有工作在其中的人创造一个场，在这个场域里所有人都能修行，能发挥最大的光芒。”

吴秀波说，《军师联盟》里找的大多是“饿不死”的演员。所谓“饿不死”就是戏好，人好，可能不红，但只要演员这行存在，这样的人永远有口饭吃。“如果我不是运气好一些，也会是个‘饿不死’的演员。一有职业能力，二有职业道德，可能不是明星，但30年后照样能演戏。这个行业把我们饿死？你试试看。”

对于自己创造的这个“场”，吴秀波很满意。他毫不谦虚地说，于和伟塑造的曹操就是超越了他曾经的刘备，因为这个拍戏环境能让每个演员毫无顾虑地钻研角色。

创造这个“场”的代价不小。整个剧组在横店耗了333天，导演张永新只休息过一天——五一劳动节。整部戏是按剧本顺序顺拍的，这样一来，演员的情绪容易带入。代价是，和按场景拍摄相比，耗时要增加两到三倍，成本自然大幅度提升。

演员吴秀波是那种要充分理解角色动机和心理，才能把戏演顺的演员。制片人吴秀波很理解演员的这份拧巴，在拍摄现场，他花了大量时间把演员说通说顺。杨修的扮演者翟天临想不通自己演的这个早夭的角色，觉得他是个坏人，吴秀波就和他断断续续聊了3天。“好人和坏人是谁定的？杨修的一生该如何定义？我们聊对每个角色的尊重。他最后一场戏原本在剧本里没有，是我、天临和永新在现场聊出来的。”

最容易做演员的时代

在演艺圈里，吴秀波是少有的经历过生活磨砺

的人。他有能胜任制片人的圆滑一面。比如，把剧名落在《军师联盟》，而不是《司马懿》上。他半开玩笑地解释：“对演员、对投资都好交代。我说，李晨来给我演个戏吧。他说，好啊，什么戏？我说，司马懿。他问，我演谁？这接下来我就没法接了。但叫《军师联盟》就没问题了，曹丕是所有军师的头啊。”

随着年龄的增长，吴秀波越世故老辣，就越向往简单纯粹，他觉得，后者是一个演员安身立命的根本。“放下所有的立场，所有的知识和情感捍卫，进入某一个角色，那是一种快感，但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吴秀波这番话，我不太理解，这与我对老戏骨、老表演艺术家的认知有悖。我宁愿把他的说法理解为将近天命之年的困惑和危机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感受到精神与肉体的沉重，因而更向往轻盈的活法。但轻盈很难，所有轻盈都建立在对安全感，甚至是责任感的轻视之上，这对50岁的人来说是种危险的活法，对吴秀波也不例外。

因为实践起来困难重重，吴秀波就更看重具有这样特质的人。张永新身上有，他合作过两次的女导演薛晓路身上更有。尽管在吴秀波看来，《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还有一些技术问题，但他依然愿意演，愿意听置他的意见于不顾的薛晓路的差遣，为的就是保护她创作上的那份初心。

“有些技术上并不成熟的东西，我说了她也不改，但如果她有新戏找我，我还是愿意和她合作。因为她在创作的心境上还是幼稚的，而你都不幼稚了，我多想和她一样简单纯粹啊。”吴秀波说。

在吴秀波看来，当下这个时代是最容易做演员的时代，只要你没有表演和艺术上的追求，那现在就是演员最好赚钱、最好出名的时机。

但这钱赚得没那么痛快，因为与表演无关。所以，他想做制片人，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让自己演得痛快。“人有两种需求，一种关乎精神，一种关乎无知，我做过很多尝试，却从来没在戏剧以外找到一种能满足我这两种需求的活法。我但凡能再找到一个，都不会做这件事。”

采访快结束时，有人问吴秀波，以后是不是都要这样做戏了，自己做制片人，自己演。吴秀波想了想，回答说：“如果我做演员的命运依然叵测，我只能如此。”



陈兑

加州注册心理师
《通往真爱之路》



孟子

娓娓道来，从科学角度解读真爱，很有启发和作用。



人比黄花胖

谢谢朵拉，这些话说到我心里去了。你的课给了我信心！



Yvon

振聋发聩的小课。谢谢老师，回看自己的生活，感觉很多事情都得到了解释，这就是哲学的力量吧！



a^tman

谢谢老师。人生，正是不断地选择，冲突，挣扎，最终找到自我，谢谢。



田Candy

可是这三个“着陆技术”，只是暂时地消除了焦虑情绪，如果多次使用这样的方法抑制，身体也会免疫吧



清流

临床咨询经验超过6000小时的心理咨询师
《打败紧张、焦虑、愤怒，三大情绪敌人》



李剑

牛津学者、社科院专家
《难以选择时如何更好的做选择？》



马良坤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教授
《备孕二胎你必须准备的十件事》

放下你的焦虑

「中读小课」



扫描二维码
下载「中读」客户端



(王小京 摄/国家大剧院供图)



铃木忠志和两出希腊悲剧

文 / 王菲宇

《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国家大剧院首演的前一天，刚刚过完 78 岁生日的导演铃木忠志依旧亲临现场指挥。他戴上白手套，一丝不苟地将作为道具的座椅摆到舞台之上，指挥现场灯光调试，调度演员的动作。彩排间隙，铃木悄悄询问一直在现场拍摄的摄影师，自己的作品是否太过于艰涩难懂。

疑问产生于几日前的《特洛伊女人》的演出。铃木忠志发现，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都走向了剧目简介板。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特洛伊女人》原本就是戏剧性较弱的文本，铃木忠志的改编将戏剧性再度削弱：特洛伊城的沦陷作为故事的大背景，剧中人物唯一的戏剧动作就是对境遇的持

续哀叹；他安排了地藏王菩萨和阿波罗两座神明在舞台上现身，但几乎一动不动。

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次带来国家大剧院的两部作品，具有诸多可供比照的相似性。两部剧作都改编自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其中的女性角色都成为戏剧的核心。在《酒神狄俄尼索斯》里，铃木把焦点放在了彭透斯的母亲阿高埃的身上，这个女人夹在男人的争夺与异族的纷争中，在非清醒的状态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用铃木忠志的话说，尤其能凸显古希腊悲剧“极度戏剧化的内容和人物行动激烈的情绪反应”。

虽然铃木忠志的这两部作品均创作于上世纪 70 年代，但这两部作品在当代语境下都彰显出惊人的隐喻性。《特洛伊女人》中抱着孩子的幸存妇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难民潮中带着孩子流离失所的母亲。



(王小京 摄/国家大剧院供图)

2

而《酒神狄俄尼索斯》中因为阻止狄俄尼索斯教在忒拜的传播而遭到毁灭的彭透斯一家，则让人联想到因为政治和宗教冲突而引爆的战争。

在向媒体介绍这两部作品时，铃木忠志的旧识、国家大剧院戏剧总监徐晓钟引用了铃木忠志自己写在书里的两句话：“我的理想是创造一朵永久的花，造一座衔接经典和当代的桥梁，用戏剧照亮我们的时代问题，这是当代戏剧导演的使命。”

和寺山修司、唐十郎等日本战后“小剧场运动”中流砥柱一样，铃木忠志是所谓的“战后第一代”。当时的日本社会，流行的是所谓“新剧”。“新剧”以翻译外国现实主义剧作为主，契诃夫、易卜生是经常搬演的对象。而在表演方式上，则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为范本。铃木忠志则很早就表达了对这种戏剧表达方式的无动于衷。他在笔记中这样写道：

“到目前为止，观看‘新剧演出’的经验都叫我失望。新剧导演似乎都假定，你就应该是读了那个剧本，脑子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印象，而他们只是尝试在舞台上最终才创造出一个同样的印象。其实，



(高尚 摄/国家大剧院供图)

3

日本戏剧大师铃木忠志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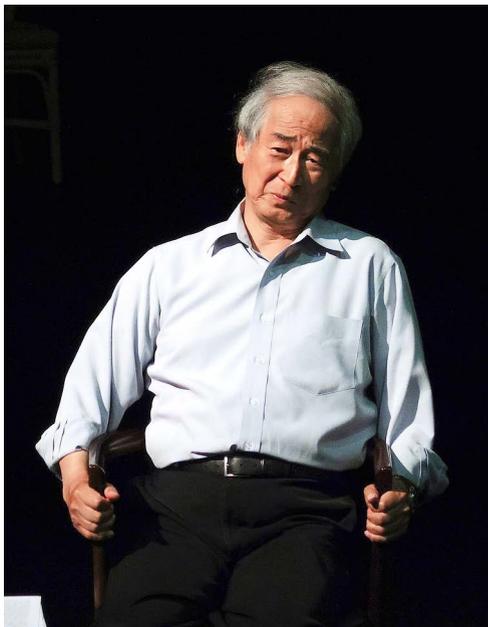
1~2.《酒神狄俄尼索斯》剧照

3.《特洛伊女人》剧照

戏剧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你不能够用你阅读剧本时的意识，来演出剧中的人物。戏剧经验最迷人之处，在于发现阅读剧本时印象之外的含义，从而背叛和推翻之前的印象。”

1966年，铃木忠志和他的“新剧团自由舞台”在东京新宿区一家咖啡馆的二楼搭建起专门的排练场“早稻田小剧场”。在这里，他与女演员白石加代子相遇，并从后者身上获得了极大的灵感。白石加代子并不是专业演员出身，但她的舞台演出具有表现力。从1969年开始的连续三年里，他和白石加代子合作发表了《戏剧性巡礼》三部曲。特别是其中的第二部，几乎是为白石加代子量身打造。她在其中饰演一名发疯的老太婆，后来日本评论家扇田昭彦这样评价：“充满浓密的身体感觉，极具侵犯力与激情，让我们不敢直视。”

早年白石加代子在舞台上的激烈剧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样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舞蹈。60年代初，在“反安保条约”等社会思潮影响下，寻找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成为日本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选择。舞蹈直接反抗玛莎·葛莱姆的现代舞体系，



铃木忠志

以身体、残缺和死亡为核心概念，将日本神道教传统和仪式融入表演。而从70年代开始，铃木忠志将古希腊悲剧与日本传统能剧的形式方法结合，逐渐构造出自己的舞台美学。

他尝试古希腊悲剧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欧里庇得斯的《特洛伊女人》。这也是铃木忠志触及的第一个西洋文本，他试图通过这部作品解决一个“新剧”未能解决的问题：在不装扮成西洋人的情况下，东方人如何表现一个西洋文本。特洛伊城被焚毁，男子被杀尽，妇女沦为奴隶，等待着命运的宣判。这是一个公认的缺乏戏剧性的文本，然而铃木忠志却又有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戏剧人，我认为没有什么能比被迫等待和想象一个可悲无常又无法改变的命运更具有戏剧性的了。”

《特洛伊女人》首演于1974年12月，时任岩波剧场艺术总监的铃木忠志邀请“能剧国宝”观世寿夫与白石加代子同台共演，他既是倾听老太婆倾诉的地藏王菩萨，也是与被杀害的特洛伊女人依偎的阿波罗神。整出剧时间不过一个小时，以一个老妇在临死前回忆家族命运而展开，这个命运便是《特洛伊女人》中描写的故事。

在铃木忠志看来，无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

系，还是继承了这一衣钵的纽约演员工作室，都没有演出古希腊悲剧的传统，因而永远无法奉献如《特洛伊女人》这样的表演：赫卡柏和老太婆在极少移动的情况下，讲述大段的台词，而神明没有一句台词，只将锡杖举起，或将一只手捂在胸口微微屈身。在接受采访时，铃木忠志说，他曾经带着这部戏在伦敦演出，整整一个小时矗立不动的神明让英国的戏剧评论界万分惊讶。然而在铃木看来，这种编排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如果让一个神在台上到处乱走，这是肯定不行的。”

而在1974年的日本岩波剧场，更让观众惊讶的也许是在剧末出现歌曲《爱你在心口难开》（*I Want You Love Me Tonight*）。欧阳菲菲的这首流行金曲发表于1973年——也就是《特洛伊女人》首演一年之前。占岩波剧场观众席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官员，无不因此瞠目。

一直到40年后，当这首歌在北京的舞台上回响之时，其震惊效果依然不减。一方面，熟悉的歌曲让这部形式上具有相当距离感的剧作忽然显得亲近起来；另一方面，流行歌曲与古希腊悲剧的拼贴，让这部情节性本就不强的剧作，在结尾处愈发显得扑朔迷离。

不同于剧评人纷纷揣测导演试图用歌曲表达女性的独立自主，铃木忠志在这首歌里实际投射的是人类对神明不作为的失望。在剧终，老太婆倒下，神明欲伸手相助却还是没有触碰到，这时卖花的少女将花丢在了地藏菩萨身上，《爱你在心口难开》的音乐在这时响起。“无法寄托的神，以及无法诉说的恨，遇到这种不幸，竟然依然不得不呼唤神的名字。”

《特洛伊女人》前后诞生了两个演出版本。1982年，当这部话剧在富山县利贺山村举办的首届“利贺国际戏剧节”中亮相之时，铃木将老太婆、赫卡柏、卡珊德拉三个角色合而为一，这一版本延续至今。一个女演员在一部戏中同时担纲三个重要角色，这无疑是对演员的巨大考验。

在谈到戏剧的本质时，铃木忠志曾经将剧场中的所有元素做减法，从而得出了“演员和观众”是戏剧最为重要的两大因素的结论。评论界普遍认为，在“早稻田小剧场”早期，铃木忠志最为紧密的合作者是剧作家别役实，而其后转向与演员的亲密合作，实际上将创作关注的重心从文本转移到了表演。

铃木忠志本人并不同意这种认为他将文本置于

次要地位的普遍看法，他这样解释：“戏剧演出创作中最重要的挑战是演员应该如何表现文本。”在他看来，不同的文本需要不同的表演方法，例如在古希腊悲剧的表演中，存在着某种“神性”：“表演，尤其是古希腊悲剧中说台词的行为，最初并不仅仅只是对着一群观众展现某件事情，而是一种对着神灵的呈现，古希腊悲剧演员充当着某种萨满巫师的角色。”

与之可以比照的是日本传统表演艺术中的一个概念“骗”。“骗”意为表演者用自己的想法感染别人，将别人拉入一个共同的气氛当中。铃木认为，日本演员在长年的经验当中，可以展现出一套“说故事”的表演技巧，同时也是“骗”的身体技巧。

基于这种目标而建立的“铃木训练体系”，强调身体被观看的意识，讲求干净准确的动作，在舞台上用台词发声传递能量。他把注意力集中于下半身，尤其是足部，这种概念与日本传统能剧以足部活动创造表现力环境如出一辙。在铃木看来，现代主义戏剧来到日本之后，与传统表现方法完全割裂了。而他的训练体系则旨在新与旧之间建立桥梁。

“为了应对现代化削弱演员技艺的现象，我努力地还原表演中身体的整体性。我的尝试并不只是简单地创造类似能剧和歌舞伎的形式，而是利用能剧和歌舞伎，以及其他前现代传统戏剧的共同特质。通过突出和发展这些历久不变的共同特质，我们创造一个机会，重新巩固我们当前已被肢解的身体机能，复苏身体的感受和表现能力。”

从70年代铃木忠志建立这套体系开始，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中国的几千名学员，接受了铃木方法的训练。训练中，一项练习是让演员在一段时间内配合音乐节奏跺足。一位曾在2015年亲身经历过训练的戏剧人这样描述铃木的训练：“排练时不允许喝水、不允许上厕所，因为演出时同样不能。先开着音乐正走步伐，用身体进行记忆，然后关掉音乐再走。所有人里只有田冲和一个外国演员做对了，但是铃木说，一个集体的水平往往跟着水平最低的走。”

铃木要求的分毫不差和整齐划一，在《酒神狄俄尼索斯》中可以得到最好的体现。五把椅子在舞台后沿一字排开，五束灯光照射其上，五个全身披挂的狄俄尼索斯教僧侣端坐其上。当缓慢变奏的能剧音乐响起，五名身穿红白相间长袍的狄俄尼索斯

教信女从舞台两侧盘旋而入。她们以相同的速率旋转，手上的粉雾在一致的时间播撒开来。

争议从来没有停止。排斥这一表演方式的人认为，铃木将演员在舞台上的创造力降低到了极限。“在日本也有人这样批评，还有人说我是封建式的家长，但是重视‘个性’是西方的价值观。现在电影电视售卖的是‘个性’，所以戏剧也会出现明星领衔，突出个人，而我更强调‘集体’。”

这种对“集体”的追求遇到古希腊悲剧，正如神魂相遇。在铃木忠志看来，现代主义戏剧将歌队的形式取消。而在古希腊悲剧中，歌队象征着社会和集体的声音。“古希腊戏剧是一种评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社会戏剧。”

铃木忠志将古希腊悲剧形容为“对人类社群暴力犯罪本质作最深刻检视的戏剧形式”。无论在《特洛伊女人》还是《酒神狄俄尼索斯》中，欧里庇得斯都用悲剧形式探索杀人的本质和其背后的驱使动力。“古希腊悲剧提出了人类最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跨文化和时代的。”

《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上演轨迹大概能说明这种普遍性。这部剧1978年在日本首演，之后在苏联解体前夕的莫斯科塔甘卡剧院、海湾战争爆发后的纽约林肯中心分别上演——几乎遭遇了时代的每一次轻微震荡。剧中阿高埃对儿子的杀戮，则让今天在网络上目睹了“伊斯兰国”暴行的当代人心有戚戚焉。

在最近几年排演这部作品时，铃木忠志特别加强了对于杀戮的调度，以让观众在一出几乎是静止能量的剧作中更直观感受到暴行的残酷。“现在世界上依然存在异文化的冲突。比如不同宗教之间的杀戮，比如战争总要打着一个神圣的旗号，受害的大多是女性，是普通人。即使是在今天，也仍应和古时候一样，剧作家的使命就是去揭示那些沉默地压抑在人心的痛苦。”

“表演，尤其是古希腊悲剧中说台词的行为，最初并不仅仅只是对着一群观众展现某件事情，而是一种对着神灵的呈现，古希腊悲剧演员充当着某种萨满巫师的角色。”



1



2



3



4

1. 《理想化的女子像》，米开朗琪罗，纸本素描，28 厘米 × 22.8 厘米，大英博物馆藏
2. 《被诅咒的灵魂》，米开朗琪罗，纸本素描，25.1 厘米 × 35.7 厘米，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藏
3. 《埃及艳后》正反面，米开朗琪罗，约 1528~1532 年，素描，23.2 厘米 × 18.2 厘米，佛罗伦萨博那罗蒂之家博物馆藏
4. 《梦》，米开朗琪罗，约 1533 年，纸本素描，27.8 厘米 × 39.8 厘米，英国考陶德美术馆藏



《米开朗琪罗向华丽的洛伦佐展示他的雕塑》，奥塔维欧·凡尼尼，1638~1642年，湿壁画，佛罗伦萨皮蒂宫

《埃及艳后》非米开朗琪罗亲笔？

文 / 龚之允

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博那罗蒂之家（Casa Buonarroti），是为了纪念伟大而不朽的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1475～1564）而在其故居中设立的一家博物馆。该馆由艺术家的侄孙小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开设，汇集了许多米开朗琪罗的真迹，这些作品也都经由小米开朗琪罗搜集和购买。博物馆设立的时候，距离艺术家的去世并不久远，很多作品的归属都很容易追本溯源，因此其馆藏真伪很少引发争议。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藏品中一幅素描《埃及艳后》，关于原作者的真实身份却引发了争议。

这幅素描有正反两面，正面的女子形象很容易被甄别为埃及艳后，因为她在与屋大维抗争失败后选择被毒蛇咬伤自尽，素描描绘的正是被咬伤后等待死亡的那一刻。而画面的反面，则是1988年进行保养检测时才发现，其实作品背面还有一幅素描。后来美术馆保养部小心翼翼地把背面用化学方法清洗出来，并从原来的素描纸本上揭下，自成一件作品。

背面这一幅上的女子，从造型来看显然是正面那幅《埃及艳后》的之前一稿。该稿完成度非常低，仅仅勾勒出一个人物肖像的框架。虽然它的大块面部明暗处理和五官勾勒显得和文艺复兴时代大师笔下的那些草稿并无两样，却有很多鉴赏家提出，这并非出自米开朗琪罗之手，作者另有其人。

其实在此之前，包括著名的伯恩哈德·贝伦松（Bernard Berenson）在内的很多学者就已经指出过，《埃及艳后》素描的正面版本也不是米氏亲笔。随着背面这幅画的面世，围绕着究竟是否为米氏真迹的讨论，又甚嚣尘上。

无可争议的来源

米开朗琪罗一辈子都献身于艺术创作，先后为8位教宗服务过，其中来自美第奇家族的教宗利奥十世（Leo X）和克莱芒七世（Clement VII）都是他

左图：《教宗利奥十世肖像》，拉斐尔，木板油画，155.5厘米×119.5厘米，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藏



右图：《第一代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美第奇戎装像》，布龙齐诺，16世纪40年代，木板油画，86厘米×67厘米，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美术馆藏



的“发小”。尽管他大部分的大型创作都服务于教会或佛罗伦萨市政府的公共创作，但是他一生也结交了不少朋友，也为这些朋友创作过一些艺术品。虽然雕塑创作可以脱离素描这一步骤，直接用雕塑泥稿（意大利语中被称为博泽托，Bozzetto）的方式来设计和修改，但是米开朗琪罗在与友人通信时附带的作品稿图一般还是使用素描稿的形式。米开朗琪罗精通诗文，并且接受过系统的拉丁文学习，他的书信和文字稿件中不时会附上诗词。他的诗词配上他的素描，这种书信形式更接近中国古代文人画的风范。他留下的素描稿大约有500余件，但实际上还有几千件素描稿都被他本人定期销毁了。

素描《埃及艳后》的来历实际上非常清楚，是小米开朗琪罗从第一代托斯卡纳大公科西莫·美第奇手中购得，而科西莫大公则是从罗马贵族托马索·卡瓦列里（Tommaso dei Cavalieri, 1509～1587）那里强行获得的。卡瓦列里在1562年给科西莫大公的信件中无奈而悲怆地说：交出这么一幅画稿就如同老来丧子般让人痛心疾首。这一事件被米开朗琪罗的学生，因《艺苑名人传》而传世的瓦萨里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下来，而瓦萨里也曾

长期身为科西莫大公的宫廷画师，他的记录应是比较可信的。那么为何卡瓦列里对米氏这么一幅素描有如此强烈的情感呢？

卡瓦列里是米开朗琪罗的忘年交，出身奥尔西尼（Orsini）家族。该家族是罗马名门望族，华丽的洛伦佐·美第奇的正妻即来自于该家族。卡瓦列里曾两次被选举成为罗马市的保卫官，可见其地位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非同一般。

1532年，已经年近耳顺之年的57岁的米开朗琪罗（在当时已经属于高龄了）遇到了23岁风华正茂的贵族公子卡瓦列里，便一见如故，或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两人柏拉图式的感情一直持续到了米氏故去，长达30多年之久。卡瓦列里被认为是米开朗琪罗的缪斯，米氏为这位年轻“恋人”所献的诗歌就有30多首（米氏一生所作诗歌有300首，十分之一都献给卡瓦列里）。其中一首诗《致卡瓦列里》（节选）这样写道：

为何我要寻求安抚炽热的欲望，
当泪水和随风而去的悲词仍然存在，
当天堂，或迟或早，都无法，
为火焰所吞噬的爱的灵魂带来宽慰？

……

我情愿寻找那能主宰我胸怀的人，
在她的欢愉与哀婉中缓缓划过，
假如链条与绳索能保佑我的幸福，
如果没有奇迹，我也会甘受寂寞，
心甘情愿成为戎装骑士的俘虏，
这就是一个奴仆的告白。

素描《埃及艳后》就是作为他们来往书信时的附属礼物，由米开朗琪罗馈赠给卡瓦列里的。米氏赠给卡瓦列里的素描约有6幅，瓦萨里把《埃及艳后》颂为“惊人的素描”，米氏同时代的人则把它誉为“完美无瑕的描绘”（perfettamente dipinta），可见米氏这幅素描是一幅完整的画作，而不只是为壁画或油画所作的设计草稿。

无解的争议点

伯恩哈德·贝伦松等人之所以质疑《埃及艳后》正面的那幅较为完善的描绘是否出自米氏之手，是因为他们认为在文艺复兴时代，素描的职能是设计稿，不会被作为一幅完整的作品而被艺术家重视，而将描绘的精细程度做到如此极致。米氏确实有很多素描都有涂改和未完成的痕迹。比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的《利比亚女先知素描》，画面上就有各种设计的比对。又比如作为同样赠予卡瓦列里的《梦》，其背景中的人物也没有细致的描绘。还有被后代艺术家经常模仿的《季诺碧亚》其头部和胸部的描绘与《埃及艳后》有相似之处，但该作也是一幅草图。实际上贝伦松他们的这种说法也有缺陷，比如大英博物馆藏的《理想化的女子像》就是和《埃及艳后》类似的完整的素描。

另一部分学者质疑的是在《埃及艳后》背面那幅新发现的女子像，他们认为这幅画像在解剖结构上，特别是女子的眼球部分，其描绘非常外行，不像是出自米氏这样的大师手笔。也确有记载辅证这一质疑：据史料，米氏“诱惑”卡瓦列里的手段除了写非常露骨肉麻的情诗之外，还向后者充分展示他的艺术才华，以“教授画技”的名义保持着交流。卡瓦列里也确实在米氏的指导下学会了绘画。米氏在教授学徒时有个习惯，就是让学徒把习作画在稿纸的背面，然后他把修改的素描画在正面，通过这样的对比，显出他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才华。米氏在后半生被当时欧洲的文艺界誉为“神佑者”（il

divino），他的艺术才华被认为是天降神授，非凡人研习可得。很有可能卡瓦列里就画了那幅丑陋的埃及艳后，而米氏把修改稿画在了正面，然后顺水推舟又作为礼物送给了他的梦中情人。

但这一质疑也有无法自圆其说的地方。米氏有一幅著名的素描《被诅咒的灵魂》，也描绘了面目狰狞的疑似女子的头像，这幅素描也只是点到为止。“埃及艳后”这一题材在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两面性，因此米氏有理由把她画成两种完全不同的样貌。在罗马帝国时代，由于其政敌屋大维的政治宣传，埃及艳后被描绘为淫欲和权欲永不满足的红颜祸水。而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则采取了中立的立场，认为埃及艳后对死亡的抉择是勇敢与高贵的。中世纪基督教根据教父哲学的原则，埃及艳后是一面倒被谴责的；而文艺复兴时期，新柏拉图主义则又再次把埃及艳后拉回到了塔西陀的视角。卡瓦列里所拥有的《埃及艳后》，描绘的正是她介于生死之间的那个关键时刻：她已被毒蛇所咬，她的命运已经注定，但她还有短暂的存活时间。对这一瞬间的把握，可以反映出画家对埃及艳后的态度。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时刻，也可以说是一种“薛定谔的猫”，即生死未定，悬疑之间。米氏习惯于使用超越自然的手法来做夸张的描绘，以呈现艺术惊人的感染力。这种形体的比例变形早在《圣殇》和《大卫》上得以体现。《大卫》雕像就有引发争议的头大身体小的问题。为此，达·芬奇还作为评审者批评了米氏的雕塑。然而正是这种夸张的造型，开启了一种新的艺术风尚。米氏认为像蛇和火焰一样的形体才是完美的，因为两者变幻莫测，有着无限的力量和动感。他这种艺术思想后来就发展成了欧洲的巴洛克风格，他也因此被誉为“巴洛克之父”。

因此，正反两面的《埃及艳后》都有可能是米开朗琪罗亲笔所绘。即便采取科学的手法，在画作上查出了卡瓦列里的DNA，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既然《埃及艳后》是老米送给情人的礼物，卡瓦列里端详绘画时留下DNA也不足为奇。由于历史的见证人早已故去，《埃及艳后》究竟出自谁的手笔只能成为悬案。从笔触上也行，从绘画完整性上也罢，都无法给予决定性的证据。倒是米开朗琪罗对素描的态度，值得学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John Addington Symonds, 1904, *The Sonnets of Michel Angelo Buonarroti*, 2nd Edition,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

为非洲社区而建造

文 / 钟和晏 图片提供 \ Kéré Architecture

西非建筑师弗朗西斯·凯雷以生态敏感和社会参与性的设计著称，那些符合背景环境的低成本建筑仍然保有它的尊严和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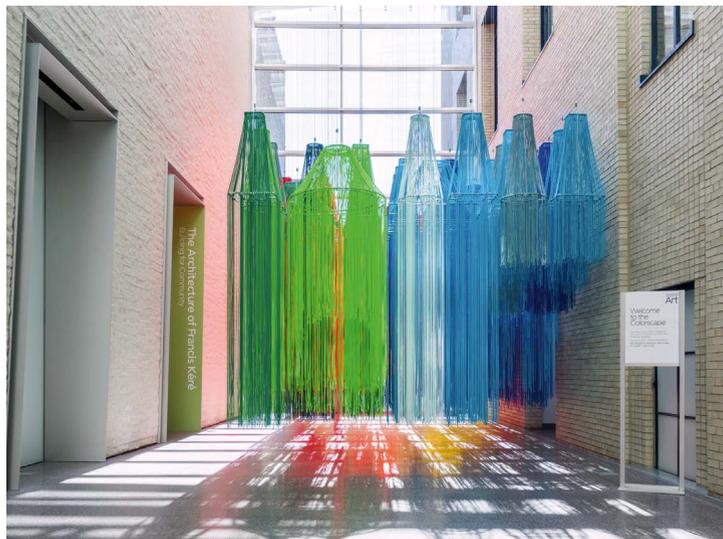
弗朗西斯·凯雷 (Francis Kéré) 作为建筑界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首先源自他不同寻常的幼年经历。他 1965 年出生于西非布基纳法索名为甘多 (Gando) 的沙漠村庄，距离首都瓦加杜古以东 200 多公里。总共 2500 居民的村庄里近乎一无所有，没有自来水和电力，也没有学校、医疗保健所和社区中心等基础设施。

然而，他作为村长的儿子还是获得了罕见的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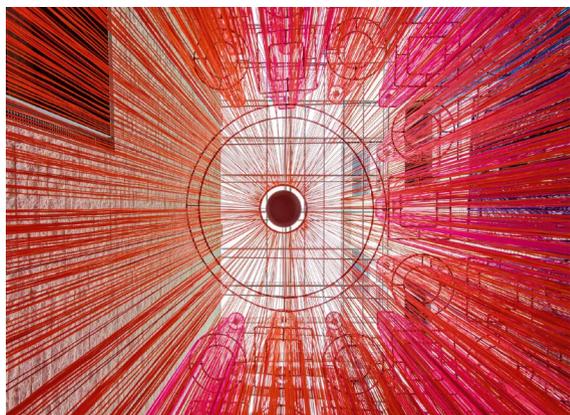
会，能够到邻近城市上学，高中毕业后赢得去德国学习的奖学金。后来，他毕业于柏林技术大学建筑系。

近些年，作为全球少数非洲建筑师之一，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欧美一些重要建筑和艺术活动中。仅仅去年后半年，慕尼黑建筑博物馆和费城艺术博物馆就分别举办了他的作品主题展“彻底简单”以及“凯雷的建筑：为社区而建造”，费城的展览也是他第一次在美国举办个展。今年 3 月份，他被美国艺术和文学学院授予阿诺德·布伦纳 (Arnold W. Brunner) 建筑纪念奖。

6 月 23 日，他为伦敦蛇形画廊设计的夏季展亭开幕。蛇形画廊的这一年度项目始于 2000 年，继扎哈·哈迪德、弗兰克·盖里、库哈斯等明星建筑师之后，



2



4



3



5

1. 弗朗西斯·凯雷设计的 2017 年伦敦蛇形画廊展亭，深色屋顶下的深蓝墙壁代表一棵大树的建筑版本

2. 2016 年，费城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凯雷的建筑：为设计而建造”展览

3. 蛇形画廊展亭的中心是被钢架包围的露天部分，到了雨天向内倾斜的屋顶变成圆锥形的漏斗

4. 在费城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上，凯雷用绳索表达对费城历史上作为纺织品城的致敬

5. 2015 年，凯雷在德国威尔维特拉园区内设计的 Camper 快闪店

第一次一位非洲建筑师赢得了久负盛名的委托。

在伦敦肯辛顿花园里，凯雷把 2017 蛇形画廊展亭构思为一个微观宇宙，深色屋顶下的深蓝墙壁代表一棵大树的建筑版本。由中央钢框架支撑的宽大屋顶模仿了树冠，空气在其中自由流通，如凯雷在设计阐释中所说：“在布基纳法索，一棵树是人们聚集之处，每天的活动都在树荫下进行。宽大的垂悬式屋顶和开放墙壁的组合促进了自由和社区的感觉，让展亭成为伦敦人聚会、辩论和分享经历的地方。”

亭子占地面积 541 平方米，内部总面积 162 平方米。直径 25 米的屋顶天蓬从中心的椭圆形钢支架上展开，半透明的聚碳酸酯表皮覆盖着屋顶结构，

既过滤夏天的阳光，又保护人们免受雨淋。向外延伸的橙色木制遮阳辐条排列在屋顶下方，向地面投下一圈斑驳的阴影。

一系列弯曲的深蓝色墙壁松散地包围着它的空间，形成四个不同的入口。这是预制木块组装成的三角形模块，如同织布一样，交错排列出倒三角形的图案，细微的间隙透着光线。事实上，深蓝色是布基纳法索人在节日、约会等特殊场合穿着的色彩。

凯雷的设计显然考虑了伦敦夏季的多雨天气。展亭的中心是被钢架包围的露天部分，到了雨天，向内倾斜的屋顶变成圆锥形的漏斗，雨水从地下进入公园的蓄水池中，被用于回收灌溉植物。这样的雨水收集方式又有它的象征性，表明水是人类生存

和繁荣的重要资源。

凯雷受到国际关注的第一座建筑是他为故乡建造的甘多小学，2004年获得了阿迦汗建筑奖。还是柏林技术大学学生的时候，他就创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用于甘多的砖”(Bricks for Gando)，为他的村庄筹集资金来修建缺乏的基础设施。

完成后的甘多小学是三个泥砖制成的简单长方体，统一覆盖在波纹金属的“飞屋顶”之下。这一设计从成本、气候、可用资源和施工可行性等一长串参数列表演变而来，它的成功取决于必须同时接受和否定这些限制。

当地有大量可用的黏土，传统上也被用于建造房屋，黏土砖便宜、易于生产，还能提供抵抗炎热气候的隔热保护。为了建造更加坚固的结构，凯雷改进了传统技术，在黏土中加入10%的混凝土变成混合的黏土砖，让建筑物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

为了使黏土砖墙壁免受暴雨侵害，布基纳法索的许多房屋都有瓦楞金属屋顶。但另一方面，金属板吸收太阳的热量，会使室内空间难以忍受。凯雷对自己在照明和通风不良、闷热难耐的学校环境中学习的痛苦经验仍然记忆犹新。

甘多小学仍然使用了悬垂式的锡皮屋顶，但是它被金属支杆抬高了，拉开了与教室的距离。屋顶下是能够释放热空气的穿孔黏土天花板，让凉爽的空气流动在建筑周围。甘多小学原本计划为150名学生建造，后来吸引了1000多名学生，为此增加建造了小学延伸部分、教师住房等。

甘多小学之后，凯雷又在布基纳法索各地相继完成达诺(Dano)中学、劳永(Laongo)医疗保健和社会促进中心等，都是符合背景环境的低成本建筑，但仍然保有它的尊严和秩序。这些社会参与和生态敏感的设计，为他赢得了2009年全球可持续建筑奖、2013年绿色地球建筑师奖等荣誉。

凯雷的建筑事务所2005年创办于柏林，大概十几人的规模，他用欧洲的项目委托资金来资助布基纳法索的建造，其中大部分是低薪或无偿。当他被问到“为什么将精力集中在非洲大陆和社会性项目上”时，他的回答是：“比起欧洲，非洲更需要我们，那里是我的国家，我出生的地方。毕竟，建造有用的、美丽的、有品质的房子，这是我职业存在的唯一理由。”

贫穷、资源稀缺和极其炎热的气候，这是在非洲建造房子的困难之处，尤其布基纳法索这样的国

家，在联合国最贫困国家名单上排名第二。凯雷必须采用负责任的建造方式，必须学会不浪费任何东西。他说：“当我去参观新项目基地时，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观察它的周围环境，发现大自然可以提供的材料，然后研究气候、分析当地社区的潜在工艺和劳动力的水平等，这一切都是出于资源问题。”

从甘多小学开始，他的适合非洲地区气候条件的可持续建筑就已经呈现出清晰的策略。选用当地丰富的黏土或红土砌筑墙壁，用钢筋桁架将建筑物上方的屋顶升高，使热空气易于散发，也减少了墙壁吸收的阳光热量。自然通风是通过黏土天花板上的隙缝和百叶窗来实现，这是比复制西方的建筑模式更加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施工方式也是保留了全民参与的当地传统方式，在布基纳法索农村，修建住房是一个社会事实。无论谁需要建房子，先是请求村庄的允许，然后所有村民都会参与到施工过程中：妇女运送水，男人们用黏土和泥造砖，孩子们也一起帮助。那些可以建造直墙的人变成了砌砖工人，老人则坐下来给予建议，提醒注意考虑到气候、季节、风向等因素。这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社区的归属感和情感参与被融入其中。

去年，凯雷还设计了迄今为止他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项目——布基纳法索新的国家议会大厦。2014年10月30日，布基纳法索总统布莱斯·孔波雷(Blaise Compaore)试图修正限制总统任期的国家宪法，来延长他已经执政27年的统治，由此引发成千上万布基纳法索人的武力示威，市政厅、执政党总部和国民议会大楼等在抗议中被攻击和摧毁。第二天孔波雷下台，2015年11月布基纳法索举行了首次公开的总统选举。

作为前法国殖民地，布基纳法索拥有1900万人、60多个部族和60多种语言，国家需要一个新的议会大厦充当不同群体的共同据点，新任国会议长邀请凯雷提出建筑和总体规划。动荡的历史事件将国家引向十字路口，它该如何前行？凯雷的观点是——新议会大厦“不仅需要传递透明、开放和平等的核心民主价值观，也可能成为首都瓦加杜古整体发展的促进因素”。

去年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上，作为“寻找新的瓦加杜古”展的一部分，凯雷建筑事务所首次公布了他们的设计方案。127个座位的新议会大厦是一座山丘般的梯田式建筑，6层的高度从瓦加杜古



奥巴马遗产校园

Obama Legacy Campus

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祖母莎拉·奥巴马多年来一直为艾滋病孤儿提供衣服和食物，为了向肯尼亚儿童提供持久的教育资源，她的基金会确立了“莎拉·奥巴马遗产校园”这一重点项目。尽管自己没有获得过正规教育，但她坚信教育的变革和影响力。

由凯雷建筑事务所设计的遗产校园是一个教育园区，位于奥巴马父亲的出生地肯尼亚西部尼安萨省科盖洛村（Kogelo），包含儿童早期成长中心、小学和中学三个部分，它将为 1000 多名学生和学前儿童提供服务。

为了强化社区教育，每所学校都是针对具体的年龄组设计，提供适合这一年龄段的图书馆、游乐场和运动场。三所学校彼此独立，以礼堂、运动场和自助餐厅等共享公共空间连接。这些公共空间不仅用于会议、学校庆典和体育赛事，也能被科盖洛村 3600 位居民以及周边村落使用。遗产校园的总造价约 1200 万美元，目前奥巴马祖母基金会正在为此积极筹集资金。

的平坦地形中脱颖而出。在布基纳法索，90%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农业对于它的生存与繁荣至关重要。出于这个原因，新议会大厦的外立面上被整合了绿色的梯田，这是鼓励城市农业的公共实验室。

与蛇形画廊展亭一棵树的意象相似，他的设计仍然从传统中寻求方案。在西非农村，村庄的长者总是聚集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商议重要事情，村庄里的决策过程不是闭门发生的事情，社区成员可以自由地坐在附近观看整个过程。在大会堂旁边的花园里，凯雷恢复了“商议树”的传统，方便议员们聚集起来享受树下的阴凉。

瓦加杜古的大多数居民从未见过高于一棵树的高度，新议会大厦以盛大的阶梯形式邀请人们攀爬就座，占据整个建筑物的表面，无论从现实还是隐喻层面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按照凯雷的解释：“我们希望整个建筑物成为公民拥有的平台，人民能够在政治家上面，还有什么比这更具民主象征意义？”



利斯·肖格中学

Lycée Schorge Secondary School

在布基纳法索有 13 万居民的库杜古城市（Koudougou）边缘，慕尼黑一家促进西非教育和创业的组织委托凯雷设计了利斯·肖格中学，总面积 1660 平方米的学校是目前他完成的最大建筑。

学校位于一片半干旱的长条形土地上，由围绕庭院径向布置的 9 个独立矩形体组成，每个模块面积 85 平方米，包含一系列教室、办公室以及牙科诊所等。沿袭传统村庄的方式，这样的布局可以保护中央公共庭院免受风沙影响并提供隐私。

模块的墙壁由本地采集的红土砖砌筑，具有美丽的颜色和多孔的纹理表面，这是一种地下土壤，暴露于空气中时会迅速硬化。红土砖墙与引风塔和悬垂式屋顶相结合，降低了内部空间的温度，五彩金属百叶窗将光线和空气带入室内。

如同透明织物一般，这些模块被一层桉树制作的木质屏风围绕着。桉树是当地一种快速增长的树木，通常用于脚手架和烧柴，在这里它充当了教室、庭院和走廊的遮阴元素。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场材料，凯雷还设计了家具，和当地工匠一起用胶合板、螺纹钢等建造剩余废料制作了数百把课桌和椅子。



1

给西装来点“不正经”

记者 / 杨聃

“技术宅也需要一些东西来表达自己是一个很酷的人。”

进化中的严肃着装

早些年大面积高饱和度的印花在男装体系里简直“罪无可恕”，它顶多出现在T恤、沙滩裤或者度假衬衫上。如今连西装也沦陷了。像电视信号测试基图这样夸张的图案，搭配同系列领带，成了时下最风靡的风格，反正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吉米·坎摩尔这么穿了，还有汤姆·汉克斯。

这些看起来有点儿“不正经”的西装是荷兰品牌 OppoSuits 推出的，三个创始人在 2012 年欧冠足球赛用 2000 套橙色西装打开销路，随后伦敦奥运



2

会上的米字旗西装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他们大客户通常是足球队、橄榄球队及其球迷们。“我们创造了一种鉴于时尚和新奇之间的西装，它比一般的西服要酷，但也谈不上时尚。”创始人之一的兹维特对《Business Insider》说。

“毫无疑问，我们并没有打算把它卖给朝九晚五的上班族，而是给那些不想穿得太严肃，或是想以某种风格去参加派对的人穿的。”有些特别款式，像是“吃豆人”（Pac-Man）游戏主题西装和《星球大战》联名款授权，成了OppoSuits重要的优势。

OppoSuits病毒式的传播终于让无趣的男装多了一种风格。无论是职业装还是休闲装，男装的变化无非是增加或减少一粒纽扣、双排扣变单排、更换衬衫的颜色、缩缩领带宽度和裤长而已。如今，越来越多的色彩和花纹出现了。

突破保守的第一步尝试往往是口袋巾，因为它在整体造型中所占的面积最小，“泡芙状”的刺绣口袋巾已经是最大限度的“主权宣告”模式了。

随着西裤越来越收紧的布料，袜子成了第二个

突破口。传统的金科玉律是皮鞋、西裤配深色袜，只有迈克尔·杰克逊理直气壮地穿白袜配黑鞋。现在看来，男性在花袜子这件事上的关注度逐渐赶超过了女性。毕竟，73%的男性在所有的场合中都会穿袜子，而女性的比例仅是39%。

西装革履和鲜艳花纹的袜子成了潮男标配。作家乔什·比尔曼是这样理解的：“袜子之于男人就像贴身内衣之于女人，只有他自己知道裤子下面藏着它。但当他走路的时候，不经意地露出一点点线索让别人可以瞥到里面的样式。”

华尔街发起的名为“星期五之袜子”（Friday Socks）的运动，号召金融男们在周五穿上鲜艳的袜子去上班。硅谷的技术男同样如此，初创投资公司Homebrew的创始人亨特·沃克甚至将色彩鲜艳的袜子比作科技产业的“黑帮符号”。对此，一个专做有趣袜子的创始人评价道：“技术宅也需要一些东西来表达自己是一个很酷的人。”

如此看来，难怪Millennial系列袜子会那么火，其设计的特点在于袜子的正面是一个个灰色、黑色



1. 刚果的 Sapeurs 一族
2. OppoSuits 豹纹男装
3. Sapeurs 一族的重点是
不管优雅与否，都要潇洒随性
4. Vetements 男装
5. 瑞克·欧文斯男装
6. 亚历山大·麦奎恩男装

和棕色的色块，以便和西装或者其他商务正装搭配，但袜子的侧面和背面则调皮地使用了绿色、红色、黄色以及斑点的设计。从正面看是穿去上班，从背面看像是穿着去派对。就像瑞克·欧文斯所说的：“最成功的男性时尚是在保守中点缀一丝反叛。”

终于，这种个性的表达从细小的配饰蔓延到了以严肃著称的西装之上。要知道，时尚作家克里斯多福·布里渥（Christopher Breward）曾研究过“西装进化论”，自它在1860年左右的维多利亚时代诞生之日起，其设计和剪裁的变化屈指可数。

爱德华七世风格西装是优雅的代表，这种风格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到50年代早期被整个伦敦的上流住宅梅菲尔区所青睐。它所强调的是西服的收腰效果，并辅之以天鹅绒衣领和刺绣西装背心。搭配一顶圆顶硬礼帽、一双轻亮的皮鞋、一把雨伞，

就成了这种英伦绅士的范本《王牌特工》里科林·费斯饰演的哈里·哈特。这种传统的西服制作工艺，大约需要四大工序、300余道小工序，靠使用衬布来构筑它的“骨架”和“脊梁”。

20世纪70年代，日本设计师提供了“中西合璧”的设计方案，高田贤三、川久保玲、山本耀司，他们用解构的方式把西装变成了休闲风格，这与一本正经的英国裁缝街刚好相反。到了80年代，乔治·阿玛尼改变了肩膀部分倾斜的设计，自肩部以下呈褶皱状，使曲线更加柔和，同时改低了纽扣的高度，采用了更轻盈的面料。改装后的西装多了几分“妖娆”，理查·基尔在《美国舞男》中扮演的朱利安就是范例。

当然还有像铠甲一样紧裹身体的迪奥黑色贴身西装，有人这样评价它：“要是你的身材有一点点不够挺拔就别想穿进这衣服。甚至在穿的时候也必须做深呼吸，否则就会看起来不对劲。”卡尔·拉格斐就是迪奥西装的爱好者，据说他著名的减肥事件背后的动机除了健康的考虑，也是为了把自己塞进去。

多些随性，甚至是丑陋

去年圣罗兰的秋季男装走秀上，西装的数量只有3套；葆蝶家有5套，爱马仕和菲拉格慕各有4套，博柏利只有1套。传统剪裁的款式在T台基本消失了。根据欧睿的市场调研报告，2015年美国的西装销量下滑2%，这种下滑态势已经持续3年了。

《华尔街日报》此前的一篇文章提到，摩根大通、普华永道等金融机构正在改变公司严格的西服政策。模糊的界线让相对有趣的“类西装”市场逐步扩大。设计师们从廓形、细节、面料等方面思考，试图解决西装过于严肃的形象问题。再高冷的品牌也无法古板下去了，秀场上穿着 Joseph Abboud 姿态随意的男模，布里奥尼的闪亮摇滚套装，以及巴黎世家超大廓形的男士造型都在试图跟无聊撇清关系。

2010年《华盛顿邮报》曾经报道过这样的场景：一个黯淡的午后，一辆栗色的奔驰车急速停止，让空气中的沉闷气氛有了一丝动态。这时从上面走下来一群穿着时尚的年轻人，他们身上喷着古龙水，身上的衣服展示着各种各样的潮流。台球厅一位打球者高喊：“标签！标签！请展示你们的标签！”其中一名叫作犹可达·邦吉的20岁年轻人一边像著名摇滚巨星米克·贾格尔那样高视阔步地走着，一边





左图：德赖斯·范诺顿男装

右图：各类派对上花袜子成了暗号

指向自己莱茵石皮带扣，口里说着：“范思哲，看清楚了，这是范思哲品牌的皮带！”

另一个报道中提到的人物是路约卢，一个工科学生，以销售DVD为生，居住在一间摇摇欲坠的两层楼的店铺里面，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平时就睡在卧室地上的一张席子上。但在路约卢卧室裂开的墙壁上，挂着一套黑色的“杜嘉班纳”品牌西服。他表示，有时，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的亲戚会给他寄送衣服，有时他会去路边的服装市场购买，或者从时尚爱好者那里借来用。他打开衣箱，从中取出一件长长的黑色山本耀司品牌外套，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拉链和扣子，他眼睛发光地说：“这正是我一辈子要奋斗的东西。”

这些人被称作“Sapeurs一族”——极度信仰高级时装。因为把西装玩出了复古时尚风，他们也被列入了《西装：形式，功能和风格》一书中。他们的标配是锥形裤、翻毛皮鞋、修剪整齐的头发，再加一顶斜纹软呢帽，重点是无论优雅与否，都要潇洒随性。

正是跟 Sapeurs 如出一辙的心态，让 T 台上多了很多难以理解的现象，比如“西太后”薇薇安·韦斯特伍德把街边矿泉水瓶捡来给模特做鞋

子；克雷格·格林把模特装扮成衣服挂，整场秀都没看到男模一张完整的脸；川久保玲的2017秋冬秀上，模特穿着异型膨胀的黑心棉，头饰像极了钢丝清洁球儿……随性，甚至是丑陋代替美，成了时尚的常态。

刚刚结束的巴黎男装周上，设计师德赖斯·范诺顿想要探索在男装的色彩实验上能走到多远，其中包括了：意大利蛋糊的金黄色、树皮般的栗色、蓝龙般的钴蓝色以及琥珀沙色等等。于是你会发现模特的气质、设计的细枝末节和色彩组合都很奇怪。丑突然变成了一个难以定义的概念，尤其对于时尚来说，潮流趋势和社交网络的热点一样转瞬即逝。

引用文化评论家斯蒂芬·贝利在《丑：万物之美学》一书中的观点：丑通常被认为是美的对立面，然而，当美在历史上被仔细审视过后，丑却从未得到过同样的对待。它会随着文化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而文化观念又随着时间而改变。我并不想被禁锢在相对主义的概念里，事实上，越是想去探究丑，越会发现它的难以捉摸。时装设计师们似乎深有同感，就像德赖斯·范诺顿曾说过的那样：“没有什么比美更无聊的了，我更倾向那些丑的，让人意外的东西。”

同性恋都是天生的吗？

文 / 袁越

同性恋平权运动的支持者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性取向是遗传的，后天无法改变。这句话后来被流行歌手嘎嘎小姐（Lady Gaga）唱了出来，歌名就叫作《生来如此》（*Born This Way*）。

为了证明同性恋者天生就和别人不一样，科学家们尝试了各种办法。早在1991年，一个名叫西蒙·拉维（Simon LaVey）的英国神经生物学家就宣称他发现男同性恋者的“下丘脑前区第三间质核”比异性恋要小一些，但他的研究并不能证明这个差异到底是先天就有还是后天形成的。他甚至连两者的因果关系都说不清楚，因为他选择的研究对象大都是艾滋病患者，说不定这个差异是HIV病毒引起的。

两年之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遗传学家迪恩·哈默（Dean Hamer）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宣称他在X染色体上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区域，能够决定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同性恋。这篇文章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很多人学着他的样子试图寻找传说中的“Gay基因”，但都无功而返。

所有这类研究采取的都是“寻找相关性”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从同性恋人群当中采集DNA样本，再和普通人群做对比，看看前者的基因组内有哪些独有的特征。这些年陆续有人在第7、8和10号染色体上找到了一些似乎和性取向有关的基因片段，但相关性都非常弱，远不足以成为“Gay基因”的候选目标，双方的因果关系也就更加无从谈起了。

但是，在平权运动支持者们的努力下，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同性恋是天生的，性取向是一种遗传特征。比如，1977年进行的一项盖勒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0%的美国人认为同性恋是天生的，如今这个数字增加到了将近50%，相比之下，相信同性恋与后天环境有关系的美国人从1977年的60%下降到了37%。

现在想来，所有这类研究都基于这样一个错误的前提，那就是同性恋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属于某种基因突变。事实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动物界的性行为是非常复杂的，绝不仅仅只有同性和异性这

两种模式。人作为哺乳动物中的一员，在这方面自然也不例外。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性取向成为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是在人类发展史的晚期才出现的，过去的人类社会是没有这样的分类标准的。

因为这个错误的前提，所有关于“Gay基因”的研究都天生带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缺陷，那就是如何定义同性恋。要知道，如今仍然有很多人不愿公开“出柜”，这样的人应该如何统计？更普遍的情况是，同性恋和异性恋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两者之间是有很多交集的。英国一家咨询公司曾经用调查问卷的方式研究过新一代英国青少年的性取向，结果发现仅有48%的人认为自己是100%的异性恋。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在综合了大量研究文献后指出，无论是遗传、荷尔蒙、神经发育、社会变化和文化因素等等都不能完全解释同性恋的发生，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因人而异，甚至和时代都有很大的关系。

比如，新一代西方青少年当中同性恋的比例之所以比过去高了，很可能是因为社会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比过去更加宽容所导致的。而且，这种宽容不但可以让此前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不再隐瞒自己的性取向，而且会让一些勇敢的人主动选择适合自己的爱情模式。比如美剧《欲望都市》里的女演员辛西娅·尼克松（Cynthia Nixon）就曾经公开表示自己之所以和一位女性结婚，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和天生的性取向无关。

人类的很多喜好看似是遗传的，其实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而发生改变。比如很多在基因检测中被检查出应该讨厌香菜的人最终都因为中国菜大量使用香菜而喜欢上了它。另外，遗传下来的东西不见得就应该被保护，比如讨厌甚至恐惧和自己长相迥异的人是多年进化留给人类的一项本能，但这绝不能成为种族歧视的借口。

一个成年人应该有选择自己恋爱模式的自由，这种自由和遗传什么的没有关系，无论同性恋、异性恋还是双性恋，都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

听到球门柱的诉说吗？

文 / 张斌



1978年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战胜荷兰队夺冠

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足球赛，遥远得只剩下破碎的黑白影像。那是中国内地第一次电视转播世界杯，也只有45岁以上的人曾有过真实的围观黑白电视目睹阿根廷夺冠的温暖记忆。那年我9岁，记住了宋世雄老师的嗓音和肯佩斯进球后漫天飞舞的纸屑，当然，那时候家中尚无电视，整个楼道里只有那位退伍军人叔叔家有一台9英寸的电视机。

记忆很奇妙，众人皆是碎片的，拼合在一起才接近完整。近日，偶然发现一位同龄的苏格兰人福瑞斯特居然在念叨40年前的那届神奇大赛，他除了感慨苏格兰队空有夺杯实力，但总无冠军运程之外，居然从记忆深处挖掘出一个鲜见的细节。那届世界杯赛决赛中的球门柱接近地面的位置上都被漆成黑色，这是为什么？偶然还是另有寓意？

福瑞斯特不断翻看着阿根廷世界杯赛画册，那球门柱上的黑色不断映入眼帘，需要奔赴那个南美国度穿越到往昔，让答案说话吗？自有苍天做主，福瑞斯特的妻子获得一次学术研究的机会，登陆阿根廷，专注研究军政府统治时代的黑暗历史。一家人飞跃大西洋，距离答案近了一些。

1978年，阿根廷深陷军政府统治，决赛阶段开打之前，数千国民消失，事后证明他们因政见不同而被秘密囚禁在集中营中，多数人再也没有回到人间，福

瑞斯特的妻子就是要唤醒这一段时光中的国民记忆。布宜诺斯艾利斯中央商务区中便有一座秘密集中营，居然命名为“竞技俱乐部”，理由是距离著名的博卡青年竞技俱乐部仅有一箭之遥，暴政就隐匿在寻常巷陌。

带着世界杯画册，福瑞斯特操着一口糟糕的西班牙语，逢人便指着黑色的球门柱寻求答案，但毫无收获，被问到的阿根廷人从照片里总能发现不同的兴趣点。看来一定要回到历史场景里，找寻到历史当事人。纪念碑体育场——阿根廷足球圣地，就是在那里击败克鲁伊夫的荷兰队，把金杯留下的。如今，已找寻不到球门柱的黑色痕迹。看了一场乏味的联赛比赛后，福瑞斯特有幸在一位当地朋友的安排下，赛后第二天得以漫步在球场上，场地管理员自然被追问到球门柱的隐秘。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去问巴伦蒂尼吧，他还活着。

一周后，推开厚重的房门，福瑞斯特见到了端坐家中正在品酒的巴伦蒂尼。开门见山，老人嘶哑地说道，1978年年中，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有国民在神秘失踪，失去孩子的母亲开始走上街头，国民对抗专治强权的情绪在凝聚。据说，决赛来临前，主教练梅诺蒂在纪念碑体育场的休息室里，压低声音告诉球员们，不要为那些将军们夺取金杯，要为看台上那些工人、屠夫、面包师和出租司机而战。这就是1978年的阿根廷。

巴伦蒂尼与同事们曾有过大胆的想法，在球场广告牌上刷标语抗议强权，或者将球场的草皮在修建时特意显露出抗议组织的标识，但这都太冒险了，他们会因此成为新的失踪名单中的一员。恰好此时，国际足联要求阿根廷组委会完善纪念碑体育场的球网支撑物，阿根廷学着1976年南斯拉夫欧洲杯赛的样子来完善球门后支撑方式，但绝不更换球门的任何部件，因为在阿根廷人看来，那可都是具有神性的东西。

只需一夜时间，纪念碑体育场的两端门柱底部都被漆成黑色，完全可以替代球员臂缠黑纱的效果。军政府派人来追问，巴伦蒂尼从容作答，这是当地的传统，而自我标榜尊重本土文化传统的将军们只得作罢。40年过去了，巴伦蒂尼否认那是无声的抗议，不过是永远的铭记罢了，那时的阿根廷人也只有如此了。福瑞斯特大喜过望，终有答案，请老人在画册上签名纪念，起身便走。巴伦蒂尼怒吼一声，“这就要走啊？难道不想问问阿根廷和秘鲁是不是踢了假球吗？”

解决问题需要更多的时间

文 / 宋晓军

7月5日，当朝鲜自称首次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和中俄外交部就朝鲜半岛问题签署了《联合声明》后，美国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研究员费什（Isaac Stone Fish）在《卫报》上撰写了一篇题为《特朗普缺乏对朝战略拉近了中国和俄罗斯距离》的文章。这位在中国住过7年的国际问题资深记者的文章副标题是：如果双方扩大利益对美国的长期利益而言将比金正恩和他的导弹更具破坏性。看到这个副标题，我想到了美国的三位国防部长和他们的文章及谈话。

先说在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担任过国防部长的佩里（William J. Perry）和卡特（Ashton B. Carter）。2006年6月22日，佩里和卡特联名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果有必要，打击或摧毁》的文章。文章建议当时的小布什政府不能无视朝鲜正在发展的可打到美国的洲际导弹技术，认为如果有必要，就要对朝鲜实施“外科手术”的打击，摧毁朝鲜正处于研发阶段的“大浦洞”导弹试验设施。他们认为，一旦等到朝鲜掌握了洲际导弹技术，不仅美国的常规打击力量不能确保摧毁深藏在地下的洲际导弹及发射装置，而且美国的反导系统也不能确保准确拦截朝鲜的洲际导弹。但根据小布什政府当时的国务卿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2011年出版的回忆录《无上荣耀》中的描述，小布什当时并未采纳佩

里和卡特的建议。

接着再说现任特朗普的国防部长马蒂斯的态度。事实上，自今年初“朝鲜半岛问题”不断被媒体热炒以来，马蒂斯一直对此保持了一个相对低调的态度。比如在5月28日，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国家”栏目主持人迪克森（John Dickerson）采访时说，一旦朝鲜半岛发生冲突将是“灾难性”的。再比如，当7月6日朝鲜宣称成功试射了“火星-14”洲际导弹后，他对福克斯新闻说：“我不相信（朝鲜）这种能力会使我们更接近战争。”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想11年前两位国防部长与现任国防部长在对待朝鲜发展洲际导弹的态度上的差异，与朝鲜2006年10月至2016年9月进行了五次核试验有关。当然，这是一个影响因素。但我想说的是，他们在看待中俄两国影响力上的差异。比如2006年佩里和卡特在文章里就认为，如果美国因朝鲜发展洲际导弹对其实施打击，“中国和俄罗斯会因为朝鲜的鲁莽和‘六方会谈’失败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感到震惊，但是中国和俄罗斯不会保护朝鲜”。而11年后，在中俄对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后，不仅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表态谨慎了很多，同时他还于6月13日在参院军事委员会就2018财年国防开支进行听证时说“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俄罗斯和中国寻求对他们外围国家的经济、外交和安全决策拥有否决权”，并正在各个领域试图限制美国能力的投送。可见，马蒂斯与前文提到的《卫报》文章的作者费什对中国与俄罗斯的“联手”是有着相似担忧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马蒂斯被认为是“学者型”国防部长，进入21世纪后作为军人他亲历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从“基于威胁”到“基于能力”转型的探索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对美军能力相对于中俄两国下降的现实，也应该有清醒的认知。因此他对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所表现出来的“谨慎”，很可能对特朗普产生了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在G20峰会上对中国领导人所说的那句“解决朝鲜问题需要更多的时间，这个时间比我和您预想的都要长……”是很值得玩味的。☑



7月4日，朝鲜宣布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4”发射成功

国家只是一种无机物

文 / 维舟

作者以平实的叙事记录了他的父亲作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生命轨迹。真正的战争反省，恐怕正应从每个普通人成为具有思考能力的主体开始。



小熊英二与他的作品《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普通人战争前后的经历

最艰难的社会生活，可能存在于那种形式与现实严重脱节的时代——战争期间尤其如此，当你每天为“如何在兵荒马乱中活下去”而发愁时，听到的却是国家告诉你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为国牺牲。尽管对一个深陷危机中的群体而言，这些宏大的目标也有其必要性，但它们毕竟脱离人们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太远，因而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即便在集体陷入神学狂热（以及作为其变体的世俗激进政治）之后，都或以其智慧，或以其愚蠢，最终本着自我延续的求生意志，谨慎地避开了那些大到不着边际的说辞。

即便是“二战”时总动员化、标榜“举国一致”的日本，在经历了几年筋疲力尽的战争之后，人们紧绷的神经也已麻木了。小熊英二在《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中记述他父亲小熊谦二的回忆，到1944年底时，出征入伍时那种挥舞“日之丸”国旗的壮行会已经不举行了，“因为入伍召集逐渐频繁，大家都变得不再关心”，即便是稀稀拉拉前来送行的几个亲友，也没谁“表现出振奋人心的壮行气氛”。所有要求别人做出牺牲的宏大理由与承诺，除非像宗教那样是在来世才兑现，否则总无法让人长久地相信有这样做的必要性。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是，对当时的日本而言，这种“战争看不到头也看不到好处”的感受也许更令人沮丧，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历次战争中几乎无不是速战速决且获利丰厚，直到军部那些跋扈的将军们终于玩脱了。

在这难以抵挡的时代洪流中，当时刚过19岁生日不久的小熊谦二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分子。虽然也曾有一点独立思考的意识（在那个年代当然也很危险），不过就像他自己坦承的，“自己既没有支持战争的自觉，也没有反对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随波逐流。虽然政府说有重大战果，但局势反而更加恶化，总觉得非常诡异。但是没有深入追究的习惯，也没有可供探讨的资讯。像我们一般的普通人，大概都处于这种状况”。这确实应该是那个年代日本

平民的真实处境，也解释了何以他们即便有所不满，但战争期间却始终没有大规模有组织的社会反战运动。小熊英二在这本书中，多次强调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普通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通人在战争前后的经历就不值得记录，恰恰相反，正是这种普通性赋予了一种普遍意义：“我父亲采取的行动，潜在性上是所有人都可能采取的行动。”

如果反过来理解，那这也意味着：小熊谦二在战时、战后的遭遇，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因为他所“采取的行动”，实际上都带有某种被动应对的特质。之所以被动，是因为个人在那种大时代，根本无从抵抗国家机器的强制，很难有自由的选择权。像小熊谦二这样，在战争结束前夕被征入伍，作为新兵还未完整受训，就被苏军俘虏，就此在冰天雪地的战俘营里度过了三年青春期，虽然侥幸生还，但他也失去了进入大企业的机会，又罹患结核病而失去了一个肺，堕入了社会中“下层的下层”。如他所言，当时的日本社会，是“脱离过正轨一次之后，就永远无法回归了”。即便如此，相比起那些没熬过来而死在战俘营里自此消失的同伴，他已经算是幸运了。

最令人产生荒诞和幻灭感的是：这一切的磨难，有时只是一些偶然性造成的。小熊谦二受的苦，是因自己偶然地把本籍地设在新潟，因而被征召前往中国东北；而他的东京籍同学，却只是留在国内挖了一些防空洞后，就迎来了战争结束的时刻。无怪他感慨“所谓人的命运，有时候一点微小的差异就会造成重大区别”，这其中又包含着某种无奈，因为被战时体制所支配的普通人，在面对这种命运分岔的时刻，根本无能为力。

迈向独立思考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是这段改变他人人生道路的战俘生涯，使他学会了独立思考，由此造就了后来的自己——他所具备的许多人生判断并不都是“常识”，而可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殊人生经历的结果。苏联战俘营的生活尽管艰苦，但却给他

这样从未脱离国内体制的人一个觉醒的机会：他得以目睹一个人如何能在那样极端的环境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也看到拥有底层生活经验的人更能熬过最艰苦的时期；在对比中意识到苏军的官兵之间要比日军平等得多；更得以领悟到发动战争的军部和国家如何欺骗、利用了自己这样的平民。当初军方要求他们为国牺牲，可是当他们被俘后，关东军却把他们当作赔偿给苏联的劳动力物资，甚至在给苏方的陈情书里非常客气地说：“（受俘日军）返回（日本内地）之前的时间，将极力协助贵军之经营，敬请尽情调度使用。”

正因此，当他活着回来后，才能更明确地反对那套体制：为什么庶民们受尽磨难，甚至即便活过来，攒下的钱也在战后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化为尘埃；但发动了愚蠢战争、把人们逼上绝境的那些高级官僚与军阀，却即便战败仍能领取高额退休金？他们至少应当负起责任。他甚至认为天皇也应“先退位一次”，因为“发布开战诏书的大元帅为战败负起责任，是极其正常的”。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想法，1974年在菲律宾卢邦岛重现人间的原陆军少尉小野田宽郎，虽以右翼言论引人注目，但也在回国的第二年就表明“天皇应该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日本虽然战败，但却并未彻底清算原有体制。天皇的责任始终暧昧有争议，而除了甲级战犯之外的其余人等也大抵不了了之。早在50年代，负责占领的盟军总部（GHQ）经济科学局局长克列马上校就曾说过“日本的军人养老金制，在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极其恶劣”，这种制度优待军属，给予高于普通国民的特殊待遇，而这正是“谋求世袭军人阶级永存的一种手段”。与此同时，正如田中伸尚在《战后日本遗族透析》中说的：“日本对战死者的援护工作，是以‘与国家处于雇佣关系’的军人、文职人员为中心进行的。但是，即使同处于雇佣关系者，因没有日本国籍，也被排斥在外。”这样，战后得到的补偿不仅仍是论资排辈，而且朝鲜等原殖民地被迫征发士兵由于已经不算是日本人，也得不到分文补偿。原则上日本政府对战争被害者的态度就是“不赔偿”，理由是“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

简言之，“不赔偿、不道歉，但抚慰对方”。

小熊谦二的一句话最能概括他的觉醒：“我自己对国家有所怨恨，所谓的国家，与人心不同，只是一种无机的物质。”那仿佛是卡夫卡小说《城堡》里的景象：一个冥冥中的抽象力量，既不能和它说理，也不能敲开与它对话的门，但它却左右着你的生活。说它是“无机的物质”，是因为它让人有很多“想不通”的非理性之处，不按照“人心”的逻辑来运作，并且不是它来顺应人，而反过来要求人来适应它。

尽管如此，日本国内的这种战争反省，却仍可以说是一种“基于平民视角的受害者意识”，只不过他们认为加害者不是与他们作战的美军苏军，而是愚蠢的高层官僚。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一家破产企业的底层员工，抱有某种“我们没做错什么，应该是那些做了错误决策的高层辞职谢罪”的怨恨，而他们应受谴责的与其说是“伤害了共同体之外的他人”，倒不如说是“把事搞砸了”。即便如小熊谦二，内心也觉得“俄国人与自己一样，都只不过是坏好的制度与政策的受害者罢了”，也就是说，他自视为日本战时体制的被动受害者。这又与中国当时国共

两党的“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应该受谴责的是那些发动战争的战犯”一拍即合，但却与“对亚洲人民的加害责任”显然又有着不小的距离，甚至还增加了这一转变的难度。正如一位“二战”遗族石崎菊曾说的：“我们遗族好不容易才极其痛苦地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死去的丈夫、父亲、孩子等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对亚洲人民的加害者。”

为了在经历了那些可怕的事情之后活下去，每个人也许都不自觉地筛选、重组了自己的记忆。尽管作为一位普通人，小熊英二已经表现出可贵的对他人处境的理解与想象，也能相对客观地评价日本的体制，然而他也在相当程度上回避了日本普通人的战争责任，实质上假定了只有一小部分人需要为战争负责，而受害者的主体主要也是日本平民，甚至都未必扩展到“亚洲人民”，那毕竟又是远离他经验的事物。这在某种程度上恐怕正是因为当时的日本人身为国家体制下缺乏主体性的顺民，本身就没有担负责任的意思，就像谦二说的，上级“既没教大家要自己思考，也不期待我们思考”。从这一意义上说，真正的战争反省，恐怕正应从每个普通人成为具有思考能力的主体开始。■

《读书》2017年第七期目录

欧树军 美国军政关系的变与不变
田雷 一九三七：美国最高法院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姜奇平 分享为什么经济
刘成 多元化的信用创造与货币的多元化

西学与中国

考古学如何与“中国”结合（孙庆伟）·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传统与反思（孙飞宇）·中国现代史学的使命与“全球史”的真正建立（江渭）

短长书

学问真性情：梁漱溟的批评与被批评（罗志田）·杨家的《夜奔》（徐凡）·难忘王均先生（李行健）

盛洪 为什么“满街都是圣人”？
余成峰 从老鼠审判到人工智能之法

陈忠平 梁启超与何蕙珍“情事”新考

陈慧 布罗姆“棒”打弗莱为哪般？
张欣 为喜悦所惊，如风般不安
徐伟光 现代政治语境中的道德论证

品书录

《哲匠录》的洞察与回响（徐怡涛）·历史研究的温情与敬意（邵建斌）·中国农村应有怎样的未来（郝志东）

孔令伟 拉达克与清朝欧亚情报网的建立

陈言 “夜行性肉食动物”的精神史 著译者言

刘运峰 从孙犁手迹看其晚年生活与心态

刘吉平 《韦兹莱日记》中的罗曼·罗兰
朱红 花开半妍的意味

张颖 在可见/可说的临界处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余华：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2）

文 / 朱伟



作家余华

1988年第一期《北京文学》发表余华的中篇小说《现实一种》，我们当时读到，都吓了一跳：他怎么能这样，似乎带着微笑，就轻松洒脱地写一个家庭，亲人之间越来越残酷的报复？一改1987年他对抽象提炼的兴趣，这个中篇小说的故事性特别强。这残杀表面看是由哥哥山岗仅4岁的孩子皮皮不经意将弟弟山峰的儿子摔死始，但余华其实在写皮皮用耳光等待堂弟“如愿以偿的哭声”时，就铺垫了这种轻松的残酷。4岁的皮皮当然不懂得生死，他把堂弟抱出去看太阳，麻雀飞下来时，他觉得手里抱着的东西越来越重，自然就松了手。是余华的叙述令我们惊悚：没有这样写生命如此之轻的。山峰的儿子轻易就摔死了，山峰于是让山岗交出皮皮，做什么呢？让他“把那滩血舔干净”。余华描写，皮皮望着那滩亮晶晶的血，竟“想起一种鲜艳的果浆”，他伸出舌头，“一种崭新的滋味”竟“油然而生”。山峰随即一脚踢去，山岗就看到儿子“像块布一样飞

起来”。

两个孩子都死后，山岗与山峰的媳妇各自选择的报复手段是——山岗买回来一包肉骨头，带回一条小狗。他不动声色地把肉骨头煨烂，让山峰自愿绑到窗外那棵树的树荫里，用木板固定了双腿，将烧烂的肉骨头涂在他脚底，引小狗来舔。山峰奇痒难耐，就开始笑。余华写他的笑声“像两片铝片刮出来一样”，“笑得连呼吸的空隙都快没有了”。山岗却在旁边问他：“什么事这样高兴？”他让自己的兄弟活活笑死，不知余华如何能出其不意，想到如此恶毒的残酷。

山峰死后，杀人偿命，山岗于是被枪毙，他被戏剧化地连击三枪，而山峰媳妇的恶毒，是假充他妻子，捐献了他所有的器官。最后一节写医生们如何瓜分山岗的尸体——剥皮，取走他所有的脏器，最后一个外科医生要剔除肌肉与筋膜，带走骨骼。余华写他捏捏粗鲁的肌肉，对山岗的躯体说：“尽管你很结实，但我把你的骨骼放在我们教研室时，你会显得弱不禁风。”优雅又俏皮的文字，将冷酷写到淋漓尽致，这就是坏笑着的余华。

与《现实一种》同时间，他在1988年第一期南京《钟山》上发表了另一个中篇《河边的错误》，写一桩其实并不复杂，却叙述得扑朔迷离的杀人案。么四婆婆的鹅被放到了河边，她去赶鹅时被杀。就如侦探小说的写法，余华在第一节就交代，当事人共有五个：三个男人，其中有一个是疯子；一个女人，最后一个是孩子。案情本是清楚的：凶手就是疯子，作案也非谋财害命，因为么四婆婆将攒下的钱折成一条，都搓在麻绳里了。余华有意隐瞒着疯子与么四婆婆的真实关系，小说结构在当事人被调查过程中的心理扭曲所造成的迷离中，案情继续发展，河边继续杀人，一直延续到那个目击者孩子被杀、另一位当事人自杀。余华是有意不交代彼此的因果，让你思考“错误”的意味：是疯子错杀，还是调查酿就了错误？最后，刑警队长开枪打死了疯子，“因为法律对他无可奈何”。公安局长为了保护刑警队长，让他在医生面前扮演精神病人。这个中篇显得有点冗长，这是故事内核容量不足的缘故。

紧接着，就读到他在《收获》上发表的《世事如烟》。我记不清自己究竟是哪年初见余华了，向他求证，他说是1988年9月，他进鲁迅文学院后，之前与我通过信、通过电话。通信与电话我是记得的，我记得他得意地笑着的声音：“我知道，《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朱伟就会来找我。”在我记忆中，依稀1987年下半年是与他见过面的，地点也许是在李陀家里？那时我住白家庄，李陀住东大桥，距离很近，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就过去了。我记得是在李陀家里，我们一起聊过笔记小说。80年代下半期，在西方现代主义的种种技巧都已不再新鲜后，开始有回头看古人小说的回流。回头一看了不得，我记得那次话题就是聊古人的想象力与叙述之简洁。我读的是民国吴曾祺编的《旧小说》，上海书店的影印本。记得余华当时说他读的版本，不知是否为民国江畚经选编的《历代小说笔记选》，那也是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

我感觉，《世事如烟》明显是在阅读笔记小说的背景下，余华对自己的又一次迅速超越。没想到他能如驾清云般，轻松就掠那些陈腐而过，以“如烟”二字就鸟瞰了。不似我，迷恋而拘泥之。这个中篇用第三人称叙述，其中的角色都用数字或其他符号：7一病不起，算命先生说是被儿子克的，儿子换成鸡，病就渐渐好转了。接生婆的儿子是司机，司机梦见轧了灰衣女人，去找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防止另一只脚也踏进死里，路上遇到灰衣女人就要停车。司机花20元钱买下灰衣，开车轧了衣服，女人回家就死了。司机去参加灰衣女人儿子的婚礼，在婚礼上因屈辱自杀，也没逃过衣服的宿命。司机死后，接生婆深夜出诊，去的是坟场，接生回来遇见算命先生的最后一个儿子，算命先生的儿子死了，接生婆自己也死了……

这小说似乎处处在写命运之手操控的神秘宿命，算命先生似乎是枢纽所在。但在“如烟”的标题指向下，所谓命途，无论司机与灰衣女人、与2和6的女儿，无论3与她的孙儿、瞎子和4、算命先生与他儿子与4，都只是“世事”“众生”，一张脱不出的棋网而已。说余华“轻松掠陈腐而过”是因为，他能像《聊斋》故事一样，精妙地写接生婆

的阴间接生；能借葛洪的《抱朴子》说算命先生的续生术，脱出窠臼写“采阴补阳”；能不断脱离直接因果写意外；这一切的一切都构成一个个坚实的，供“如烟”鸟瞰的，棋格般的局部。在这些精彩局部的组接下，他以一个中篇，就凌驾了笔记小说的传统叙述类型的综合。

更重要的是“如烟”的叙述。叙述效果，其实才见作家的真功夫。余华写这个中篇里司机见接生婆洗脸，竟能将水写成“像一张没有丝毫皱纹的白纸，母亲正将这张纸揉作一团”。小说中写得最精彩的段落，大约是第三节导致司机自杀前，新娘给他擦脸的过程和最后一节4裸着的歌声导引瞎子走进江水的诗意。余华写新娘给司机擦脸，先是“毛巾迎面而来，抹去了2的手指”，这是视线，像蒙太奇；然后，“一只手轻轻按住了他后脑，他体会到了五个手指的迷人入侵”。当他后来变得一无所有时，新娘按在他脑后的五个手指，又变成了“五个生锈的铁钉”。叙述入骨了。

瞎子与4这一对关系，是小说中的超现实叙述。4的声音是瞎子眼前的鲜艳，余华写瞎子初听这声音，“像水果一样甘美”，“飘来时似乎滴下了几滴水珠”。结尾4的歌声携带这瞎子走向江边。余华描写，4感觉到，江水正在给裸身的她“穿上一件衣服”，而4的歌声伴着江水慢慢淹没瞎子的时候，瞎子又听到了那颗水珠的跳动，“似乎是4微笑发出的声音”。余华说他写作进度很慢，这样的文字，确实是寻寻觅觅的结果。☑（待续）



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4年出版的《余
华作品集》三卷
本(2)，第一卷是
短篇小说、中篇小
说，第二卷是中篇
小说，第三卷是长
篇小说

爱情特殊分子

文 / 没有窗户的面包车 图 / 陈曦



在我生活的地方，离婚率很高。这一点，我们都见怪不怪了。不过，已经 30 岁的我也总会在想，究竟是我们的婚姻观念开放前卫，还是压根没把婚姻放在眼里？

我是一个拉祜族人，相信很多人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们生活在云南西双版纳山区，人口只有不到 50 万，一个寨子里也就几百人。出了云南，外面的世界里很难见到我的同伴，因为我们真的不会离开这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些山头上。我们靠天吃饭，因为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很好，几乎不会出现什么天灾，虽不富足，但总有吃穿。这些年，靠着茶树和莫名其妙被城里人炒热的“古树茶”概念，附近的山头几乎一夜暴富。我们开始雇用山下的傣族人来帮忙采茶，要知道，千百年来，傣族人才是这里的老大。

虽然生活变了，但我们这些少数民族从骨子里还是生殖崇拜的原始部落。不光是拉祜族，周围的傣族、哈尼族、布朗族等等都是这样。通常到了十七八岁，就该结婚生子了，早一些的，也有十五六岁就当上爸妈的。皮肤黑、屁股大的女子在这里最受欢迎，因为能干活、能生育。闪婚的多，闪离的也多。有的 30 岁时都已离过几次婚了，说起来好像比分手还容易。老老少少都看得挺开的，处不来就分开吧，何必强求？

我算是这个寨子里有点特殊的年轻人，爷爷是当年上山下乡时插队的知青，他从河北过来，娶了奶奶，就留在了这里。因此，我的血统里有一部分是汉族的。然而，我也不是个异类，还是加入了离婚大军。我离过一次，在这里算是正常，不会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你，也不会有人因此而不愿意嫁你。

我是闪婚，认识一个月就结婚了。她是个性格有些彪悍的女子，在西双版纳和老挝边境的小县城生活，家里是做外贸生意的，她的母语是傣语，还会说汉语、老挝语和泰语，在边境地带游走自如。相比之下，我只会说汉语和没什么用的拉祜语，我们之间的交流用汉语，就好像一个韩国人和一个日本人用英语谈恋爱，但这也不妨碍什么。

结婚后，我们去了老挝开餐厅，生意很一般，勉

强维持。在老挝生活得很困难，因为语言不通，每天出去买菜，我都要带上一个厨子给我当翻译。开饭店期间，我也会帮着她家做一些生意。不过，我总被她家里人嫌弃，帮不上什么大忙，弄不来那么多钱。她也会有些嫌弃我，因为我不懂做生意，她总说我是“教育系统”的，是个“书呆子”。我哪里是个“书呆子”呢？不过是教过几年体育课，还真没什么文化，倒是平时喜欢听听歌写写东西，这一点算是拉祜族的异类。

在边境做生意，没有几个“不湿鞋”的，尤其是在云南和东南亚国家的边境。我总会被问起有关毒品的问题，当然，我并没有沾过，也压根很难碰到那个圈子。我们所接触到的，顶多是帮别人带一些境外物品入境，都是些寻常东西，手表、电子产品，或是红木，赚点零花钱。说实话，红木利润是最高的，量又大，谁让城里人都喜欢假模假式的中式家具呢？这些事，我见过一些，但并没有涉足很深，我不是那块料。可能正是因为不是那块料，也是我们离婚的一个导火索吧。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吵架的频率越来越高。结婚三年后，她终于提出了离婚，这时我们已经有了孩子。起初我没答应，但反复了四五次，我就烦了，最终还是离了。在我们寨子离婚的年轻人中，我算是纠缠的时间比较长的，可一旦放下也就真的放下了。

现在的拉祜族，很多传统观念淡化，不再包办婚姻，也都是自由恋爱了。然而，我们的恋爱似乎有些太自由了。爱情更像是游戏或者是兴旺家族的砝码，爱上一个人太容易，几个眼神、几句话就能让人寝食难安，那种冲动的荷尔蒙在我们这儿蔓延得尤其迅速，可褪去时也快得出人意料。因为以农业为主，家庭关系就不只局限在柴米油盐中，种地、采茶、卖茶这些事既是维持生计的“事业”，又时时刻刻穿插着家庭矛盾、家族纷扰，再加上民族的一些习俗，爱情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中显得那么脆弱。

可身处其中的我，依旧渴望着，爱情拥有细水长流的温度，不疾不徐，不卑不亢。✍